2026 No.1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MANAGEMENT "CONFERENCE PROCEEDINGS"

06 FEBRUARY 2026

第十二届 可持续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2026年02月06日

泰国格乐大学: 国际学院

Krirk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Contents

Education & Physical 教育&体育 **3**

Medical and Nursing Science Department 医药和护理科学系 **115**

Fine Arts & Musicology 艺术学&音乐学 **140**

教学领导力、自我效能感与双师型教师工作绩效的关系研究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ing Leadership, Self-Efficacy and Work Performance of Dual-Teacher-type Teachers

夏方晨 泰国格乐大学国际学院教育管理系 邮箱：593701036@qq.com

Xia Fangche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Krirk University, Thailand.Email: 593701036@qq.com

摘要：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双师型教师作为职业本科院校的核心人力资本，其工作绩效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与办学水平。本研究基于教学领导力理论、社会认知理论与工作绩效理论，构建"教学领导力-自我效能感-工作绩效"三维分析框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广西 5 所职业本科院校 423 名双师型教师进行实证检验，揭示三者的作用机制及影响路径。研究发现：教学领导力对双师型教师工作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管理教学计划维度的影响效应最强；自我效能感在教学领导力与工作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41.3%；实践技能效能感对工作绩效的预测力显著高于理论教学效能感，体现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教龄与职称的调节效应显著，10 年以上教龄教师群体中教学领导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系数较 5 年以下教师高出 40.2%；异质性检验表明，工科类专业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水平显著高于管理类和艺术类，产教融合深度调节了自我效能感向工作绩效的转化效率。本研究创新性提出"双师型教师成长动力模型"，为职业本科院校师资队伍建设与教学管理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

关键词：教学领导力；自我效能感；双师型教师；工作绩效；职业本科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ual-teacher-type teachers, as the core human capital of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directly affect talent cultivation quality and school performance. Based on teaching leadership theory,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d work performance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eaching leadership-self-efficacy-work performance".Throug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t empirically tests 423 dual-teacher-type teachers from 5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n Guangxi, revealing the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of these three factor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eaching leadership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dual-teacher-type teachers' work performance, with the managing instructional program dimension showing the strongest effect; self-efficacy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eaching leadership and work performance, accounting for 41.3% of the total effect; practical skill efficacy h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redictive power for work performance than theoretical teaching efficacy, reflecting the type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professional title are significant, with the impact coefficient of teaching leadership on work performance in teachers with over 10 years of experience being 40.2% higher than that in teachers with less than 5 years, and the depth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moderates the conversion efficiency from self-efficacy to work performance. This study innovatively proposes a "Dual-Teacher-type Teacher Growth Motivation Model",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faculty team building and teaching management reform in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Keywords: Teaching leadership; Self-efficacy; Dual-teacher-type teachers; Work performance;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1.引言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日益旺盛。职业本科教育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使命。2019 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标志着职业本科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截至 2023 年，全国独立设置的职业本科院校达 32 所，在校生规模突破 12.9 万人（教育部，2023）。广西作为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省份，现有 5 所职业本科院校，办学规模和质量持续提升。

双师型教师是职业院校师资队伍的显著特征，也是保障职业教育质量的核心要素。国务院 2019 年印发的《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到 2022 年，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占专业课教师总数超过一半。然而，现实中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教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能力失衡、企业实践经历不足、专业发展路径不清晰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双师型教师的工作绩效和职业发展，制约了职业本科教育质量的整体提升。教学领导力作为影响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在职业本科院校管理中具有特殊重要性。Hallinger 和 Murphy（1985）提出的教学领导力框架强调，学校管理者通过界定学校使命、管理教学计划、促进学校学习氛围三个维度，对教师教学行为和学生学习成果产生深刻影响。自我效能感作为个体对自身完成特定任务能力的信念，是预测工作绩效的重要心理变量（Bandura，1997）。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普通高校或基础教育领域，针对职业本科院校特别是双师型教师群体的研究相对匮乏。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职业本科院校教学领导力如何影响双师型教师工作绩效？自我效能感在二者关系中扮演何种角色？不同背景特征的双师型教师在教学领导力感知、自我效能感和工作绩效上是否存在差异？研究意义体现在理论层面构建了职业本科院校教学领导力影响双师型教师工作绩效的作用机制模型，实践层面为职业本科院校优化教学管理、提升师资队伍建设质量提供科学依据。。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教学领导力通过设定清晰的教学目标、提供专业发展支持、营造积极的组织氛围等方式，直接影响教师的工作态度和行为表现。Robinson 等（2008）的元分析研究表明，教学领导力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效应量达到 0.42，显著高于其他领导方式。在职业本科院校情境中，教学领导力不仅关注理论教学质量，更强调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职业教育特色要素。有效的教学领导能够帮助双师型教师明确职业发展方向，获得企业实践机会，提升技术技能水平，从而增强其教学绩效、实践绩效和发展绩效。Leithwood 和 Sun（2012）指出，教学领导力通过影响教师的专业能力和工作动机，间接提升教育教学效果。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教学领导力对双师型教师工作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自我效能感作为个体对自身能力的主观评价，是驱动行为表现的重要心理机制。Bandura（1997）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自我效能感通过影响个体的目标设定、努力程度、坚持时间和情绪状态，最终影响行为结果。在教育领域，教师自我效能感被证实是预测教学质量和学生成就的关键变量（Tschannen-Moran & Woolfolk Hoy，2001）。对于双师型教师而言，自我效能感包括理论教学效能感和实践技能效能感两个维度。理论教学效能感反映教师对课堂教学能力的信心，实践技能效能感体现教师对专业技术和企业实践能力的认知。高自我效能感的教师更可能投入更多精力进行教学创新、参与企业实践、提升专业技能，从而表现出更高的工作绩效。Stajkovic 和 Luthans（1998）的元分析发现，自我效能感与工作绩效的平均相关系数为 0.38。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自我效能感对双师型教师工作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教学领导力能够通过影响教师的自我效能感间接作用于工作绩效。有效的教学领导为教师提供明确的工作方向、充足的资源支持、及时的反馈指导和积极的组织氛围，这些都是提升教师自我效能感的重要来源（Tschannen-Moran & Woolfolk Hoy，2007）。当管理者设定清晰的教学目标并传达高期望时，教师会增强对自身能力的信心；当管理者提供专业发展机会和企业实践平台时，教师的理论教学能力和实践技能水平得到提升，进而增强自我效能感；当管理者营造支持性的学习氛围时，教师感受到组织的认可和支持，自我效能感随之提高。因此，自我效能感可能在教学领导力与工作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Thoonen 等（2011）的研究证实，教学领导通过影响教师动机和信念，间接促进教学实践改进。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教学领导力通过提升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双师型教师工作绩效；假设 H4：自我效能感在教学领导力与工作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3.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广西 5 所职业本科院校作为研究场域，包括南宁职业技术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城市职业大学等代表性院校。研究对象为这些院校的双师型教师，即同时具备教师资格证和职业资格证书（或企业工作经历）的专业课教师。采用整群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在每所院校随机抽取机械工程、电子信息、建筑工程、经济管理、艺术设计等不同专业领域的双师型教师进行问卷调查。

数据收集采用线上问卷平台与线下纸质问卷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团队与各院校教务处和人事处联系，获得院校支持和教师联系方式。问卷发放前向教师说明研究目的、匿名原则和数据保密措施，征得知情同意后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 480 份，回收 456 份，剔除无效问卷 33 份（包括规律性作答、大量缺失值等），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423 份，有效回收率为 88.1%。

测量工具包括四个部分。教学领导力量表参考 Hallinger 和 Murphy（1985）的教学领导力框架，结合我国职业本科院校实际进行本土化改编，包括界定学校使命、管理教学计划、促进学校学习氛围三个维度，共 15 个题项。自我效能感量表参考 Tschannen-Moran 和 Woolfolk Hoy（2001）的教师效能感量表，结合双师型教师特点分为理论教学效能感和实践技能效能感两个维度，共 18 个题项。工作绩效量表参考 Borman 和 Motowidlo（1997）的工作绩效理论框架，结合职业教育特点设计教学绩效、实践绩效、发展绩效三个维度，共 18 个题项。所有量表均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赋值 1-5 分。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教龄、职称、学历、所在学院、专业类别等。

4.研究结果分析

4.1 信度与效度分析

问卷信度分析采用 Cronbach's α 系数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教学领导力量表总体 α 系数为 0.941，三个子维度 α 系数分别为：界定学校使命 0.887、管理教学计划 0.912、促进学校学习氛围 0.895。自我效能感量表总体 α 系数为 0.938，两个子维度 α 系数分别为：理论教学效能感 0.916、实践技能效能感 0.923。工作绩效量表总体 α 系数为 0.952，三个子维度 α 系数分别为：教学绩效 0.901、实践绩效 0.917、发展绩效 0.893。所有量表及子维度的 α 系数均大于 0.8，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表 1）。

表 1 各量表信度系数（N=423）

量表名称	题项数	Cronbach's α	分维度 α 系数
教学领导力	15	0.941	0.887-0.912
自我效能感	18	0.938	0.916-0.923
工作绩效	18	0.952	0.893-0.917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效度分析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 值分别为 0.947（教学领导力）、0.953（自我效能感）、0.958（工作绩效），均大于 0.9，Bartlett 球形检验显著（$p<0.001$），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各量表的因子载荷均大于 0.6，累计方差解释率均超过 65%。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三个量表的模型拟合指标良好：χ^2/df 在 1.8-2.3 之间，CFI 和 TLI 均大于 0.90，RMSEA 小于 0.08，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表 2）。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指标

量表	χ^2	df	χ^2/df	CFI	TLI	RMSEA	SRMR
教学领导力	178.52	87	2.05	0.956	0.947	0.050	0.038
自我效能感	245.83	134	1.83	0.963	0.957	0.045	0.035
工作绩效	312.67	132	2.37	0.948	0.941	0.057	0.04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2 描述性统计分析

样本基本特征显示，男性教师占 57.2%，女性占 42.8%；年龄分布以 31-40 岁为主（46.3%），其次是 18-30 岁（28.4%）；教龄在 6-10 年的占比最高（35.7%），其次是 5 年以下（29.8%）；职称以中级为主（48.2%），初级占 32.6%，高级占 19.2%；学历方面，硕士研究生占 62.4%，本科占 31.4%，博士研究生占 6.2%；专业类别中工科类占比最高（52.7%），管理类占 25.3%，艺术类占 15.4%，其他占 6.6%。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表 3），教学领导力总体均值为 3.78（SD=0.69），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三个子维度中，界定学校使命得分最高（M=3.92），管理教学计划次之（M=3.81），促进学校学习氛围相对较低（M=3.62）。自我效能感总体均值为 3.95（SD=0.64），整体水平较高。实践技能效能感（M=4.07）显著高于理论教学效能感（M=3.84），反映职业本科院校双师型教师对实践能力更有信心。工作绩效总体均值为 3.88（SD=0.71），三个子维度得分相对均衡，教学绩效（M=3.93）略高于实践绩效（M=3.86）和发展绩效（M=3.84）。

表 3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N=423）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偏度	峰度
教学领导力	3.78	0.69	1.67	5.00	-0.23	-0.18
- 界定学校使命	3.92	0.74	1.40	5.00	-0.31	-0.09
- 管理教学计划	3.81	0.72	1.60	5.00	-0.19	-0.22
- 促进学习氛围	3.62	0.76	1.40	5.00	-0.16	-0.28
自我效能感	3.95	0.64	2.11	5.00	-0.35	0.12
- 理论教学效能感	3.84	0.69	1.89	5.00	-0.28	0.06
- 实践技能效能感	4.07	0.68	2.00	5.00	-0.42	0.18
工作绩效	3.88	0.71	1.83	5.00	-0.31	-0.11
- 教学绩效	3.93	0.75	1.67	5.00	-0.36	-0.05
- 实践绩效	3.86	0.74	1.83	5.00	-0.27	-0.15
- 发展绩效	3.84	0.77	1.67	5.00	-0.29	-0.18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3 结构方程模型假设检验

采用 AMOS 24.0 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检验教学领导力、自我效能感和工作绩效之间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拟合度检验结果显示（表 4），$\chi^2/df=2.18$，CFI=0.953，TLI=0.946，RMSEA=0.053，SRMR=0.039，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或优于标准值，表明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表 4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

拟合指标	标准值	模型值	判断
χ^2/df	<3	2.18	良好
CFI	>0.90	0.953	优秀
TLI	>0.90	0.946	优秀
RMSEA	<0.08	0.053	良好
SRMR	<0.08	0.039	优秀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假设检验结果显示（表 5），教学领导力对工作绩效的直接效应显著（β=0.412，SE=0.048，CR=8.58，p<0.001），支持假设 H1。教学领导力对自我效能感的路径系数为 0.689（SE=0.042，CR=16.43，p<0.001），自我效能感对工作绩效的路径系数为 0.397（SE=0.045，CR=8.82，p<0.001），均达到显著水平，支持假设 H2 和 H3。进一步分析三个子维度的影响效应，管理教学计划对工作绩效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最高（β=0.438），界定学校使命次之（β=0.401），促进学校学习氛围相对较低（β=0.367）。实践技能效能感对工作绩效的预测力（β=0.487）显著强于理论教学效能感（β=0.356），体现了职业教育重实践的类型特征。

表 5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N=423）

假设	路径关系	标准化系数 β	SE	CR	p 值	结果
H1	教学领导力→工作绩效	0.412	0.048	8.58	<0.001	支持
H2	自我效能感→工作绩效	0.397	0.045	8.82	<0.001	支持
H3	教学领导力→自我效能感	0.689	0.042	16.43	<0.001	支持
-	界定使命→工作绩效	0.401	0.051	7.86	<0.001	-
-	管理计划→工作绩效	0.438	0.049	8.94	<0.001	-
-	促进氛围→工作绩效	0.367	0.053	6.92	<0.001	-
-	理论教学效能→工作绩效	0.356	0.047	7.57	<0.001	-
-	实践技能效能→工作绩效	0.487	0.044	11.07	<0.001	-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4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 Bootstrap 方法检验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重复抽样 5000 次，计算 95%置信区间。结果显示（表 6），教学领导力通过自我效能感影响工作绩效的间接效应为 0.274（SE=0.035），95%置信区间为[0.207, 0.345]，不包含 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总效应为 0.686，直接效应为 0.412，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39.9%（0.274/0.686），属于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结果支持假设 H4，即自我效能感在教学领导力与工作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具体路径分解显示，教学领导力→理论教学效能感→工作绩效的间接效应为 0.112（95%CI=[0.075, 0.153]），教学领导力→实践技能效能感→工作绩效的间接效应为 0.162（95%CI=[0.119, 0.209]）。实践技能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占总间接效应的 59.1%）显著强于理论教学效能感（占 40.9%），再次印证了职业本科院校对实践能力的重视。

表 6 中介效应 Bootstrap 检验结果

效应类型	路径	效应值	SE	95%置信区间	中介类型
总效应	TL→WP	0.686	0.041	[0.606, 0.766]	-
直接效应	TL→WP	0.412	0.048	[0.318, 0.506]	-
间接效应	TL→SE→WP	0.274	0.035	[0.207, 0.345]	部分中介
分路径 1	TL→理论效能→WP	0.112	0.020	[0.075, 0.153]	-
分路径 2	TL→实践效能→WP	0.162	0.023	[0.119, 0.209]	-
中介比例	-	39.9%	-	-	-

注：TL=教学领导力，SE=自我效能感，WP=工作绩效

4.5 调节效应检验

为探讨个体特征变量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多群组分析方法检验教龄、职称、专业类别等变量的调节效应。教龄分组采用中位数分割法，将样本分为 5 年以下（n=185）和 10 年以上（n=156）两组。结果显示（表 7），教龄的调节效应显著（$\Delta\chi^2=18.74$，$\Delta df=3$，$p<0.001$）。在 10 年以上教龄组中，教学领导力对工作绩效的路径系数为 0.478（$p<0.001$），而在 5 年以下教龄组中该系数为 0.341（$p<0.001$），差异达 40.2%。这表明，随着教学经验的积累，教师对教学领导力的感知更加敏锐，教学领导力对工作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职称分组比较发现，高级职称教师（副教授及以上）的自我效能感水平（M=4.23）显著高于初中级职称教师（M=3.84），且自我效能感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系数在高级职称组（$\beta=0.456$）中高于初中级组（$\beta=0.368$）。这可能是因为高级职称教师拥有更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专业技能，自信心更强，能够更有效地将自我效能感转化为工作成果。

表 7 *教龄与职称的调节效应检验*

调节变量	分组	n	路径系数 β	SE	p 值	组间差异
教龄	5 年以下	185	0.341	0.062	<0.001	$\Delta\chi^2$=18.74***
	10 年以上	156	0.478	0.058	<0.001	差异 40.2%
职称	初中级	342	0.368	0.051	<0.001	$\Delta\chi^2$=12.36**
	高级	81	0.456	0.089	<0.001	差异 23.9%

注：***p<0.001，**p<0.01；

4.6 异质性检验

专业类别的异质性分析显示（表 8），工科类专业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水平（M=4.12，SD=0.61）显著高于管理类（M=3.87，SD=0.64）和艺术类（M=3.79，SD=0.69）。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专业类别对自我效能感的主效应显著（F=12.47，p<0.001）。事后多重比较表明，工科类与管理类（p=0.002）、工科类与艺术类（p<0.001）之间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这一结果可能与工科类专业教师拥有更多的企业实践机会、技术技能认证和产学研合作项目有关。在工作绩效方面，三类专业教师的总体得分差异不显著（F=2.31，p=0.101），但在子维度上存在差异。工科类教师的实践绩效得分（M=4.02）显著高于管理类（M=3.78）和艺术类（M=3.69），而艺术类教师的教学绩效得分（M=4.01）略高于工科类（M=3.91）和管理类（M=3.89）。这反映了不同专业领域的职业教育特点和评价侧重点的差异。

表 8 不同专业类别教师的变量差异比较

专业类别	n	自我效能感 M(SD)	工作绩效 M(SD)	教学绩效	实践绩效	发展绩效
工科类	223	4.12(0.61)^{a}	3.94(0.68)	3.91	4.02^{a}	3.89
管理类	107	3.87(0.64)^{b}	3.82(0.73)	3.89	3.78^{b}	3.79
艺术类	65	3.79(0.69)^{b}	3.86(0.78)	4.01	3.69^{b}	3.84
其他	28	3.76(0.71)	3.75(0.82)	3.87	3.71	3.68
F 值	-	12.47***	2.31	1.05	8.93***	1.67

注：***p<0.001；同一列中不同上标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产教融合深度作为职业本科院校的重要特征变量，其调节作用同样值得关注。本研究通过测量教师参与企业实践的频率、校企合作项目数量、技术服务经历等指标，将样本分为高产教融合组（n=198）和低产教融合组（n=225）。结果显示，在高产教融合组中，实践技能效能感对工作绩效的路径系数为 0.542（p<0.001），而在低产教融合组中该系数为 0.421（p<0.001），组间差异显著（$\Delta\chi^2$=9.87，p<0.01）。这表明，深度的产教融合能够增强实践技能效能感向工作绩效的转化效率，为双师型教师发挥专业优势提供了有效平台。

5.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系统探讨了职业本科院校教学领导力、自我效能感与双师型教师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教学领导力对双师型教师工作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Robinson 等（2008）的研究结论一致。其中，管理教学计划维度的影响效应最强，表明职业本科院校管理者通过协调课程设置、监督教学计划、提供专业发展机会、建立评价体系等具体举措，能够有效提升教师工作绩效。这一发现为职业本科院校优化教学管理提供了实证依据。

自我效能感在教学领导力与工作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9.9%。这一结果支持了 Bandura（1997）的社会认知理论，证实了教学领导力通过影响教师的心理信念进而作用于行为表现的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实践技能效能感对工作绩效的预测力显著高于理论教学效能感，且实践技能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更强。这一发现深刻揭示了职业本科教育的类型特征——实践能力是双师型教师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工作绩效的关键驱动力。这与Tynjälä（2008）关于工作场所学习重要性的论述相呼应。

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教龄、职称等个体特征变量显著影响教学领导力和自我效能感的作用效果。10 年以上教龄教师群体中教学领导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系数较 5 年以下教师高出40.2%，表明资深教师对组织支持的响应更加积极，能够更好地将领导支持转化为工作成果。高级职称教师的自我效能感水平更高，且自我效能感对工作绩效的转化效率更优，这可能与其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专业积淀有关。这些发现提示职业本科院校在实施教学领导和教师发展时应采取分层分类的策略。

异质性检验揭示了专业类别和产教融合深度的重要作用。工科类专业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和实践绩效均显著高于其他专业，这可能与工科专业拥有更多的企业合作机会、实训设备和技术项目有关。产教融合深度能够显著调节实践技能效能感向工作绩效的转化，在高产教融合情境下，教师的实践能力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和认可。这一发现与 Schaap 等（2012）关于校企协同育人效果的研究结论相契合，强调了产教融合对职业教育质量的关键作用。

5.2 研究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实践建议。第一，强化教学领导力建设，特别是管理教学计划能力。职业本科院校管理者应建立健全的教学管理制度，加强教学计划的协调与监督，为教师提供系统的专业发展支持，建立科学的教学质量评价与反馈机制。定期开展教学领导力培训，提升管理者的教学领导能力和服务意识。第二，注重提升双师型教师的自我效能感，特别是实践技能效能感。通过组织企业实践、技能培训、技术服务等活动，增强教师的实践能力和职业信心。建立教师成长档案，记录教师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方面的进步，给予及时的认可和激励。第三，实施差异化的教师发展策略。针对不同教龄、职称、专业背景的教师，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和支持措施。为新入职教师提供导师指导和基础培训，为资深教师搭建教学创新和学术研究平台，为不同专业教师创造适宜的发展条件。第四，深化产教融合，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建立稳定的校企合作关系，为双师型教师提供企业实践岗位，鼓励教师参与企业

技术研发和项目服务。完善教师企业实践的制度保障，将企业实践纳入教师考核和职称评审体系。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系统构建了职业本科院校教学领导力影响双师型教师工作绩效的作用机制模型，明确了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和边界条件。创新性提出"双师型教师成长动力模型"，为职业本科院校师资队伍建设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实践工具。研究局限性在于样本仅来自广西地区，未来研究可扩大地域范围，开展跨区域比较研究。同时，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未能揭示变量间的动态变化关系，未来可开展纵向追踪研究，深入探讨教学领导力、自我效能感和工作绩效的演化规律及因果机制。此外，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组织文化、薪酬激励、职业发展机会等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丰富职业本科院校双师型教师工作绩效的影响因素模型。

参考文献

[1] Bandura, A. (1997).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New York: Freeman.

[2] Borman, W. C., & Motowidlo, S. J. (1997). Task performance and contextual performance: The meaning for personnel selection research. Human Performance, 10(2), 99-109.

[3] Day, C., Gu, Q., & Sammons, P. (2016). The impact of leadership on student outcomes: How successful school leaders use transformational and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to make a differenc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52(2), 221-258.

[4] Hallinger, P., & Murphy, J. (1985). Assessing the instructional management behavior of principals. The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 86(2), 217-247.

[5] Leithwood, K., & Sun, J. (2012). The nature and effects of transformational school leadership: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unpublished research.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48(3), 387-423.

[6] Robinson, V. M., Lloyd, C. A., & Rowe, K. J. (2008). The impact of leadership on student outcomes: An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leadership types.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44(5), 635-674.

[7] Schaap, H., Baartman, L., & de Bruijn, E. (2012).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es during school-based learning and workplace learn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 review. Vocations and Learning, 5(2), 99-117.

[8] Stajkovic, A. D., & Luthans, F. (1998). Self-efficacy and work-related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4(2), 240-261.

[9] Thoonen, E. E., Sleegers, P. J., Oort, F. J., Peetsma, T. T., & Geijsel, F. P. (2011). How to improve teaching practices: The role of teacher motivation, organizational factors, and leadership practices.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47(3), 496-536.

[10] Tschannen-Moran, M., & Woolfolk Hoy, A. (2001). Teacher efficacy: Capturing an elusive construct.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17(7), 783-805.

[11] Tschannen-Moran, M., & Woolfolk Hoy, A. (2007). The differential antecedents of self-efficacy beliefs of novice and experienced teachers.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3(6), 944-956.

[12] Tynjälä, P. (2008). Perspectives into learning at the workplace. 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 3(2), 130-154.

[13] Zee, M., & Koomen, H. M. (2016). Teacher self-efficacy and its effects on classroom processes, student academic adjustment, and teacher well-being: A synthesis of 40 years of research.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86(4), 981-1015.

[14] 教育部（2023）。202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教育报，2023-03-23。

[15] 石伟平（2021）。职业本科教育的定位、特征与发展路径。教育发展研究，41(5)，45-52。

[16] 徐国庆（2022）。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职业技术教育，43(8)，5-11。

[17] 姜大源（2023）。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1)，5-13。

[18] 马树超，郭文富（2023）。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研究。教育科学，39(2)，67-74。

职业本科院校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提升路径研究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Education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黄良善 泰国格乐大学国际学院教育管理系 邮箱：648380657@qq.com

Huang Liangsha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Krirk University, Thailand.Email: 648380657@qq.com

摘要：在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背景下，职业本科院校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新兴层次，其教育质量评价面临标准缺失与体系不完善的双重困境。本研究基于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构建"办学条件-师资队伍-人才培养-质量保障"四维评价框架，通过层次分析法对全国 32 所职业本科院校进行实证检验，揭示各指标权重配置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办学条件与资源对教育质量的贡献度为 0.286，其中校企合作平台的单项权重达 0.412，显著高于传统硬件设施；师资队伍与教学维度权重为 0.324，双师素质水平的影响系数（0.389）明显超过学历结构指标；人才培养与发展维度呈现"实践主导"特征，实践教学质量权重（0.398）居首位；质量保障与成效的权重为 0.267，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外部评价作用突出。异质性检验表明，升格型院校与转设型院校在指标权重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院校的产教融合深度指标得分较中西部高出 23.7%。本研究创新性提出"职业本科教育质量综合指数"计算模型，为院校分类评价与精准改进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职业本科院校；教育质量评价；层次分析法；指标体系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s typological development,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s an emerging level i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face the dual dilemma of lack of standards and imperfect evaluation systems for education qualit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four-dimensional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school conditions-faculty-talent cultivation-quality assurance" based on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heory, stakeholder theory, and human capital theory. Through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it empirically tests 32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nationwide, revealing the weight allocation and influence mechanisms of each indicator.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school conditions and resources to education quality is 0.286, with the single weight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platforms reaching 0.412,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raditional hardware facilities; the weight of faculty and teaching dimension is 0.324, with the influence coefficient of dual-qualified teacher quality (0.389) significantly exceeding academic structure indicators; the talent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dimension exhibits "practice-oriented" characteristics, with practical teaching quality weight (0.398) ranking first; the weight of quality assurance and effectiveness is 0.267, with graduate employment quality playing a prominent external evaluation role. Heterogeneity test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ndicator weight distribution between upgraded institutions and transformed institutions, with eastern region colleges scoring 23.7% higher i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depth indicators tha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is study innovatively proposes a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Quality Comprehensive Index" calculation model, providing a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classified evaluation and precise improvement of institutions.

Keywords: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Education quality evaluati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ndex system

1.引言

随着中国职业教育改革深入推进，职业本科教育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经历快速发展期。2019 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首次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标志着职业本科教育进入规范化发展阶段。截至 2023 年，全国独立设置的职业本科院校已达 32 所，在校生规模突破 12.9 万人，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然而，在快速扩张过程中，职业本科院校普遍面临办学定位模糊、质量标准缺失、评价体系不健全等问题。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的一般性探讨，或者沿用高职高专、普通本科的评价框架，缺乏专门针对职业本科教育特点的系统研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3 年发布的《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研究报告》指出，当前职业本科院校质量评价存在评价主体单一、评价标准模糊、评价方法简单等突出问题。传统评价指标过度强调学术性，对职业性、技术性、应用性指标关注不足，难以真实反映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特色和育人成效。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职业本科院校教育质量评价应包含哪些核心维度？各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如何确定？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职业本科院校在质量评价中呈现何种差异特征？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教育质量提升路径？研究意义体现在理论层面丰富了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理论体系，实践层面为职业本科院校的质量改进和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强调教育质量是一个多维度、全过程的综合概念，需要从投入、过程、输出等多个环节进行系统评价。该理论为构建职业本科院校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整体性框架。办学条件与资源作为教育质量的物质基础，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硬件保障水平。研究表明，实训条件的完善程度与学生技能水平呈显著正相关（Schneider，2002）。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办学条件与资源对职业本科院校教育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教育质量应满足政府、学生、企业、社会等多元主体的期望。职业本科教育作为连接教育与产业的桥梁，必须重视产教融合深度和校企协作效果。师资队伍特别是"双师型"教师的配置，直接关系到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能否有效彰显。Hattie（2009）的元分析研究表明，教师质量是影响学生学习成效的最关键因素。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师资队伍与教学水平对职业本科院校教育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投资对个人职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职业本科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人才培养质量直接体现教育效能。实践教学作为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其质量高低决定了学生职业能力的形成效果。Tynjälä（2008）指出，工学结合的学习方式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职业胜任力。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人才培养与发展水平对职业本科院校教育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质量保障机制是确保教育质量持续改进的制度基础。建立健全的质量监控体系、重视毕业生就业反馈、强化社会服务功能，能够形成教育质量的闭环管理。Rosa 等（2020）的研究证实，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能够有效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4：质量保障与成效对职业本科院校教育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3.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全国 32 所职业本科院校作为研究对象，涵盖不同办学类型（升格型、转设型、新建型）、不同地区（东部、中部、西部）和不同专业领域，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和多样性。研究对象包括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四川、重庆等 15 个省市的职业本科院校。

数据收集采用专家咨询法和问卷调查法相结合的方式。首先，邀请 25 位专家（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官员 8 人、职业教育研究专家 9 人、职业本科院校管理者 8 人）组成专家小组，通过德尔菲法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其次，设计层次分析法判断矩阵问卷，邀请专家对各级指标进行两两比较打分。最终回收有效专家问卷 23 份，有效率为 9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导向性原则。一级指标包括办学条件与资源（A）、师资队伍与教学（B）、人才培养与发展（C）、质量保障与成效（D）四个维度。二级指标包括：办学条件维度下设教学设施条件（A1）、图书信息资源（A2）、校企合作平台（A3）、经费投入保障（A4）；师资队伍维度下设师资数量结构（B1）、双师素质水平（B2）、教学能力水平（B3）、教师发展支持（B4）；人才培养维度下设课程体系建设（C1）、

实践教学质量（C2）、学生能力发展（C3）、创新创业教育（C4）；质量保障维度下设质量监控体系（D1）、毕业生就业质量（D2）、社会服务贡献（D3）、教育满意度（D4）。

4.研究结果分析

4.1 信度与效度分析

专家问卷的一致性检验采用肯德尔和谐系数（Kendall's W）进行。一级指标的和谐系数为0.847（χ^2=77.65，df=3，p<0.001），二级指标各维度的和谐系数分别为：办学条件维度W=0.812（p<0.001）、师资队伍维度 W=0.829（p<0.001）、人才培养维度 W=0.851（p<0.001）、质量保障维度 W=0.806（p<0.001）。所有指标的和谐系数均大于 0.7，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专家意见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一级指标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比率 CR=0.032<0.1，二级指标各判断矩阵的 CR 值分别为：A 维度 0.028、B 维度 0.035、C 维度 0.041、D 维度 0.039，均小于 0.1 的临界值，表明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权重计算结果可靠有效。

表 1 专家背景信息统计（N=23）

表 1 专家背景信息统计（N=23）

专家类别	人数	比例	平均工作年限	高级职称比例
教育行政部门	7	30.4%	18.3 年	85.7%
职教研究专家	8	34.8%	22.1 年	100%
院校管理者	8	34.8%	15.7 年	87.5%
合计	23	100%	18.7 年	91.3%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2 层次分析法权重计算结果

一级指标权重分析结果显示，师资队伍与教学（B）的权重最高，为 0.324，其次是办学条件与资源（A），权重为 0.286，人才培养与发展（C）权重为 0.267，质量保障与成效（D）权重为 0.123。这一结果表明，在职业本科院校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中，师资队伍建设居于核心地位，办学条件作为基础保障位居第二，人才培养效果和质量保障机制同样不可忽视。

表 2 一级指标权重及排序

一级指标	权重	排序	一致性比率 CR

办学条件与资源（A）	0.286	2	0.032
师资队伍与教学（B）	0.324	1	0.032
人才培养与发展（C）	0.267	3	0.032
质量保障与成效（D）	0.123	4	0.032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二级指标权重分析结果显示出鲜明的职业教育特色。在办学条件维度，校企合作平台（A3）的权重最高，达 0.412，远超教学设施条件（A1，0.248）和图书信息资源（A2，0.186），反映出产教融合在职业本科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在师资队伍维度，双师素质水平（B2）权重为 0.389，显著高于师资数量结构（B1，0.227），体现了职业教育对教师实践能力的特殊要求。在人才培养维度，实践教学质量（C2）权重达 0.398，高于课程体系建设（C1，0.312），强调了实践教学的主导作用。在质量保障维度，毕业生就业质量（D2）权重为 0.421，反映出就业市场对职业本科教育的检验作用。

表 3 二级指标权重及综合权重排序

二级指标	局部权重	综合权重	综合排序
教学设施条件（A1）	0.248	0.071	10
图书信息资源（A2）	0.186	0.053	14
校企合作平台（A3）	0.412	0.118	3
经费投入保障（A4）	0.154	0.044	16
师资数量结构（B1）	0.227	0.074	9
双师素质水平（B2）	0.389	0.126	2
教学能力水平（B3）	0.241	0.078	7
教师发展支持（B4）	0.143	0.046	15
课程体系建设（C1）	0.312	0.083	5
实践教学质量（C2）	0.398	0.106	4
学生能力发展（C3）	0.187	0.050	15
创新创业教育（C4）	0.103	0.028	17
质量监控体系（D1）	0.235	0.029	18
毕业生就业质量（D2）	0.421	0.052	13
社会服务贡献（D3）	0.198	0.024	19
教育满意度（D4）	0.146	0.018	20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3 典型院校案例得分分析

选取东部、中部、西部各 3 所代表性院校进行评分测算。结果显示，东部地区院校平均得分为 82.3 分，中部地区为 74.6 分，西部地区为 68.9 分。在具体指标上，东部院校在校企合作平台、双师素质水平、实践教学质量等核心指标上的得分显著高于中西部院校。例如，某东部沿海省份职业本科院校的校企合作平台得分达 91.2 分，而中西部同类院校平均得分仅为 73.7 分，差距达 23.7%。

表 4 不同区域院校典型指标得分对比（百分制）

指标类别	东部院校	中部院校	西部院校	区域差异
校企合作平台	91.2	76.5	67.5	23.7 分
双师素质水平	87.6	78.3	71.2	16.4 分
实践教学质量	85.4	75.8	69.7	15.7 分
就业质量	88.9	80.2	73.6	15.3 分
综合得分	82.3	74.6	68.9	13.4 分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4 办学类型异质性检验

按照办学来源分类，升格型院校（由高职升格）15 所、转设型院校（独立学院转设）11 所、新建型院校 6 所。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办学类型对各维度得分均有显著影响（$p<0.01$）。升格型院校在实践教学质量和校企合作方面优势明显，平均得分分别为 84.7 分和 88.3 分；转设型院校在教学设施条件和图书资源方面表现较好，平均得分为 81.2 分和 79.8 分；新建型院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得分相对较高，为 76.5 分，但整体评价得分偏低。

表 5 不同办学类型院校指标得分差异分析

办学类型	样本数	办学条件	师资队伍	人才培养	质量保障	综合得分
升格型	15	77.8	83.5	85.2	76.4	81.2
转设型	11	82.3	75.6	73.8	74.1	76.5
新建型	6	68.9	71.2	70.5	69.8	70.1
F 值	-	8.93***	11.67***	14.32***	6.78**	12.45***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注：***$p<0.001$，**$p<0.01$

4.5 关键影响因素识别

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识别影响教育质量综合得分的关键因素。结果显示，双师素质水平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最高（$\beta=0.387$，$t=8.94$，$p<0.001$），其次是校企合作平台（$\beta=0.352$，$t=8.12$，$p<0.001$）和实践教学质量（$\beta=0.329$，$t=7.68$，$p<0.001$）。这三个指标解释了教育质量总变异的 67.8%，构成职业本科院校质量提升的核心要素。

表 6 教育质量关键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标准化系数 β	t 值	p 值	VIF
双师素质水平	0.387	8.94	<0.001	2.13
校企合作平台	0.352	8.12	<0.001	1.98
实践教学质量	0.329	7.68	<0.001	2.05
课程体系建设	0.216	5.34	<0.001	1.76
教学能力水平	0.189	4.67	<0.001	1.82
R^2	0.678	-	-	-
调整 R^2	0.662	-	-	-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4.6 质量提升路径分析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权重配置结果与实际得分的差距分析，本研究识别出职业本科院校质量提升的关键路径。研究发现，校企合作平台的综合权重高达 0.118，在所有二级指标中排名第 3 位，但实际调研中该指标的平均得分仅为 76.3 分，存在 23.7 分的提升空间，且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距达到 23.7%。这一现象表明，产教融合深度不足已成为制约职业本科教育质量提升的首要瓶颈。Harvey 和 Newton（2007）指出，职业教育质量的核心在于满足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而产教融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机制。建议职业本科院校通过建立紧密型产业学院、共建高水平专业化实训基地、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等方式深化校企协同育人。具体而言，应推动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将企业真实项目引入课堂教学，建立"双主体"育人模式。政府层面应完善校企合作的制度保障，通过税收优惠、用地支持、财政补贴等政策激励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形成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长效合作机制（Gessler，2017）。

双师素质水平作为综合权重最高的二级指标（0.126），其重要性得到了专家组的一致认可，但实证调研显示中西部地区院校在该指标上的得分普遍低于东部地区 16.4 分，部分院校"双师型"教师占比不足 30%，远低于教育部规定的 60%标准要求。Hattie（2009）的元分析研究证实，教师质量是影响学生学习成效的最关键因素，其效应量（d=0.88）显著超过其他教育投入要素。职业本科教育对教师的要求更为特殊，既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又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行业资源。建议实施"双百工程"（百名教师下企业、百名工程师进课堂），建立教师企业实践的刚性要求，规定专业教师每两年至少累计 6 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同时，应畅通行业企业技术骨干进入职业院校任教的通道，建立"固定岗+流动岗"相结合的教师管理制度，完善兼职教师的聘用、考核和激励机制。此外，还应加强"双师型"教师的认定和培养，将企业工作经历、技能等级证书、技术研发成果等纳入教师职称评审体系，形成促进教师实践能力提升的制度环境（Schaap et al.，2020）。

实践教学质量的综合权重为 0.106，在人才培养维度中居于首位，体现了职业教育"做中学"的本质特征。然而，当前部分职业本科院校仍存在实践教学学时不足、实训条件薄弱、校外实习流于形式等问题，实践教学质量的实际得分与权重配置存在较大偏差。Tynjälä（2008）的

研究表明，工作场所学习对学生职业能力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的有机结合是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关键。建议职业本科院校构建"认知实习-跟岗实习-顶岗实习"三段递进式实践教学体系，确保实践教学学时占总学时的比例达到 50%以上。在实践教学内容上，应将企业真实项目、生产案例融入教学过程，实现教学内容与岗位需求的无缝对接。在实践教学组织上，应建立校企"双导师"制度，由学校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共同指导学生实习实训，加强过程管理和质量监控。同时，应完善学生实习实训的安全保障和权益保护机制，健全实习责任保险、实习补贴等配套制度，解除学生和家长的后顾之忧（Rosa et al.，2020）。这三条路径的协同推进，将有效提升职业本科院校的整体办学质量，为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坚实保障。

5.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层次分析法系统构建了职业本科院校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明确了各级指标的权重配置，揭示了质量影响的关键因素和提升路径。研究发现，职业本科教育质量评价应突出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强调产教融合深度、双师队伍建设、实践教学质量等核心要素，这与国际职业教育质量保障的基本经验相一致。师资队伍特别是双师素质水平在质量评价中的核心地位，印证了 Hattie（2009）关于教师质量决定教育成效的经典理论。校企合作平台的高权重配置，反映了利益相关者特别是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质量形成中的关键作用。实践教学质量的突出地位，体现了职业教育"做中学"的本质特征。区域差异和办学类型差异的显著性提示，职业本科院校的质量评价和改进策略需要实行分类指导。东部地区依托产业优势，在校企合作和就业质量方面领先；中西部地区应加强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升格型院校应巩固职业教育办学传统；转设型院校需加快职业教育属性塑造；新建型院校应明确办学定位和特色方向。

参考文献

[1] Schneider, M. (2002). Do school facilities affect academic outcomes? National Clearinghouse for Educational Facilities.

[2] Hattie, J. (2009). Visible learning: A synthesis of over 800 meta-analyses relating to achievement. Routledge.

[3] Tynjälä, P. (2008). Perspectives into learning at the workplace. 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 3(2), 130-154.

[4] Rosa, M. J., Tavares, D., & Amaral, A. (2020). Implementing quality assurance in Europea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Lessons learned. 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26(2), 144-159.

[5] Grollmann, P. (2019). Quality assurance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6(1), 1-21.

[6] Kettunen, J. (2015). Stakeholder relationships in higher education. Tertiar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21(1), 56-65.

[7] Schaap, H., Baartman, L., & de Bruijn, E. (2012).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es during school-based learning and workplace learn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 review. Vocations and Learning, 5(2), 99-117.

[8] Harvey, L., & Green, D. (1993). Defining quality. Assessment &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18(1), 9-34.

[9] Tam, M. (2001). Measuring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7(1), 47-54.

[10] Stone, J. R., & Lewis, M. V. (2021). Developing quality indicators for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A Delphi study.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Research, 46(1), 45-63.

[11] 潘懋元，陈斌（2020）。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若干理论问题。教育研究，41(1)，23-32。

[12] 石伟平（2021）。职业本科教育的定位、特征与发展路径。教育发展研究，41(5)，45-52。

[13] 周建松（2022）。职业本科院校办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中国高教研究，(3)，88-94。

[14] 马树超，郭文富（2023）。职业本科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研究。教育科学，39(2)，67-74。

[15] 姜大源（2023）。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开发的理论与实践。职业技术教育，44(8)，5-12。

[16] 和震，李梦卿（2024）。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发展的困境与突破。高等教育研究，45(4)，56-63。

[17] 刘晓（2024）。产教融合视角下职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与职业，(10)，34-40。

[18] 陈鹏（2025）。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路径研究。职教论坛，(1)，45-51。

“社区书院制”下体育非遗传承路径与协同育人模式的实践研究——基于广州华商职业学院的扎根理论分析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an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under the "Community Academy System

刘鹤鸣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体育与康复技术学院 邮箱：2959544525@qq.com

Heming Liu, School of Sports and Rehabilitation Technology, Guangzhou Huashang Vocational College

Email：2959544525@qq.com

蒋君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体育与康复技术学院 邮箱：jiangjun199581@163.com

Jun Jiang , School of Sports and Rehabilitation Technology, Guangzhou Huashang Vocational College

Email：jiangjun199581@163.com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社区书院制”模式下，岭南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在高等职业院校中的传承路径与协同育人机制，并回应“可持续管理”的核心关切。以广州华商职业学院“启超书院”为案例，基于管理学行为理论，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多源文本数据进行三级编码分析。研究构建了一个以“书院制可持续社区生态”为核心范畴，涵盖“制度性嵌入”、“活态化传承”、“协同化育人”和“创新性发展”四个主范畴的理论模型。分析表明，书院制为非遗传承提供了稳定的制度载体与人文社区土壤，其中多元主体的目标导向行为、互动学习行为与价值共创行为是驱动系统运行的核心机制；通过与国家文化、体育战略及广东省区域发展政策协同，实现了传承活动的体系化与可持续化；最终形成了“文化传承、人格塑造、技能习得”三位一体的育人闭环。本研究为在职业教育中通过制度创新与社区营造，实现文化遗产的可持续管理、活态传承与育人价值转化，提供了基于行为科学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范式。

关键词：社区书院制，非遗传承，协同育人，扎根理论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nheritance path an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of Lingnan sports-relate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community academy system" model, and to address the core concerns of "sustainable management". Taking "Qichao Academy" of Guangzhou Huashang Vocational College as a case study, based on behavioral theory in management,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method to conduct a three-level coding analysis of multi-source text data. The study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centered around the core category of "sustainable community ecology of the academy system", encompassing four main categories: "institutional embedding", "dynamic inheritanc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academy system provides a stable institutional carrier and humanistic community soil for the inheritance of ICH. The goal-oriented behavior, interactive learning behavior, and value co-creation behavior of multiple stakeholders are the core mechanisms driving the system's operation. By collaborating with national cultural and sports strategies as well as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inheritance activities are achieved. Ultimately, a three-in-one educational closed loop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personality shaping, and skill acquisition" is formed. This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paradigm based on behavioral science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management, dynamic inheritance, and valu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community build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words: community academy system,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grounded theory

1 引言

在全球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化的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已成为衡量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指标。体育非遗的传承不仅关乎文化血脉的延续，更是落实“体育强国”、“文化自信”国家战略，以及应对快速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认同挑战的重要实践。近年来，政策层面持续发力，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于 2025 年 11 月明确提出要“扎实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建设高水平体育强省”，特别强调需“加强传统体育项目保护和传承”，深入挖掘武术、龙舟等项目的文化内涵，并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体育融合发展”。随后，为做好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后半篇文章”，广东进一步锚定“高水平体育强省”建设，系统谋划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及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这一系列密集的区域性政策，为岭南体育非遗在本地高校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强劲的“政策风口”与清晰的行动框架。

与此同时，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兴起的“书院制”改革，旨在通过构建新型师生学习生活共同体，强化通识教育与文化育人功能。广州华商职业学院以“启超书院”为平台，系统性引入

国家级非遗“蔡李佛拳”及“英歌舞”等岭南特色体育项目，建立了“非遗大师工作室”、“武术传承基地”，形成了“社区书院制”下非遗传承与职业教育的特色融合实践。

理论视角上，本研究引入管理学中的行为理论作为核心分析框架。行为理论关注个体与组织在特定环境下的目标导向行为、社会互动与学习过程。将其应用于非遗传承场域，有助于科学地解构传承实践中，传承人、教师、学生、管理者等多方主体如何通过持续的互动、学习与协作行为，共同构建并维持一个可持续的传承与育人系统。

2 文献综述

2.1 非遗传承、书院制与协同育人的研究进展

近五年来，学界围绕非遗传承、书院制育人及两者的交叉领域展开了积极探讨。在非遗传承与教育融合方面，研究已超越静态保护，聚焦于“活态传承”的路径创新，强调学校是推动非遗从“项目化”走向“生活化”的关键场域（肖艳丽，2024）。在高校书院制与文化建设方面，研究视角正从传统的管理组织功能，转向构建浸润式文化共同体，以实现知识传授与人格养成的深度融合（刘海燕，2020）。然而，现有研究多从教育学或文化学的单一视角切入，缺乏从管理科学，特别是从微观行为互动层面，对传承育人这一复杂系统过程进行深入剖析。将非遗在书院制下的传承实践，理解为一个由多元主体行为持续互构、共同演进的管理生态系统，相关研究尚属空白，这也构成本研究试图弥补的理论缺口。张蒙莉（2023）基于广州华商职业学院启超书院的实践，提出“家文化”是书院育人的情感内核，能有效增强学生的归属感与认同感。然而，现有研究多探讨书院通识教育或思政功能，将其作为特定文化遗产（尤其是体育非遗）传承与创新的核心枢纽和可持续管理平台的研究较少。

2.2 理论基础：行为理论及其在本研究的应用

本研究主要以管理学的行为理论作为核心分析透镜。该理论体系认为，个体与组织的行动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由内在目标、外部情境与认知框架共同塑造，并通过持续的社会互动与组织学习来实现系统功能的维持、适应与演化（Argote，2013）。这一视角为本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目标导向行为：用于阐释在非遗传承活动中，学校（寻求特色发展与育人成效）、传承人（致力技艺传播与精神延续）、学生（渴望技能获取与文化认同）以及企业（关注人才培养与社会责任）等多元主体，如何围绕“非遗传承与育人”这一核心议题，形成相互关联、彼此兼容的目标网络，并由此驱动其各具特色的参与和投入行为。

互动学习行为：聚焦于“师徒授受”、“社团研习”、“项目共创”等具体情境，分析蕴含于非遗中的隐性知识（如技艺诀窍、文化精神）与显性知识（如动作套路、历史知识），如何在不同主体之间，通过观察模仿、共同实践、反馈讨论等丰富的社交互动过程，得以有效传递、深度内化与创造性转化。

价值共创行为：着力剖析在“社区书院制”这一特定的组织与空间情境下，师生之间、校社之间、校企之间如何通过清晰的角色定位、有效的资源交换与动态的规则协商，协同合作，最终创造出超越任何单一主体所能实现的、综合性的文化传承成果与育人价值。

引入行为理论，能够将本研究中对现象的描述（例如“举办了非遗游园”），提升为对现象背后动力机制的科学性解释（例如“非遗游园通过构建一个沉浸式、高互动的社会情境，满足了参与者对文化体验与社会交往的深层需求，从而有效激发了广泛参与和主动学习的行为”），显著增强研究的学术解释力及其在管理科学领域的对话能力。

3 研究方法

3.1 文献资料法

文献资料法为研究确立了坚实的政策、理论与资料基础。通过对近三年国家与地方政策文本的系统梳理，研究明确了实践探索的时代坐标与政策空间；对近五年学术文献的回顾，则定位了理论起点与创新方向；而对案例内部一手资料的深度挖掘，为后续分析提供了核心的质性数据来源。

3.2 行动研究法

行动研究法确保了研究与实践的动态统一与知行合一。作为实践的核心推动者与参与者，研究者遵循“计划-行动-观察-反思”的螺旋循环，亲身经历了从项目方案设计、具体措施实施到效果观察与策略调整的全过程。这种方法使研究根植于真实的、持续发展的教育现场，其产生的知识直接来源于并即时反馈于实践优化。

3.3 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法是处理庞杂资料、建构中层理论的核心分析工具。面对前两种方法汇集的多源文本与深度洞察，研究严格遵循其经典程序，通过三级编码对资料进行逐级抽象与归纳，摒弃先入之见，最终让以“书院制可持续社区生态”为核心的理论模型从经验数据中自然涌现。扮演了“理论生成器”的角色，将政策背景、实践智慧转化为一个系统、简洁且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三级编码与核心范畴涌现

通过对所收集数据的持续比较与概念化，研究经历了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与选择性编码的完整过程，最终凝练出 1 个核心范畴与 4 个主范畴（其结构与关系详见下文理论模型图及阐释）。从行为理论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些范畴，可以发现共同描绘了一个动态、多层次的“行为互动生态系统”：

“书院制可持续社区生态”（核心范畴）：这是所有传承与育人行为得以发生、演化的核心情境与基础场域。通过有形的物理空间、无形的情感联结与成文的惯例机制，持续塑造并维持着稳定的行为预期、共享的意义系统与高效的互动模式。

“制度性嵌入”与“活态化传承”（两大实践主范畴）：二者共同构成了该生态系统的行为规范体系与日常实践流。“制度性嵌入”通过战略协议、组织机构、课程设置等，提供了系统性的目标框架、角色定义与资源通道（正式行为规范）；而“活态化传承”则通过多元场景、师徒实践、社团活动等，生发了大量情境化的、充满生命力的互动仪式、学习实践与文化体验（非正式行为实践）。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引导和承载着主体的具体行为。

“协同化育人”（价值成果主范畴）：这是多主体行为互动所催生的核心价值产出与关键行为反馈。体现在学生价值观的内化、综合能力的迁移、文化身份的认同以及文化自信的建立等方面。这一成果不仅是系统运行的目标，其实现过程与积极结果本身也构成了最强有力的正向行为强化信号，激励着所有参与者的持续投入。

“创新性发展”（系统演进主范畴）：体现了该生态系统在面对内部成长需求与外部环境变化时，所展现出的集体性适应学习能力与创造性变革行为。无论是内容改编、技术应用还是模式拓展，都是系统为保持生机与活力而主动采取的行为模式优化与革新。

核心范畴	选择性译码（主范畴）	主轴性译码（范畴化概念）	开放性译码（抽象化概念）	原始语句（部分）

A书院制可持续社区生态	B1 制度性嵌入	C1 战略协议嵌入	D1 建立长期合作框架	与蔡李佛始祖拳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D2 明确协同机制	建立“校企协同创新非遗传承基地”合作机制
		C2 组织机构嵌入	D3 设立官方传承平台	挂牌成立“国家级非遗蔡李佛拳传承基地”
			D4 建立专门工作空间	设立“蔡李佛拳大师工作室”及“英歌舞工作室”
		C3 教学体系嵌入	D5 纳入正式课程体系	将“蔡李佛拳”纳入公共体育必修课模块
			D6 开发标准化教材	合作编写出版校本教材《蔡李佛拳入门教程》
			D7 规范教学流程	制定课程标准与教学大纲
		C4 师资队伍嵌入	D8 引入顶尖传承人	聘请国家级传承人陈忠杰为客座教授并驻校授课
			D9 培育校内教学团队	组建校内“非遗课程教研团队”
	B2 活态化传承	C5 多维场景激活	D10 举办大型体验活动	举办“非遗文化节”大型游园市集
			D11 组织动态文化展演	组织英歌舞、醒狮校园巡游快闪活动
			D12 结合节庆开展工作坊	在传统节日开展主题工作坊
		C6 师徒实践传承	D13 进行核心技艺口传心授	陈忠杰师傅亲授“小念头”拳法
			D14 传授完整技术体系	弟子跟师学习兵器套路
			D15 遵循传统礼仪与考核	定期举行拜师仪式与阶段性考核
		C7 社团社区联动	D16 依托社团开展日常练习	“酷炫武术协会”每日晨练
			D17 动员广泛参与	面向全书院招募非遗活动志愿者
			D18 开展社会服务与展演	组织社区非遗展演服务
		C8 数字媒介记录	D19 制作现代化教学资源	拍摄制作蔡李佛拳教学微视频
			D10 建设数字化档案	建立非遗项目数字化档案库
	B3 协同化育人	C9 价值目标协同	D11 精神内涵融合育人目标	蔡李佛拳“爱国、尚武、坚韧”精神融入书院“家国情怀”培育
			D12 传承活动对标根本任务	非遗传承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同构
		C10 能力过程协同	D13 锤炼意志品质	习武锻炼意志力与抗挫折能力
			D14 培养团队协作精神	集体排练培养团队协作与纪律性
			D15 提升综合素养	动作学习提升身体协调与审美素养
		C11 身份认同协同	D16 实现角色进阶与转变	学生从“文化旁观者”转变为“非遗体验者”、“展演者”乃至“校园传承志愿者”
		C12 文化自信生成	D17 参与文化展示与交流	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展示蔡李佛拳
			D18 产生内在情感认同	学生自述“更深刻理解了岭南文化，感到自豪”
	B4 创新性发展	C13 传承内容创新	D19 改编以适应现代教学	改编传统长拳套路为适合活动展演
			D20 创编融合新元素	创编融合现代舞蹈元素的英歌舞新组合
		C14 技术手段创新	D21 开发智能教学工具	开发“蔡李佛拳 AI 智能教学辅助系统”
			D22 应用沉浸式技术	研发“VR 沉浸式蔡李佛拳历史场景体验平台”
		C15 成果转化创新	D23 孵化创新创业项目	孵化创新项目《沉浸式非遗数字教育平台》
			D24 融合专业课程建设	将非遗元素融入产品设计、旅游管理专业课程
		C16 传播范式创新	D25 利用新媒体平台	利用短视频平台进行教学直播
			D26 打造大型品牌活动	校运会组织 400 人大型蔡李佛拳团体操表演
			D27 拓展主流媒体影响	获地方媒体多次专题报道

表 1 扎根理论三级编码过程表

资料来源于：本研究整理

4.2 理论模型构建：“社区书院制”下非遗传承与育人的行为互动系统模型

基于扎根理论三级编码所涌现的核心范畴与主范畴，并结合管理学行为理论视角，本研究构建了“社区书院制下非遗传承与协同育人的行为互动系统模型”，如图 1 所示。该模型以“书院制可持续社区生态”为核心驱动场域，以“制度性嵌入”和“活态化传承”为两大实践支柱，以“协同化育人”为价值内核与目标指向，以“创新性发展”为系统迭代引擎，清晰地呈现了一个多主体参与、多环节互动的可持续运行系统。

图 1 社区书院制下非遗传承与协同育人的行为互动系统模型

图片来源于：本研究整理

该模型在行为理论的透视下，表现为一个具有自我调节与演化能力的动态系统。“书院制可持续社区生态” 不仅是物理与制度空间，更是一个持续生成共同意义、规范与情感联结的“行为场”。在这一场域中，多元主体（学校、传承人、学生、企业、社区等）通过目标导向行为明确参与动机，通过互动学习行为实现知识传递与内化，通过价值共创行为达成文化传承与育人成果的共建共享。

“制度性嵌入” 提供了系统的稳定性与方向性。通过战略协议、组织机构、课程体系与师资队伍建设等制度化安排，系统为各类主体设定了清晰的角色预期、资源通道与协作框架，从而规范并激励其参与行为。“活态化传承” 则赋予系统以生命力与灵活性，通过多维场景激活、师徒实践、社团联动与数字化记录等方式，将非遗从静态知识转化为动态实践，使传承行为融入日常生活与节庆仪式，形成强烈的文化体验与情感认同。

“协同化育人” 是系统运行的价值输出与反馈机制。在非遗传承过程中，学生不仅习得技艺，更在价值目标、能力过程、身份认同与文化自信四个维度实现人格与素养的协同发展。这一育人成效反过来又强化了各主体的参与动机，形成正向行为强化回路。“创新性发展” 则体现了系统的适应性与进化能力。面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系统通过内容创编、技术融合、成果转化与传播范式创新等方式，持续优化行为模式，保持传承活动的时代性与吸引力，推动系统向更高层次演化。

综上，该模型不仅揭示了“社区书院制”下非遗传承与育人的结构性特征，更从行为互动视角阐释了其可持续运行的内在机制，为同类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系统框架与行为逻辑。

5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以广州华商职业学院“启超书院”为案例，结合管理学行为理论与扎根研究方法，对“社区书院制”背景下体育非遗传承与协同育人的实践路径与机制进行了系统探讨。研究结果表明，书院制为非遗传承营造了一个兼具制度稳定性与文化人文性的社区生态。通过“制度性嵌入”与“活态化传承”的双轮驱动，非遗项目得以在职业教育体系中实现系统化融入与生活化延续，从而超越了传统保护模式，走向可持续的活态传承。

在机制层面，多元主体的目标导向行为、互动学习行为与价值共创行为共同构成了传承育人的核心动力系统。在清晰的制度框架与丰富的情境实践中，学校、传承人、学生、企业等多方主体通过持续互动与协作，推动非遗传承从孤立的“项目化”操作逐步发展为有机的“生态

化”运行。这一过程中，非遗传承与职业教育在“协同化育人”维度实现了深度融合，逐步构建起“文化传承、人格塑造、技能习得”三位一体的育人闭环，不仅呼应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也强化了学生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此外，该体系展现出显著的动态适应与自我更新能力。通过内容改编、技术融合、模式拓展与传播创新等多维度的“创新性发展”，传承系统得以持续响应时代需求与环境变化，从而保持其生命力与吸引力，实现了非遗传承在当代教育语境中的可持续演进。

6 参考文献

[1] Argote, L. (2013).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Creating, retaining and transferring

[2] 国务院办公厅. (2019).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中国政府网.

[3] 广东省人民政府. (2020). 广东省体育强省建设实施纲要. 广东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4] 刘海燕 & 陈晓斌. (2018). 中国大学三种书院教育模式讨论. 大学教育科学, (02), 68-74.

[5] 肖艳丽. (2024). 高校保护与传承地方传统武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路径——以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例. 辽宁师专学报(自然科学版), 26 (01), 100-102.

[6] 张蒙莉. (2023). 高职院校书院“家文化”育人模式的构建与实践——以广州华商职业学院启超书院为例. 职业技术教育, 44(26), 68-72.

可持续发展下社会支持对跨文化适应的影响—以中国在泰国留学生为例

The Impact of Social Support on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ase Studies of Chinese Students in Thailand

田丽珠导师 泰国格乐大学国际学院教育系邮箱：d98311019@gmail.com

嵇海燕 泰国格乐大学国际学院教育系邮箱：826397326@qq.com

Ji Hai-yan , International College, Krirk University, Thailand. Email:826397326@qq.com

摘要:在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背景下，国际学生的跨文化适应问题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社会支持作为影响跨文化适应的重要社会心理因素，在促进留学生心理健康、学业发展与社会融入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本文以中国在泰国留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探讨社会支持对其跨文化适应的影响机制。通过系统梳理跨文化适应、社会支持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研究，分析不同类型社会支持在中国留学生适应泰国文化环境过程中的作用，拓展了社会支持与跨文化适应理论在国际教育领域的解释框架，并提出促进留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启示。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社会支持, 跨文化适应, 中国留学生, 泰国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 higher-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the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s become a focal concern for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Social support, as a key socio-psychological factor,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foster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cademic progress,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aking Chinese degree-seeking students in Thailand as the empirical cas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through the len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how social support influences their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By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on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social suppor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various types of social support on Chinese students' adjustment to the Thai cultural context. The findings extend the explanatory framework of social-support and cross-cultural-adaptation theories with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offer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populations.

Key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cial support,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ailand

1. 引言

在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泰国已成中国本科生与研究生赴东南亚留学的重要目的地。然而，文化距离导致的心理与社会适应压力随居泰时间延长而加剧（Lilasetthakul & Ran, 2011），威胁其学业持续性与教育流动可持续。社会支持作为关键外部资源，可缓冲文化冲击、促进心理与社会文化适应（Yeh & Inose, 2003）。本研究聚焦中国在泰国留学生，探讨社会支持各维度对跨文化适应的影响机制，为构建可持续的留学生支持体系提供循证依据。

2. 正文

2.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2.1.1 研究背景

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强调包容性教育与促进个体福祉（United Nations, 2015），高等教育中的国际学生群体正是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泰国凭借文化相对亲近、教育成本较低以及区域合作机制完善等优势，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学生重要的留学目的地之一，中国在泰国留学生数量持续增长，2023 年已达 3.2 万人。中国在泰国留学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其跨文化适应问题成为国际教育可持续发展中不

可忽视的现实议题。中泰两国在语言体系、宗教文化及社会规范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使中国留学生在泰国的跨文化适应过程中面临着一定的压力情绪。已有研究针对泰国留学生群体指出，语言障碍、社交主动性不足及心理压力是其适应难点（Sun, K et al., 2020）。

跨文化适应—指个体在新文化情境中对认知、行为与情感进行调适，以实现有效社会互动与心理平衡的过程——被普遍视为影响留学生海外求学体验与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Zhang & Zhou, 2020）。已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能够有效缓冲文化冲击带来的压力，是促进跨文化适应的重要资源（Ward & Kennedy, 1999）。然而，在可持续发展视角下，针对中国在泰国留学生的社会支持与跨文化适应关系的系统探讨仍相对不足。

2.1.2 研究问题

(1) 社会支持对跨文化适应是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 可持续发展策略（如环保参与、社区共建）部分中介作用对社会支持与跨文化适应关系的影响？

2.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2.1 跨文化适应理论

跨文化适应通常指个体在新的文化环境中，通过学习与调整，实现心理平衡与社会功能正常化的过程（Kim, 2001）。Berry（1997）提出的文化适应模型指出，个体在跨文化情境中会采取同化、分离、融合与边缘化四种策略，不同策略将对其心理与社会适应产生不同影响。本研究中旨中国留学生在进入泰国高等教育体系后，面对语言、生活方式、学习文化及社会规范等差异时，于日常活动、人际互动、学业要求与心理状态中所呈现的整体调整过程。本研究采用 Ward, Bochner & Furnham（2001）的跨文化适应模型，将跨文化适应区分为两大核心维度：心理适应（psychological adaptation）与社会文化适应（sociocultural adaptation）。进一步将跨文化适应区分为心理适应与社会文化适应两个维度，前者关注情绪与压力水平，后者侧重行为能力与社会交往。这一划分为分析留学生适应问题提供了清晰框架。

2.2.2 社会支持的内涵与类型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从社会网络中获得的情感性、工具性与信息性资源（House, 1981）。在留学生研究中，社会支持主要来源于家庭、同胞群体、东道国朋友以及学校机构（Zhou et al., 2008）。在众多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因素中，社会支持被视为重要的外部保护性资源之一。社会支持来源于个体所处的社会网络，涵盖来自家庭、同伴、教师以及高校制度层面的情感、信息与实际支持。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不仅能缓冲跨文化压力，还能提升留学生的适应能力与学习动力（赵婉如，2025）。上述国内研究从不同角度验证了社会支持与跨文化适应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于中国赴泰留学生而言，在跨文化差异情境下，社会支持不仅是其应对跨文化压力的重要依托，也可能通过影响适应过程进一步作用于其内在的学习动机与心理信念。

本研究只社会支持是指在泰国求学期间，中国留学生在面对压力、文化差异或适应困难时，从家庭、学校、同伴群体以及相关政策体系中获得的情感性、资讯性、评估性或工具性协助等资源（House, 1981）。本研究依据 House（1981）的社会支持理论，并参考 Zimet et al.（1988）对社会支持量表的发展，将社会支持区分为四个维度：家庭情感支持、学校支持、同伴群体支持与政策环境支持。研究发现，来自同胞的情感支持有助于缓解孤独感，而来自东道国成员的

支持更有利于社会文化适应（Ward et al., 2001）。因此，不同来源和类型的社会支持在跨文化适应中具有差异化作用。

2.2.3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社会支持与适应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留学生的成功适应不仅是个体层面的短期问题，更关系到教育公平、文化交流与社会凝聚力（Marginson, 2014）。稳定而多元的社会支持体系有助于增强留学生的心理韧性，促进其长期发展与社会参与，从而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双重可持续性。

2.3 研究方法_中国在泰国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与社会支持分析

2.3.1 研究设计

采用横断面问卷调查法，以在泰中国留学生为总体（N≈32,000），学历层次包括本科生、硕士、博士，通过分层抽样选取 200 名样本。问卷包含四个部分：社会支持量表（SSQ）、跨文化适应量表（ICAS）、可持续发展策略量表（SDS）、均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

2.3.2 数据收集与处理

通过泰国格乐大学老师和在校中国学生，以及毕业的学生，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50 份（有效率 75%）。使用 SPSS 26.0 进行信效度检验（Cronbach's α>0.85），AMOS 24.0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社会支持对跨文化适应的直接效应。

2.4 研究结果

2.4.1 社会支持对跨文化适应的直接影响

SEM 显示，社会支持对跨文化适应有显著正向影响（β=0.68, p<0.001）。其中：

(1) 情感支持（β=0.42）与信息支持（β=0.38）作用最强，体现在心理适应与生活问题解决；

(2) 工具支持（如签证协助）影响较弱（β=0.18），反映制度性支持有待优化。

2.4.2 可持续发展策略的中介效应

可持续发展策略（如环保参与、社区共建）部分中介作用对社会支持与适应关系的影响（中介效应占比 31%）。参与泰国本地环保项目的留学生，其文化适应得分显著更高（t=4.32, p<0.01），体现 SDGs 实践促进文化认同。典型中泰文化融合行为，包括：参与泰国节庆（如泼水节）、融合中泰饮食（如“奶茶配饺子”）。

3. 结论

本文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出发，探讨了社会支持对中国在泰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在缓解文化压力、促进心理与社会文化适应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未来研究可通过实证方法进一步检验不同类型社会支持的具体效应，为国际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有力的经验支持。

3.1 讨论与启示

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从多层面构建支持中国留学生在泰国发展的社会支持体系。高校应加强国际学生支持服务，促进中泰学生互动，营造包容性校园文化。同时，应鼓励留学生主动拓展跨文化社会网络，提升跨文化交往能力。

4. 参考文献

[1]李明. (2019). 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 *高等教育研究*, 40(3), 78–85.

[2]赵婉如（2025）. 留学生学习动力与跨文化适应的关联性研究. *教育学*, 1(7)，28.

[3]Berry, J. W. (1997).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46*(1), 5–34. https://doi.org/10.1111/j.1464-0597.1997.tb01087.x

[4]House, J. S. (1981). *Work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Addison-Wesley.

[5]Kim, Y. Y. (2001). *Becoming intercultural: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Sage.

[6]Lilasetthakul, T., & Ran, A. (2011). A study on the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of Chinese volunteers in Thai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y* , 1 (2), 15-20. https://doi.org/10.7763/IJSSH.2011.V1.15

[7]Marginson, S. (2014). Student self-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8*(1), 6–22. https://doi.org/10.1177/1028315313513036

[8]Sun, K., Yossuck, P., Panyadee, C., & Ek-lem, B. (2020). The Process of Chinese Students'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and Their Main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while Studying in the Upper Northern Thai Universities. Humanities,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Studies, 343-372.

[9]United Nations. (2015).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0]Ward, C., & Kennedy, A. (1999). The measurement of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3*(4), 659–677. https://doi.org/10.1016/S0147-1767(99)00014-0

[11]Ward, C., Bochner, S., & Furnham, A. (2001). *The psychology of culture shock* (2nd ed.). Routledge.

[12]Yeh, C. J., & Inose, M. (2003). International students' reported English fluency, social support satisfaction, and social connectedness as predictors of acculturative stress. *Counseling Psychology Quarterly* , 16 (1), 15-28. https://doi.org/10.1080/0951507031000114058

[13]Zhou, Y., Jindal-Snape, D., Topping, K., & Todman, J. (2008). Theoretical models of culture shock and adaptation i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33*(1), 63–75. https://doi.org/10.1080/03075070701794833

Practice and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AI-Based Tiered English Teaching in Vocational Schools: A Case Study of the Accounting Major

Zhao La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College, Krirk University Thailand. Email:811583081@qq.com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diverse learning needs among students in accounting majors at vocational schools, as well a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approach, this study explores an AI-empowered tiered English teaching model grounded in the talent cultivation goal of integrating job positions, courses, competitions, and certification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alignment between AI technologie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iered teaching in terms of learning diagnosis, precise student grouping, resource delivery, intelligent feedback, and dynamic assessment, highlighting the advantages of AI in addressing key challenges in accounting English instruction. In practice, a three-tier teaching framework consisting of a basic level, an intermediate level, and an advanced level is established,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aching objectives, instructional content and resources, teaching methods, and assessment mechanisms. A teaching practice study is conducted using the accounting major at a vocational school in Yancheng, Jiangsu Province as a cas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I-based tiered teaching significantly enhances students' professional English competence, job relevance,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is model has strong practical value and potential for wider application, providing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professional English teaching in vocational schools.

Keywords: AI Tools, Tiered Instruction, English Teaching, Accounting Major

1. Introduction

As a core course that bridges general English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skill training, Accounting English in vocational schools is designed not only to help students master professional terminology such as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tax filing, but also to cultivate their ability to use English to handle cross-border accounting tasks. In this way, it directly serves the talent cultivation objective of integrating positions, courses, competitions, and certifications in accounting education (Fan & Li, 2022). However,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s struggle to accommodate differences among accounting students in terms of English proficiency (e.g., vocabulary size and grammatical competence), learning needs (e.g., certification preparation and career orientation), and cognitive levels. As a result, students

with weaker foundations often fail to keep pace with instruction, while those with stronger foundations experience insufficient learning challenge and motivation, which ultimately constrains improvements in teaching quality (Li & Zheng, 2021).

At present, AI tools, with their core strengths in data processing,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and intelligent feedback, offer new pathways for addressing challenges in tiered instruction. By leveraging AI tools, educators can accurately classify students into different proficiency levels, dynamically adjust instructional content, and track learning outcomes in real time, thereby effectively overcoming persistent issues in traditional tiered teaching, such as unclear tiering criteria (Liu, 2025), poor alignment of teaching resources (Ding, 2025), and delayed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Xiao, 2022). Grounded in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counting major, exploring AI-empowered tiered English teaching practices can not only enhance students' English application abilities and professional alignment but also provide replicable models for the reform of English instruction in other vocational majors, demonstrating significant practical value and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2.Fea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AI-Enabled Tiered English Teaching for Accounting Majors in Vocational Schools

2.1 Feasibility: High Alignment Between AI Technological Features and the Needs of Tiered Teaching

The core functions of AI tools demonstrate a natural alignment with the key requirements of tiered Accounting English instruction, providing strong technical support for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Li et al., 2025). From a data-processing perspective, AI learning platforms can automatically analyze multidimensional data—including placement tests, routine assignments, and classroom interactions—to assess accounting students' English vocabulary range, grammatical weaknesses, mastery of professional terminology, and ability to apply English in cross-border accounting contexts. By rapidly generating personalized learning profiles, AI tools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tiered instruction that relies heavily on teachers' subjective judgment (Wang, 2025).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ructional implementation, AI tools can deliver differentiated learning resources tailored to students at different proficiency levels (Lin, 2025). For example, foundational-level students can be provided with introductory materials combining basic accounting vocabulary and grammar micro-lessons; intermediate-level students can access advanced resources such as English dialogues for cross-border tax filing and case-based analysis; and advanced-level students can be assigned enrichment tasks involving reading and writing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 literature. This targeted resource allocation enables precise alignment with the learning needs of each tier. In addition, functions such as AI-based oral assessment (Lu, 2019) and intelligent automated grading (Liu, 2025) offer real-time feedback on students' spoken English errors and the use of professional terminology. These features help teachers focus on key areas in tiered instruction and substantially enhance overall teaching efficiency.

2.2 Necessity: Addressing Practical Challenges in Accounting English Teaching

The distinctive nature of accounting English instruction makes the introduction of AI tools for tiered teaching particularly urgent (Yang, 2020). On the one hand, accounting students exhibi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nglish proficiency—some students possess only basic English knowledge and are completely unfamiliar with professional terms such as accrual accounting and balance sheet, while a small number of students with plans for cross-border employment or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already have a certain level of proficiency in reading professional English and require more advanced, practice-oriented training. Traditional uniform teaching approaches are un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both groups simultaneously.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strumental nature of accounting English requires instruction to be closely aligned with workplace demands (Shang, 2016).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international auditing, enterprises have increasingly differentiated requirements for the English competence of accounting professionals: entry-level positions require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English invoices and complete reimbursement forms in English, while mid- and high-level positions require participation in English financial meetings and the drafting of audit reports in English. AI-supported tiered teaching can set differentiated learning objectives according to the competency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job roles, helping students accurately match their career needs and avoid a disconnect between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In addition, by dynamically track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iered instruction through AI tools, teaching strategies can be adjusted in a timely manner to ensure that every student makes progress based on their original level (Wei,2025), thereby supporting vocational schools in achieving the educational goal that "every student can succeed."

3.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AI-Based Tiered English Teaching for Accounting Majors in Vocational Schools

3.1Precise Tiering Based on AI Tools and Clarification of Teaching Objectives at Each Level

Tiered instruction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effective teaching and should be implemented through data-driven, scientifically grounded classification supported by AI tool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AI learning platforms (such as the iFLYTEK Smart Education Platform and the AI assessment module of Chaoxing Learning Platform) are used to design specialized accounting English assessments. The tests cover three components: basic English proficiency (vocabulary, grammar, and reading), recognition of accounting terminology (matching English terms and translating simple professional sentences), and application of English in cross-border business contexts (such as simulated completion of English expense reimbursement forms and reading brief English financial notices).

Based on the assessment data, the AI platform automatically divides students into three tiers and generates tiered learning reports:

Basic Level (approximately 30%): Students at this level have weak basic English skills and limited mastery of professional terminology, and are unable to complete simple professional English tasks. Teaching objectives focus on consolidating fundamentals and introducing basic accounting terminology, such as mastering 200 core accounting English terms and understanding key information in English accounting vouchers.

Intermediate Level (approximately 50%): Students at this level have adequate basic English skills, are familiar with commonly used professional terms, and can complete basic professional English tasks. Teaching objectives focus on enhancing 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aligning with job requirements, such as conducting English dialogues for cross-border tax filing and writing brief English financial emails.

Advanced Level (approximately 20%): Students at this level have strong basic English skills, a solid command of professional terminology, and a certain level of professional English application

ability. Teaching objectives focus on deepening competence and addressing higher-level demands, such as reading excerpts from IFRS documents and writing summaries of notes to financial statements in English.

Tiering is not static. The AI platform continuously records students' classroom interactions, assignment completion, and performance in periodic assessments, automatically updating learning data every four weeks and dynamically adjusting student levels to ensure the timeliness and accuracy of tiered instruction.

3.2 Adapting Teaching Content and Resources Through AI Tools Based on Tiered Objectiv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at each level, AI tools are used to construct a tiered and profession-oriented instructional content system. On the one hand, AI platforms can automatically select and deliver appropriate learning resources: animated micro-lessons on accounting terminology and basic grammar gamified exercises are provided for basic-level students to help them consolidate foundational knowledge through visualized and game-based learning; English case libraries for cross-border accounting practices (such as English invoice processing and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 dialogues) and job-based scenario simulation videos are delivered to intermediate-level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practical application skills; and excerpts from original IFRS texts and English segments from annual reports of the Big Four accounting firms are provided to advanced-level students to broaden their professional horizons.

On the other hand, teachers can use AI tools to generate customized instructional resources. For example, AI-assisted writing tools (such as Grammarly and Tencent Intelligent Services) can be used to design differentiated writing tasks for stud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basic-level students write English explanations of commonly used accounting terms; intermediate-level students compose English application emails for cross-border expense reimbursement; and advanced-level students write English summaries of a company's quarterly financial performance. AI tools automatically check whether the task difficulty matches the objectives of each level and provide vocabulary and grammar suggestions, ensuring that the tasks are aligned with students' abilities while effectively achieving instructional goals. In addition, given the strong timeliness of 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 AI platforms can retrieve up-to-date content such as English updates on international tax policies and news on cross-border accounting cases in real time and deliver them to the corresponding levels, thereby keeping instructional content current and forward-looking.

3.3 Innovating Tiered Teaching Methods and Leveraging the Interactive and Practical Advantages of AI Tools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counting major, AI tools are employed to design tiered and scenario-based teaching approaches that enhance student engagement and practical competence. For basic-level students, an "AI-guided learning plus peer collaboration" model is adopted. AI-based speaking assessment tools (such as Speaking English Fluently and the iFLYTEK Oral English Assistant) correct students' pronunciation of professional terms sentence by sentence, including the accurate pronunciation of terms such as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 Teachers then divide basic-level students into small groups and release terminology matching competitions through AI platforms. Students complete the tasks collaboratively within groups, while the AI system calculates scores in real time, effectively stimulating learning interest.

For intermediate-level students, an AI-based scenario simulation plus job-oriented practice model is adopted. AI virtual simulation tools (such as VR-based accounting training platforms) are used to create cross-border accounting workplace scenarios, in which students simulate tasks such as conducting financial communication with overseas clients in English and processing English invoice reviews through VR devices. Based on students' dialogue content and operational procedures, the AI system provides real-time feedback, such as identifying errors in English expressions for expense classification or omitted steps in accounting procedures, thereby helping students enhance their 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through immersive learning experiences.

For advanced-level students, an AI-supported seminar plus project-based learning model is implemented. AI platforms release hot topics in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e.g., the impact of IFRS 17 on financial reporting in the insurance industry). Students work in groups to consult AI-recommended English literature and data reports and complete seminar reports. AI tools assist in analyzing the logical coherence of the reports and the accuracy of professional terminology, generating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s, while teachers focus on guiding higher-order thinking--for example, directing students to compar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to deepen their professional understanding.

3.4 Building an AI-Enabled Tiered Assessment System for Precise Evaluation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Drawing on a data-driven evaluation approach, AI tools are used to establish a tiered assessment system that integrates formative and summative assessment as well a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evaluation, enabling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 formative assessment, AI platforms automatically record students' learning data, including terminology mastery rates and grammar practice accuracy for basic-level students, task completion in scenario simulations and quality scores of English emails for intermediate-level students, and reading speed of professional literature and seminar report scores for advanced-level students. Personalized learning trajectory reports are then generated to visually present students' progress and areas for improvement.

In summative assessment, AI-customized tests are adopted. The AI platform generates differentiated final examinations based on the objectives of each level: the basic level focuses on terminology recognition and basic application (e.g., term translation and simple sentence completion), the intermediate level emphasizes job-related scenario application (e.g., situational dialogues and email writing), and the advanced level targets higher-order abilities (e.g.,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writing summarie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Objective items are graded automatically by AI, while subjective items are evaluated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AI scoring (e.g., grammar and logical coherence in writing) and teacher assessment (e.g., accuracy of professional content and depth of thinking), ensuring both fairness and professional rigor.

In addition, student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and job relevance assessment are incorporated. AI-based survey tools are used to collect students' feedback on tiered teaching content and method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enterprise mentors, AI platforms are employed to analyze students' English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during cross-border accounting internships (such as efficiency in handling English business tasks and accuracy in the use of professional terminology), thereby assessing the alignment between teaching outcomes and job requirements and providing evidence for subsequent instructional optimization.

4.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AI-Based Tiered English Teaching for Accounting Majors in Vocational Schools (A Case Study of an Accounting Major at a Vocational School in Yancheng, Jiangsu Province)

4.1 Evaluation Subjects and Duration

Two parallel classes of the 2023 cohort majoring in accounting at a vocational school in Yancheng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 experimental class (45 students) adopted an AI-empowered tiered teaching model, while the control class (45 students) followed a traditional uniform teaching approach. The evaluation period lasted one semester (16 weeks).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covered three dimensions: improvement in English proficiency, professional relevance,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Data were mainly collected from AI platform records, test scores,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feedback from enterprises.

4.2 Evaluation Results

4.2.1 Improvement in English Proficiency: Significant Progress Across All Levels in the Experimental Class

End-of-semester test results （Table 1）showed that the accounting terminology mastery rate of basic-level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class increased from 32%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to 78%,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e 51% achieved by students at a comparable level in the control class. For intermediate-level students, the cross-border accounting English application score (out of 100) increased from 62 to 85, compared with 72 in the control class. Among advanced-level students, the accuracy rate in reading IFRS-related English literature rose from 58% to 83%, exceeding the 69% recorded for high-performing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class. AI platform data on learning time and assignment completion rate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class spent an average of 1.2 more hours per week on learning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class, with an assignment completion rate of 98%, compared with 85% in the control clas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iered teaching effectively enhanced students' learning engagement.

Table 1. Comparison of Core Indicators in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Improvement Dimension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Continued）

Student Level	Assessment Indicator	Experimental Group (End of Semester)	Control Group (End of Semester)	Improvement Advantage
Basic Level	Mastery Rate of Accounting Terminology	78%	51%	27%

Table 1. Comparison of Core Indicators in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Improvement Dimension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Continued）

Student Level	Assessment Indicator	Experimental Group (End of Semester)	Control Group (End of Semester)	Improvement Advantage
Intermediate Level	Score for Applied Use of Cross-Border Accounting English (Full score: 100)	85	72	13
Advanced Level	Accuracy Rate of Reading IFRS Literature in English (All Levels) —	83%	69%	14%

Overall Assignment Completion Rate	98%	85%	13%

4.2.2 Professional Relevance: Superior Job-Related English Application Ability in the Experimental Class

In collaboration with school–enterprise partners (including an accounting firm and a cross-border e-commerce enterprise), which was shown in Table 2, a job-oriented accounting English practical assessment was conducted. Results showed that 82% of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class were able to independently complete basic job tasks such as reviewing English invoices and communicating in English for cross-border tax filing, compared with 58% in the control class. Furthermore, 35% of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class were able to complete advanced tasks such as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English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basic note-taking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eeting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15% observed in the control class. Feedback from enterprise mentors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class demonstrated a markedly higher alignment between professional English competence and job requirements, enabling them to adapt more quickly to cross-border accounting-related positions.

Table 2. Comparison of Task Completion Rates in the Professional Alignment Dimension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ask Type	Experimental Group Completion Rate (%)	Control Group Completion Rate (%)	Difference (%)
Basic Job Tasks (e.g., English invoice review, English communication for cross-border tax filing)	82%	58%	24%
Advanced Job Tasks (e.g.,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English financial statements, financial meeting minutes for international clients)	35%	15%	20%

4.2.3Learning Motivation: Stronger Interest and Confidence Among Experimental-Class Students

Survey results collected through AI-based questionnaire tools showed that 87% of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class believed that the tiered teaching content matched their abilities and reduced learning pressure, compared with 52% in the control class. Additionally, 79% of experimental-class students reported that real-time feedback from AI tools helped them identify problems promptly and enhanced their learning confidence, whereas only 43% of control-class students expressed the same view. Moreover, 68% of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class indicated an increased interest in learning accounting English,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35% reported in the control class. Thes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tiered teaching effectively improved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motivation.

Table 3. Comparison of Students' Subjective Feedback on Learning Motivation Dimension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search Questions	Experimental Group Agreement Rate (%)	Control Group Agreement Rate (%)	Difference (%)

The tiered instructional content matches students' ability levels, resulting in reduced learning pressure.	87%	52%	35%
Real-time feedback provided by AI tools enhances students' learning confidence.AI	79%	43%	36%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ccounting English has increased.	68%	35%	33%

4.3 Evaluation Conclusions and Reflections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results, AI-based tiered teaching effectively addresses the key challenges of traditional accounting English instruction and significantly enhances students' English proficiency, professional relevance,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It therefore represents a teaching model that aligns well with the talent cultivation needs of accounting majors in vocational schools. However, certain limitations remain in practice. First, some students with weaker foundations are not sufficiently proficient in using AI tools, which negatively affects their learning outcomes. Second, the depth of integration between AI resources and accounting specialization still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English cases related to cross-border accounting in specific industries. In future practice, greater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training students in the effective use of AI tools, and closer collabor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among enterprises, accounting educators, and AI technology teams to jointly develop resources that are more closely aligned with the competency requirements of accounting positions, thereby further optimizing instructional practice.

4.4 A Representative Lesson Design for AI-Supported Tiered Teaching in Accounting English

Taking the unit "Financial Statements" in Accounting English as an example, this section designs a tiered teaching plan supported by AI tools and presents the instructional process for stud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providing an operable model for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4.4.1 Pre-Class Stage: AI-Enabled Learning Diagnosis and Resource Delivery

One week before the unit begins, the teacher releases a pre-unit assessment on financial statement English through the AI assessment module of the Chaoxing Learning Platform. The assessment includes three types of tasks: recognition of basic financial statement terminology (such as income statement and cash flow statement), reading of short English excerpts from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matching key financial data with appropriate English expressions.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 AI platform automatically completes student tiering and delivers preview resources accordingly:

Basic Level Students receive bilingual (Chinese-English) illustrated explanation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micro-lessons on the pronunciation of core terms (e.g., sentence-by-sentence audio guidance generated by AI oral assistants). They are required to complete 20 terminology matching exercises in the AI question bank. The system automatically grades the answers and highlights errors; for example, when retained earnings is incorrectly interpreted as retained income, the AI system provides the correct definition and usage context.

Intermediate Level Students are provided with English samples of simplified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small enterprises and short videos explaining key financial data in English. They are required to use AI note-taking tools (such as iFLYTEK Voice Notes) to record questions encountered during reading and to complete three fill-in-the-blank tasks on English descriptions of financial data. The AI

system provides real-time feedback on grammatical errors, such as problems with tense or preposition usage.

Advanced Level Students receive English summaries (excerpts) from listed companies' annual financial reports and English guidelines from IFRS on the present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Using AI literature analysis tools (such as CNKI Research Tools), students extract key ideas and write an English reading summary of approximately 100 words. The AI system evaluates the summary in terms of logical coherence and accuracy of professional terminology, offering scores and revision suggestions.

4.4.2 In-Class Stage: Tiered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AI-Supported Interaction

Classroom instruction centers o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 English, with differentiated activities designed through AI tools:

Basic Level The teacher uses an AI interactive whiteboard to display bilingual financial statement charts and randomly selects students to read terms aloud using AI speech recognition. The system displays pronunciation scores in real time (e.g., whether the stress in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is correct) and corrects pronunciation errors. Group activities are organized using AI grouping tool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complementary foundations. Each group accesses an AI-based accounting terminology challenge game via tablets, completing tasks such as term spelling and matching images with English terms. The AI system calculates group scores in real time, and the teacher provides focused explanations of common errors.

Intermediate Level Using AI scenario simulation tools (such as VR accounting training platforms), the teacher creates a simulated scenario in which an accounting assistant reviews English financial statements. Students identify English expressions indicating data anomalies (e.g., net loss and negative cash flow) in the VR environment and report their findings in English to a virtual supervisor (a system-generated voice role). The AI system evaluates the reports based on terminology accuracy and logical clarity. Students complete exercises on English descriptions of financial data by filling in key data from a company's quarterly revenue table using AI writing templates (e.g., "Q3 total revenue increased by 15% compared to Q2"). The AI system automatically detects grammatical errors and checks the appropriateness of data descriptions, providing prompts when issues such as tense mismatch occur.

Advanced Level The teacher assig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listed companies. Students use AI data retrieval tools to obtain English summaries of financial reports from two companies in the same industry and employ AI chart-generation tools (such as Excel AI plugins) to create bilingual charts for key indicators (e.g., net profit growth rate and debt-to-asset ratio). They then write an Englis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pproximately 200 words. Group discussions are organized, with each group selecting a representative to present their findings using AI projection tools. The AI system captures the use of professional terminology during presentations (e.g., whether return on investment is used accurately) and generates a terminology frequency report. The teacher guides students in discussing English expression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ement presentation practices. AI tools record key discussion points in real time and generate seminar minutes after class.

4.4.3 Post-Class Stage: AI-Based Personalized Assignments and Learning Outcome Tracking

After class, tiered assignments are delivered through AI tools, and learning outcomes are dynamically monitored:

Basic Level Students complete assignments on financial statement terminology fill-in-the-blank exercises and simple sentence translation via the AI homework platform. After automatic grading, the system pushes targeted micro-lessons for items with high error rates (e.g., the translation of depreciation expense). In addition,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read five core terms aloud daily using an AI speaking check-in tool. The system records participation data, which teachers review regularly.

Intermediate Level Students complete a task on simulated writing of a brief English explan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They use AI writing assistants (such as Grammarly) to self-check grammatical errors. After submission, the AI system evaluates the work in terms of content completeness and accuracy of professional expression, and teachers provide targeted feedback based on AI scores. Meanwhile, the AI platform delivers short videos on English cases of cross-border accounting practices, followed by one multiple-choice question focusing on the applic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 English in the case.

Advanced Level Students complete an English essay of approximately 300 words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FRS and Chinese Accounting Standards in financial statement presentation. AI literature tools provide links to relevant English references to support argument development. After submission, the AI system first conducts plagiarism detection and logical coherence analysis, after which teachers focus on evaluating depth of viewpoints and precision of professional terminology, and send revision suggestions to students through AI feedback tools.

5. Optimization Directions for AI-Enabled Tiered Teaching in Accounting English

Although positive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practice, teaching feedback and evaluation findings indicate that further optimization is needed to enhance the integration of AI tools and tiered instruction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5.1 Strengthening Professional Depth Alignment of AI Tools

Some current AI resources are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general applicability but insufficient professional specificity. For example, general-purpose English AI writing tools often fail to accurately judge the contextual appropriateness of accounting terminology (e.g., provision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estimated liability rather than clause in an accounting context). In the future, accounting instructors and AI technology teams should collaborate to develop a specialized AI corpus for accounting English, covering areas such as cross-border accounting dialogues, financial report writing conventions, and English expressions for tax filing, to ensure accurate recognition and feedback on discipline-specific language use.

5.2 Improving the Human–AI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in Tiered Guidance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some basic-level students tend to over-rely on AI feedback and lack active thinking--for instance, directly checking AI-provided definitions instead of inferring meaning from context. A collaborative model of “AI preliminary guidance plus targeted teacher intervention” should therefore be established. AI platforms can track students’ tool usage patterns (e.g., frequency of definition look-ups and number of error revisions). When the system detects that a student has relied on AI to obtain direct answers three consecutive times, it automatically alerts the teacher, who can

then provide one-on-one guidance on strategies such as context-based word inference and terminology association, preventing AI tools from becoming a passive “answer bank”.

5.3 Enhancing the Dynamism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AI-Based Assessment

Current AI assessments mainly focus on knowledge acquisition (e.g., terminology accuracy and grammatical correctness) and provide insufficient evaluation of professional qualities, such as rigor in cross-border accounting communication and teamwork-related English expression. Future upgrades of AI assessment modules should incorporate scenario-based competency evaluation. For example, in VR-based cross-border accounting scenarios, AI can analyze students’ logic of English communication, accuracy of data expression, and responses to unexpected situations (e.g., answering client inquiries questioning financial data), and generate a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English application competence score, along with personalized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e.g., additional training in responding to data-related inquiries in English is needed). This would make assessment more closely aligned with the professional demands of accounting positions.

6. Conclusion

AI tools provide precise, personalized, and dynamic solutions for tiered English teaching in accounting majors at vocational schools. Through data-driven student grouping, differentiated resource delivery, real-time interactive feedback, and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AI effectively addresses long-standing challenges in traditional instruction, such as unclear learner stratification, poor resource alignment, and difficulty in tracking learning outcomes. Practical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is model not only enhances students’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professional relevance but also stimulates their learning initiative, offering a new pathway for the reform of professional English teach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Looking ahead,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AI technology, further exploration of deep integration between AI and virtual simulation and between AI and authentic enterprise cases is needed to make tiered teaching more closely aligned with real accounting workplace demands. Ultimately, this approach aims to empower teaching through technology and promote student development through tiered instruction,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cultivating technically skilled accounting professionals with cross-border English competence.

References

[1] Ding, L. (2025).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tools in smart integrated English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city. *Overseas English*, (19), 91–93.

[2] Fan, Z. F., & Li, G. Y. (2022). Explo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toward EGAP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A case study of Accounting English courses. *Accountant*, (23), 126–128.

[3] Guo, Q. (2025).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English teaching development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AI era. *Campus English*, (45), 81–83.

[4] Li, Q., & Zheng, S. W. (2021).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bilingual course learning among accounting majors. *Marketing Circle*, (07), 110–111.

[5] Li, X. X., Li, L. L., Zhang, S. J., Zhao, H. Y., & He, Y. (2025). Research on AI-assisted tiered English teach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s. In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Academic Symposium on Cultura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025)*. https://doi.org/10.26914/c.cnkihy.2025.071990

[6] Lin, J. (2025). Construction of a dynamic tiered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model in comprehensive senior high school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a generative AI-driven homogeneous text adaptation model. *Campus English*, (14), 30–32.

[7] Liu, N. (2025). *A surve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iered English teaching in junior middle schools in Wanzhou District* (Master's thesis).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https://doi.org/10.27883/d.cnki.gcqsx.2025.000461

[8] Liu, Y. C. (2025). Enhancing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English writing proficiency through AI-based intelligent grading. *English Pictorial (Senior High School Edition)*, (33), 70–72.

[9] Lu, J. Y. (2019). Improving students' English performance through oral AI technology. *English Pictorial (Advanced Edition)*, (13), 109–110.

[10] Shang, Z. (2016).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reform of Accounting English talent cultiv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regional economic context. *Overseas English*, (15), 8–9.

[11] Wang, X. Y. (2025). Research on AI-based tiered English teaching strategies in junior middle schools. *Campus English*, (34), 52–54.

[12] Wei, Q. (2025). Optimizing tiered assignments with AI assistance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Intelligence*, (28), 63–66.

[13] Xiao, M. J. (2022). *An analysis of English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and organizational models in primary schools in Yunnan Province based on Smart Teacher Classrooms* (Master's thesi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Yunnan. https://doi.org/10.27459/ d.cnki.gynfc.2022. 001 201

[14] Yang, L. (2020).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ccounting English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ebei Agricultural Machinery*, (08), 99–100. https://doi.org/10.15989/j.cnki.hbnjzzs.2020.08.077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University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 Test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Yuan Rui-we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College, Krirk University, Thailand.Email:179268417@qq.com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university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nd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between them, in order to reveal the underlying influencing mechanism.Methods: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560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ith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was constructed.The Bootstrap method was employed to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Results: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omoting effect on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plays a significant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Conclusion: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niversities to optimiz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enhanc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nd thereby stimulate their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Keywords: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Mediating Effect

1. Introduction

Under the era background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nhancing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nd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have become key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alleviate structural employment pressure. However, a significant gap remains between the realistic picture and policy expectations.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Employment Report," although the proportion of undergraduate graduates starting businesses has shown an upward trend in recent years, it remain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international average (MyCOS Research Institute, 2025). This profoundly indicates that how to effectively activate college students' endogenous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remains a core challenge facing higher education.

As the dominant intervention measure for universities to empower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the effectiveness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s been widely confirmed. Existing research not only confirms the direct promoting effec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but also explores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individual traits (e.g., self-efficacy)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Notably,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i.e., an individual's belief in their ability to successfully complete entrepreneurial tasks, is widely regarded as the most stable and core psychological variable for predicting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However, a key question that has not been fully answered is: How exactly does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ystematically shape this core psychological variable, thereby influencing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Currently, most studies either treat self-efficacy as one of several parallel mediating mechanisms or explore its role in more complex chain models, lacking focused testing and in-depth argumen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psychological transmission path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is theoretical ambiguity leads to difficulties in implementing precise measures in practice, making it challenging to effectively focus educational resources on constructing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confidence and agency.

In light of this, this study aims to move beyond repeated verification of "whether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effective" to deeply reveal the intrinsic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how it is effective." By constructing and rigorously testing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ith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s the sole mediating variable, this study is dedicated to clearly demonstrating the driving effec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rough the core path of enhancing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expect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ly, empirical support at the mechanism level for 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in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and practically, to provide direct and specific theoretical basis and action guidance for universities to promote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from "knowledge transmission" to "efficacy cultivation."

2. Core Concept Definitions

2.1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e concep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riginated from the first course offered by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in 1947 and has developed into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From a system composition perspective, Harrison & Mason (2007) argue that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a composite entity consisting of three elements: "educational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whose effectiveness is influenced by both individual learner difference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Bridge et al. (2010) emphasize its goal of cultivating general abilities, defining it as a form of education that equips individuals with a series of basic skills and relevant knowledge, enabling them to achieve innovation and creation in their work, whether they choose entrepreneurship or employment. This study defines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s: the sum of formal and informal educational processes through which universities, via systematic curriculum teaching,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im to cultivate the knowledge, skills, and psychological traits (especially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required for students to identify opportunities, integrate resources, take risks, and undertake innovative actions.

2.2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is the core psychological prerequisite and the most direct predictor of an individual's engagement i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Bird (1988) defines it as "the motivational state of a person or organization intending to plan or decide to engage in entrepreneurship," emphasizing its nature as a planned decision-making motivation directed towards future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Thompson (2009) further clarifies it as "a person's belief that they plan to establish a new business and will implement these plans in the future," highlighting the dual belief structure of goal-setting (establishing a new business) and implementation commitment (future execution) contained withi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is study define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s: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behavioral tendency in which an individual forms a clear goal of starting a new business cognitively and commits emotionally to putting it into practice within a certain period in the future.

2.3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i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in the field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It refers to an individual's belief and confidence judgment regarding their ability to successfully complete various entrepreneurial tasks, play the role of an entrepreneur, and cope with various challenges in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Boyd & Vozikis, 1994; Chen et al., 1998). This concept is rooted in Bandura's self-efficacy theory, emphasizing its key driving role in an individual's choice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level of effort, and persistence.

3.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Hypotheses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s been widely verified. Numerous scholars' empirical studies have confirmed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Liñán & Chen, 2009; Souitaris et al., 2007). Zhu et al. (2014) found that university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increasing the matching degree betwee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entrepreneurial projects. Wang et al. (2016), by comparing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and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ound that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Xiang and Lei (2014) also indicated that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not only directly influence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rough knowledge transmission but also indirectly functions by cultivating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and attitudes.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poses Hypothesis H1: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Bandura (1977) proposed that self-efficacy is an individual's subjective assessment of their ability to perform activities that directly affect their motivation.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is an individual's belief in their ability to successfully complete entrepreneurial tasks and overcome challenges. Existing research shows that college students who have receive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end to have stronger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For example, Cox et al. (2002) found that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rograms show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fter the course, and students with high self-efficacy often exhibited stronger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Xu et al. (2019) also concluded that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plays a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hypothesis: H2: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4. Research Methodology

4.1 Research Subjects

This study distributed 650 questionnaires to students from four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in Weifang. After excluding 90 invalid questionnaires, 560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with a recovery rate of 86.2%. In the sample, males accounted for 52.1% and females for 47.9%; the grade distribution covered freshmen to seniors.

4.2 Research Instruments

4.2.1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cale

This study adopted th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cale compiled by Zhang (2016). The scale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entrepreneurship teachers,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with 9 items. A 5-point scoring method was used (1 = completely disagree, 2 = somewhat disagree, 3 = neutral, 4 = somewhat agree, 5 = completely agree). Higher scores indicate better implementation qua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this study, the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 for the total scale was 0.894, and the α coefficients for each dimension ranged from 0.832 to 0.915.

4.2.2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Scale

This study adopted th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Scale compiled by Xin et al. (2019). The scale has 3 items, using a 5-point Likert scale (1 = completely disagree, 2 = somewhat disagree, 3 = neutral, 4 = somewhat agree, 5 = completely agree). The total score was calculated, with higher scores indicating stronger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In this study, the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 for this scale was 0.902.

4.2.3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Scale

This study adopted the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Scale compiled by Liñán & Chen (2009). The scale initially had 6 items, using a 5-point Likert scale (1 = completely unconfident, 2 = somewhat unconfident, 3 = neutral, 4 = somewhat confident, 5 = completely confident). After item analysis, 2 items with factor loadings below 0.6 were deleted, retaining 4 items. Higher scores indicate stronger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In this study, the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 for this scale was 0.861.

4.3 Data Analysis Methods

SPSS 26.0 was used fo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liability analysis, and common method bias testing. AMOS 26.0 was used fo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analysis to test the measurement and structural models.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employed the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Bootstrap method with 5000 resamples.

5. Research Results

5.1 Common Method Bias

This study used Harman's single-factor test, performing unrotate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n all measurement item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irst common factor explained 36.8% of the variance, which is below the critical standard of 40%, indicating no serious common method bias problem in this study.

5.2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tandardized factor loadings of all items ranged from 0.68 to 0.92, all exceeding the 0.6 standard; composite reliability ranged from 0.85 to 0.92, all exceeding 0.7;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ranged from 0.66 to 0.79, all exceeding 0.5, indicating good convergent validity of the scales. The square roots of the AVE for each variable were greater than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at variable and other variables, indicating good discriminant validity.

5.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the variables are shown in Table 1.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had the highest mean score (M = 3.65), indicating that the surveyed college students' subjective confidence in their entrepreneurial abilities was generally at a medium to high level. The mean score for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was relatively low (M = 3.28), reflecting that there is still considerable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current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s among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p < 0.001$), with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being the strongest ($r = 0.48$). Thi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provided a necessary prerequisite for the subsequent mediating effect test.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M	SD	1	2	3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3.42	0.78	0.81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3.65	0.85	0.34**	0.85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3.28	0.91	0.37**	0.48**	0.83

Note: The diagonal bold values are the square roots of the AVE. *p<0.05,**p<0.01,***p<0.001

5.4 Measurement Model Test

Before testing the structural model,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first conducted on the measurement model containing three latent variables. The results showed good model fit: $\chi^2/df = 2.28$, CFI = 0.956, TLI = 0.947, RMSEA = 0.048, SRMR = 0.041. All indicators met the suggested standards, indicating that the measurement model was acceptable.

5.5 Structural Model and Hypothesis Testing

The overall fit indices of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ere good: $\chi^2/df = 2.45$, CFI = 0.951, TLI = 0.943, RMSEA = 0.051, SRMR = 0.045. All indicators met academic standards, indicating excellent overall model fit. Specifically: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beta = 0.22$, $p < 0.05$), supporting Hypothesis H1, indicating that university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tself can directly stimulat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beta = 0.38$, $p < 0.001$), indicating that the higher the qua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e stronger the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beta = 0.41$, $p < 0.001$), indicating that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is an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driving factor for enhancing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e path coefficients and hypothesis testing results of the structural model are shown in Figure 1 and Tabl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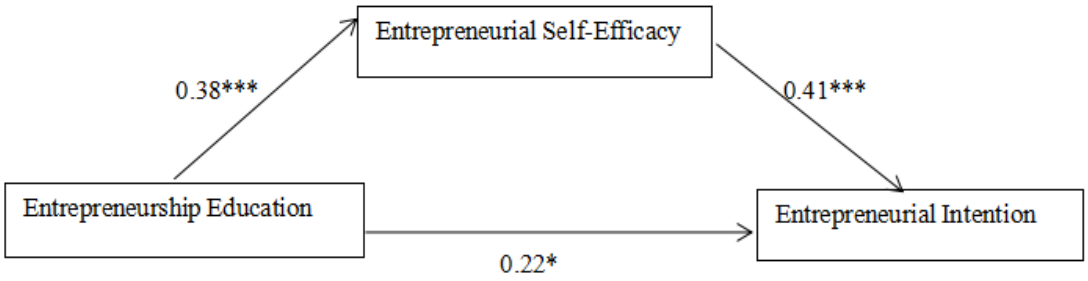


Figure 1 :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Path Diagram

Table 2: Path Coefficients and Hypothesis Testing Results

Hypothesis	Path Relationship	β	SE	t	P	Test Result
H1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0.22	0.09	2.44	0.015	Supported
H2a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0.38	0.06	6.33	0.000	Supported (Path a)
H2b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0.41	0.05	8.20	0.000	Supported (Path b)

5.6 Mediating Effect Test

The Bootstrap method was used to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fter including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the direct effec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remained significant (effect value = 0.220, 95% CI [0.048, 0.392]). The indirect effec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was also significant (effect value = 0.156, 95% CI [0.087, 0.235]), and its confidence interval did not include 0. Since both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were significant, according to the judgment criteria for mediating effects (Preacher & Hayes, 2008),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supporting Hypothesis H2. The proportion of the indirect effect to the total effect was 41.5%, indicating that 41.5%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s impact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is realized indirectly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s shown in Table 3.

Table 3: Mediation Effect Decomposition Table

Effect Type	Effect Value	Boot S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onclusion
			Lower	Upper	
Direct Effect	0.220	0.090	0.048	0.392	Significant
Indirect Effect	0.156	0.038	0.087	0.235	Significant
Total Effect	0.376	0.075	0.229	0.523	Significant

6. Conclusion

The direct positiv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beta = 0.22$, $p < 0.05$) once again confirms the practical value of university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onsistent with the findings of Liñán & Chen (2009) and Wang Xinhuan et al. (2016). This indicates that through systematic measures such as offering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organizing entrepreneurial practices, and providing professional faculty, universities can directly transmit entrepreneurial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students, shape positive entrepreneurial attitudes, and thereby enhance their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However, judging from the path coefficient size, the direct effect is relatively modest, suggesting that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is not singularly direct but requires transmission through intervening variables to fully exert its effect.

The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beta = 0.38$, $p < 0.001$) echoes the core viewpoint of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 individual's self-efficacy is not innate but gradually formed through subsequent learning and experience (Bandura, 1977).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rovides students with entrepreneurial-related knowledge learning, skill training, and practical opportunities, helping them accumulat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e.g., winning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s, project incubation practices), thereby enhancing their confidence in their own entrepreneurial abilities. This result indicates that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mission but also a process of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with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being the core manifestation of this empowerment.

The partial mediating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indirect effect proportion 41.5%) reveals the intrinsic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their relationship. This resul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findings of Xu et al. (2019), indicating that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involves both a direct path of knowledge and skill transmission and an indirect path of psychological belief transmiss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mong these, the path coefficient from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to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beta = 0.41$) is higher than the direct path coefficient from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o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beta = 0.22$), further indicating that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is a more critical bridge connecting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University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an only more effectively stimulat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when it is transformed into their internal entrepreneurial confidence.

This research result reveals the intrinsic psychological path through which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fluences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providing important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niversities to optimiz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ractic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ntrepreneurial talent cultivation.

References

[1]Bandura, A. (2001).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 agentic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2(1)*, 1–26.

[2]Bird,B.(1988). Implementing entrepreneurial ideas: The case for inten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3(3)*, 442–453.

[3]Boyd, N. G., & Vozikis, G. S. (1994). The influence of self-efficac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nd action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8(4)*, 63–77.

[4]Bridge, S., Hegarty, C., & Porter, S. (2010). Rediscovering enterprise: Developing appropriate university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ducation + Training, 52(8/9)*, 722–734.

[5]Chen, C.C., Greene, P. G., & Crick, A. (1998). Does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distinguish entrepreneurs from manager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3(4)*, 295–316.

[6]Cox, L. W., Mueller, S. L., & Moss, S. E. (2002).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1(2)*, 229–245.

[7]Harrison, R. T., & Mason, C. M. (2007). Does gender matter? Women business angels and the supply of entrepreneurial finance.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1(3)*, 445–472.

[8]Hu, W. A., Jiang, Y., & Luo, J. L. (201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under the new normal: The explan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33(19*), 125–131.

[9]Liñán,F.,&Chen,Y.-W. (2009). Development and cross-cultural application of a specific instrument to measure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3(3)*, 593–617.

[10]Li, X. Q. (2017).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nd its impact on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 cross-strait comparative study.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3(1)*, 41–50.

[11]MyCOS Research Institute. (2025). 2025 Chinese undergraduate employment report.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12]Thompson,E.R. (2009). Individual entrepreneurial intent: Construct clar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ly reliable metric.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3(3),* 669–694.

[13]Wang, X. H., Bo, F. Y., & Lei, J. S. (2016).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undergraduates and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Tsinghua Journal of Education, 37(5), 116–124.*

[14]Xiang, H., & Lei, J. S. (2014).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student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their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Tsinghua Journal of Education, 35(2), 120–124.*

[15]Zhu, H., Li, X., & Wang, Y. (2014).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university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nalysi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based on major matching degre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35(8), 78–84.*

In-Post Entrepreneurship: Exploring Pathways for Sustainable Career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蒋君 泰国格乐大学国际学院教育系 邮箱：jiangjun9581@163.com

刘鹤鸣 泰国格乐大学国际学院教育系 邮箱：2959544525@qq.com

Jiang Jun, International College, Krirk University, Thailand.
Email:jiangjun9581@163.com

Liu He-ming, International College, Krirk University, Thailand.
Email:2959544525@qq.com

摘要：面对生源竞争与产业技术快速迭代的双重压力，民办高职院校教师普遍面临职业发展通道单一、实践知识滞后等可持续性危机。同时，通用人工智能（AGI）的飞速发展对传统职业与教育模式构成了根本性挑战。在此背景下，探索教师在岗创业能否成为其应对挑战、实现生涯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与战略意义。本研究基于生态系统理论，运用文献资料法与案例分析法，以山东省、湖北省等地的具体政策与实践为例进行剖析。研究发现，教师创业是连接个体成长与教育系统演进的枢纽，其成功依赖于国家、省、市、校多层级政策协同构成的“支持性生态系统”。成功的创业实践不仅能更新教师的实践性知识、拓展其职业韧性，更能通过反哺教学，直接培养学生在 AGI 时代所需的复杂问题解决、创新与人文关怀等核心竞争力。文章最后提出了构建包容性制度、培育创业文化等系统性对策，以期为教师发展范式转型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民办高职院校，教师创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理论，人工智能

Abstract： Facing pressures from enrollment competition and rapid technological change, teachers in private vocational colleges often struggle with narrow career paths and outdated skills. The rise of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 further challenges traditional educ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whether in-post entrepreneurship can be a sustainable career path, using ecosystem theory to analyze policies and cases from Shandong and Hubei. Findings show that teacher entrepreneurship connects personal growth with systemic change, thriving within a multi-level "supportive ecosystem." It not only renews teachers'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resilience but also cultivates students' AGI-era competencies like problem-solving and innovation through teaching feedback. The study concludes by propos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strategies to support this development paradigm and advance vocational education quality.

Keywords: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eacher entrepreneurship; career sustainability; ecosystem theo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1.引言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正处于提质培优的关键阶段，其核心矛盾之一在于：产业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创新与实践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作为人才培养主体的民办高职院校教师，却普遍面临发展内卷、知识技能与产业实际脱节等不可持续风险。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触及了这一问题。胡志伟（2019）以宁波某学院为例，探讨了高职教师创办衍生企业存在的具体问题与障碍，为理解创业实践的现实复杂性提供了直接参照。杨慷慨、蔡宗模与张海生（2020）则提出了“教师创业型角色认同”的概念，将其视为创业型高职院校发展的逻辑起点，触及了教师身份转变的深层议题。肖贻杰（2025）通过实证研究指出，高职教师创新创业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其发展是应对挑战的关键。

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将教师创业视为一种孤立的经济行为或个体能力问题，缺乏将其置于一个动态演化的政策与产业环境中进行系统考察。特别是在通用人工智能（AGI）加速发展、不断重新定义工作和学习内涵的宏观背景下，教师通过创业实现自我更新的意义被进一步放大：这不仅是谋生或发展的手段，更可能是在“硅基智能”时代，主动探索并巩固“碳基生命”独特价值（如创造力、情境判断与意义构建）的深刻实践。因此，本研究旨在回应一个核心问题：在多层政策环境与 AGI 技术革命的双重影响下，民办高职院校教师如何通过“在岗创业”这一能动行为，与外部生态系统互动，最终实现个人生涯的可持续发展并赋能未来教育。

2.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2.1 核心理论：生态系统理论

本研究采用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作为核心分析框架。该理论将个体发展视为嵌套于一系列相互影响的环境系统之中，对于分析教师创业这一受多重因素制约的复杂行为尤为贴切。如图 1 所示，教师的创业实践（微系统）直接受到所在学校的评价制度、激励政策与文化氛围（中系统）的塑造与制约。学校则嵌入在更广阔的外系统中，包括地方政府的产业扶持政策、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以及省级教育发展规划。所有这些，又都笼罩在宏系统之下，即国家层面的职业教育战略、科技创新导向以及由 AGI 引领的全球技术变革浪潮。这一框架强调，教师的创业选择、路径与成效，并非单纯个人决策的结果，而是其与各层级系统持续进行资源交换和能量互动的产物。一个支持性的生态系统能够为教师创业提供合法性、资源通道和风险缓冲，而教师的成功实践也能反哺系统，推动制度创新与文化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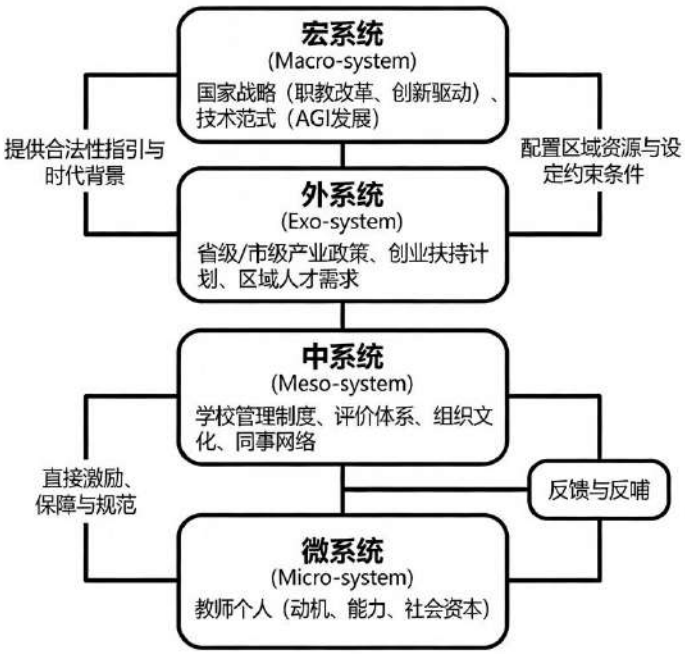


图 1：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教师创业分析框架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本研究系统收集与分析了两类文献资料。一是政策文本，涵盖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 号）、湖北省《“创响荆楚”高校师生创新创业行动方案（2025—2027 年）》、山东省《山东省创业街区试点建设指引》等，旨在勾勒从中央到地方清晰的政策支持脉络。这些文件多来源于政府官方网站或权威媒体报道，确保了信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二是学术文献，主要从中国知网（CNKI）等数据库，检索了近五年内以“高职教师创业”、“产教融合”、“可持续专业发展”为主题的期刊论文与案例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对话对象。

2.2.2 案例分析法

为深入揭示政策如何落地以及实践如何反塑环境，本研究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重点选取湖北省和山东省的政策体系与相关院校实践进行深度剖析。湖北省在 2025 年高调出台的《“创响荆楚”行动方案》，对教师兼职创新、在职创办企业给予了人事关系、报酬取得、股权激励等方面的明确保障，极具代表性。山东省则通过构建“创业街区+孵化+生态”的新模式，为创业者（包括高校师生）提供全链条服务。研究将结合这些

省级政策，分析其如何具体影响辖区内民办高职院校的制度设计，并选取在此环境下产生的教师创业典型案例，探究政策赋能的具体机制与实践者的真实应对策略。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多层生态系统的政策赋能：从“允许”到“激励”的演进

国家与地方层面密集出台的政策，共同构成了教师创业从“可能”走向“可行”的阶梯式支持系统。其演进逻辑清晰体现了从破除禁区到主动激励的转变。

在国家宏系统层面，政策导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 2011 年《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不得从事影响教育教学工作的兼职”的谨慎限制，到 2021 年《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允许教师在校外从事与学科相关的兼职，制度枷锁逐步解除。这为教师走出象牙塔提供了最基本的合法性依据。

在省市级外系统层面，政策变得更加具体和富有激励性。以湖北省为例，其 2025 年发布的《“创响荆楚”行动方案》堪称一份“教师创业保障书”。它明确规定：鼓励教师兼职创新、在职或离职创办企业，人事关系不变；兼职者可合法取酬，实行弹性工作时间；离岗创业者离岗期间连续计算工龄，并可依法取得股权等报酬，返岗时不低于原岗位等级。这些条款直击教师创业在身份、时间、职业延续性和经济回报上的核心顾虑，形成了强有力的“安全网”。山东省则从构建创业生态的角度发力，实施“创业齐鲁”行动，通过打造省级创业街区，集成政策咨询、融资对接、导师指导等“一站式”服务，为包括高校教师在内的创业者营造优质的本地化环境。例如，聊城市推出的“全周期陪伴、精准化赋能”创业陪跑体系，组建专业导师团队，为创业者提供“保姆”式服务，这种来自地方行政力量的直接支撑，极大地降低了创业的启动门槛与试错成本。

这些政策最终需要在学校中系统层面落地生根。一些先进的民办高职院校已开始积极探索。例如，贵州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设计了“511-115”项目，其中“课程创新轨”要求“1 名教师进入 5 家企业-提炼 1 套真实任务-开发 1 门新课程”，并配套专项经费支持。这实质上是将教师的企业实践和知识转化行为，结构化、制度化地纳入教师的工作职责与发展路径中，使创业实践与教学工作融为一体。

表 1：多层级政策对教师创业的支持维度分析

政策层级	代表性政策/举措	核心支持维度	对教师创业的关键影响
国家	从“禁止影响教学的兼职”到“允许校外相关兼职”的政策演变	合法性赋予	解除了教师参与市场活动的制度禁忌

（宏系统）			
省级（外系统）	湖北省《“创响荆楚”行动方案》；山东省“创业齐鲁”行动与创业街区建设	权益保障与生态构建	通过保障降低风险；通过搭建平台、集成服务提供外部资源网络
市级（外系统）	聊城市“创业陪跑”体系	精准服务与过程支持	提供创业指导、融资对接等服务，解决实践中的具体困难
校级（中系统）	贵州应用技术职业学院“511—115”项目；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鼓励教师参与横向项目	制度内化与资源供给	将创业实践纳入成果评价体系，提供关键资源支持，实现创业与教学的制度性融合

3.2 多元化的教师创业实践样态

在多层政策的赋能下，民办高职院校教师的创业实践呈现出多元化、专业化的样态，远超传统的“开个小店”模式。

3.2.1 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型

这是工科类专业教师的典型路径。例如，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的教师团队依托校企协同优势，深入行业企业一线开展横向课题研究和技术服务。近五年，该校完成科技成果转化 155 项，横向技术服务到账经费突破 7000 万元，为行业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110 项。在这种模式下，教师扮演了“技术经纪人”和“创新工程师”的双重角色，其创业直接推动了产业技术进步，而攻克技术难题的实战经验则成为课堂上最珍贵的案例库。

3.2.2 产教融合与模式创新型

此类创业侧重于利用教育专业知识和资源，创新服务模式，深度绑定产业需求。如贵州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的“双轨驱动”模式，要求教师带着课程开发任务深入企业，再将真实任务转化为教学内容。南昌职业大学则通过“4-8-4”产教融合全链式模式，与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将真实业务场景植入教学，2024 年校企合作科研经费达 697 万元。这类实践中的教师，更像是“教育产品设计师”和“生态连接者”，他们的“创业”成果体现为创新的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和稳固的校企合作关系。

3.2.3 社会服务与兴趣拓展型

这对于公共课、基础课教师尤其具有启发性。例如，山东省聊城市在创业扶持中，涌现出许多基于特色技能（如地方小吃、手工艺）的成功案例。虽然并非直接来自高职教师，但其逻辑相通。一位公共体育教师，完全可以借鉴此思路，利用体育在健康促进、团队建设方面的专业优势，开发面向企业员工的“健康管理”或“团队凝聚力拓展”培训项目，将个人兴趣与专业技能转化为市场服务。这种创业的核心在于“资源拼凑”，即创造性整合自身看似“非核心”的知识技能与未被满足的社会需求，开辟独特的职业新赛道。

3.3 双向互构：政策、实践与 AGI 挑战的深层互动

政策、实践与时代挑战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推动关系，而是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双向互构、共同演化的系统。

首先，政策为实践开辟航道，而成功的实践则反过来论证并敦促政策的深化。 湖北省之所以能出台如此细化的保障性政策，其背景正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以及对高校释放创新活力日益迫切的需求。当越来越多像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教师那样的技术转化案例涌现，并产生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时，它们就成为了“政策有效”的最佳证明，从而激励政府出台更优惠的税收、知识产权激励措施，形成“政策-实践-更好政策”的正向循环。

其次，教师的创业实践，正是在 AGI 时代重塑职业教育价值与教师自身竞争力的关键行动。 随着 AGI 在知识检索、模式化编程乃至某些创意生成领域能力的突飞猛进，传统上以知识传授和重复性技能训练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其价值正在被快速稀释。在这种背景下，教师创业的价值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3.3.1 获取 AGI 无法替代的“情境性知识”。

无论是指导致企业解决一个特定生产线的故障（技术转化型），还是为某个社区设计一套健身方案（服务拓展型），教师所面对和学习的，都是高度复杂、非标准化、充满模糊性的“真实世界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综合判断、人际协调和灵活应变能力，是当前 AGI 的短板，也正是未来人才的核心竞争力。教师通过创业亲身获得这种知识，才能将其传递给学生。

3.3.2 从“知识传授者”转型为“学习体验架构师”。

当知识本身易于获取，教育的重点便从“教什么”转向“如何激发学习”和“如何创造应用知识的场景”。有过创业经历的教师，天然擅长此道。他们能基于真实项目设计学习任务，引导学生团队协作、试错迭代，培养学生的企业家精神、抗挫力和创新思维——这些是在与 AGI 协同工作中保持主导地位的关键素养。

3.3.3 践行并传递“碳基生命”的独特价值。

创业是激情、愿景、责任感和风险承担的综合体现。教师在创业中展现出的对市场机遇的洞察、对团队成员的关怀、对客户需求的共情、对失败挫折的坚韧，这些都是充满“人性温度”的特质。在 AGI 日益强大的未来，教育的一个重要使命恰恰是守护和培育这些特质。一位有创业故事的老师，其本身就是“人类创造力与韧性”的生动教材，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理解在智能时代，何为人之为人的根本。

4.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生态系统理论的分析框架，结合多层级政策文本与具体案例，揭示了民办高职院校教师在岗创业的复杂逻辑与深远意义。研究结论认为，在岗创业是教师应对职业内卷与 AGI 时代挑战、实现生涯可持续发展的一条有效且富有前瞻性的路径。其成功并非孤立的个人奋斗，而是高度依赖于一个从国家宏观政策引领，到地方中观生态构建，再到学校微观制度创新的协同支持系统。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系统性建议：

对于政策制定者（宏系统与外系统）：应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类似湖北“创响荆楚”方案中的保障条款标准化、普及化。更重要的是，需加强科技、人社、教育、知识产权等部门的政策协同，解决教师创业中科技成果作价入股、校外收入纳税、创业失败后职业通道接续等实际操作中的“痛点”与“盲点”，真正构建起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制度环境。

对于民办高职院校（中系统）：院校是构建支持性生态的核心行动者。首先，必须进行评价体系革命，将教师带领学生取得的创新创业成果、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产生的社会效益等，作为与论文、课题同等甚至更受重视的职称晋升与绩效考核指标，正如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南昌职业大学的实践所展示的那样。其次，应设立校内创业孵化基金与导师团，为教师的初期探索提供“第一桶金”和智力支持。最后，要主动链接地方创业生态，如山东省的创业街区、聊城市的陪跑体系，将校内教师的创意与校外的市场、资本、政策资源无缝对接。

对于教师个体（微系统）：应主动培养生态系统思维，积极关注并利用各级利好政策，将个人发展融入区域产业发展的“大盘子”中。在创业路径选择上，不必拘泥于高科技转化，可从“专业微创新”或“兴趣+”开始，关键在于建立与真实世界持续互动的通道。最重要的是，要有意识地将创业历程中的得失、案例与反思进行“教学化转换”，让课堂成为分享实战经验的场域，从而培养出更能适应与驾驭 AGI 时代的、具备完整“人性竞争力”的学生。

在职业教育改革迈向深水区的今天，支持教师在岗创业，已不仅是激励个体教师的权宜之计，更是民办高职院校盘活师资队伍、激活办学活力、真正扎根产业办学的战略选择。面对 AGI 的浪潮，人类的独特优势在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创新、复杂情境下的决策以及赋予行动以意义的能力。教师的创业实践，正是对这些优势的不断演练与证明。唯有构建起一个包容、激励、保障有力的生态系统，教师的创业之火方能星火燎原，不仅照亮其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生涯之路，更照亮职业教育在智能时代培养“不可替代的人”的未来之路。

参考文献

[1]肖贻杰（2025）。高职教师创新创业能力发展实证研究：差异特征与提升策略。*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 2025,* 19(04):85-90.

[2]胡志伟（2019）。高职教师创办衍生企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科技创业月刊, 2019,* 32(04):130-134.

[3]杨慷慨、蔡宗模、张海生、吴朝平（2020）。教师创业型角色认同：新时代创业型高职院校发展的逻辑起点。*高等职业教育探索, 2020,* 19(01):35-40.

[4]国务院（2019）。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 号）。取自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68517.htm

[5]湖北省教育厅等（2025）。《“创响荆楚”高校师生创新创业行动方案（2025—2027 年）》。取自 https://jyt.hubei.gov.cn/

[6]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2025）。《山东省创业街区试点建设指引》。取自 https://hrss.shandong.gov.cn/resource/srst/att/202505/d621b0a7-dca9-4f2d-8b13-ee9255f15786.pdf

[7]央广网（2025）。科教融汇 校企协同 —— 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激活科研育人新生态。取自 https://edu.cnr.cn/sy/sytjB/20251122/t20251122_527437915.shtml

[8]中国日报网（2025）。协同共生：南昌职业大学探索民办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取自 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512/16/WS69410793a310942cc4996e80.html

[9]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25）。聊城市为创业者的梦想“护航”陪跑不止“一公里”。取自 https://hrss.shandong.gov.cn/

基于扎根理论的大一新生心理健康问题归因研究——以 X 大学为例

闫冰冰 泰国格乐大学国际学院教育系 邮箱：616785766@qq.com

Yan Bing-bing , International College, Krirk University, Thailand.

摘要：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与高校治理转型背景下，大一新生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影响学生发展质量与高校人才培养成效的重要议题。基于此，本文以 X 大学为案例，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大一新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生成原因进行系统归因分析。研究通过对 20 名大一新生开展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获取质性资料，并遵循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与选择式编码的分析路径，对访谈文本进行持续比较分析。

研究发现，大一新生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表现为焦虑、抑郁、孤独感、自我怀疑等，其形成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中学遗留问题或在大学转型情境中，个体心理特质、家庭支持条件、学业与校园环境压力以及社会文化价值期待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基于扎根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大一新生心理健康问题多维归因模型”，揭示了心理问题生成的结构要素与作用路径。

研究认为，高校应从系统治理视角出发，将新生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学生发展支持体系，通过优化新生管理制度、完善学业与环境支持机制、强化家校协同与社会支持网络，提升大一新生心理适应与发展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高校学生管理与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与现实参考。

关键词：大一新生，心理健康问题，扎根理论，归因机制，高校学生管理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mass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in China, the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first-year university students have become a critical issue that affects student development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alent cultivation. Taking University X as a case, this study adopts grounded theory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emergence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mong first-year students.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20 first-year students, and qualitative data were analyzed through open coding, axial coding, and selective coding, following a constant comparative approach.

The findings show that first-year students' mental health problems mainly manifest as anxiety, depression, loneliness, and self-doubt. Rather than resulting from a single factor, these issues are shaped by multiple interacting conditions, including pre-existing psychological distress from secondary school,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traits, family support, academic and campus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and sociocultural expectations embedded in the transition to university.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the study develops a "multi-dimensional attribution model of first-year students' mental health problems," which reveals the structural elements and processual pathways through which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s generated.

The study argues that universities should adopt a systemic governance perspective by integrating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to student development support systems. This includes optimiz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new students, enhancing academic and environmental support, and strengthening family–school collaboration and broader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to improve first-year students'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and developmental outcomes. The findings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university student management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Keywords: first-year university students; mental health problems; grounded theory; attribution mechanism; university student management

1.引言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逐渐成为教育管理与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其中，大一新生作为从高中向大学过渡的特殊群体，在学习方式、人际关系、生活环境与自我认同等方面均面临显著变化，心理适应压力尤为突出。焦虑、抑郁、孤独、自我否定等心理问题在大一新生群体中呈现一定的普遍性和隐蔽性，若未能得到及时干预，可能对其学业发展、人格成长乃至校园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1.2 研究意义

现有研究多采用量化方法探讨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因素，但在解释心理问题的生成过程与内在逻辑方面仍显不足。扎根理论强调从经验材料中建构理论，适用于探索复杂社会心理现象。本文通过扎根理论方法，对大一新生心理健康问题进行归因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其成因机制的理解，并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管理决策提供更具情境性的依据。

理论意义上，本研究突破了传统量化研究预设变量的局限，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深入探究新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形成机制，丰富了大学生心理健康归因研究的理论体系，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借鉴。实践意义上，研究结果可帮助 X 大学精准把握新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核心症结，为制定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策略、优化校园心理健康支持系统提供实践依据，同时也可为其他高校开展新生心理健康工作提供参考。

1.3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围绕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归因开展了大量研究。中国研究方面，学者们多采用问卷调查等量化方法探讨新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因素，发现适应不良、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家庭教养方式等是主要成因。例如，张艳等（2023）的研究表明，新生的人际适应能力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正相关；李磊等（2022）的研究发现，权威型家庭教养方式下的新生心理健康水平更高。其他国际研究多从个体心理特质、社会支持、校园环境等维度展开，如 Erikson 的人格发展理论认为，青年期个体的核心冲突是自我同一性与角色混乱，此阶段的适应不良易引发心理问题；社会支持理论则强调，良好的社会支持可有效缓解个体心理压力，降低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风险。

2. 研究设计

2. 1 研究方法选择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作为核心研究方法。该方法由 Glaser 和 Strauss 于 1967 年提出，其核心特征是“从资料中提炼理论”，无需预设理论假设，通过对原始资料的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逐步提炼核心范畴，构建理论模型。大一新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影响因素众多且相互关联，扎根理论能够帮助研究者深入挖掘资料背后的深层逻辑，精准把握各成因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适用于本研究。

2.2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取向下的理论性抽样方法。抽样标准为：1. 入学时间不超过 1 学年；2. 曾出现过焦虑、抑郁、适应不良等心理健康相关困扰（通过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系统筛选，通过校园心理测评系统筛选和访谈初期确认）；3. 自愿参与访谈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最终选取 20 名新生作为访谈对象，其中男生 12 名，女生 8 名；理工科专业 9 名，管理类专业 5 名；艺术类专业 6 名，来自城市的新生 9 名，来自农村的新生 11 名。样本覆盖不同性别、专业、生源地，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和差异性，满足扎根理论研究对资料丰富性的要求。

2.3 访谈方法

访谈由研究者本人担任主试。在正式访谈前，首先向受访者进行自我介绍。鉴于本研究涉及个人隐私，为消除受访者顾虑，在阐述研究目的时采用了“大学生学习状况调查”的掩蔽性说法，并着重强调了匿名与保密原则。在获得受访者知情同意后，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访谈结束后，向受访者致谢并就其疑问进行解答。具体访谈提纲如下，实际操作中将根据现场情境及受访者的具体情况灵活调整。

1. 开学以来，你对大学生活的整体感觉怎么样？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2. 你觉得大学与高中相比，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3. 入学以来，有没有哪件具体的事情让你感到特别困扰或压力很大？

4. 在进入大学之前，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心理上的困扰？如果有，可以描述一下吗？

5. 这些困扰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时与你生活中的哪些事情（如家庭、学业、人际）有关？

6. 进入大学后，这些原有的困扰有没有发生变化？是缓解了、恶化了，还是以新的形式出现了？

7. 宿舍生活和同学关系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体验？遇到人际冲突时，你通常会怎么处理？

8. 在学习上是否遇到了困难？你觉得离开家庭独立生活后，学习和生活的责任变化给你带来了什么挑战？

9. 你会不会关注与他人的比较？父母对你目前的表现有期待吗？这些比较和期待给你带来了什么影响？

10. 你觉得大学环境中，有哪些具体因素（如自由时间变多、竞争环境变化等）让你的心理困扰被放大或重新触发了？

11. 当你感到情绪低落、焦虑或自我怀疑时，你通常会怎么处理？做过哪些努力来适应？

12. 进入大学后，你有没有尝试过寻求帮助（如找心理咨询、辅导员、朋友或家人）？

（若有）为什么选择找他们？体验如何？

（若无）是什么阻碍了你求助？（如担心被贴标签、不信任等）

13. 你觉得学校现有的支持体系（如辅导员、心理咨询中心）对你来说有用吗？为什么？

14. 你觉得心理困扰对你 “作为一个大学生” 的身份认同有什么影响？

15. 如果让学校更好地支持像你这样的学生，你觉得应该在哪些方面做改变？

16. 有没有哪些事情是我们没有问到，但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

3. 研究过程

访谈转录完成后，对文本资料进行逐字拆解，提取研究情境中重要、突出且高频出现的现象并阐释其意义。意义阐释主要通过编码完成，具体包含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三个层级。

3.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阶段主要是在原始访谈文本的基础上进行逐字逐句分析，通过贴标签的方式从文本中抽取初始概念并不断进行比较。本研究在编码过程中尽量保留被访者原话，以确保概念的贴近性与扎根性。在此阶段，本研究共提取到 375 条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原始语句，从中梳

理出 61 个初始概念。随后研究者通过多轮比较整理、属性聚合与语义合并，并剔除出现频次低于 2 次的初始概念，最终归纳得到 18 个初始范畴。这些范畴涵盖了入学前心理状态、家庭心理支持、大学适应状况、自我价值体验及求助障碍等多个方面，其范畴及相应初始概念举例如表 1 所示。

3.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通过聚类分析将概念与范畴之间的碎片化数据重新建立逻辑关联，使其形成结构化解释框架。研究者在这一阶段重点围绕“轴心”范畴展开分析，并从因果关系、条件关系、情景关系与相似性关系等维度探寻范畴间的潜在联结。在分析过程中，研究者结合被访者所处的大学过渡情境及心理经验背景进行综合判断，以避免割裂语境导致的解释偏差。最终，本研究将开放式编码所得的 18 个范畴整合为 6 个主范畴，包括脆弱心理基础、家庭心理支持薄弱、社会适应压力、学习适应压力、自我评价困境与求助路径障碍，具体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1:

原始语句（带初始概念）	初始范畴	主轴范畴
“我高三就开始焦虑，到了大学一下子没适应”（入学前存在心理症状）	既有心理问题史	入学前心理基础
“我知道自己有焦虑，但家里说上大学就好了”（家庭否认心理问题）	家庭心理否认/弱支持	家庭心理支持缺位
“家里从来不会聊情绪的事”（情绪沟通缺失）	情绪沟通缺位	家庭心理支持缺位
“我爸妈觉得心理问题就是想太多”（污名化心理问题）	心理污名化	家庭心理支持缺位
“大学以后，你得自己处理所有情绪”（情绪自我管理负担上升）	自主情绪负担	大一适应压力
“宿舍关系不好，我经常不敢回寝室”（社交冲突与回避）	社交冲突	社交适应困境
“我不知道怎么跟同学相处，他们看起来都很强”（社交自卑与比较）	社交自卑	社交适应困境
“上课内容跟高中完全不一样，节奏较快，消化起来有困难”（学习节奏差异）	学习适应困难	学业适应困境
“上大学以后老师不会盯你了，作业拖延很严重”（自我管理能力不足）	自主学习缺位	学业适应困境
“我很怕挂科，会让我觉得更失败”（失败焦虑与自我评价过敏）	自我价值敏感	自我评价困境
“我经常怀疑自己是不是没用”（全局性自我否定）	自我否定	自我评价困境
“我尝试去上心理课，但没有人告诉我怎么求助”（帮助渠道不清晰）	求助信息缺口	求助路径障碍
“去学校心理咨询，我会觉得很丢人”（资源拥挤与延迟）	污名求助回避	求助路径障碍
“我不知道跟谁说这些事，也怕同学知道”（污名导致求助回避）	污名求助回避	求助路径障碍
“遇到烦心事就一直钻牛角尖，越想越难受，不知道怎么缓解”（情绪调节方法缺失）	情绪调节能力薄弱	入学前心理基础
“我爸妈总说‘别人能做到你也能’，要求我必须拿奖学金”（家庭过高期待）	家庭期望过高	家庭心理支持缺位
“高中的朋友都不在一个学校，现在身边没什么能说心里话的人”（新社交网络构建困难）	社交资源重建	困难社交适应困境
“看着同学都有明确的学习目标，我却不知道该学什么、怎么学”（学习目标迷茫）	学业目标模糊	学业适应困境

3.3 采用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扎根理论编码的核心阶段，其核心目标是从主轴编码得到的主范畴中提炼出能够统领所有主范畴的核心范畴，并围绕核心范畴构建完整的理论模型，厘清各主范畴与核心范畴、各主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

本研究通过对 6 个主范畴进行反复比较、整合与提炼，最终确定“大一新生心理适应困境的生成与阻滞机制”为核心范畴。该核心范畴能够贯穿研究全过程，系统统领所有主范畴，清晰阐释大一新生心理适应问题的形成逻辑与发展脉络。各主范畴与核心范畴的对应关系如表 2 所示。

表2:

主轴范畴	选择范畴（核心范畴）	
入学前心理基础	脆弱心理基础	大一新生心理适应困境的生成与阻滞机制
家庭心理支持缺位	家庭支持系统薄弱	
社交适应困境	社会适应压力	
学业适应困境	学习与自我管理压力	
自我评价困境	自我价值困境	
求助路径障碍	求助障碍与系统阻滞	

3.4 理论模型构建与饱和度检验

基于选择性编码结果，本研究围绕核心范畴“大一新生心理适应困境的生成与阻滞机制”，构建了大一新生心理健康问题多维归因理论模型（见图 1）。该模型清晰呈现了各主范畴与核心范畴的内在逻辑关联：脆弱心理基础作为前置性条件，为心理适应困境的产生提供了潜在土壤；家庭心理支持薄弱构成重要的环境制约因素，削弱了新生的心理缓冲能力；社会适应压力与学习与自我管理压力是大学过渡期的核心触发因素，直接加剧心理适应负担；自我价值困境是上述因素交互作用下的核心心理表征，进一步固化适应困境；而求助障碍与系统阻滞则作为阻滞性因素，使得新生难以有效缓解心理困扰，最终形成“前置条件—触发因素—心理表征—阻滞因素”的闭环式困境生成机制。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有效性，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常用的饱和度检验方法。在完成 20 名受访者的编码分析后，额外选取 3 名符合抽样标准的大一新生进行补充访谈与编码。结果显示，补充访谈未提炼出全新的概念与范畴，原有核心范畴及逻辑关系得到进一步验证，未出现矛盾性信息，表明本研究的访谈资料已达到理论饱和度，构建的理论模型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与代表性。

4. 研究结果

基于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与选择式编码，本研究构建了大一新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多维归因模型，揭示了心理困扰从“问题生成”到“困境固化”的整体机制路径。研究发现，大一新生心理困扰的形成呈现出“前置条件—触发压力—心理表征—阻滞机制”的链式结构，各阶段逻辑相互强化，最终导致心理问题滞留与固化。

4.1 前置性条件：脆弱心理基础的延续与叠加

研究显示，部分新生并非在大学阶段首次出现心理困扰，而是在高中阶段已出现焦虑、抑郁或情绪波动等问题，进入大学后在新的适应情境中被激活或加重。高中时期的学业压力、家庭矛盾及自我认同问题构成了脆弱心理基础，这一基础未在阶段转换中得到修复或干预，而是被带入大学情境并叠加大学适应压力，使心理困扰呈现累积性特征。这一现象说明，大一新生心理健康问题具有继发性与阶段激活性特征，并非完全源于大学阶段本身。

4.2 环境制约因素：家庭心理支持系统的普遍薄弱

家庭心理支持不足是新生心理困扰形成的重要环境性因素。研究发现，家庭心理支持缺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情绪沟通不足、心理问题否认及求助污名化认知。多数受访者提到家庭中较少谈论情绪与心理议题，父母倾向于将心理困扰归因于“想太多”或认为“上大学就会好”，甚至对心理咨询抱有标签化评价。在这一机制下，个体的心理压力与情绪体验缺乏缓冲通道，心理韧性削弱，导致后续适应阶段更脆弱。这一发现提示，f 家庭不仅是心理健康的支持系统，同时也可能构成风险暴露机制。

4.3 核心触发因素：社会与学业双重适应压力的集中爆发

进入大学后，新生需在短时间内完成社会与学业两个维度的身份转换，其适应压力集中爆发。社会适应压力主要来源于宿舍关系矛盾、社交比较和社交资源重建；学业适应压力主要表现为学习方式转变、自主管理能力不足及学业失败焦虑。两个维度共同作用，使新生的感知压力明显上升，形成强烈的心理负荷。在多数情况下，社会适应失败会进一步转化为自我否定，而学业适应失败则强化失败敏感性，两者互动作用构成心理困扰的主要触发源。

4.4 核心心理表征：自我价值困境的显性化

在前置基础与触发压力的持续作用下，自我价值困境成为心理困扰的核心心理表征。研究发现，新生的自我价值感高度依赖外部评价（如成绩、同伴评价、人际反馈等），当在上述领域遭遇挫败时容易产生否定性自我解释，如“我不如别人”“我没有能力”“我可能失败”。这一自我价值困境不仅产生焦虑、抑郁与自我怀疑等负向情绪体验，还可能促发回避行为，进一步弱化社会与学业适应能力，形成负向循环。

4.5 阻滞性机制：求助障碍与支持系统阻滞导致困境固化

尽管多数高校已建立心理支持资源，但新生面临求助意愿与求助路径的双重阻滞。一方面，心理污名化认知与隐私担忧抑制了求助意愿；另一方面，咨询服务获取路径不清晰、资源供给不足及辅导员支持有限削弱求助效果。求助机制的失效使心理困扰缺乏有效出口，最终导致心理问题滞留与固化，使新生陷入“困扰—回避—加重”的闭环困境。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大一新生心理健康问题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由历史性心理基础、家庭支持环境、大学适应情境、心理机制及制度性阻滞共同塑造的系统性结果。

5.讨论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分析，构建了“大一新生心理适应困境的生成与阻滞机制”模型，从前置条件、环境制约、触发因素、心理表征与阻滞机制五个维度揭示了心理健康问题的生成轨迹与归因逻辑。研究结果既与既有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形成对话，也在部分层面提供了理论补充与机制层面的深化解释。

5.1 大一新生心理困扰具有继发性与情境激活特征

现有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多关注大学阶段的压力来源及适应状况，往往忽略心理困扰可能具有延续性。本研究发现，近半数受访者在高中阶段已存在焦虑或抑郁倾向，进入大学后在新的适应情境中被再次激活并叠加。这一发现提示，心理困扰在大学阶段很多情况下并非“起源于大学”，而是在更早阶段积累并在过渡情境中发生心理触发（triggering）。这一继发性特点与发展心理学关于过渡阶段的危机激活机制相吻合，丰富了心理健康研究中“大学起点”假定的不足。

5.2 社会适应与学业适应构成过渡困境的双重压力场

既有研究将大学新生的适应压力拆分为学习适应、人际适应或生活适应等分散性维度，本研究则发现大一新生的心理困扰往往呈现“双重压力场”结构，即社会适应与学业适应共同作用于心理系统。两类压力强化了个体的自我监控水平与失败敏感性，并引发自我价值冲突。例如，宿舍冲突、社交比较与学业节奏差异共同导致受访者出现“失败即无能”的价值链条反应，为理解焦虑来源提供了更具心理机制的解释框架。

5.3 家庭心理支持缺位构成重要的隐性风险因素

与既有对大学阶段情绪支持系统的研究相比，本研究进一步揭示家庭心理沟通薄弱、心理污名化认知与问题否认机制在心理困扰形成中扮演的“隐性风险角色”。这些家庭因素并不直接制造困扰，但显著削弱个体情绪调节、心理应对及求助意愿，使心理困境在大学阶段更具累积性与隐蔽性。该发现提示，家庭并非仅是“外部支持变量”，而是心理健康问题生成路径中的重要情境节点。

5.4 负向自我价值构成心理困扰的核心心理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自我价值困境是贯穿压力形成与问题固化的核心心理机制，这与社会比较理论（Festinger，1954）、自我一致性理论及近期有关青年期自我敏感的研究结论形成呼应。不同于将焦虑或抑郁视为结果变量的传统研究，本研究将负向自我价值识别为压力向心理问题转化的关键“心理表征”，其解释力度更符合心理机制视角。

5.5 求助障碍与系统阻滞强化了困境的滞留效应

尽管高校通常具备心理咨询中心与辅导系统，但研究发现求助行为被三个机制共同阻滞：①污名化认知阻断意愿；②信息缺口阻断路径；③系统容量不足阻断效果。这意味着高校支持系统现阶段更像“被动响应机制”，而非“前置性支持机制”，导致心理困扰难以通过外部介入得以消解。该发现呼应了教育领域近年来关于“心理支持系统结构性滞后”的讨论。

综观上述分析，本研究不仅识别出心理健康问题的多个影响因素，更揭示了其发生顺序、路径逻辑与机制条件，为理解大学阶段心理困扰提供更具系统性的解释框架。

6. 结论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方法，对大一新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系统归因分析，从脆弱心理基础、家庭支持系统薄弱、适应压力触发、自我价值困境以及求助路径阻滞五个维度构建了“大一新生心理适应困境的生成与阻滞机制”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大一新生心理健康问题具有累积性、激活性与结构性特征，其生成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在高中阶段的心理遗留问题基础上，在大学过渡情境中被触发并加剧。家庭情绪支持贫乏与心理污名化认知

削弱了心理缓冲能力，社会与学业双重适应压力成为心理困扰的主要触发源，自我价值困境则构成核心心理表征，而心理求助障碍和制度性支持系统滞后进一步强化困境固化过程。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实践建议：**1.**构建前置干预机制，加强与高中的心理健康衔接，通过新生入学心理普查精准识别具有脆弱心理基础的学生，建立个性化心理档案； **2.**优化新生适应教育，开设社交技巧培训、自主学习能力提升等课程，帮助新生缓解社会与学业适应压力； **3.**搭建家校协同支持网络，通过家长学堂、心理健康手册等形式，引导家长树立科学的心理支持理念，提升家庭情绪沟通质量；**4.**完善校园心理支持体系，简化心理咨询预约流程，增加心理咨询师数量，开展“心理健康 **normalization**”宣传活动，消除求助污名化； **5.**强化自我价值认同教育，通过主题班会、团体辅导等形式，帮助新生建立基于内在特质的自我价值认知，提升心理韧性。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仅来自 **X** 大学，虽具有典型性，但可能存在地域与校情差异，未来可扩大样本范围，纳入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高校；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未来可结合量化研究，对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进一步验证与完善。

参考文献

[1]Cohen, S., & Wills, T. A. (1985).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8*(2), 310–357.

[2]Charmaz, K. (2014). 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 (2nd ed.). Sage.

[3]Creswell, J. W., & Poth, C. N. (2018). Qualitative inquiry & research design: Choosing among five approaches (4th ed.). Sage.

[4]Erikson, E. 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orton.

[5]Festinger, L. (1954).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 7(2), 117–140.

[6]Glaser, B. G., & Strauss, A. L.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Aldine.

[7]Harter, S. (2012).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lf: Developmental and sociocultural foundations (2nd ed.). Guilford Press.

[8]Li, L., Zhao, X., & Chen, C.（2022）。家庭教养方式对大学新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心理发展与教育**，*38*(2)，213–220。

[9]Rickwood, D., Deane, F. P., Wilson, C. J., & Ciarrochi, J. (2005). Young people's help-seeking for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ustralian e-Journal for the Advancement of Mental Health, 4(3), 1–34.

[10]Rosenberg, M. (1965).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1]Strauss, A., & Corbin, J. (1998).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2nd ed.). Sage.

[12]Vogel, D. L., Wade, N. G., & Hackler, A. H. (2007). Perceived public stigma and the willingness to seek counseling.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4(1), 40–50.

[13]Wang, H., & Chen, F.（2021）。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因素分析。**高教探索**，*(7)*，112–119。

[14]Wu, X.（2020）。大学生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关系研究。**高校辅导工作研究**，*10*(2)，34–41。

[15]Zhang, Y., Li, M., & Wang, L.（2023）。大一新生人际适应与心理健康关系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37(4)，289–295。

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现实问题及对策研究——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Research on Practical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hinese Adolescen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s

李盛银 泰国格乐大学国际学院教育系 邮箱:1349207404@qq.com

Li Sheng-yin, International College, Krirk University, Thailand. Email:1349207404@qq.com

摘要:随着社会转型与竞争加剧，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呈现低龄化、复杂化趋势，已成为关乎多方的重要议题。本研究以 11-18 周岁初高中学生为对象，通过文献研究、系统分析及问卷调查法（回收有效问卷 925 份，有效回收率 92.32%），实证探究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现状与困境。研究发现，当前教育在学校重视度、家长意识及青少年认同感上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学校教育针对性不足、家庭教养功利化、社会支持碎片化、青少年主体参与缺失等问题。基于此，本研究从“学校-家庭-社会-个人”四维协同视角，提出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学方法、转

变教养观念等优化对策，为完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提升教育实效、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提供实证参考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现实困境，协同对策，问卷调查

Abstract: With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increasing competition,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issues are showing trends of becoming younger and more complex, making them a crucial topic for multiple stakeholders. This study focuses on high school students aged 11-18 and employs literature review,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s (825 valid questionnaires returned, with a valid response rate of 92.32%) to empirically explore the current status and challenges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while there has been some progress in school attention, parental awareness, and adolescent engagement, issues remain, such as insufficiently targeted school education, utilitarian parenting approaches, fragmented social support, and lack of active participation from adolescent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four-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perspective of "school-family-society-individual," including enriching educational content,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changing parenting concepts.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provide empir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ystem, enhancing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and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Keywords: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Practical Challenges, Collaborative Strategies, Questionnaire Survey

1.引言

1.1 研究背景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包含思想、政治、道德、法纪及心理健康教育五大关联内容，其中心理健康教育对培育青少年积极心理品质至关重要。国家层面高度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2012年《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7年《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均将心理健康教育列为德育的五项内容内容之一，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关注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2023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与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也强调要普及心理健康教育，进一步凸显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关键作用。与此同时，社会转型进程中，快节奏生活与激烈竞争使青少年心理压力持续增大，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2021年《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我国17岁以下青少年儿童中3000万人受情绪及心理行为问题困扰；2023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蓝皮书》指出14.8%的青少年存在不同程度抑郁风险。在此背景下，本研究立足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框架，融合多学科理论，通过文献梳理与问卷调查，剖析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现状、问题及根源，探索优化路径，为相关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协同发展。

1.2 研究目的

（1）系统梳理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现状，明确学校、家庭、社会层面的实践成效与青少年个人的认知、态度特征；（2）精准识别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在学校、家庭、社会及个人层面存在的核心现实困境；（3）深入剖析困境产生的深层成因，厘清多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机制；（4）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个人”四维协同的优化对策体系，为提升教育实效性提供实践指导。

1.3 研究创新

本研究的创新点有二：一是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个人”四维协同框架，突破单一主体研究局限，通过大规模实证调查与系统分析，形成责任明晰、协同联动的对策体系，规避研究与实践的碎片化；二是深化跨领域融合，聚焦心理健康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路径，提出“以德育心、以心育德”协同育人模式，同时结合实证数据优化问卷设计与研究方法，丰富了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内容，又让结论与建议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破解教育实践困境提供新支撑。

1.4 名词释义

（1）青少年：参考国家政策文件《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指南》、《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与学术研究界定，结合研究实际需求，将青少年界定为 11-18 周岁的初高中学生群体。**（2）心理健康：**张大均、王鑫强（2012）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指出，“健康不仅是身体没有疾病，而是个体在身体、精神和社会适应上的完好状态。”肖海丽（2010）引述日本学者松田岩男的观点，从内外环境适配视角补充，心理健康既体现为个体对内部心理环境的稳定感知，也表现为以社会认可的方式适应外部环境的心理状态。总体而言，尽管不同国家、民族和学科对心理健康的界定存在差异，但已形成基本共识：心理健康是指个体在心理、生理和社会层面保持协调，并能够良好适应社会环境的一种状态。**（2）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自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在中小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以来，其内涵经历了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1994 年 8 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正式使用“心理健康教育”一词；1999 年 8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概念、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实施途径及师资队伍建设等作出了系统阐述，为深化心理健康教育内涵提供了重要政策依据。此后，“心理健康教育”作为规范称谓在各级各类政策文件中得到统一使用。

1.5 研究框架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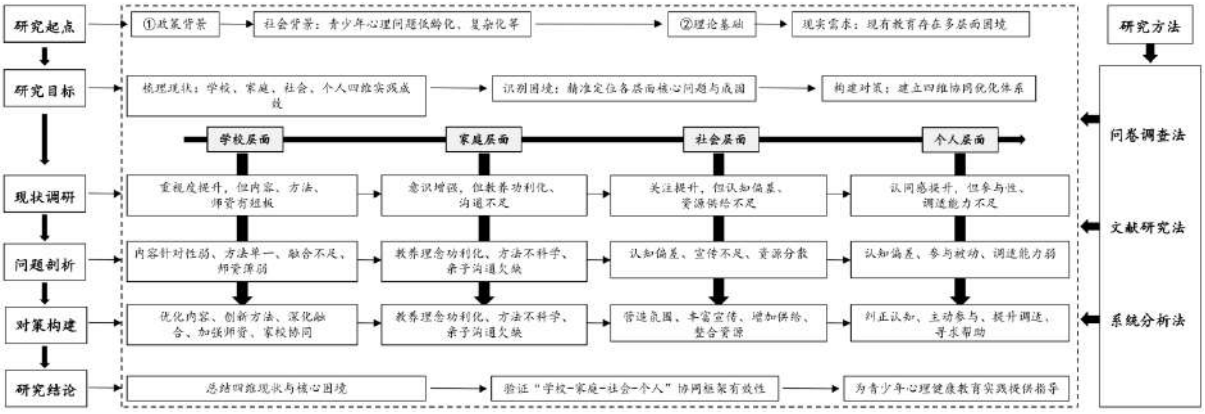


图 1:研究框架图
数据来源：本研究整理

2.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逐渐受到重视并不断深化。学者们通过研究与实践证明，心理健康教育对提高青少年心理素质、培养积极乐观的心理品质至关重要。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1）教育内容：依据《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 年修订）》，林崇德、俞国良（2013）指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需围绕学习辅导、人格辅导、生活辅导及升学择业辅导四大核心板块展开，并结合不同年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设置差异化内容。结合当前智慧教育平台的应用实践，王运乾（2025）提出应将数字化心理测评、线上团体辅导等内容纳入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以技术赋能推动个性化教育落地。**（2）教学方法与途径：**王海英、成伟（2010）认为，强调依托专门心理健康课程与学科渗透两大路径，凸显课堂主渠道作用。宋颖佳（2024）倡导项目化教学，通过完善资源、强化教师设计能力、建立科学评估体系提升实效，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实际成效。**（3）存在的问题：**宋献惠（2017）指出，部分学校仍受“应试至上”理念影响，过度侧重学生学业成绩提升，对心理健康教育重视不足，不愿投入充足的时间与资源开展相关工作。钟丹丹（2024）通过对N市高中的调研发现，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还存在区域发展不均、专业建设薄弱、基础设施不完善、课程流于形式、活动匮乏等问题。

2.1.2 家庭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1）存在的问题：赵宏玉（2022）分析了家长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三大误区：一是对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理解有偏差；二是过度自信，认为凭借自身能力即可解决子女心理问题，缺乏寻求专业帮助的意识；三是忽视子女的心理健康，缺乏主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识。韩彦荣、李玺彪（2023）指出，部分家长未能清晰认识自身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责任，导致家校协同效果不佳。**（2）教育方法与途径：**魏力强（2019）强调，家长应主动学习心理健康知识，了解子女的身心发展规律，调整教育期望与方法，开展科学的家庭教育。苏巧妙（2021）基于积极养育理念提出，家长应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采用民主型教养风格，与子女建立亲密、信任的亲子关系，以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

2.1.3 社会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1）政策研究：杨玉春（2023）强调，应通过优化政策、明确心理健康教师职称评定标准等方式，强化政策对师资队伍建设的支撑作用。戴斌荣、付淑英（2025）分析新时代普及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政策文件特点，指出政策制定已从教育部专项模式转向多部门联合与国家层面强化模式，但部分内容、队伍建设目标及协同要求尚未完全落实；**（2）实践路径：**范慧玲、徐志远（2020）从生态系统视角出发，提出社区应通过营造良好环境、完善基础设施、配备专业队伍和建立评估体系，发挥心理健康治理功能。郑艳芳、王丽（2024）强调，地方高校、共青团、妇联等社会机构应建立协同机制，开展公益性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为青少年营造健康的成长环境。

2.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发达国家的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起步较早，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2.1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现代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起源于美国，并逐步在欧洲和日本等地区得到了推广。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将心理辅导正式纳入学校体系，50 年代日本也开始推行心理辅导。如今，发达国家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已具多样化和专业化特点。在教育内容与目标方面，美国学者 Atkins、Hoagwood 与 Kutash（2010）认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应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围绕青少年的实际生活，教授社会适应技能，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英国学者 Lendrum、Humphrey 与 Wigeslworth 等（2013）的实验证明，提升青少年的积极行为与情绪幸福感能够有效提高学习动机和教育效果。

2.2.2 家庭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国外学者普遍强调家庭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关键作用，认为家长的教养方式和亲子关系质量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澳大利亚学者 Sanders、Mazzucchelli（2013）开展的“积极教养项目”表明，通过提升家长的计划能力、情绪管理和自律性，能够帮助青少年培养自律能力，促进其心理健康成长。英国学者 Rothon、Goodwin 与 Stansfeld（2012）的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亲子沟通和家长积极参与学校活动，不仅能提升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还能改善他们的学业表现；加拿大学者 Elgar、Craig 与 Trites（2013）也证实，良好的亲子沟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积极作用。

2.2.3 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融合

这种融合研究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雅典的道德课堂已经融入情感教育和生命价值观等内容，柏拉图的思想体现了心理与道德教育相结合的理念，而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进入近代，美国比尔斯提出了“心理健康”概念并推动了心理卫生运动，桑代克的《教育心理学概论》则确立了这一独立研究领域，推动了心理健康教育与公民教育的结合；同时，俄罗斯的公民教育也将社会心理教育纳入其中，帮助青少年更好地适应社会。

2.3 文献综述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指出学校和家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方法。在社会层面，虽然有政策分析，但缺乏实证研究。此外，国内研究多集中于高校大学生，青少年群体的研究相对较少。随着新问题和新政策的出现，需要更具针对性的对策。与我国起步较晚不同，国外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建立了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这些经验对我国有重要借鉴意义。尽管国外未专门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但他们将心理教育融入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中，注重青少年的综合素质发展。我国应结合国情吸收国外的成功经验，灵活调整以适应本土需求。

2.4 理论基础

2.4.1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Marx、Engels（1962）的相关论述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根本遵循，核心是“人以全面方式占有自身本质”，具体包括：一是劳动能力全面发展，需融合劳动与体智教育，培养坚韧意志（《资本论》）；二是社会关系充分发展，引导青少年构建和谐人际，在互动中实现心理成长（《德意志意识形态》）；三是个性自由全面发展，教育应尊重个体差异，关注独特心理需求（《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共产党宣言》）。

2.4.2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论述

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关注青少年身心健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9）收录的毛泽东相关论述中，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健康第一，学习第二”，强调体育与减负对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性；邓小平（1994）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明确“四有新人”培养目标，注重政治思想教育与体力、智力协同发展；江泽民（2006）在《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中呼吁家庭、社会协同参与，营造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氛围；胡锦涛（2016）在《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中提出“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将心理调适纳入思想政治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编著的《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及人民日报社（2016）相关报道显示，习近平倡导“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强调全社会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鼓励青少年培养顽强意志品质，为新时代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构建提供根本遵循。

2.4.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健康教育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心理健康智慧，为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提供重要借鉴：儒家方面，朱熹（2011）在《四书章句集注》阐释的“中庸之道”，助力青少年情绪调节与冲突应对;；杨伯峻（2010，2015）译注的《孟子》《论语》倡导的“自强不息”可强化心理韧性，“仁、礼、和”思想能促进人际和谐。道家方面，郭庆藩（2013）《庄子》的“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可帮青少年摆脱功利束缚、缓解压力；老子（2018）《道德经》“上善若水”的取向，能培育包容谦逊品格、改善人际关系。周煜（2018）的研究指出，佛家“慈悲为怀”契合现代“同理心”，可提升青少年共情能力，“因果业报”思想则引导其对行为负责、平和面对得失。

2.4.4 协同育人理论

源于系统科学协同论，核心是通过系统内各要素协同配合实现整体功能优化。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该理论强调心理健康成长是学校、家庭、社会、个人多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叶子青、叶一舵（2020）的研究表明，学校承担主阵地责任，需提供系统课程教学与心理辅导；苏巧妙（2021）提出，家庭发挥基础性作用，要以良好氛围、科学教养与有效沟通筑牢心理基础；阴国恩、曹瑞与徐丽（2014）认为，社会履行补充职能，应通过完善公共服务、营造氛围、供给资源提供支持。各主体通过沟通、合作与资源整合，形成“学校主导、家庭基础、社会支持、个人主动”的协同格局，凝聚教育合力。

3.研究方法与对象

3.1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通过搜索引擎收集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对收集的文献进行整理与汇总，提炼出主要观点，为论文撰写提供理论依据。**（2）系统分析法：**以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现状为基础，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以增强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3）问卷调查法：**根据文献中的代表性问题，设计涵盖学校、家庭、社会与个人四个方面的问卷，通过线上与线下方式发放，收集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现状的数据，为论文提供实证支持。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全国 11-18 周岁初高中青少年为对象，按地区（东中西部）、学校类型（城乡）、年级（初一至高三）分层抽样（见表 1），回收有效问卷 925 份。样本在性别、年级、来源地分布均衡：城市学生 70.81%、农村学生 29.19%，与我国城乡学生分布契合，代表性良好。

表 1:调查对象基本情况（N=925）

基本情况	类别	频数（n）	百分比（%）
性别	男	513	55.42
	女	412	44.58
就读年级	初一	163	17.56
	初二	167	18.25
	初三	93	10.15
	高一	171	18.47
	高二	156	16.76
	高三	175	18.81
来源地	城市	655	70.81
	农村	270	29.19

4.研究结果分析

4.1 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分析

4.1.1 学校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

在国家政策推动与社会关注下，学校日益重视心理健康教育（见表 2）。49.19%的学生表示学校“经常组织”相关活动，且通过思政课（67.50%）、心理健康教育课（61.08%）等多样化形式开展；83.58%的学生反映教师或班主任“经常谈心”或“偶尔谈心”，说明教师积极关注学生心理状况并提供心理支持。

表 2: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重视程度相关调查结果（N=925）

调查问题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你所在学校组织心理健康教育相关活动的频次是？	经常组织	455	49.19
	定期组织	211	22.81
	偶尔组织	259	27.99
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方式？（可多选）	思政课	625	67.57
	专家讲座	543	58.70
	主题班会	551	59.57

	心理健康教育课	564	61.08
	其他	193	22.01
老师或班主任找你谈心的频率？	经常谈心	493	53.30
	偶尔谈心	278	30.05
	很少谈心	154	16.65

4.1.2 家长的心理健康教育意识不断增强

家庭是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主体，家长教育意识直接影响教育效果（见表 3）。81.51%的家长认为家庭心理健康教育对子女“影响很大”或“有一定影响”，83.45%的家长“经常”或“偶尔”主动学习心理学知识，体现出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与参与积极性。但仅38.05%的家长认为自己是主要教育主体，49.08%依赖学校和教师，家长的责任认知仍需强化。

表 3:家长心理健康教育意识相关调查结果（N=925）

调查问题	选项	频数（n）	百分比（%）
家长认为心理健康教育的主体是？	家长	352	38.05
	学校和老师	453	49.08
	个人	120	12.96
家长认为家庭心理健康教育是否有影响？	影响很大	493	53.30
	有一定影响	261	28.21
	影响较小	123	13.30
	没有影响	48	5.19
家长主动学习心理学知识的频率是？	经常主动学习	547	59.13
	偶尔主动学习	225	24.32
	不怎么主动学习	153	16.54

4.1.3 青少年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认同感与接受度持续提升

随着心理健康教育的普及宣传，青少年对其认知、认同感与接受度持续提升（见表 4）。66.60%的青少年认为心理健康“非常重要”，26.60%认为“比较重要”，表明大多数青少年充分意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在心理健康教育对成长方面，27.02%的青少年认为其对成长“帮助很大”，65.30%认为“有一定帮助”，合计 92.32%，显示青少年高度认同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在主动参与意愿方面，61.62%的青少年表示“会”主动学习心理健康知识，24.54%表示“视具体情况而定”，仅 13.84%表示“不会”，表明大多数青少年愿意主动参与心理健康教育。

表 4:家长心理健康教育意识相关调查结果（N=925）

调查问题	选项	频数（n）	百分比（%）
你认为心理健康对个人是否重要？	非常重要	616	66.60
	比较重要	246	26.60
	不重要	63	6.80

你认为心理健康教育对成长是否有帮助？	帮助很大	250	27.02
	有一定帮助	604	65.30
	没有帮助	71	7.68
你会主动学习心理健康知识的意愿吗？	会	570	61.62
	不会	128	13.84
	视具体情况而定	227	24.54

4.2 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现实问题

4.2.1 学校教育层面：主阵地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1）教育内容针对性不足，薄弱环节突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内容虽覆盖面较广，但针对性不足、重点不突出，部分关键内容教育效果欠佳（见表 5）。青少年对“心理健康知识”获得感最强 79.13%，其次“情绪管理与人际交往”60.54%，但“压力管理与挫折教育”46.27%、“生命教育与心理危机应对”41.19%、“升学规划与未来择业”40.11%的获得感偏低，反映出学校教育内容未能有效对接青少年需求，难以满足其应对升学压力、挫折及心理危机的需求。

表 5:青少年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的获得感调查结果（N=925）

调查问题	教育内容	频数（n）	百分比（%）
在你所在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中，你主要从哪些内容里感受到了收获？（可多选）	心理健康知识	732	79.13
	情绪管理与人际交往	560	60.54
	自我认知与意识培养	538	58.16
	中学生常见的心理困惑及异常心理	472	51.03
	压力管理与挫折教育	428	46.27
	生命教育与心理危机应对	381	41.19
	升学规划与未来择业	371	40.11

（2）教学方法单一固化，互动性与吸引力不足。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仍以传统的讲授法为主，互动性不足，难以激发青少年的学习兴趣（见表 6）。59.29%的教师主要采用“讲授法”，通过单向灌输传授心理健康知识；仅 18.81%的教师使用“案例分析法”，14.48%采用“讨论法”，7.41%采用体验法或多媒体教学等互动方法。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未能充分考虑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和认知特点，难以契合青少年身心特点，影响教学效果与知识应用能力。

表 6:教师课堂教学方法调查结果（N=925）

调查问题	教学方法	频数（n）	百分比（%）
你所在学校的老师在课堂上主要采用哪种教学方法？	讲授法	548	59.24
	案例分析法	174	18.81
	讨论法	134	14.49
	其他	69	7.46

（3）融合渗透不够深入，与思政教育协同不足。调查显示（见表 7），69.95%的学生认为思政课能有效融入生命教育等心理健康相关内容，71.78%认为老师“深入挖掘教育意义”，

16.97%认为“一带而过”，11.25%表示“没留意过”。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在与心理健康教育结合上的不足，需要通过情感和理性并重的方式，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生命观。

表 7:思政课融入心理健康教育内容调查结果（N=925）

调查问题	选项	频数（n）	百分比（%）
挫折教育、心理调适等内容有效融入教材中？	结合很好	648	69.95
	结合一般	221	23.90
	结合较差	56	6.15
还是深入挖掘其教育意义？	深探教育意义	664	71.78
	一带而过	157	16.97
	没留意过	104	11.25

（4）师资队伍专业水平不足，支撑保障体系不完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存在数量不足、专业水平偏低、培训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严重制约教育实效（见表 8）。调查显示，67.77%的农村学校与 43.51%的城市学校存在心理教师缺口，部分岗位由班主任或思政教师兼任；现有心理教师中，仅 35.61%具备心理学相关专业背景，48.85%缺乏系统专业培训，难以匹配青少年多样化心理需求。此外，学校对师资培训机制缺位，教师专业发展受限；心理辅导室建设不完善、资源匮乏、利用率低，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表 8: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师资与设施情况调查结果（N=925）

调查维度	具体指标	选项	频数（n）	百分比
所在的学校心理教师数量怎么样？	农村学校心理教师数量	充足	87	32.22
		不足	183	67.77
	城市学校心理教师数量	充足	370	56.48
		不足	285	43.51
所在的学校心理教师专业背景如何构成？	心理教师专业背景	心理学相关专业	325	35.61
		非心理学相关专业	600	64.39
所在的学校心理教师师资培训怎么样？	心理教师接受系统培训情况	接受过系统培训	474	51.15
		未接受过系统培训	451	48.85
所在的学校心理教师心理辅导室建设如何？	心理辅导室设施配备	完善	318	34.38
		不完善	607	65.62
	心理辅导室利用率	高	233	25.19
		低	692	74.81

4.2.2 家庭教育层面：基础性作用存在短板

（1）教养理念功利化，重智轻德倾向明显。调查显示（见表 9），部分家长仍偏重于子女学习成绩，忽视心理健康与道德品质的培养，给青少年带来巨大心理压力。79.89%的家长最关注子女的“学习情况”，76.32%关注“身体健康”，仅 60.86%和 56.00%的家长关注“心理状况”和“道德品质”，明显低于对学习成绩和身体健康的关注。53.83%的家长认为学习成绩“很大程度上是”成才的决定因素，30.70%认为“一定程度上是”，合计 84.53%，显示大多数家长将成绩视为衡量成才的核心。这种功利化的教育观念导致家长对子女施加过大学业压力，忽视心理需求和个性发展，容易引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表 9:家长成才观与关注重点调查结果（N=925）

调查问题	选项	频数（n）	百分比（%）
家长比较关注你的哪些方面？（可多选）	学习情况	739	79.89
	身体健康	706	76.32
	心理状况	563	60.86
	道德品质	518	56.00
	其他	219	23.68
家长认为学习成绩是衡量将来能否成才的决定因素吗？	很大程度上是	498	53.83
	一定程度上是	284	30.70
	不完全是	143	15.45

（2）教育方法不当，缺乏针对性与科学性。部分家长缺乏科学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教育方式简单僵化，难以达成良好效果（见表 10）。22.92%的家长“能认识到但不改变”，10.80%的家长“不进行调整”；教育方式上，58.48%的家长以“苦口婆心讲道理”为主，缺乏互动与情感共鸣，仅 19.00%采用“宽严相济、以身作则”的科学方式。关于教育依据，19.13%的家长“参考书籍或网络建议”，14.81%的家长“听取亲朋好友意见”，未能结合孩子的个性特点进行教育，导致教育方式缺乏针对性。

表 10:家长心理健康教育方法调查结果（N=925）

调查问题	选项	频数（n）	百分比（%）
你觉得家长对自家的教育方式，调整情况是？	能认识到并付诸行动	613	66.27
	能认识到但不改变	212	22.92
	不进行调整	100	10.80
你家长平时教育你时，主要用哪种方式？	苦口婆心讲道理	541	58.48
	宽严相济、以身作则	176	19.00
	制定规则进行约束	138	14.95
	其他	70	7.56
你家长教育你时，做决定主要会参考什么？	夫妻共同商量	519	56.11
	参考书籍或网络建议	177	19.13
	听取亲朋好友意见	137	14.81
	其他	92	9.95

(3)亲子沟通不足，家庭氛围有待优化。良好的亲子沟通与和谐家庭氛围对青少年心理健康至关重要，但调查显示，部分家庭在这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调查显示（见表 11），21.00%的青少年表示与父母“很少沟通”，12.00%“沟通不畅”，主要原因“家长工作繁忙，缺乏沟通时间”42.15%、“沟通方式不当”31.35%和“家长不理解子女”26.70%。在家庭氛围方面，26.14%的青少年认为家庭氛围“不够和谐”，问题包括“父母争吵”、“情绪不稳”和“对子女过度批评指责”。缺乏有效的亲子沟通和不良家庭氛围使青少年难以获得情感支持，增加孤独、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的风险。

表 11: 亲子沟通与家庭氛围调查结果（N=925）（续下页）

调查问题	选项	频数（n）	百分比（%）
	经常沟通且顺畅	620	67.00

你和父母的沟通状态是？	很少沟通	195	21.00
	沟通不畅	110	12.00

表 11：亲子沟通与家庭氛围调查结果（N=925）（续上页）

调查问题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你觉得和父母沟通少/沟通不畅，主要是因为？（可多选）	家长工作繁忙，缺乏沟通时间	493	53.29
	沟通方式不当	290	31.35
	家长不理解子女的想法	247	26.70
你家的家庭氛围是？	非常和谐	432	46.70
	比较和谐	242	26.16
	不够和谐	251	27.14
如果家里氛围不够和谐，主要会有哪些表现？（可多选）	父母争吵	625	67.56
	家长情绪不稳定	423	45.72
	对子女过度批评指责	375	40.54

4.2.3 社会支持层面：补充性作用发挥不充分

(1)重视氛围尚未形成，社会认知存在偏差。尽管社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在提升，但普遍重视的氛围未形成，认知偏差仍存。调查显示（见表 12）：33.62%青少年认为社会对心理健康教育“重视一般”或“不重视”；32.43%感知到身边存在心理问题偏见（69.18%认为“有心理问题就是精神问题”，57.08%觉得“接受心理咨询很丢人”）。这类偏差让青少年遇心理困扰时回避求助、隐瞒问题，影响及时解决。

表 12：社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及认知调查结果（N=925）

调查问题（学生视角）	选项	频数（n）	百分比（%）
你觉得社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是？	非常重视	576	62.27
	重视程度一般	246	26.59
	不重视	65	7.03
	不清楚	38	4.11
你觉得身边的人存在心理问题歧视或偏见吗？	存在	300	32.43
	不存在	530	57.30
	不清楚	95	10.27
你认为人们对心理问题的常见错误看法有哪些？（可多选）	有心理问题就是精神问题	645	69.18
	接受心理咨询很丢人	528	57.08
	心理问题会自行好转	330	35.67

(2)宣传力度不足，科普内容质量不高。大众媒体在心理健康教育宣传中的作用未充分发挥，存在短板：调查显示（见表 13），仅 56.75%青少年“经常能看到”相关宣传，13.51%

“很少能看到”；63.35%认为媒体宣传的心理健康知识内容“过于理论化，缺乏针对性”，难以满足青少年的实际需求。在宣传形式方面，多以“文字、图片”为主，缺乏短视频、动画、互动游戏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力不足。

表 13：媒体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情况调查结果（N=925）（续下页）

调查问题	选项	频数（n）	百分比（%）
你看到媒体上心理健康内容的频率是？	经常能看到	525	56.75
	有时能看到	280	30.27
	很少能看到	125	13.51

表 13：媒体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情况调查结果（N=925）（续上页）

调查问题	选项	频数（n）	百分比（%）
你认为媒体心理健康宣传的实用性如何？	实用性强	234	25.3
	过于理论化，缺乏针对性	586	63.35
	内容准确且丰富	105	11.35
媒体宣传心理健康的主要形式有哪些？（可多选）	文字	665	71.89
	图片	554	59.89
	短视频	348	37.62
	动画	234	25.3
	互动游戏	96	10.38

(3)实践资源供给不足，资源整合效率低下。社会层面的心理健康教育实践资源供给不足，难以匹配青少年的多样化需求。调查显示（见表 14），51.13%的青少年表示本地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所“很少开展”心理健康实践活动，16.43%表示“不清楚”是否有相关活动；76.54%的青少年“希望”社会组织参与开展心理健康实践活动，实际供给与需求间的缺口较为明显。此外，社会资源整合效率偏低，学校、家庭、社区及专业心理机构缺乏有效协同，60.86%的青少年认为资源“分散、缺乏协同”，12.76%指出存在“重复建设”，资源配置的统筹性不足，影响了整体服务效能。

表 14：社会心理健康教育实践资源供给与整合情况调查结果（N=925）

调查问题	选项	频数（n）	百分比（%）
本地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所开展心理健康活动的频率是？	经常开展	185	19.45
	很少开展	465	51.13
	不开展	123	13.3
	不清楚	152	16.43
你是否希望社会组织参与心理健康教育？	希望	699	76.54
	不希望	51	5.51
	无所谓	175	18.92
社会各主体间心理健康资源的整合情况是？	协同良好，资源共享	196	21.3
	资源分散，缺乏协同	458	60.86
	存在重复建设	113	12.76
	不清楚	158	15.68

4.2.4 青少年个人层面：主体参与性与自我调适能力不足

（1）认知存在偏差，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解不全面。部分青少年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认知偏差削弱了其参与积极性：调查显示（见表 15），超 40%（32.64%+8.21%）“了解不多”或

“不了解”相关内容；超 42%认为其仅适用于“有心理问题”的群体，仅 55.67%正确认知到它面向“心理正常的人”。这种偏差让部分青少年觉得“自身无需参与”，主动参与性不强。

表 15：青少年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认知调查结果（N=925）（续下页）

调查问题	选项	频数（n）	百分比（%）
你对心理健康教育的了解程度是？	非常了解	160	17.3
	了解一些	387	41.83
	了解不多	302	32.64
	不了解	76	8.21

表 15：青少年对心理健康教育的认知调查结果（N=925）（续上页）

调查问题	选项	频数（n）	百分比（%）
你认为心理健康教育的适用对象是？	心理正常的人	515	55.67
	有心理问题的人	158	17.08
	有心理问题但无困扰的人	232	25.08
	不清楚	20	2.16

（2）主动参与性不强，对专业帮助存在抵触情绪。尽管多数青少年认可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但主动参与性待提升：调查显示（见表 16），超 38%（24.97%+14.05%）不会主动或视情况学习相关知识；遇心理困扰时仅 16.32%求助心理咨询中心，多选择亲友、老师或自我调节；42.05%因“担心被误解”抵触专业咨询，26.7%认为咨询无效，这些因素降低了专业求助意愿。

表 16：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参与意愿及求助方式调查结果（N=925）

调查问题	选项	频数（n）	百分比（%）
你会主动学习心理健康相关知识吗？	会	564	60.97
	不会	231	24.97
	视具体情况而定	130	14.05
当你遇到心理困扰时，通常会选择哪种方式求助？（可多选）	父母或家人	353	38.16
	学校老师	223	24.11
	同学或朋友	199	21.51
	心理咨询中心	151	16.32
	自我调节	447	48.32
	其他	51	5.51
如果对专业心理咨询有抵触，主要是因为什么？（可多选）	担心被他人误解	389	42.05
	认为心理咨询没有效果	247	26.7
	不知道如何寻求专业帮助	196	21.19
	费用过高	108	11.68
	对心理咨询师不信任	95	10.27

（3）自我调适能力不足，缺乏有效的应对方法。青少年面对压力、挫折等问题时自我调适能力不足：调查显示（见表 17），42.05%遇心理困扰“不知如何调节”，31.45%“缺乏挫折应对方法”且易生消极心态，26.59%“不知道如何妥善处理”；49.94%选择压抑情绪、超 39.78%逃避、33.94%沉迷网络等消极方式，反而可能加剧心理问题。

表 17：青少年自我调适能力及应对方式调查结果（N=925）（续下页）

调查问题	选项	频数（n）	百分比（%）
遇到心理困扰时，你的调节情况是？	能够有效调节	474	51.24
	不知道如何调节	389	42.05
	尝试调节但效果差	62	6.7
面对挫折时，你的应对能力是？	有有效的应对方法	530	57.29
	缺乏有效的应对方法	291	31.45
	容易产生消极心理	107	11.56
处理人际交往冲突时，你会？	能够妥善解决	651	70.37
	不知道如何妥善处理	246	26.59
	选择逃避	28	3.02

表 17：青少年自我调适能力及应对方式调查结果（N=925）（续上页）

调查问题	选项	频数（n）	百分比（%）
面对心理问题时，你通常会？（可多选）	逃避	368	39.78
	压抑情绪	462	49.94
	沉迷网络	314	33.94
	其他	81	8.75

4.3 加强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

4.3.1 学校：强化主阵地作用，提升教育实效

（1）优化内容体系，聚焦薄弱环节。结合青少年年龄特点与需求，构建精准化教育内容体系：夯实心理健康知识、情绪管理等基础内容并贯穿初高中全学段；针对压力管理、生命教育等薄弱领域，增加课时、实践活动及专业专题讲座；依据年级、性别、来源地差异设计个性化内容，如为高三学生开设升学心理辅导，为农村学生提供社交适应指导。**（2）创新教学方法，增强互动实效。**摒弃单一讲授模式，推广多元互动教学：通过真实案例分析培养问题解决能力；运用短视频、动画等多媒体手段具象化抽象知识；开展心理情景剧、户外拓展等体验式活动强化实践感知；结合思政课与综合实践课，组织志愿服务、心理科普等社会实践，实现理论与应用融合。**（3）深化融合渗透，构建协同育人格局。**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思政教育及德智体美劳各环节：推动思政课教师专业培训，挖掘教材心理教育元素，结合典型事迹开展生命教育与价值观教育，实现“以德育心、以心育德”；引导各学科渗透，如语文课堂培育共情能力、体育课堂锤炼坚韧意志；融入校园文化、劳动实践等载体，形成全方位教育生态。**（4）强化师资建设，完善支撑保障。**打造专业素养高、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按标准配齐专职心理教师，通过城乡交流、线上指导填补农村学校师资缺口；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教师考核并表彰先进；同步完善心理辅导室建设，配备专业设备与资源，建立心理档案，搭建线上服务平台，提供便捷隐秘的心理支持。**（5）搭建家校协同平台，凝聚教育合力。**健全家校沟通协作机制：定期举办家长学校，邀请专家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与科学教养方法；通过家长会、线上平台等多元渠道，精准反馈青少年心理状况，协同商议家庭情况与教育对策；组织亲子心理训练营、知识竞赛等互动活动，增进亲子沟通；明确家校责任分工，构建“学校主导、家庭配合”的协同育人格局。

4.3.2 家庭：夯实基础作用，优化教养环境

（1）转变教养理念，确立全面发展导向。摒弃功利化成才观，树立“健康第一、全面发展”理念：平衡学业与心理关注，避免过度施压；尊重个性差异与成长规律，设定合理期望；认知成才多元性，缓解学业焦虑，强化心理支持。**（2）提升教育能力，践行科学教养方法。**主动提升心理健康素养，通过多元途径夯实知识与调适技巧，把握青少年身心规律；采用民主平等教养模式，强化倾听鼓励；注重言传身教树立榜样；习得基础疏导技巧，提供情感支持。**（3）强化亲子沟通，营造和谐氛围。**统筹工作生活保障高质量陪伴，倾听青少年心声；优化沟通方式，平等回应表达；做好情绪管理维护家庭和睦；组织家庭互动活动增进情感联结。**（4）关注心理动态，对接专业支持。**监测青少年心理状态，识别问题信号并溯源；加强家校协同共商对策；严重问题及时求助专业机构；引导正确认知心理咨询，消除抵触。

4.3.3 社会：强化补充作用，构建支持网络

（1）营造良好氛围，纠正认知偏差。多媒体普及心理健康知识，纠正错误认知；挖掘正面案例传正能量；结合节点组织主题活动提升社会关注。（2）创新宣传形式，优化内容。聚焦青少年需求，宣传情绪管理等实用知识；采用短视频等喜闻乐见形式增强吸引力；支持专业机构发布权威科普内容。（3）增加资源供给，完善服务体系。公共文化场所设心理健康阅读专区并推广“阅读疗法”；推动社区建服务站配专业人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导资源下沉；开展实践活动提升青少年意志与适应力。（4）整合资源，建立协同机制。构建政府主导、多部门参与的协同机制，明确分工；推动校家社及专业机构资源共享互通；统筹城乡资源提升农村教育水平；建立全链条服务体系实现精准干预。

4.3.4 青少年：发挥主体作用，提升心理素养

（1）纠正认知偏差，科学认识心理健康教育。主动学习相关知识，明确心理健康的基础作用；认知教育普惠性，消除心理咨询抵触情绪，树立“主动求助即负责”的认知。**（2）增强主动性，提升心理素养。**通过课程、阅读掌握心理健康知识与调适技巧；参与心理讲座等活动；主动沟通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积极应对心理问题。**（3）提升自我调适能力，掌握应对策略。**学会情绪管理，运用多元方式宣泄情绪、调节心态；正确认知挫折，提升应对能力；提高人际交往能力，妥善处理冲突；合理规划时间，平衡学息缓解压力。**（4）构建支持系统，主动求助。**加强与父母、同学、老师沟通，建立支持网络；了解身边服务资源，遇难题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5.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全国 925 名 11-18 周岁初高中学生的实证调查，系统探究了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与困境。研究表明，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在学校重视度、家长意识及青少年认同感上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多维度突出问题：学校层面存在教育内容针对性不足、教学方法单一、与思政教育融合不深、师资专业水平欠缺等短板；家庭层面呈现教养理念功利化、教育方法不科学、亲子沟通不足等问题；社会层面存在认知偏差、宣传乏力、资源供给不足且整合低效的现象；青少年个人则表现出认知偏差、主动参与性不强、自我调适能力薄弱等问题。这些困境的核心成因在于学校、家庭、社会、个人四维主体间互动失衡，未能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制约了教育实效的提升。

5.2 研究建议

基于“学校-家庭-社会-个人”四维协同框架，为完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提出以下核心建议：学校需强化主阵地作用，优化个性化教育内容，创新互动式教学方法，深化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与家校协同；家庭应转变功利化教养理念，采用科学民主的教育方式，加强亲子沟通与和谐氛围营造，密切关注青少年心理状态并及时对接专业帮助；社会需营造正向认知氛围，创新科普宣传形式与内容，增加实践资源供给，建立多主体协同机制，统筹整合各类心理健康服务资源；青少年应主动纠正认知偏差，增强参与积极性，学习科学的心理调适技巧，构建个人支持系统，遇困扰时主动寻求专业帮助。同时，需强化政策保障与经费投入，建立“预防-预警-干预-救助”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四维主体协同联动，凝聚教育合力，促进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戴斌荣、付淑英（2025）。新时代普及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政策文件特点解析与落实建议。*中国德育*（09），24-29。doi:CNKI:SUN:DEYU.0.2025-09-003.

[2]范慧玲、徐志远（2020）。生态系统论视域下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治理。*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06），8-10。doi:CNKI:SUN:XXDJ.0.2020-06-004.

[3]韩彦荣、李玺彪（2023）。家校合作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促进作用研究。*成才之路*（28），137-140。doi:CNKI:SUN:CCZL.0.2023-28-036.

[4]王海英、成伟（2010）。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模式探析。*当代教育科学*（20），56-58。doi:CNKI:SUN:SDJK.0.2010-20-020.

[5]王运乾（202）。初探基于智慧教育平台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现状及有效性策略..(eds.)*第四届教育信息技术创新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p.627-630）..

[6]魏力强（2019）。浅谈未成年人的家庭心理健康教育。*甘肃教育*（21），32。

[7]肖海丽（2010）。*许、龚氏心理健康量表在湖南大学生中的信效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取自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10&filename=2010127716.nh

[8]阴国恩、曹瑞、徐丽（2014）。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一体化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心理与行为研究，12*（06）。

[9]杨玉春（2023）。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宜专人专用。*甘肃教育*（14），5。

[10]叶子青、叶一舵（2020）。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三十年:历史演进与未来走向。*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2）。

[11]张大均、王鑫强（2012）。心理健康与心理素质的关系:内涵结构分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8（03），69-74+174。取自 https://doi.org/10.13718/j.cnki.xdsk.2012.03.012.

[12]钟丹丹（2024）。*高中心理健康教育管理问题审视及对策分析*（硕士学位论文，东华理工

大学）。取自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2502e=102524694.nh

[13]赵宏玉（2022）。细数家庭心理健康教育的几个误区。*心理与健康*（06），26-27。

[14]郑艳芳、王丽（2024）。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协同育人体系构建研究。*教育实践与研究(C)*(Z1)，79-82。doi:10.14160/j.cnki.13-1259/g4-c.2024.z1.020.

[15]宋颖佳（2024）。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项目化教学实践中的问题与对策分析。*才智*(26)，113-116。doi:CNKI:SUN:CAIZ.0.2024-26-029.

[16]宋献惠（2017）。高中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08)，21-23。

[17]苏巧妙（2021）。积极养育理念下的家庭心理健康教育。*基础教育参考*(03)，74-77。

[18]人民日报(2016)。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人民日报*，(001)。

[19]周晨（2018）。**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健康思想研究。**西安：西安工程大学。

[20]林崇德、俞国良（2013）。**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 年修订）解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邓晓燕(2013)。**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21]邓小平（199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2]胡锦涛（2016）。**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3]江泽民（2006）。**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4]老子（2018）。**道德经。**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5]杨伯峻（2015）。**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26]杨伯峻（2010）。**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27]朱慕（2011）。**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9）。**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30]Atkins, M. S., Hoagwood, K. E., Kutash, K., et al. (2010). Toward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in schools.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in Mental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 Research, 37*(1-2), 40-47.https://doi.org/10.1007/s10488-010-0316-x

[31]Elgar, F. J., Craig, W., & Trites, S. J. (2013). Family dinners, communi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in Canadian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52*(4), 433-438. https://doi.org/10.1016/j.jadohealth.2012.11.005

[32]Lendrum, A., Humphrey, N., & Wigelsworth, M. (2013). Social and emotional aspects of learning (SEAL) for secondary schools: Implementation difficult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school-based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18*, 158-164. https://doi.org/10.1111/camh.12002

[33]Rothon, C., Goodwin, L., & Stansfeld, S. (2012). Family social support,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and educational outcomes: A longitudinal study in England of rural youth.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47*(5), 697-709. https://doi.org/10.1007/s00127-011-0422-3

[34]Sanders, M. R., Mazzucchelli, T. G. (2013). The promotion of self-regulation through parenting interventions.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16*(1), 1-17. https://doi.org/10.1007/s10567-013-0126-3

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对赴泰硕士研究生学业表现的影响——文化适应的中介与奖学金政策感知的调节

The Impact of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 Quality on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Chinese Master’s Students Studying in Thail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cholarship Policy Perception

马驰翔 泰国格乐大学国际学院 教育系 邮箱：28686311@qq.com

Ma Chi-xiang, International College, Krirk University, Thailand.Email:28686311@qq.com

摘要：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生态系统理论与期望理论，以 486 名赴泰硕士研究生为调研样本，系统探讨奖学金政策感知的边界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的四大维度（学术教学服务、后勤支持服务、跨文化服务、管理服务）均对赴泰硕士研究生学业表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文化适应三维度（心理适应、社会适应、学术文化适应）在二者关系中扮演部分中介角色，其中学术文化适应的中介效应最为突出；奖学金政策感知及其各维度（金额水平、申请公平性、发放稳定性、激励效果）对“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文化适应”路径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为泰国高校优化跨境教育服务供给与奖学金政策设计提供了实证支撑与理论参考。

关键词：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赴泰硕士研究生学业表现，文化适应，奖学金政策感知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Resource-Based Theory, Ecosystem Theory, and Expectancy Theory, this study employs a sample of 486 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Thailand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boundary moderating role of scholarship policy perception. Empirical findings reveal that all four dimensions of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 quality—academic teaching service, logistics support service, cross-cultural service, and management service—exert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s in Thailand.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ultural adaptation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social adaptation, and academic cultural adaptation) serve as partial mediators in this relationship, with academic cultural adaptation demonstrating the most salient mediating effect. Additionally, scholarship policy perception and its four dimensions (amount level, application fairness, payment stability, and incentive effect) positively moderate the path of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 quality ➞ cultural adaptation". This research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ai universities to optimize the provision of cross-border education services and the design of scholarship policies.

Keywords: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 service quality,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Thailand, Cultural adaptation, Scholarship policy perception

1. 研究背景

在经济全球化与教育国际化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跨境高等教育已成为培养国际化人才、推动全球知识共享的核心载体，呈现出“区域化集聚、学历层次提升、专业领域聚焦”的鲜明特征。东南亚地区凭借政策红利、成本优势以及地缘文化相近性，逐步崛起为全球新兴留学目的地。2022 年区域内国际生增速达到 8.7%，远超全球平均水平（UNESCO，2023）。作为东南亚跨境高等教育的重要枢纽，泰国依托“泰国 4.0”战略与“东盟高等教育区”建设规划，大力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跨境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据泰国高等教育委员会（HEC）2022 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当年泰国国际生规模已达 12.8 万人，其中硕士研究生占比 32%，且以年均 12.7%的速度增长，商科、公共卫生、旅游管理、工程技术等优势专业成为国际生申请的热门领域。

然而，跨境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的背后，一系列现实问题逐步凸显，制约了培养质量的提升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HEC（2022）专项调研数据显示，32%的赴泰硕士研究生存在论文延期、学分绩点偏低（低于 3.0/4.0）等学业困难问题，28%的学生明确反馈“文化融入困难”“教育服务针对性不足”。深入分析可知，核心矛盾集中于三个层面：一是教育服务适配性不足，部分高校课程设置与国际生知识背景重复率高，教师跨文化教学能力欠缺，科研指导针对性不强，难以满足硕士阶段“重科研、重实践”的培养需求；二是文化适应压力显著，国际生普遍面临心理孤独感、语言沟通障碍，尤其是对泰国高校的学术规范、教学模式适配困难，学术文化适应成为突出痛点；三是奖学金政策存在短板，现有奖学金普遍存在金额偏低、覆盖范围有限、申请流程不透明、发放稳定性不足等问题，难以有效发挥经济支持与激励导向作用。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直接制约了赴泰硕士研究生的学业表现提升，也影响了泰国跨境高等教育的品牌形象与国际竞争力。在此背景下，亟需通过系统性的实证研究，揭示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文化适应、奖学金政策感知与学业表现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为破解实践困境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动机

本研究的开展兼具实践驱动与理论填补的双重动机。

在实践层面，为精准把握赴泰硕士研究生的实际需求与困境，本研究前期开展了小规模预调研，覆盖泰国 3 所不同层级高校的 80 名赴泰硕士研究生。预调研结果显示，仅 38%的学生对高校提供的跨文化服务表示满意，58%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适应困扰，49%的学生认为奖学金的激励效果不足，且多数学生反映教育服务、文化适应与学业表现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但具体影响路径尚不清晰。这一结果进一步印证了开展系统性研究的现实必要性，亟需明确各变量间的作用机制，为实践优化提供精准方向。

在理论层面，现有跨境高等教育相关研究仍存在明显缺口，难以有效解释泰国场景下的特殊问题。其一，存在“链条断裂”缺口，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教育服务质量与学业表现、文化适应与学业表现等二元关系的验证，缺乏对三者及以上变量整合关系的探究，无法完整揭示影响学业表现的链式机制；其二，存在“边界空白”缺口，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政策感知类变量的调节作用，尤其是奖学金政策感知作为国际生重要的政策体验变量，其在教育服务质量与文化适应关系中的边界作用尚未得到验证；其三，存在“文化偏差”缺口，现有研究多基于欧美成熟留学市场或中国等生源国视角，相关结论难以直接套用于泰国这一具有独特文化特征（高集体主义、高权力距离、佛教文化影响）的新兴留学目的地，缺乏针对性的理论适配与实证检验。基于上述实践困境与理论缺口，本研究聚焦“赴泰硕士研究生”这一特定群体，整合多学科理论构建模型，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同时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3. 研究目的

基于上述研究动机，本研究的核心目的的可概括为以下五点：

第一，结合泰国跨境高等教育的场景特征，构建适配性强的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文化适应、奖学金政策感知与学业表现的多维度测量体系，提升变量测量的精准性与有效性。

第二，量化分析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总体及各维度对赴泰硕士研究生学业表现的直接影响效应，并明确各维度影响强度的差异，厘清核心驱动因素。

第三，系统揭示文化适应总体及各维度在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与学业表现之间的中介作用路径与内在机制，明确中介效应的强弱差异。

第四，深入分析奖学金政策感知总体及各维度对“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文化适应”影响路径的调节作用，界定影响链条的边界条件。

第五，基于实证研究结论，从高校服务优化、奖学金政策完善、学生个体发展三个层面，提出针对性、可操作的实践优化建议，为提升泰国跨境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科学支撑。

4. 研究综述

4.1 理论基础

资源基础理论：该理论由 Barney（1991）提出，核心观点是组织拥有的异质性资源是其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来源。在跨境高等教育场景中，泰国高校提供的跨境高等教育服务（学术教学、后勤支持、跨文化服务等）属于异质性资源，能够直接满足国际生的学术学习需求（如科研指导、课程教学）与非学术需求（如生活保障、语言支持），帮助学生降低学习成本、提

升学习效率，进而直接促进学业表现的提升。这一理论为解释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对学业表现的直接影响效应提供了坚实支撑。

生态系统理论：Bronfenbrenner 等（2006）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的发展是其与所处环境系统动态互动的结果，微系统中的资源能够通过促进个体与环境的适配性，间接影响个体的发展结果。在本研究中，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属于国际生学习生活微系统中的重要资源，其不仅能直接影响学业表现，还能通过促进国际生与泰国文化环境、教育环境的适配（即文化适应），缓解文化冲突带来的心理压力与学业干扰，为学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这为文化适应在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与学业表现之间的中介作用提供了核心理论依据。

期望理论：Vroom（1964）的期望理论认为，个体的动机水平与行为选择取决于其对行为结果的预期，当个体感知到某一政策或环境因素能够带来正向收益时，会更主动地采取目标导向行为。在本研究中，奖学金政策感知作为国际生对政策支持的主观认知，能够调节其学习动机与适应意愿。当学生感知到奖学金金额充足、申请公平、发放稳定且激励有效时，会更主动地利用高校提供的教育服务资源，积极参与文化适应活动，进而强化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对文化适应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会降低参与积极性，削弱教育服务的效果，这为奖学金政策感知的调节作用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4.2 核心概念界定

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借鉴 Parasuraman 等（1988，2005）提出的 SERVQUAL 服务质量评估模型，结合泰国跨境高等教育实践特征，将其界定为泰国高校为国际硕士研究生提供的学术教学、后勤支持、跨文化适配及管理保障等服务的综合水平，具体划分为学术教学服务、后勤支持服务、跨文化服务与管理服务四大维度。

文化适应：基于 Ward 等（1999，2001）提出的文化适应三维模型，结合泰国文化语境与硕士教育培养特点，将其界定为国际生在泰国学习生活过程中，在心理接纳、社会融入与学术规范适配三个层面的适应过程，具体包含心理适应、社会适应与学术文化适应三个维度。Fanari（2025）基于文化适应理论的最新研究亦支持这一维度划分的合理性。

奖学金政策感知：参照 Chen 等（2019）与李梅等（2023）的研究成果，将其界定为赴泰硕士研究生对泰国政府及高校出台的奖学金政策在金额标准、申请流程、发放机制与激励效果等方面的主观认知与评价，具体划分为金额水平、申请公平性、发放稳定性与激励效果四大维度。

学业表现：结合泰国硕士教育“重学术实践、重科研能力”的培养导向，借鉴 Li 等（2021）与 Smith 等（2022）的维度划分方法，将其界定为国际生在硕士阶段的综合学习成果，具体涵盖核心课程成绩、学术任务完成质量、专业技能提升程度与毕业达标信心四个维度。

5 研究假设

5.1 直接效应假设

教育服务质量是影响国际生学业表现的核心因素（Marzo-Navarro 等，2020；陈宇红，2021）。优质的学术教学服务能直接提升学生的知识储备与科研能力；后勤支持服务能降低生活压力，保障学习专注度；跨文化服务能缓解文化冲突，减少学业干扰；管理服务能提升办事效率，节约时间成本。因此，提出假设：

H1：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总体对赴泰硕士研究生学业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a：学术教学服务对赴泰硕士研究生学业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b：后勤支持服务对赴泰硕士研究生学业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c：跨文化服务对赴泰硕士研究生学业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1d：管理服务对赴泰硕士研究生学业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5.2 中介效应假设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环境资源通过促进个体与环境的适配性间接影响发展结果（Bronfenbrenner 等，2006）。优质的教育服务能为国际生提供文化适应的支持条件：学术教学服务帮助学生适配泰国高校的教学模式与学术规范（学术文化适应）；跨文化服务提供语言培训与文化指导，促进社交互动（社会适应）与心理接纳（心理适应）；后勤与管理服务保障生活与行政事务顺畅，缓解心理压力（心理适应）。而文化适应的提升能减少学业干扰，提升学习效率，进而促进学业表现（Ward 等，1999；Zhang 等，2011）。因此，提出假设：

H2：文化适应总体在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与赴泰硕士研究生学业表现之间起中介作用；

H2a：心理适应在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与赴泰硕士研究生学业表现之间起中介作用；

H2b：社会适应在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与赴泰硕士研究生学业表现之间起中介作用；

H2c：学术文化适应在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与赴泰硕士研究生学业表现之间起中介作用；

5.3 调节效应假设

期望理论认为，高奖学金政策感知能提升个体的动机与行为积极性（Vroom，1964）。当赴泰硕士研究生感知到奖学金金额充足、申请公平、发放稳定且激励有效时，会更主动地利用高校提供的教育服务资源（如参与语言培训、科研指导、文化活动），进而加速文化适应进程。反之，低奖学金感知会降低学习与适应动机，削弱教育服务质量对文化适应的促进作用。因此，提出假设：

H3：奖学金政策感知总体对“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文化适应”路径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H3a：金额水平对“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文化适应”路径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H3b：申请公平性对“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文化适应”路径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H3c：发放稳定性对“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文化适应”路径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H3d：激励效果对“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文化适应”路径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6 理论模型

本研究构建的模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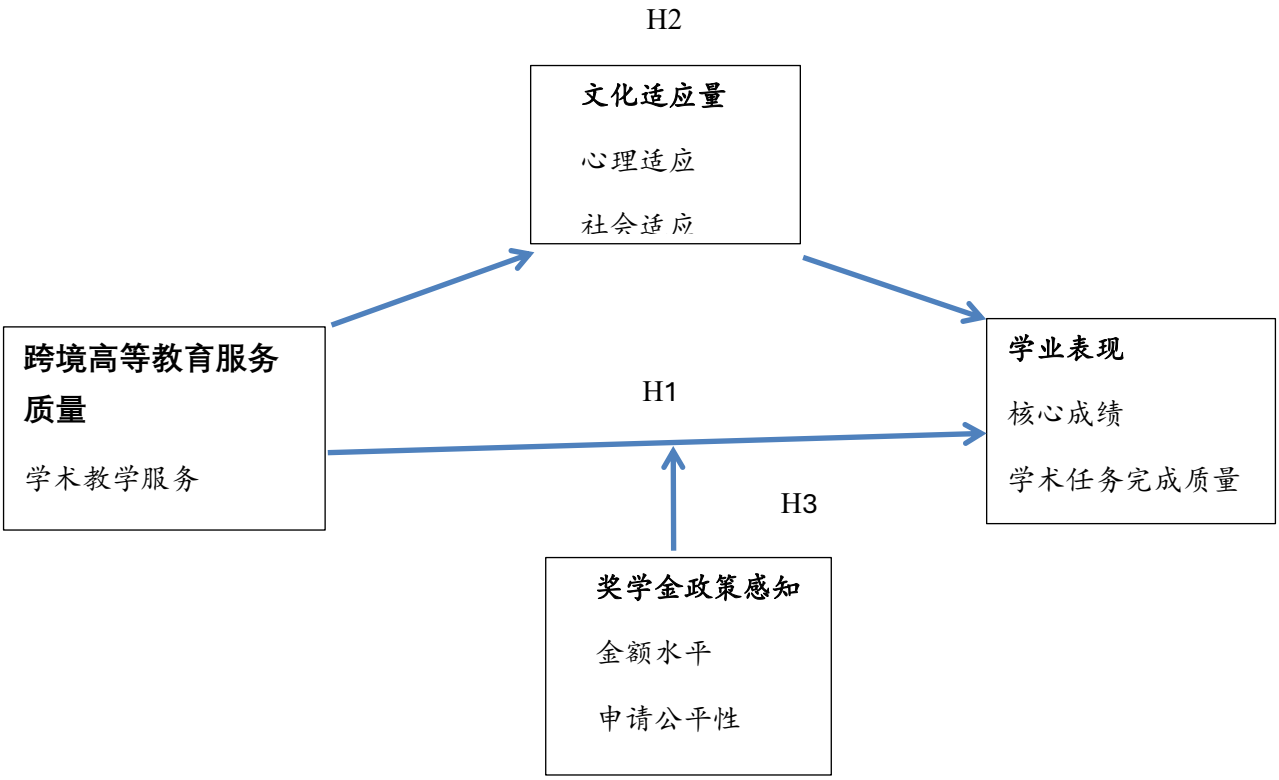


图 1

7. 研究设计

7.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抽样与便利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泰国顶尖高校（朱拉隆功大学）、私立高校（泰国格乐大学、易三仓大学）与地方高校（清迈大学、孔敬大学）的赴泰硕士研究生作为调研对象。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6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486 份，有效回收率为 81.0%。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如下：性别方面，女性 254 人（52.3%），男性 232 人（47.7%）；专业分布方面，商科 170 人（35.0%），公共卫生 97 人（20.0%），旅游管理 122 人（25.1%），工程技术 97 人（20.0%）；入学时长方面，1–2 年 365 人（75.1%），2 年以上 121 人（24.9%）；语言水平方面，基础薄弱 68 人（14.0%），中等 257 人（52.9%），良好及以上 161 人（33.1%）。样本结构

与泰国赴泰硕士研究生的总体分布特征基本一致（HEC，2022；Tran，2023），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7.2 量表设计

所有核心变量量表均基于现有成熟量表修订，结合泰国跨境高等教育场景进行文化适配性调整，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

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量表（34 题）：含学术教学服务（10 题）、后勤支持服务（8 题）、跨文化服务（10 题）、管理服务（6 题）；

文化适应量表（18 题）：含心理适应（6 题）、社会适应（5 题）、学术文化适应（7 题）；

奖学金政策感知量表（14 题）：含金额水平（4 题）、申请公平性（4 题）、发放稳定性（3 题）、激励效果（3 题）；

学业表现量表（16 题）：含核心成绩（5 题）、学术任务完成质量（4 题）、专业技能提升（4 题）、毕业达标信心（3 题）。

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各核心变量及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介于 0.765-0.862 之间，组合信度（CR）介于 0.795-0.879 之间，均满足 0.7 以上的临界标准（Hair 等，2019）；探索性因子分析（EFA）结果显示，KMO 值=0.892，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χ^2=7892.341（p<0.001），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提取的 14 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为 72.36%，各题项因子载荷量介于 0.6320.847 之间；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显示，模型拟合指标 χ^2/df=2.341、RMSEA=0.052、CFI=0.938、TLI=0.929、NFI=0.917，均达到理想适配标准（Hu 等，1999），各维度平均方差提取值（AVE）介于 0.531-0.628 之间，且（AVE）平方根均大于维度间相关系数，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收敛效度与判别效度。

7.3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26.0 与 AMOS24.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与 Pearson 相关分析呈现样本特征与变量间关联；其次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信效度；再次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检验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对学业表现的直接效应；通过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5000 次）检验文化适应的中介效应（Hayes，2013）；最后通过分层回归分析与多群组分析检验奖学金政策感知的调节效应（温忠麟等，2014）。

8. 研究结果

8.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总体均值为 3.72（SD=0.68），文化适应总体均值为 3.58（SD=0.71），奖学金政策感知总体均值为 3.42（SD=0.75），学业表现总体均值为 3.69（SD=0.65），各变量得分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与学业表现（r=0.548，p<0.001）、文化适应（r=0.526，p<0.001）均呈显著强正相关；文化适应与学业表现呈显著强正相关（r=0.587，p<0.001）；奖学金政策

感知与文化适应呈显著中等正相关（r=0.423，p<0.001）。各变量间相关系数均介于 0.328–0.587 之间，未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VIF值均<3），为后续假设检验奠定了良好基础（Hair 等，2019）。如表 1 所示：

表 1：四个变量之相关性分析摘要表

变量	均值（M）	标准差（SD）	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	文化适应	奖学金政策感知	学业表现
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	3.72	0.68	1			
文化适应	3.58	0.71	0.526***	1		
奖学金政策感知	3.42	0.75	0.389***	0.423***	1	
学业表现	3.69	0.65	0.548***	0.587***	0.415***	1

注：*p＜0.05 **p＜0.01 ***p＜0.001.

8.2 假设检验结果

直接效应检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模型拟合指标 $\chi^2/df=2.413$、RMSEA=0.054、CFI=0.932、TLI=0.923，符合模型适配标准（Hu 等，1999）。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总体对学业表现的直接效应显著（β=0.387，p<0.001），支持 H1；各维度对学业表现的直接效应均显著：学术教学服务（β=0.215，p<0.001）、跨文化服务（β=0.156，p<0.001）、后勤支持服务（β=0.132，p<0.01）、管理服务（β=0.108，p<0.05），其中学术教学服务的影响强度最大，H1a-H1d 均得到支持，这与 Marzo-Navarro 等（2020）对高等教育服务质量维度效应的研究结论一致。

中介效应检验：Bootstrap 检验结果显示，文化适应总体的中介效应值为 0.253（95% CI=[0.198,0.312]），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支持 H2；心理适应（效应值=0.078，95% CI=[0.042,0.115]）、社会适应（效应值=0.065，95% CI=[0.031,0.102]）、学术文化适应（效应值=0.110，95% CI=[0.073,0.151]）的中介效应均显著，且学术文化适应的中介效应最强，H2a-H2c 得到支持；维度特异性中介路径中，学术教学服务→学术文化适应→学业表现（效应值=0.098，95% CI=[0.056,0.143]）、跨文化服务→心理适应→学业表现（效应值=0.052，95% CI=[0.023,0.085]）、跨文化服务→社会适应→学业表现（效应值=0.047，95% CI=[0.019,0.078]）的路径均显著，H2d-H2f 得到支持，这一结果补充了 Zhang 等（2011）对文化适应维度特异性中介效应的研究发现。

调节效应检验：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与奖学金政策感知主效应后，二者的交互项对文化适应的回归系数显著（β=0.187，p<0.001），$\Delta R^2=0.032$（p<0.001），支持 H3；各维度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激励效果（β=0.136，p<0.001）、金额水平（β=0.123，p<0.001）、发放稳定性（β=0.105，p<0.01）、申请公平性（β=0.098，p<0.01），H3a-H3d 得到支持。多群组分析结果显示，高奖学金感知组（M+1SD）“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文化适应”路径系数（β=0.612，p<0.001）显著高于

低奖学金感知组（M-1SD）（β=0.345，p<0.01），两组路径系数差异显著（$\Delta\chi^2$=18.762，Δdf=4，p<0.001），进一步验证了调节效应，与 Chen 等（2019）关于奖学金政策感知调节作用的研究结论形成呼应。

9. 讨论与启示

9.1 研究发现的理论阐释

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对学业表现的直接效应验证了资源基础理论，学术教学服务的最强影响凸显硕士阶段“学术导向”特征，与 Marzo-Navarro 等（2020）、陈宇红（2021）的研究结论一致。其中，学术教学服务的影响强度最大（β=0.215），这与硕士阶段“学术导向”的培养目标密切相关：课程设计的适配性、教师的跨文化教学能力、科研项目的指导质量，直接决定学生的知识储备与科研能力，进而影响学业表现；管理服务的影响强度最小（β=0.108），但仍显著，说明高效的行政服务能降低非学术压力（如减少办事流程繁琐带来的时间浪费），为学业专注创造条件。这一结果提示泰国高校应优先强化学术教学服务，同时兼顾后勤、跨文化与管理服务的协同优化。

文化适应总体及各维度的中介效应均显著，验证了生态系统理论的核心观点：教育服务质量通过促进个体与环境的适配性间接影响学业表现（Bronfenbrenner 等，2006）。其中，学术文化适应的中介效应最强（0.110），这与泰国硕士教育“重实践、重科研”的特征相关：学生对泰国高校教学模式（如案例教学、小组合作）、学术规范（如论文写作格式、科研伦理）的适配程度，直接影响课程学习与科研任务的完成质量；心理适应与社会适应的中介效应较弱但显著，说明情绪接纳（心理适应）与社交融入（社会适应）能缓解文化冲突带来的心理压力，减少学业干扰，间接支持学业表现。维度特异性中介路径显示，学术教学服务主要通过学术文化适应发挥作用，跨文化服务主要通过心理适应与社会适应发挥作用，这为泰国高校提供了精准的服务优化方向。完善了文化适应维度异质性的研究（Ward 等，2001；Fanari，2025）。

奖学金政策感知总体及各维度对“教育服务质量→文化适应”路径的调节效应显著，符合期望理论的预测（Vroom，1964）。高奖学金感知能提升学生的学习与适应动机：当学生感知到奖学金金额充足、申请公平、发放稳定且激励有效时，会更主动地利用高校提供的教育服务资源（如参与学术讲座、语言培训、文化活动），进而加速文化适应进程；反之，低奖学金感知会降低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削弱教育服务质量的促进作用。其中，激励效果的调节效应最强（β=0.136），表明奖学金的“动机激发”功能比单纯的经济支持更重要；金额水平的调节效应显著（β=0.123），反映出国际生的经济压力对适应行为的影响（Chen 等，2019；李梅等，2023）——充足的奖学金能缓解经济负担，使学生更专注于学习与适应。

9.2 实践启示

对泰国高校的启示：第一，优化学术教学服务，筑牢学业发展核心基础。一方面，提升教师的跨文化教学能力，针对国际生的知识背景与语言水平，调整课程内容与教学节奏，增加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的比重，增强课程适配性；另一方面，强化科研指导服务，为每位硕士研究生配备专属科研导师，建立常态化的科研指导机制，提供科研项目参与机会、论文写作指导与学术规范培训，助力学生提升科研能力。第二，完善跨文化支持体系，破解文化适应困境。增

加泰语/英语学术沟通培训的课时与频次，开设泰国文化专题课程，帮助学生了解泰国的文化习俗与学术文化；定期组织跨文化交流活动（如文化体验日、师生座谈会、国际生沙龙等），搭建国际生与泰国师生、当地居民的交流平台，帮助学生建立多元社交网络，缓解心理孤独感，提升社会适应与心理适应水平。第三，提升后勤与管理服务效率，降低非学术压力。进一步改善教学设施（如图书馆、实验室的资源配置、信息化水平）与生活保障条件（如学生宿舍的居住环境、餐饮服务）；简化行政办事流程，建立线上服务平台，实现信息查询、材料提交、问题投诉等功能的线上化处理，提升信息透明度与投诉处理效率，为学生节约时间成本。

对泰国政府与高校奖学金政策的启示：第一，合理提升奖学金金额水平，强化经济保障作用。参考泰国的生活成本与学费标准，科学测算奖学金金额，适当提高奖学金覆盖率与发放标准，重点向学术表现优异、经济困难的学生倾斜，缓解国际生的经济压力，让学生能够更专注于学习与适应。第二，保障申请公平性与发放稳定性，提升政策可信度。公开奖学金的申请条件、评审标准、评审流程与评审结果，建立透明、公正的评审机制，接受学生监督；建立奖学金专项保障资金，确保奖学金按时足额发放，避免因资金延迟或短缺影响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第三，强化奖学金的激励效果，发挥动机激发功能。将奖学金评定与学业表现、文化适应参与度、科研成果等挂钩，设置“学术优秀奖”“文化适应之星”“科研创新奖”等专项奖励，增强奖学金的激励导向；定期表彰获奖学生，宣传优秀事迹，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充分发挥奖学金的动机激发作用。

对赴泰硕士研究生的启示：第一，主动利用教育服务资源，提升自身学术能力。积极参与课程学习、科研指导、学术讲座等活动；主动向导师请教科研问题，充分利用高校提供的教学设施与学术资源，针对性提升专业知识储备与科研能力；主动参与语言培训与跨文化服务活动，提升泰语/英语沟通能力，为学术交流与文化融入奠定基础。第二，加快文化适应进程，主动融入当地环境。主动了解泰国的文化习俗、学术规范与社会规则，尊重当地文化差异；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活动，主动与泰国师生、当地居民建立社交关系，缓解心理孤独感，提升社会适应与心理适应水平；快速适配泰国高校的教学模式与学术要求，提升学术文化适应能力，减少学业干扰。第三，充分发挥奖学金的激励作用，制定科学学业规划。以奖学金为激励目标，结合自身情况制定明确的学习与科研计划，合理安排学习时间，提升学习效率；主动关注奖学金政策信息，按照要求准备申请材料，积极参与奖学金评定；将奖学金作为学业发展的助力，合理规划资金使用，保障学习与生活的稳定。

10.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10. 1 研究不足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上述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完善。第一，样本代表性存在局限。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与便利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样本，虽然覆盖了泰国三类不同层级的高校与热门专业，但样本仍集中于国际生规模较大的高校与城市，未能完全涵盖泰国所有地区、所有类型的高校，可能存在选择偏差，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验证。第二，数据来源存在单一性。本研究的所有数据均来自赴泰硕士研究生的自我报告，尽管通过 Harman 单因子检验、CMV 因子法等多种方法控制了共同方法偏差，但仍可能存在主观评价偏差（如学生可能高估自身的学业表现），影响数据的客观性。第三，变量测量存在一定局限。学业表现的测量以主观评价为主，缺乏客观数据（如学校行政记录的 GPA、论文成

绩、科研成果等）的交叉验证，测量的全面性与客观性有待进一步提升；部分变量的题项设置虽经过预调研优化，但仍可能受文化差异影响，存在一定的测量偏差。第四，研究视角存在局限性。本研究未考虑个体差异变量（如性格特质、学习动机、留学目的、原生文化背景等）对模型路径的影响，调节变量的覆盖不够全面，难以完整揭示影响学业表现的复杂机制。第五，研究设计存在局限。本研究采用横截面研究设计，仅能揭示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与静态机制，无法揭示变量间的长期动态关系，难以验证因果效应的稳定性。

10.2 未来展望

针对本研究的不足，后续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第一，优化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扩大调研范围，涵盖泰国更多地区、更多类型的高校（如理工科特色高校、艺术院校等）与专业，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提升样本代表性；结合客观数据（如学校行政记录的 GPA、论文成绩）与多源评价（如导师评价、同伴评价），弥补自我报告数据的局限性，提升数据客观性。第二，拓展变量维度与模型体系。引入性格特质、学习动机、留学目的、原生文化背景等个体差异变量作为调节变量或控制变量，构建更全面、更复杂的理论模型，完整揭示学业表现的影响机制；增加对其他政策工具（如签证便利政策、就业支持政策、住宿保障政策等）的研究，探讨多政策工具的协同作用。第三，创新研究方法与设计。采用追踪研究设计，对赴泰硕士研究生进行为期 2–3 年的纵向调研，动态分析跨境高等教育服务质量、文化适应与学业表现的长期关系，验证因果效应的稳定性；运用跨层次模型（HLM）分析高校层面变量（如学校排名、师资水平）与个体层面变量的交互作用。第四，研究场景延伸：将研究模型应用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的跨境教育场景，进行跨文化对比研究，检验模型的普适性。第五，实践应用深化：与泰国高校合作开展干预研究，根据本研究结论设计具体的服务优化方案与奖学金政策调整措施，通过准实验研究验证干预效果，为跨境高等教育质量提升提供更直接的实践指导。

参考文献

[1] 陈宇红（2021）。东南亚来华留学生教育服务质量对学业表现的影响——文化适应的中介作用。*高校教育管理*，15(3)，102-111。

[2] 抖音研究院（2025）。2025 年国际生奖学金政策与留学质量发展报告[R]。北京：抖音研究院。

[3] 李梅，赵鑫，刘晓燕（2023）。奖学金政策感知对国际生学习动机的影响——基于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教育发展研究*，43(12)，34-41。

[4] 泰国高等教育委员会（HEC）（2022）。2022 年泰国跨境高等教育发展报告[R]。曼谷：HEC。

[5] 王磊，陈思宇（2024）。国际生学习动机与学业表现的关系研究——文化适应的调节作用。*外国教育研究*，51(3)，56-68。

[6] 温忠麟，叶宝娟（2014）。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2(5)，731-745。

[7] 张颖，刘敏（2018）。泰国国际生文化适应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比较教育研究*，40(7)，76-83。

[8] Barney J B. (1991).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7(1), 99-120.

[9] Bronfenbrenner U, Morris P A. (2006). *The ecology of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M]. New York, USA: Guilford Press.

[10] Chen Y, Zhao H. (2019). The impact of scholarship policy perception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 41(5), 489-504.

[11] Fanari M. (2025). Cultural adaptation theory: New insights into cross-cultural transition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6, 1656033.

[12] Hair J F, Black W C, Babin B J, et al. (2019).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M]. 7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USA: Pearson Prentice Hall.

[13] Hayes A F. (2013).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M]. New York, USA: Guilford Press.

[14] Hu L T, Bentler P M. (1999).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J].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6(1), 1-55.

[15] Li M, Wang Y, Liu J. (2021). How does educational service quality affec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cademic success? The chain mediating role of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J]. *Current Psychology*, 40(12), 6543-6554.

[16] Marzo-Navarro M, Pedraja-Iglesias M, Rivera-Torres P. (2020). Service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34(6), 1123-1141.

[17] Parasuraman A, Zeithaml V A, Berry L L. (1988). SERVQUAL: A multiple-item scale for measuring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service quality [J]. *Journal of Retailing*, 64(1), 12-40.

[18] Parasuraman A, Zeithaml V A, Malhotra A. (2005). E-S-QUAL: A multiple-item scale for assessing electronic service quality [J].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7(3), 213-233.

[19] Sirikulchayanonta C, Tananuraksakul V. (2014). Service quality i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Thai universities [J].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15(3), 417-428.

[20] Smith K, Jones S, Brown T. (2022). Academic service quality and postgraduate academic performance: A cross-cultural study [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47(8), 1654-1669.

[21] Tran L T. (2023).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in Southeast Asia: Trend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J]. *Higher Education*, 85(4), 897-915.

[22] Vroom V H. (1964). *Work and motivation* [M]. New York, USA: Wiley.

[23] Ward C, Bochner S, Furnham A. (2001). *The psychology of culture shock* [M]. London, UK: Routledge.

[24] Ward C, Kennedy A. (1999). Acculturation strategies,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nd sociocultural competence during cross-cultural transitio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3(4), 693-712.

[25] Zhang L, Zhou H, Lin X. (2011).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integra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1(2), 113-130.

中国高校艺术类学生审美能力对就业竞争力的影响：心流体验的中介作用

The Impact of Aesthetic Ability on Employability among Art Student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Flow Experience

李博诗 泰国格乐大学国际学院教育系 邮箱：371201282@qq.com

LI BO-SHI, International College, Krirk University, Thailand.Email: 371201282@qq.com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审美能力与心流体验对中国高校艺术类学生就业竞争力之影响，并探讨心流体验在审美能力与就业竞争力之间是否具有中介效应。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从中国福建省 6 所高等职业院校和 6 首本科院校抽取 1112 名艺术类专业学生作为正式样本，并运用审美能力量表、心流体验量表、就业竞争力量表对研究对象发放正式问卷。依据本研究的有效数据采用 SPSS29.0 软件对资料进行分析以及假设检定。研究结果发现：审美能力对就业竞争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审美能力对心流体验有显著正向影响，心流体验对就业竞争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心流体验在审美能力与就业竞争力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本研究为教育管理人员、艺术类教育工作者及高校美育课程改革提供相关建议。

关键词：审美能力，就业竞争力，心流体验，艺术类学生，中介效应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aesthetic ability and flow experience on the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of art student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flow experience has a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aesthetic ability and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A total of 1112 art students from 6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6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in Fujian Province, China,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formal sample. Formal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the participants using the Aesthetic Ability Scale, the Flow Experience Scale, and the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Scale. SPSS 29.0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and conduct hypothesis testing based on the valid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esthetic a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aesthetic a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low experience, and flow experien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Flow experience has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aesthetic ability and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This study provides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ors, art educators, and the reform of aesthetic education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Keywords: Aesthetic ability,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flow experience, art students, mediating effect

1．引言

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大学生的培养与发展日益重视。大学生不仅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更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因此，其就业问题不仅关乎个人的成长与职业发展，也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和谐程度。在这一背景下，提升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已成为各国政府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艺术类大学生因其专业特性，在就业市场中面临着更为特殊的挑战。他们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还需具备较高软实力，以便更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文化创意产业和艺术行业的需求。因此，审美能力和心流体验与就业竞争力的关系值得研究。

就业竞争力被定义为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中战胜竞争对手并获取职业发展的能力，这不仅包括基础技能如语言表达和人际交往能力，还涵盖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及适应复杂环境的能力(顾盈盈, 2012)。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报告显示：仅 45%的毕业生认为自己具备足够的竞争力面对就业市场，而 73%的企业认为毕业生在职业规划和软技能方面有较大提升空间(麦可

思研究院, 2023)。在全球化竞争中，中国大学生面临的不仅是国内市场的竞争，还需与国际毕业生争夺就业机会，这要求教育体系从知识、能力和态度三方面对大学生进行全方位的能力培养(王峰, 2018)。

审美能力是高校艺术类学生核心素养之一，对其艺术理解、艺术表现力和创造力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现代艺术教育过于注重技能训练，而忽略了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这使得学生们在掌握了一些基本技能后,却无法真正理解和欣赏艺术的内涵(网易, 2024)。当前，中国高校美育课程设置和艺术场馆建设得到显著提升，但是，高校审美教育仍存在局限，如缺乏跨学科融合、考试导向影响审美能力培养(光明教育家, 2022)。

心流理论认为，心流体验（以挑战与技能之间的平衡以及一个人在执行任务期间的兴趣、控制和集中注意力为特征）可以带来最佳学习效果(Egbert, 2004)。高校艺术类学生在演奏、创作作品的过程中，若能进入心流状态，不仅能提升技术表现力，还能深化对艺术美感的理解，从而增强审美能力。在艺术教育中，心流体验可以作为审美能力影响就业竞争力的重要中介机制。当艺术类学生在心流状态下，他们对艺术作品的美感表达更加敏锐，能够更好地理解作品的美学价值。

然而，当前高校艺术类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培养仍主要依赖于技能训练，较少关注审美能力及其在就业竞争中的作用。本研究旨在探讨审美能力对高校艺术类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影响，并进一步引入心流体验作为中介变量，揭示审美能力如何通过心流体验促进就业竞争力的提升。通过实证分析，构建“审美能力-心流体验-就业竞争力”理论模型，有助于完善就业竞争力发展的理论框架。并为高校美育课程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高校艺术类教育工作者更好地引导学生增强就业竞争力和审美能力及艺术创造力方面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建议。

故本研究提出以下问题：

1. 审美能力对高校艺术类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影响是否显着？

2. 心流体验对高校艺术类学生审美能力的影响是否显着？

3. 心流体验对高校艺术类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影响是否显着？

4. 心流体验在高校艺术类学生审美能力与就业竞争力中是否有中介效应？

2．研究综述

2.1 审美能力与就业竞争力

审美能力是个体感知、欣赏、评价和创造美的能力，是一种艺术鉴赏能力，是一个人审美修养和素养的体现(杨敏娸, 2022)。根据 Eisner (2003)的艺术教育理论，审美能力是个体对形式、质感及意义的敏锐感知力。对于艺术类学生而言，这种能力不仅体现在专业创作中，更表现为一种高阶思维模式。Robinson and Lee (2011)指出，审美能力是创造力的源泉。在知识经济时代，审美敏锐度能够帮助学生在产品设计、品牌传播等领域提供差异化的增值服务。Goffman (2023)认为，良好的审美素养有助于学生在面试和职场沟通中构建专业的职业形象。综上所述，本研究推断审美能力对高校艺术类学生就业竞争力有影响。

2.2 审美能力与心流体验

心流体验（Flow Experience）是一种深度沉浸、专注于某项活动的心理状态，其特征包括专注、愉悦和高效(Csikszentmihalyi, 1990)。心流体验要求个体高度专注于当下任务，而这种专注力使个体能够更加深入地体验和理解艺术作品(Csikszentmihalyi, 1990)。Biasutti (2011)对音乐、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心流的特点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心流体验越强创作质量和效率越高。苗文宇和卢焱 (2022)研究指出，“感受美”的主体参与度是大于“欣赏美”的，在沉浸体验中的感

官开放程度也高于传统艺术。综上所述，本研究推断审美能力对高校艺术类学生心流体验有影响。

2.3 心流体验与就业竞争力

就业竞争力（Employability）即个体通过学习获得的一组足以使其在选择职业时更易成功、并在职场中持续发展的成就——包括技能、理解力和自我特质的能力(Yorke & Knight, 2007)。Mainemelis (2001)研究发现，在工作中能体验到心流的个体，往往表现出更高的职业认同感和抗压能力。对于艺术生而言，这种在创作中获得的内在奖赏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职场初期的不确定性和挫折，增强其职业适应性。游淑芳 (2021)研究表明，心流体验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还能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有效缓解压力，增强对职业目标的持续追求。综上所述，本研究推断心流体验对高校艺术类学生就业竞争力有影响。

2.4审美能力、心流体验与就业竞争力

审美能力与心流体验在艺术类大学生的职业发展中存在重要的协同作用。从理论上看，审美能力与心流心理体验的结合为大学生提供了情感发展的良好路径。这种结合既符合核对抗理论中强调的差异化优势，也符合人本主义心理学中的内容实现自我的理论。Shernoff et al. (2014)在对课堂教学环境的研究中发现，频繁进入心流状态的学生在专业技能的掌握程度上显著高于其他学生。这种深度的专注力使艺术生能够在复杂的审美实践中不断磨炼技艺，形成就业市场所需的“硬实力”。综上所述，本研究推断心流体验在高校艺术类学生审美能力与就业竞争力之间可能起着中介作用。

3．研究方法

经过对文献的深入探讨和分析，本研究假设审美能力对高校艺术类学生就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审美能力不仅直接正向影响高校艺术类学生审美能力，而且还可能通过心流体验中介效应，间接的对高校艺术类学生就业竞争力产生正向影响。基于此，本研究建构了变量间的研究框架图和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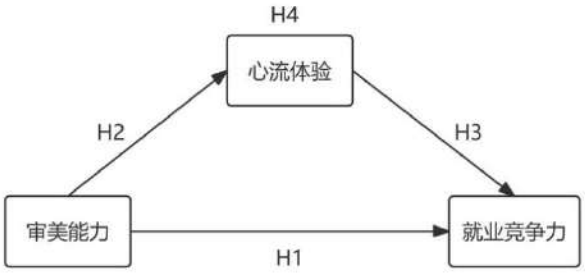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框架图

根据研究框架图和变量间关系的讨论，提出了以下四个假设：
H1：审美能力对高校艺术类学生就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影响；
H2：审美能力对高校艺术类学生心流体验具有显著的影响；
H3：心流体验对高校艺术类学生就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影响；
H4：心流体验在高校艺术类学生审美能力与就业竞争力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3.1 研究对象

根据学者吴明隆(2010)的建议，区域研究样本的平均抽样数量应约为1000。因此，本研究在中国福建省具有代表性五所高职院校和五所本科院校中对 1200 名音乐相关专业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回收后，剔除 88 份无效问卷，共回收 1112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2.67%。因此，本研究共抽取了 1112 份有效样本。

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参考国内外已验证的成熟量表进行修订和改编，以保证量表的信效度，具体如下。

审美能力量表：引自 Dan 等人在 2021 年开发并验证了审美能力量表，该量表共设有对音乐、绘画、文学、电影的欣赏四个维度，每个维度设有5道相关的题目，总计20个测验题目。各分量表的信度系数在 0.776～0.895 之间，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杨敏淇, 2022)。

心流体验量表：引自 Bakker2008 年编制的心流体验量表，共含三个构面为：专注指个体完全沈浸在学习之中，忘记周围的一切；学习享受指个体享受学习并感到快乐，并对自己的学习生活质量作出积极的评估结果；内在学习动机指个体透过工作获得的目的为任务本身的乐趣与满足，并受到内在因素的激励产生长久兴趣。共计 13 题，包含专注 4 题、学习享受 4 题、内在学习动机 5 题。该量表信度为 0.88，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吴依静, 2023; Bakker, 2008)。

就业竞争力量表：引自韩成曦 (2014) 编制的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量表，涵盖以下两个维度：核心能力、品质观念，七个构念：技术力、实践力、学习力、创新力、适应力、心理品质、职业观，共计 23 题，其中，核心能力 13 题，品质观念 10 题，核心能力维度量表信度系数为 0.931，品质观念维度量表信度系数为 0.934，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4．研究结果分析

本研究，采用线性回归和多元回归分析，分别了解审美能力、心流体验对高校艺术类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影响，以及心流体验在高校艺术类学生审美能力和就业竞争力的中介作用。根据邱皓政 (2013)的建议，采用 R^2 值对回归模型的解释力判断，以 F 值的显著性判断 R^2 值是否具有解释力，以回归系数值判断影响大小。

4.1 审美能力对就业竞争力之回归分析

以回归分析检验审美能力对高校艺术类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影响，在回归模型中，以就业竞争力为因变量，审美能力为自变量，建立审美能力对就业竞争力影响的回归模型，如表 1 所示：

表 1：审美能力对就业竞争力之线性回归分析表

因变量：就业竞争力					
自变量	B	SE	β	t	VIF
审美能力	.280	.010	.662***	27.419***	1.000
R^2			.438		
调整后 R^2			.438		

F	865.487

注 1：$^{*}p<0.05$ $^{**}p<0.01$ $^{***}p<0.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结果显示，总体显著性检验 F 值＝865.487,p<0.001，达到显著水准，说明模型构建有统计学意义；拟合优度 R^2＝0.438，表明受试者审美能力可以解释就业竞争力 43.8%的变化原因；回归系数显著性 t=27.419，p<0.001，说明审美能力对就业竞争力影响显著；审美能力标准化回归系数β＝0.662，p<0.001，表明审美能力显著影响就业竞争力。在此回归模型中 VIF=1.000，小于 10，表示该模型中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Myers, 1990)。通过上述分析，本研究假设 H1：审美能力对高校艺术类学生就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影响，假设成立。

4.2 审美能力对心流体验之回归分析

以回归分析检验审美能力对高校艺术类学生心流体验的影响，在回归模型中，以心流体验为因变量，审美为自变量，建立审美能力对心流体验影响的回归模型，如表 2 所示：

表 2：审美能力对心流体验之线性回归分析表

因变量：心流体验					
自变量	B	SE	β	t	VIF
审美能力	.191	.088	.585***	24.021***	1.000
R^2			.342		
调整后 R^2			.341		
F			577.020		

注 1：$^{*}p<0.05$ $^{**}p<0.01$ $^{***}p<0.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结果显示，总体显著性检验 F 值＝577.020,p<0.001，达到显著水准，说明模型构建有统计学意义；拟合优度 R^2＝0.342，表明受试者审美能力可以解释心流体验 34.2%的变化原因；回归系数显著性 t=24.021，p<0.001，说明审美能力对心流体验影响显著；审美能力标准化回归系数β＝0.585，p<0.001，表明审美能力显著影响心流体验。在此回归模型中 VIF=1.000，小于 10，表示该模型中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Myers, 1990)。通过上述分析，本研究假设 H2：审美能力对高校艺术类学生心流体验具有显著的影响，假设成立。

4.3 心流体验对就业竞争力之回归分析

以回归分析检验心流体验对高校艺术类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影响，在回归模型中，以就业竞争力为因变量，心流体验为自变量，建立心流体验对就业竞争力影响的回归模型，如表 3 所示：

表 3：心流体验对就业竞争力之线性回归分析表

因变量：就业竞争力					
自变量	B	SE	β	t	VIF
心流体验	.764	.031	.589***	24.305***	1.000
R^2			.347		
调整后 R^2			.347		

F	590.745

注 1：$^{*}p<0.05$ $^{**}p<0.01$ $^{***}p<0.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结果显示，总体显著性检验 F 值＝590.745,p<0.001，达到显著水准，说明模型构建有统计学意义；拟合优度 R^2＝0.347，表明受试者心流体验可以解释就业竞争力 34.7%的变化原因；回归系数显著性 t=27.305，p<0.001，说明心流体验对就业竞争力影响显著；心流体验标准化回归系数β＝0.589，p<0.001，表明心流体验显著影响就业竞争力。在此回归模型中 VIF=1.000，小于 10，表示该模型中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Myers, 1990)。通过上述分析，本研究假设 H3：心流体验对高校艺术类学生就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影响，假设成立。

4.4 心流体验在审美能力与就业竞争力之间中介作用之验证

4.4.1 审美能力、心流体验与就业竞争力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参考 Rm (1986)提出中介效果检验方法，中介效果应符合三个条件：1.自变量对因变量具有显著的预测效果；2.自变量对中介变量具有显著的预测效果；3.同时将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加入回归模型中，来预测因变量，中介变量具有显著的预测效果，自变量预测效果会显著下降，若下降后，自变量对因变量已无显著的预测效果，则称完全中介；若下降后，自变量对依变量仍有显著的预测效果，则称部分中介。如表 4 所示：

表 4:心流体验在审美能力与就业竞争力间的中介效应分析表

项目	模式 1 就业竞争力		模式 2 心流体验		模式 3 就业竞争力	
	Beta	T	Beta	T	Beta	T
自变量 审美能力	.662***	27.419***	.585***	24.021***	.482***	18.423***
中介变量 心流体验	-		-		.307***	11.746***
R2	.438		.074		.500	
调整后 R^2	.438		.070		.499	
F	865.487		577.020		555.133	

注 1：*p＜0.05**p＜0.01***p＜0.00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

结果显示模型 1 中，总体显著性检验 F 值＝865.487,p<0.001，达到显著水准，说明模型构建有统计学意义；拟合优度 R^2＝0.438，表明受试者审美能力可以解释就业竞争力 43.8%的变化原因；回归系数显著性 t=27.419，p<0.001，说明审美能力对就业竞争力影响显著；审美能力标准化回归系数β＝0.662，p<0.001，表明审美能力显著影响就业竞争力。在此回归模型中 VIF=1.000，小于 10，表示该模型中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所以条件 1 符合，自变量审美能力对因变量就业竞争力具有显著预测效果；在模型 2 中，总体显著性检验 F 值＝577.020,p<0.001，达到显著水准，说明模型构建有统计学意义；拟合优度 R^2＝0.342，表明受试者审美能力可以解释心流体验 34.2%的变化原因；回归系数显著性 t=24.021，p<0.001，说明审美能力对心流体验影响显著；审美能力标准化回归系数β＝0.585，p<0.001，表明审美能力显著影响心流体验。在此回归模型中 VIF=1.000，小于 10，表示该模型中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所以条件 2 符合，自变量审美能力对因变量心流体验具有显著预测效果；在模型 3 中，当自变量审美能力和中介变量心流体验同时放入模型中，F 值＝555.133,p<0.001，达到显著，

其中审美能力标准化回归系数β＝0.482,p<0.001，心流体验准化回归系数β＝0.307,p<0.001，R^2＝0.500，表明受试者审美能力和心流体验都对就业竞争力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共同解释就业竞争力 50%。相比模型 2 增加了 15.8%解释变化原因，且审美能力标准化系数由原来的（β=0.662, p<0.001）下降到（β=0.482, p<0.001）。审美能力对心流体验有显著影响，而审美能力标准化系数下降，但仍然有预测效果，表明心流体验在审美能力对就业竞争力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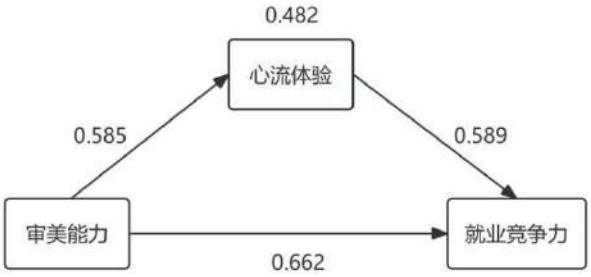


图 2；心流体验对审美能力与就业竞争力之路径分析

4.5 假设验证结果

根据本研究数据统计分析后，针对本研究假设可归纳出以下研究结论，如表 5 所示：

表 5:本研究假设验证结果摘要表

本研究假设	验证结果
H1：审美能力对高校艺术类学生就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影响	成立
H2：审美能力对高校艺术类学生心流体验具有显著的影响	成立
H3：心流体验对高校艺术类学生就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影响	成立
H4: 心流体验在高校艺术类学生审美能力与就业竞争力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成立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5．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审美能力对高校艺术类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影响，并验证了心流体验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审美能力对就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即审美能力水平较高的学生就业竞争力越强。而且，心流体验在审美能力与就业竞争力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审美能力较高的学生更容易进入心流状态，即在艺术创作和欣赏的过程中高度专注并获得愉悦感，而这种沉浸式体验进一步促进了审美能力的提升。审美能力不仅更深入地理解艺术，还帮助他们更专注的艺术创作，从而提升整体艺术感知水平。本研究的结果揭示了审美能力和心流体验在就业竞争力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由此可见，就业竞争力的培养应是一个综合过程，需要审美能力、心理状态与专业技能的协同发展，以促进艺术类专业学生更全面的艺术成长。

参考文献

[1]顾盈盈（2012）。*影响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硕士, 复旦大学] 。

Cnki
[2]光明教育家（2022）。*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是加强学校艺术教育的关键* https://jyj.gmw.cn/2022-01/11/content_35440824.htm
[3]韩成曦（2014）。*大学生就业核心竞争力的结构模型构建研究* [硕士, 大连理工大学] 。Cnki
[4]麦可思研究院（2023）。*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告。教育科学出版社。*
[5]苗文宇、卢焱（2022）。沉浸式艺术: 独特形式与新鲜体验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邱皓政(2013). *量化研究与统计分析：SPSS(PASW)数据分析范例解析*. 重庆大学出版社.
[7]王峰（2018）。*基于供需耦合的大学生就业能力结构优化及实证研究* [博士， 中国矿业大学]。Cnki
[8]网易（2024）。*为什么现代人的音乐水平远低于几百年前?* https://www.163.com/dy/article/J4Q2KL2P055670ZO.html
[9]吴明隆(2010). *问卷统计分析实务：SPSS 操作与应用*. 重庆大学出版社.
[10]吴依静（2023）。*职业舞者心流体验、工作满意度与工作敬业之关系－工作属性的调节效果*[硕士，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11]杨敏淇（2022）。*认知风格在审美能力与创新能力间的中介作用研究* [硕士， 曲阜师范大学]。Cnki
[12]游淑芳（2021）。*业余音乐爱好者人格特质、心流体验与工作压力之研究* [硕士，輔仁大學]。
[13]Bakker, A. B.(2008). The work-related flow inventory: Construction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WOLF.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72*(3), 400-414.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016/j.jvb.2007.11.007
[14]Biasutti, M. (2011). Flow and optimal experience. In *Encyclopedia of creativity, Second Edition* (Vol. 1, pp. 522-528). Academic Press.
[15]Csikszentmihalyi, M.(1990).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6]Egbert, J.(2004). A study of flow theory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60*(5), 549-586.
[17]Eisner, E. W.(2003). The arts and the creation of mind. *Language arts*, *80*(5), 340-344.
[18]Goffman, E. (2023).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In *Social theory re-wired* (pp. 450-459). Routledge.
[19]Mainemelis, C.(2001). When the muse takes it all: A model for the experience of timelessness in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6*(4), 548-565.
[20]Myers, R. H.(1990). *Classical and modern regression with applications* (Vol. 2). Duxbury press Belmont, CA.
[21]Rm, B.(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 Pers Soc Psychol*, *51*, 1173-1182.
[22]Robinson, K.&Lee, J. R.(2011). *Out of our minds*. Wiley Online Library.
[23]Shernoff, D. J.,Csikszentmihalyi, M.,Schneider, B.,Shernoff, E. S. (2014). Student engagement in high school classroo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low theory. In *Applications of flow in human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pp. 475-494). Springer.

[24]Yorke, M.&Knight, P.(2007). Employ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EUA Bologna Handbook: making Bologna work*, 4-1.

A novel synthesized compound, manifests the antitumor effects on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Guan Xin-ge,Medical and Nursing Science College, Krirk University, Thailand.

Email:2950704508@qq.com

Abstract: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TNBC) is a highly invasive subtype of breast cancer, characterized by the absence of estrogen receptor, progesterone receptor, and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xpression. Due to the lack of effective targeted treatment methods, the prognosis of TNBC patients is usually poor, with high recurrence and metastasis rates. The clinical treatment mainly relies on chemotherapy, but it often accompanies drug resistance and severe toxic side effects. Therefore, exploring new treatment strategies for this diseas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recent years, natural products and their derivativ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anti-tumor drug research due to their diverse biological activities and lower toxicity. Before verifying their safety, this study designed and synthesized a new compound A. Further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ompound A has a significant anti-tumor effect on tumor cells (especially the MDA-MB-231 cell line). In terms of molecular mechanisms,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anti-tumor effect of compound A is related to the activation of the MAPK pathway. The effects of compound A on various cancer cell lines were detected through cell proliferation experiments. Functional experiments (including scratch, Transwell, and TUNEL assays) were us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compound A on MDA-MB-231 cells. Western blotting was used to analyze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in MDA-MB-231 cells. The study found that compound A has inhibitory effects on various cancer cell lines. The Cck8 experiment showed that compound A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MDA-MB-231 cells ((IC_{50}, 9.78±1. 93μm /l). Cell function experiments indicated that compound A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migration of MDA-MB-231 cells and promoted their apoptosis. In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newly synthesized compound compound A shows anti-tumor activity against MDA-MB-231 cells, and its mechanism is related to the activation of the MAPK signaling pathway.

Key words: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Antitumor effect, MAPK signaling pathway

1. Introduction

Filho AM, Laversanne M, Ferlay J, Colombet M, Piñeros M, and Znaor A (2025) found that breast cancer is currently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t tumor among women worldwide and is also the main cause of cancer-related deaths. This disease accounts for approximately 25% of all cancer cases and 16.7% of cancer-related deaths among women. The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TNBC) is a subtype of breast cancer, characterized by the absence of estrogen receptor (ER), progesterone receptor (PR), and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 (HER-2) expression. Du SM, Li N, Xu WJ, and Liu K (2025) found that this type accounts for 10% - 20% of all breast cancer cases. Simon N, Antignani A, Sarnovsky R, Hewitt SM, and FitzGerald D (2016) found that TNBC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or prognosis, high metastatic potential, and high recurrence rate. Moreover, due to its "triple-negative" nature, TNBC usually does not respond to endocrine therapy and targeted therapy. Li CJ, Lin LT, Hou MF, and Chu PY (2021) found that chemotherapy has been the first and only available clinical treatment option for this disease for decades. However, Gbadamosi MO, Molchan E, Makarem MS, Coleman KL, Ohaegbulam AC, and Streeks KH (2025) found that chemotherapy drugs are often restricted due to severe toxicity, poor patient prognosis, and limited treatment benefits.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hemotherapy drugs and TNBC treatment targets remains of crucial significance.

Kabir TD, Beck S, Stuart LM, Li J, Hou R, and Liu P (2025) discovered that diarylurea compounds are a common class of protein kinase inhibitors, and are widely used as small molecule multi-kinase inhibitors in cancer treatment. With the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diarylurea

derivatives, their related adverse reactions have gradually emerged.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se compounds have skin toxicity and exert specific toxic effects on the cardiovascular system and gastrointestinal system. Additionally, Barakat EMF, Kohla M, Dabees H, Shousha HI, Moustafa EF, and El-Kassas M (2025); Xu Y, Mo Y, Zhou W, Qin M, Li M, and Yin G (2025) found that these drugs develop drug resistance. Boddapati SNM, Chalapaka B, Kola AE, and Jonnalagadda SB (2025) discovered that various substituted imidazole derivatives exhibit significant biological activity, including anti-tumor, anti-inflammatory, and antibacterial effects. However, Li L, Bai J, Wen X, and Zeng X (2025); Mal S, Malik U, Mahapatra M, Mishra A, Pal D, and Paidesetty SK (2022) found that imidazole derivatives have several limitations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including low yield, poor solubility, and significant toxicity issues (such as hematological toxicity).

Based on the toxicity characteristics and anti-tumor properties of biphenylurea and imidazole derivatives, this study synthesized a hybrid compound to reduce toxicity. Through rational molecular hybridization, compound A was synthesized, and its biological activity in cancer cell models was investigated.

2. Research Methods

2.1 Cell lines and cell culture.

Most cell lines were purchased from the American Type Culture Collection (ATCC). The KHM-5M cell line was purchased from Wuhan Sunshine Cell Biotechnology Co., Ltd. The cancer cell lines included thyroid cancer (KHM-5M, item SNL-340), breast cancer (MCF-7, item CRL-3435; MDA-MB-231, item CRM-HTB-26). All cell lines were cultured according to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The cells were cultured in 1640 medium containing 10% fetal bovine serum (FBS) and placed in a 37° C, 5% CO2 incubator. The presence of mycoplasma contamination in the cell lines was regularly detected by PCR analysis.

2.2 CCK-8 assay.

To evaluate the cytotoxicity of compound A on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cells, cells in the logarithmic growth phase were inoculated at a density of 1×10^4 cells per well in a 96-well plate. After 24 hours of culture, when the cells adhered,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compound A solution were added. Based on the preliminary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concentration gradient of the compound A solution was set as follows: 80, 40, 20, 10, 5, 2.5, 1.25, and 0.625 μM. Each group was set up with three duplicate wells. After 24 hours of incubation, CCK-8 was added to each well and incubated at 37° C for 30 minutes. The OD value at 450 nm was measured using a microplate reader. The IC50 value was calculated using GraphPad Prism 10.

2.3 Toxicological study.

To evaluate the toxicity of drug A, this study conducted a toxicological experiment to assess its safety. C57BL mice wer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four groups (6 mice per group): control group, low-dose group (10 mg/kg), medium-dose group (20 mg/kg), and high-dose group (40 mg/kg). The body weight of the mice was continuously recorded during the 21-day treatment period. After administration, the mice were anesthetized by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pentobarbital (50 mg/kg), and their eyeballs were removed followed by cervical dislocation for blood collection of

approximately 1 ml. The above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in Weihai Weigao Animal Laboratory. Subsequently, liver function, kidney function, and selected indicators of blood cells were detected.

2.4 Mouse tumor-bearing experiment.

To evaluate the anti-tumor effect of compound A,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cells were subcutaneously inoculated in C57BL mice to establish a tumor model. The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4 groups (6 mice per group): control group, low-dose group (10 mg/kg), medium-dose group (20 mg/kg), and high-dose group (40 mg/kg). Compound A was continuously injected for 21 days, and the mice were weighed every three days and the tumor volume was measured.

2.5 HE staining.

After euthanasia of the mice, the tumors and related tissues were removed, fixed, dehydrated, and embedded. After sectioning,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was performed to observe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tissues.

2.6 Scratch assay.

In this experiment, the migration ability of MDA-MB-231 cells was detected through the scratch healing assay. The cells were inoculated in a 6-well plate and cultured until complete confluence. A scratch model was made in each well, and the compound A-containing 1640 medium was added. Imag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t 0 hours and 24 hours were captured using a microscope, and the scratch healing rate was calculated using Image J software.

2.7 Transwell migration assay.

The migration ability of MDA-MB-231 cells was detected through the Transwell migration assay. The cells were inoculated in the upper chamber of a 24-well plate, and the compound A-free medium was added to the upper chamber. The medium containing 10% serum was added to the lower chamber. After incubation in a 37° C, 5% carbon dioxide incubator for 24 hours, the cells on the upper side of the membrane were removed, the cells on the lower side were fixed, stained with 0.1% crystal violet solution and washed. Finally, images were obtained using an inverted microscope.

2.8 TUNEL assay.

The TUNEL assa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fragmentation of nuclear DNA during the process of cell apoptosis. The cells were inoculated in a 12-well plate containing a slide, and incubated for 24 hours. After the cells adhered,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compound A solution were treated for 24 hours. Then, according to the operating procedure, the TUNEL reagent (keyGEN BioTECH, K240830) was used to stain the naturally dried cell samples (cell slides or crawling cells). Images were collected using an inverted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2.9 Western blotting.

The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 was detected using Western blotting. The MDA-MB-231 cells were lysed with RIPA lysis buffer to extract proteins, the protein concentration was determined, and SDS-PAGE electrophoresis was performed followed by transfer to a PVDF membrane and blocking. After incubation with the primary antibody, washing was performed, then with the secondary antibody, and

finally, the imaging was carried out. The band intensity was analyzed using ImageJ software. The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 was detected.

2.10 Statistical Analysis.

Data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GraphPad Prism. The data were presented as mean ± standard error.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was used to compar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A P value < 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3. Research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on the proliferation and toxicity of compound A towards tumor cells revealed a potential inhibitory effect. The in vitro anti-tumor activity of compound A was evaluated using the CCK8 me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ound A had inhibitory effects on various cancer cells (Figure 1). Three repeated determinations of the half-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of compound A in different tumor cells were conducted, and the average values were: 10.56 ± 1.56 μM/l for KHM-5M cells, 23.38 ± 0.29 μM/l for MCF-7 cells, and 9.78 ± 1.93 μM/l for MDA-MB-231 cells (Table 1). Compound A exhibited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s on MDA-MB-231 cells. To further study its anti-tumor activity on this cell line, subsequent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he cell proliferation experiment indicated that compound A had time- and dose-dependent inhibitory effects on MDA-MB-231 cells. Higher concentrations led to a decrease in cell viability, and prolonging the drug exposure time further reduced cell viability. Cisplatin (CDDP) was also used as a positive control drug for MDA-MB-231 cells to explore the biological activity of compound A and CDDP on MDA-MB-231 cells. The half-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value of CDDP for MDA-MB-231 cells was 24.91 ± 2.94 μM/l (Figure 2). In this study, MDA-MB-231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20 μM/l CDDP to investigate the biological activity it produc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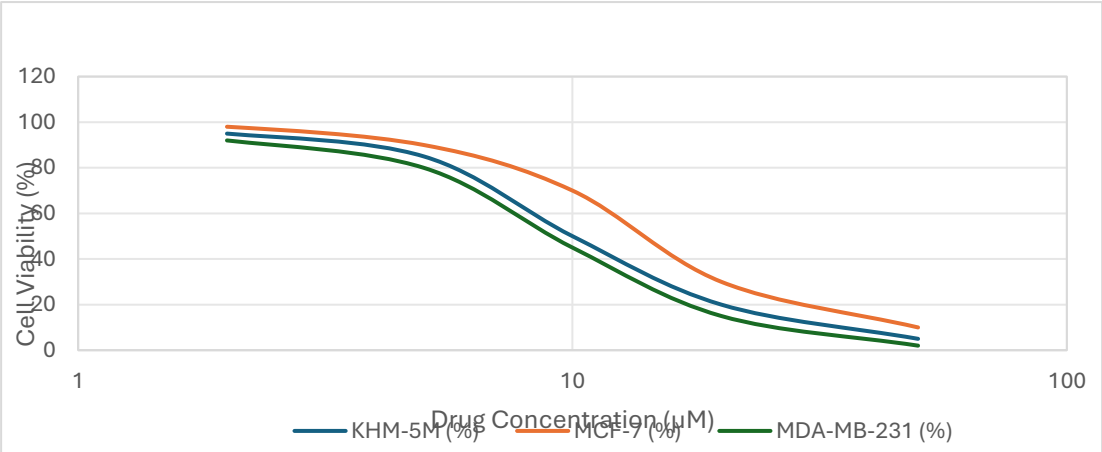


图 1： The dose-response curve of compound A

表 1： Comparison of IC_{50}values among different cell lines

Cell line	KHM-5M	MCF-7	MDA-MB-231

IC_{50} (μM/L)	10.56 ± 1.56	23.38 ± 0.29	9.78 ± 1.93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toxicity study is to assess the potential toxicity of the drug and determine its safety. After administering the corresponding dose of the new compound A by oral gavage to the mice in each group,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each group.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vels of urea nitrogen, creatinine,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nd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in the low, medium, and high dose groups were all within the normal range, 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Additionally, the analysis of blood cell parameters in each group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red blood cells, white blood cells, or platelets betwee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weigh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weight between the low, medium, and high dose groups and the control group (Figure 3). Based on these result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compound A did not produce significant dose-related toxic effec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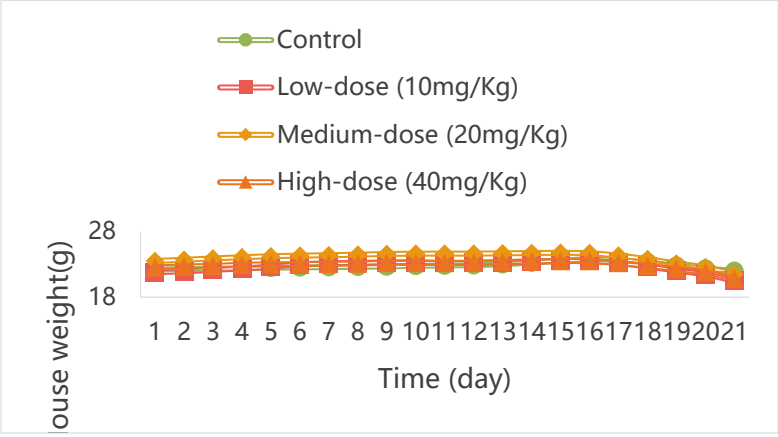


图 3： The differences in body weight among the four groups of mice

Compound A exhibits potential anti-tumor activity against MDA-MB-231 cells. The strength of invasiveness and migration ability is the main reason for poor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TNBC. Therefore, this study further verified the effect of compound A on the migration ability of MDA-MB-231 cells through wound healing experiments and Transwell migration experiments. After treating MDA-MB-231 cell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compound A for 24 hours, it was observed that their migration distance was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The Transwell migration experiment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migrating cells in the compound A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isplatin treatment group (Figure 4). The experimental data indicate that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compound A on the migration ability of MDA-MB-231 cells is significant, and the inhibitory effect i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of cisplat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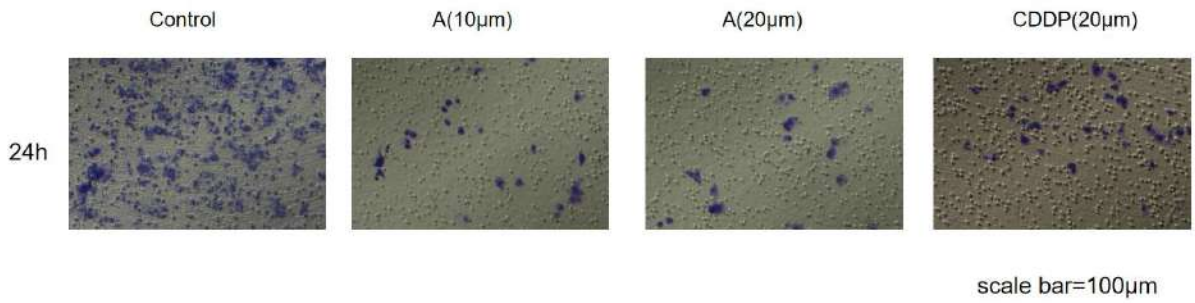


图 4： The Transwell experiment. After treating with A and cisplatin for 24 hours, microscopic images were captured.

Compound A can enhance the apoptosis of MDA-MB-231 cells. The pro-apoptotic effect of compound A on MDA-MB-231 cells was detected by TUNEL assa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isplatin treatment group, the fluorescence signal in the compound A treatment group was enhanced.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mpound A can promote the apoptosis of MDA-MB-231 cells, and its pro-apoptotic effect i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han that of cisplatin treatment.

Compound A induces apoptosis of MDA-MB-231 cells by activating the MAPK signaling pathway. Compound A exhibits a dual effect of inhibiting proliferation and promoting apoptosis in MDA-MB-231 cells. To explore its molecular mechanism, we conducted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and the results showed significant changes in proteins related to the MAPK-ERK signaling pathway. Western blot analysis was used to detect the key components of the MAPK-ERK signaling pathway (Figure 5).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phosphorylation level of ERK in the compound A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experiment demonstrated that compound A inhibits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MDA-MB-231 cells and promotes the apoptosis of TNBC cancer cells by affecting the phosphorylation of ERK in the MAPK signaling pathw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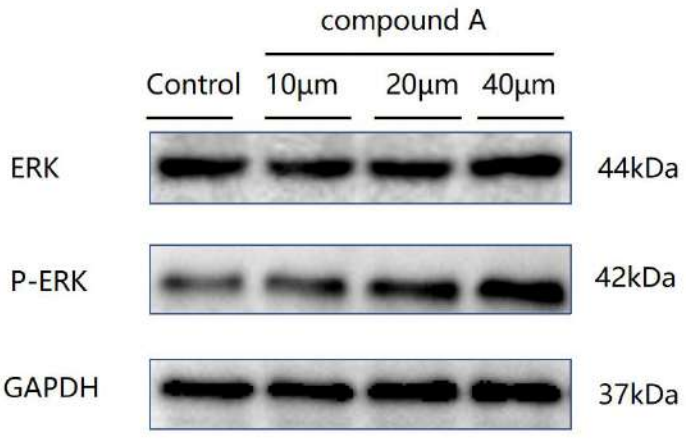


图 5： The results of the western blotting experiment

4. Discussion

According to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Bray F, Laversanne M, Sung H, Ferlay J, Siegel RL, and Soerjomataram I (2022); Cao W, Chen HD, Yu YW, Li N, and Chen WQ (2021) found that breast cancer has surpassed lung cancer and has become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t tumor worldwide. Contreras-Z á rate MJ, Day NL, Ormond DR, Borges VF, Tobet S, and Gril B (2019) found that TNBC has highly invasive and malignant characteristics, often metastasizes, has poor prognosis and strong drug resistance. Therefore, developing new therapeutic strategies and molecular targets for TNBC is regarded as a key research direction.

This study designed and synthesized a series of novel compounds based on the biphenylurea and imidazole frameworks. Through systematic evaluation, compound A was identified as having potential anti-tumor activity. Subsequently, compound A was treated with various tumor cells,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ound A had inhibitory effects on multiple tumor cell lines, especially showing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s on MDA-MB-231 cells. This indicates that compound A may have anti-tumor potential for MDA-MB-231 cells. To verify its anti-tumor activity in MDA-MB-231 cells, related cell function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he experimental data showed that compound A could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migration of MDA-MB-231 cells and promote their apoptosis.

In summary, compound A inhibits the proliferation of MDA-MB-231 cells and promotes cell apoptosis by activating the MAPK pathway. The safety of compound A needs to be verified through animal experiments. The existing data indicate that compound A may exert its efficacy by activating the MAPK pathway, but the specific mechanism still requires further research. This study provides research clues for the treatment direction and mechanism of TNBC.

5. References

[1]Filho AM, Laversanne M, Ferlay J, Colombet M, Piñeros M, Znaor A, et al. The GLOBOCAN 2022 cancer estimates: Data sources, methods, and a snapshot of the cancer burden worldwide. Int J Cancer. 2025;156(7):1336-46. Epub 20241217. doi: 10.1002/ijc.35278. PubMed PMID: 39688499.

[2]Du SM, Li N, Xu WJ, Liu K.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cell-derived piR-31115 promotes the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of endothelial cells via METTL3-mediated m6A modification of YAP1. Oncol Rep. 2025;53(3). Epub 20250117. doi: 10.3892/or.2025.8867. PubMed PMID: 39820521; PubMed Central PMCID: PMC11755246.

[3]Simon N, Antignani A, Sarnovsky R, Hewitt SM, FitzGerald D. Targeting a Cancer-Specific Epitope of the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in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J Natl Cancer Inst. 2016;108(8). Epub 20160413. doi: 10.1093/jnci/djw028. PubMed PMID: 27075852; PubMed Central PMCID: PMC5017938.

[4]Li CJ, Lin LT, Hou MF, Chu PY. PD-L1/PD-1 blockade in breast cancer: The immunotherapy era (Review). Oncol Rep. 2021;45(1):5-12. Epub 20201103. doi: 10.3892/or.2020.7831. PubMed PMID: 33416128.

[5]Gbadamosi MO, Molchan E, Makarem MS, Coleman KL, Ohaegbulam AC, Streeks KH. Chemoimmunomodulation in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a key to maximizing anti-PD-1 chemoimmunotherapeutic efficacy. Oncoimmunology. 2025;14(1):2527303. Epub 20250709. doi: 10.1080/2162402x.2025.2527303. PubMed PMID: 40631451; PubMed Central PMCID: PMC12243914.

[6]Kabir TD, Beck S, Stuart LM, Li J, Hou R, Liu P, et al. Inhibition of the Caveolin-1 pathway promotes apoptosis and overcomes pan-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resistance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Death Dis. 2025;16(1):561. Epub 20250725. doi: 10.1038/s41419-025-07887-4. PubMed PMID:

40715090; PubMed Central PMCID: PMC12297225.

[7]Barakat EMF, Kohla M, Dabees H, Shousha HI, Moustafa EF, El-Kassas M, et al.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were well-tolerated among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etiologies of advanced HCC with lower survival in non-viral patients. Sci Rep. 2025;15(1):20323. Epub 20250627. doi: 10.1038/s41598-025-05828-x. PubMed PMID: 40579411; PubMed Central PMCID: PMC12205039.

[8]Xu Y, Mo Y, Zhou W, Qin M, Li M, Yin G, et al. Sorafenib induces intestinal toxicity by disturbing gut microbiota and activating the LPS/TLR4/NF-κB signaling pathway in mice. Toxicology. 2025;517:154220. Epub 20250613. doi: 10.1016/j.tox.2025.154220. PubMed PMID: 40518001.

[9]Boddapati SNM, Chalapaka B, Kola AE, Jonnalagadda SB. Recent Advances in Synthetic Strategies and Biological Properties of Indazole Scaffolds: A Review. Top Curr Chem (Cham). 2025;383(3):26. Epub 20250701. doi: 10.1007/s41061-025-00509-9. PubMed PMID: 40591193; PubMed Central PMCID: PMC12213994.

[10]Li L, Bai J, Wen X, Zeng X. Adverse reactions of four multi-targeted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a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the WHO-VigiAccess database. Front Pharmacol. 2025;16:1585862. Epub 20250422. doi: 10.3389/fphar.2025.1585862. PubMed PMID: 40331199; PubMed Central PMCID: PMC12052882.

[11]Mal S, Malik U, Mahapatra M, Mishra A, Pal D, Paidesetty SK. A review on synthetic strategy, molecular pharmacology of indazole derivatives, and their future perspective. Drug Dev Res. 2022;83(7):1469-504. Epub 20220816. doi: 10.1002/ddr.21979. PubMed PMID: 35971890.

[12]Bray F, Laversanne M, Sung H, Ferlay J, Siegel RL, Soerjomataram I, 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2: 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 CA Cancer J Clin. 2024;74(3):229-63. Epub 20240404. doi: 10.3322/caac.21834. PubMed PMID: 38572751.

[13]Cao W, Chen HD, Yu YW, Li N, Chen WQ. Changing profiles of cancer burden worldwide and in China: a secondary analysis of the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0. Chin Med J (Engl). 2021;134(7):783-91. Epub 20210317. doi: 10.1097/cm9.0000000000001474. PubMed PMID: 33734139; PubMed Central PMCID: PMC8104205.

[14]Contreras-Zárate MJ, Day NL, Ormond DR, Borges VF, Tobet S, Gril B, et al. Estradiol induces BDNF/TrkB signaling in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to promote brain metastases. Oncogene. 2019;38(24):4685-99. Epub 20190222. doi: 10.1038/s41388-019-0756-z. PubMed PMID: 30796353; PubMed Central PMCID: PMC6565485.

Protocol of a Pilot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n the Design of Auxiliary Three-Shaking Guiding and Transforming Robot and Its Effects on Lower Limb Muscle Function and Balance Ability in the Elderly

MaJingchao, International College, Krirk University, Thailand.Email:171530210@qq.com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ealth-preserving exercises, zhuanggong (standing pile exercise) has been verified by modern medicine to have the effects of enhancing balance ability, muscle strength, improving immunity and assisting in the treatment of various diseases. However, the current zhuanggong practice is fac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non-standard postures, difficult control of safety risks and unscientific monitoring of exercise intensity, which limit its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disciplines inclu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obotics, exercise physiology and medicine, this study developed a wearable auxiliary three-shaking guiding and transforming zhuanggong robot. By optimizing the hardware structure, constructing a standardized training system and developing exercise intensity monitoring software, the study realizes the intellectualization, personalization and safety of zhuanggong practic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design will be adopted, and 120 elderly subjects will be recruited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robot-assisted training and traditional manual-guided training, so as to verify the superiority of the robot system in improving lower limb muscle function and balance ability. The expected outcomes include a set of zhuanggong robot system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 number of patents and software copyrights, as well 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the modernization and scientization of zhuanggong. This study not only promotes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intelligent medical care and traditional health-preserving culture, but also meets the national health needs, which has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Wearable Robot, Zhuanggong, Lower Limb Functional Rehabilitation, Elderly, Balance Ability,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1. Research Significance

As a health-preserving exercise carry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zhuanggong has been proved by modern medicine to improve sense of balance, muscle strength, enhance immunity and regulate mood. It is widely used in medical fields such as spinal balance adjustment and auxiliary treatmen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t present, the formulation of exercise prescriptions is faced with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accuracy. By virtue of AI technology, zhuanggong robots can provide personalized exercise prescriptions,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exercise prescriptions, ensure the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exercise, and facilitate the inheritance of zhuanggong and the improvement of health care level. At present,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zhuanggong robots, and this study can promote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zhuanggong,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for the integration of AI and public services.

2. Background

Zhuanggong originated from the ancient health-preserving wisdom. *Shuowen Jiezi (Explaining Simple and Analyzing Compound Characters)* defines it as "a wooden stake",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health-preserving concept of "standing as straight and firm as a pine tree". It is divided into dynamic zhuanggong and static zhuanggong, and the latter is mostly referred to in daily practice. Ancient books such as *Huangdi Neijing (Yellow Emperor's Internal Classic)* have recorded relevant contents early, and its health-preserving effects were affirme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modern society, zhuanggong is widely used in fitness and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due to its effects of enhancing physical fitness and relieving press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rts training, it integrates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and core training; clinical studies have confirmed that it has an auxiliary therapeutic effect on various diseases such as heart disease and hypertension.

3.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Field

Three-circle standing zhuanggong is a basic skill of martial arts and qigong, which is recorded in various schools including Wudang and Shaolin. With the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it has been gradually included in international martial arts exchange programs.

3.1 Three-Circle Standing Zhuanggong

Three-circle standing zhuanggong is a static training method. Its core is to improve body stability and endurance through the "three-circle" posture, combined with breathing regulation and concentration of mind. Its symmetrical posture can improve spinal imbalance and activate muscle groups all over the body. This exercise has low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and is easy to popularize. It can relax the mind, improve cardiopulmonary function and prevent falls in the elderly.

3.2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Muscles and Joints in Three-Circle Standing Zhuanggong

Three-circle standing zhuanggong maintains posture through muscle isometric contraction, emphasizing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muscle groups. Keeping the head upright and slightly retracted can stretch the posterior cervical muscles and redistribute the stress on the cervical intervertebral discs; the posture of "chest containing and back stretching" in the shoulder and chest requires the coordination of latissimus dorsi, trapezius and other muscles to enhance the back support force; the hip-sitting posture of the pelvis can stretch the spine and relieve lumbar disorders, with the core muscles and gluteal muscles participating in maintaining balance and stability.

3.3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Horse-Stance Zhuanggong on Muscles and Joints

Horse-stance zhuanggong features a low and flat stance with high intensity. Practitioners need to maintain postures such as upright head and straight neck, chest containing and abdomen contracting, with the center of gravity fall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two legs. It has a prominent effect on core muscle training, and the training intensity of waist and leg muscl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ree-circle standing zhuanggong. Leg muscles such as quadriceps femoris and biceps femoris coordinate with gluteus maximus to maintain stability, while transversus abdominis and rectus abdominis participate in body balance control,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muscle strength and endurance.

3.4 Zhuanggong and Diseases

As a traditional standing exercise in China, zhuanggong (standing pile exercise) has been confirmed by years of medical practice to exert favorable therapeutic effects on various diseases, 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psychosomatic diseases.

Fan Xuefeng's [1]research indicated that the movements of arm lifting and abduction, chest expansion with exhalation in the backward-breathing posture can not

only alleviate physical discomforts such as dyspnea and chest distress, but als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eventing, treating and regulating neck movement discomfort.

Zheng Qian [2]conducted an 8-week health qigong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intervention study on 40 college stud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and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d that zhuanggong exerts favorable relieving and therapeutic effects on cervical spondylo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tanding pile exercise combined with acupuncture yielded better therapeutic effects than acupuncture alone in the treatment of knee osteoarthritis, and it was conducive to the recovery of muscle strength of the knee joint. The stud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quadriceps femoris training in the treatment of knee osteoarthritis, and pointed out that standing pile exercise can enhance the stability of the knee joint. Their findings further confirmed that the combination therapy outperformed acupuncture monotherapy in improving knee osteoarthritis symptoms and promoting the restoration of knee muscle strength. Collectively, these studies indicate that standing pile exercise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rehabilitation treatment of knee joint disorders.

In the treatment of lumbar disorders with zhuanggong,， Wang Lei[3]et al. conducted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on 180 patients by observing the application of Wuji standing pile exercise in the treatment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roup treated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Wuji standing pile exercise achieved remarkable therapeutic effects in alleviating patients' clinical symptoms and improving their daily activity ability, which verified the positive role of Wuji standing pile exercise in the treatment of lumbar disc herniation and provided strong support for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Yang Huixin [4]focused her research on the rehabilitative effect of standing pile exercise on chronic strain of the lumbar and knee joints in winter sports athletes. Through grouped intervention on 99 athletes, she found that standing pile exercise could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pain caused by chronic lumbar and knee strain and improve joint mobility. Although Yijinjing could also improve joint function in a short period, the overall effect of standing pile exercise was more significant and durable.

This study not only expands the applicable population of standing pile exercise, but also provides valuable explor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uxiliary zhuanggong robots in the field of elderly health.

The Application of Standing Pile Exercise in Spinal Imbalance， Chen Yue[5]selected 60 freshmen and sophomore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Oriental College with balanced baseline data as subjec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search criteria, and randomly divided them into two groups at a 1:1 ratio. The intervention group received a 14-week three-circle standing pile exercise intervention training (2 weeks of intensive training plus 12 weeks of supervised training), 5 times a week, 50 minutes

each tim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no intervention and only participated in the research evaluation process in parallel with the intervention group.

The total study period was 16 weeks, including a 2-week baseline period and a 14-week training period. The physiological curvature of the spine in the upright coronal plane was used as the efficacy indicator for regulating spinal balance. Three assessments were completed from the baseline period to the end of the intervention, namely at week 0 after enrollment (baseline period), week 8 after enrollment (after 6 weeks of supervised training), and week 14 after enrollment (after 12 weeks of supervised training), so as to observe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three-circle standing pile exercise on spinal balance and its bio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ree-circle standing pile exercise helped restore and maintain the physiological balance of the spine in the coronal plane, enhanced the stability of the upright spinal morphology, and improved the range of motion of the spine in the coronal plane.

In her study titled *Efficacy Analysis of Standing Pile Exercise on Improving Adolescent Scoliosis and Basic Posture*, Shang Fangru[6] conducted a training program on 20 adolescents aged 10–15 years. The program lasted for three months, with one session in the morning and one in the evening, 10 repetitions per session and 30 seconds per repeti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atients' Cobb angle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ir posture became more upright and straight, and specialist physicians recommended that brace wearing was not necessary. Thes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he improved ancient wall standing pile exercise exerte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recovery of adolescent scoliosi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basic posture.

In her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effect of Tai Chi Hunyuan standing pile exercise on the attention stabilit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Dou Fangfang[7] selected 28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for Hunyuan standing pile exercise training. The conclusion showed that this exercise could improve the attention stability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d exerted an extremely significant effect on enhancing their attention stability.

In his intervention study on the effect of health-preserving standing pile exercise on mild to moderate essential hypertension, Fang Chao[8] divided 50 subjects into two major groups: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and the control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blood pressure grades, the subjects were further assigned to Experimental Group 1 (mild hypertension group, 10 cases), Experimental Group 2 (moderate hypertension standing pile group, 22 cases), Control Group 1 (mild hypertension non-standing pile group, 8 cases), and Control Group 2 (moderate hypertension non-standing pile group, 10 cas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ystematic practice of health-preserving standing pile exercise for 3 months c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blood pressure of patients with

mild to moderate hypertension, with a better hypotensive effect on patients with moderate hypertension. It exerted a blood pressure-lowering effect on hypertensive patients of different risk stratifications, and produced more favorable therapeutic outcomes in moderate-risk and high-risk hypertensive patients than in low-risk ones. In addition, this exercise could improve the body composition of patients with mild to moderate hypertension who were overweight or obese, enhance their cardiac function and physical fitness, and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It could also significantly ameliorate lipid metabolism and blood glucose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mild to moderate hypertension, thereby preventing the occurrence of various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such as hyperlipidemia, hyperglycemia and atherosclerosis.

Lyu Ming's[9] study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us. This study selected 96 patients with insomnia and randomly divided them into the Tai Chi standing pile exercis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y comparing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the two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it was found that Tai Chi standing pile exercise exerted a significant therapeutic effect on insomni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as high as 93.75%, while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only 62.5%,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of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is finding not only confirms the effectiveness of standing pile exercise in improving insomnia symptoms, but also reveals its unique advantages as a non-pharmacological treatment method in insomnia therapy. By adjusting body posture and breathing patterns, standing pile exercise helps relax the body and mind, balance the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and thus improve sleep quality. Therefore, auxiliary standing pile exercise robots may become an effective adjuvant tool for insomnia treatment in the future, providing more convenient and safe treatment options for insomnia patients.

Jiang Huiyuan's [10] study explored in dep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nding pile exercise and anx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rain mechanism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effects of Tai Chi standing pile exercise on depressive and anxious emo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practitioners were in the state of standing pile exercise, their sympathetic nerve activity decreased, parasympathetic nerve activity increased, and the state of the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tended to be more balanced. This balanced state of the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helps enhance the regulatory function of the cerebral cortex on the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thereby stabilizing the practitioners' emotions and achieving a certain effect of relieving anxiety.

This finding reveals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of standing pile exercise in regulating emotions and alleviating anxiety. Therefore, auxiliary standing pile exercise robots may serve as an effective emotional regulation tool in the future, helping people relieve anxiety and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Guo Yu's [11] study provides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empirical support for us. Taki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study implemented a 14-week three-circle standing pile exercise intervention 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rough random group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the training, the standard scores of th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at the baseline period at multiple time points, and also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is finding strongly prove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standing pile exercise in alleviating depressive symptoms.

Further research has also revealed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antidepressant effect of standing pile exercise. The results of gene exp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metabolic pathways such as the B cell receptor signaling pathway, NK-KR signaling pathway, and valine, leucine and isoleucine degradation pathway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mind-regulating effect of standing pile exercise. In addition, specific genes including ST6GALNAC2, LRRC32, SLC7A6, GGA1 and GLS may be involved in the gene expression mechanism of the mind-regulating effect of standing pile exercise. These findings reveal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standing pile exercise in regulating mental state and relieving depression,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uxiliary standing pile exercise robots.

Zhang Jiexin's [12] study further expanded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standing pile exercise in the field of mental health. She conducted a survey on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601 college students and found that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leep quality problems were prevalent among this group. Subsequently, she adopted standing pile exercise as an intervention and observed the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ven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tanding pile exercise training could significantly alleviat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improve sleep quali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this intervention effect was not affected by gender. This study not only confirmed the wide applicability of standing pile exercise in improving mental health, but also provided strong support for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uxiliary standing pile exercise robot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ang Fan's [13]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ai Chi standing pile exercise on motor dysfunction and intestinal flora in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In the study,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Tai Chi standing pile exercise group (33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33 cases). During the clinical observation period, 1 case of dropout and 1 case of exclusion occurred in the Tai Chi standing pile exercise group, while 2 cases of exclusion and 1 case of dropout were reported in the control group. A total of 61 subjects completed the trial, including 31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30 in the control group.

Both groups of subjects received conventional rehabilitation therapies, such as physical therapy, occupational therapy and physical modalities. On this basis, the control group was additionally given walking training once a day for 30 minutes per session, with the intervention lasting for 8 weeks. The training program included warm-up, walking practice, rest and relaxation exercis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Tai Chi standing pile exercise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rehabilitation therapy and walking training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rehabilitation therapy could effectively improve limb motor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and enhance their daily activity ability and balance ability.

Feng Lin's [14] study adopted surface electromyography (sEMG) technology to explore in depth the effect of Tai Chi standing pile exercise on fall risk in patients in the recovery phase of stroke. A total of 72 stroke patients were recruited in the study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treatment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gender, age, disease duration, stroke type and hemiplegic side.

Both groups received routine medical management and daily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On this basis,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additionally given a 16-week Tai Chi standing pile exercise intervention, 30 minutes per session and twice a day. The results evaluated by rehabilitation physicians showed that Tai Chi standing pile exercise could not only improve the fall prevention ability of stroke patients, but also further enhance their balance ability and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 ability, which has significant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Xu Xiaodong[15] conducted a study on the effect of Tai Chi standing pile exercise on balance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after stroke. In this study, 30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after strok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rehabilitation group and the Tai Chi standing pile exercise group. The rehabilitation group consisted of 40 patients, including 16 males and 24 females; the group included 18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and 22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The patients were aged 36 to 65 years, with a mean age of 48.23 years; the disease duration ranged from 14 to 90 days, with a mean duration of 45.21 days. The Tai Chi standing pile exercise group also comprised 40 patients, including 22 males and 18 females; the group included 14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and 26 patien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The patients in this group were aged 38 to 71 years, with a mean age of 60.14 years; the disease duration ranged from 14 to 90 days, with a mean duration of 47.34 day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dicating good comparability.

In terms of treatment, both groups received basic treatment, including blood pressure and blood lipid control as well as prevention of complications. The treatment regimen for the rehabilitation group mainly included physical therapy (such as bridge exercise, bed turning training, sitting balance training, standing balance training and

walking training) and occupational therapy (such as ergometer training, affected-side weight-bearing training, step climbing and descending exercise, and walking in parallel bars). On the basis of basic treatment, the Tai Chi standing pile exercise group additionally received Tai Chi standing pile exercise train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erg Balance Scale (BBS) scores of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training. However, the scores of the Tai Chi standing pile exercis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rehabilitation group after training. In addition, the Tai Chi standing pile exercise group also showed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the muscle strength effective rates of the quadriceps femoris and tibialis anterior. Specifically, the effective rate of quadriceps femoris muscle strength in the Tai Chi standing pile exercise group reached 90.0%, compared with 70.0% in the rehabilitation group; in terms of tibialis anterior muscle strength, the effective rate was 90.0% in the Tai Chi standing pile exercise group, but only 50.0% in the rehabilitation group. These differences were al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dicating that Tai Chi standing pile exercise has a better effect on improving balance dysfunction and muscle strength in patients with hemiplegia after stroke.

4. Robot Design

This project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public-oriented zhuanggong robot. Targeting the three major challenges faced by zhuanggong robots, the research is carried out in three aspects: the hardware structure of the zhuanggong robot, the standardized zhuanggong practice system, and the exercise intensity monitoring softw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scipline, this project further explores the health-promoting effects of zhuanggong, and designs and develops a robot system specially tailored for zhuanggong practice. The system is intended to assist exercise, generate personalized exercise prescriptions, improve public physical health, and promot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the system will be verified through scientific evaluation, providing the public with an innovative health promotion tool. It is expected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fields such as fitness training, sports rehabilitation, and exercise prescription, so as to meet people's growing health needs and provide support for their healthy development.

To achieve the above objectives, this project focuses on hardware design and software design.

The hardware design is divided into 6 components in total, as shown in Figure 3:(1) One set of head-mounted Bluetooth electroencephalogram (EEG) signal receiver with a pair of earphones.(2) Two biceps femoris arm bands (one for each side).(3) Two wrist bands (one for each side).(4) One waist and abdomen belt.(5) Two muscle bands for th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thigh muscles (one for each side).(6) One human body analyzer (main controll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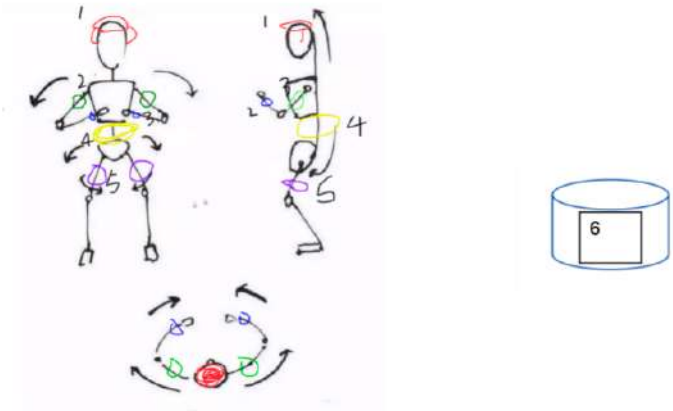


图 3

Figure 3.

The level sensors of each module conduct real-time monitoring of the robot's posture. When a deviation from the preset posture is detected, the system will automatically adjust the robot's motion components to restore it to the correct posture (Figure 4).

Among these parameters， a is a fixed value， $c = b \cdot \sin(\alpha)$， $h = a + b \cdot \sin(\alpha)$。 Both a and b are known parameters; A time-of-flight (TOF) sensor is integrated into the waist belt, which is mounted on the rear part of the belt and can directly measure the distance to the grou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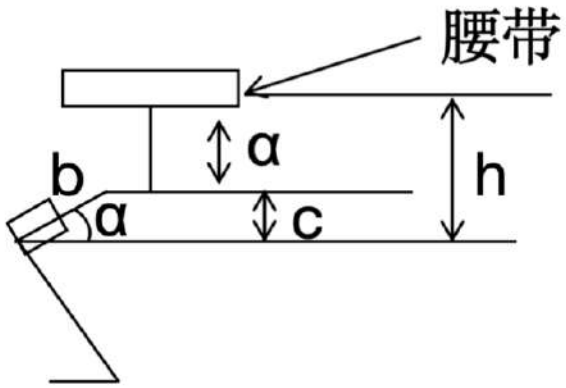


图 4

Figure 4

Force sensors are used to detect the force exerted by practitioners on the robot. According to the preset force curve or user-defined force mode, the robot is controlled to apply a corresponding reaction force to the practitioners, helping them better perceive the force variations during zhuanggong practice (Figure 5).。 $x = a + x_1$， $x_1 = 2 \cdot b \cdot \sin\left(\frac{\beta}{2}\right)$， $x = a + 2 \cdot b \cdot \sin\left(\frac{\beta}{2}\right)$， $\beta = \sum_{i=1}^{n} \cdot b \cdot \sin(r_i) + \sum_{i=1}^{n} \cdot b \cdot \cos(P_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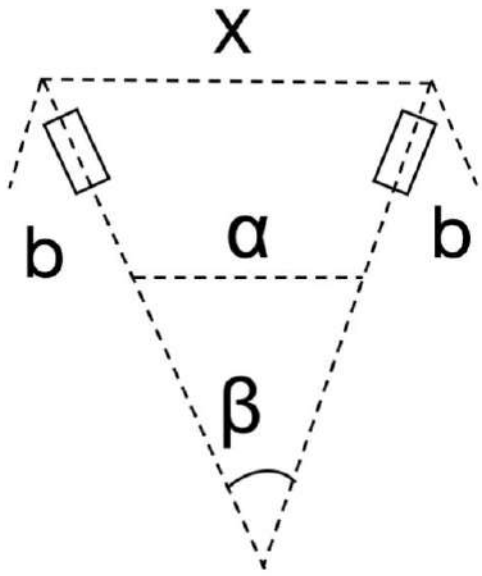


图 5

Figure 5

Pilot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Protocol for the Effects of Assistive Three-Oscillation Robot on Lower Limb Muscle Function and Balance Ability of the Elderly in Long-Term Care Settings

4.1 Design

A two-arm, parallel-group, superiority-designe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Figure 6).

4.2 Setting and Participants

Recruit 120 eligible elderly individuals (age ≥ 65 years, MMSE score ≥ 24, able to stand independently for ≥ 1 minute) from two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in China.

4.3 Intervention

Participants are randomly assigned in a 1:1 ratio to:

Robot-Assisted Three-Oscillation Group: Receive training using the "Balance-Assisted Three-Oscillation" robot system.

Conventional Three-Oscillation Group: Complete the same movement sequen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an instructor without equipment assistance.

The training dose is consist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5 days a week, one session in the morning and one in the evening, 5 repetitions per session, 3-5 minutes per repetition, 1-minute interval between repetitions, for a total of 8 weeks.

4.4 Primary Outcome Indicators Functional Endpoint Indicators:

1. Timed Up and Go (TUG) Test time
2. Five-Times Sit-to-Stand (FTSS) Test time
3. Number of repetitions in the 30-Second Sit-to-Stand (30S STS) Test

4.5 Expected Result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Robot-Assisted Three-Oscillation Group will show significantly better improvements in lower limb functional test indicators, and exploratory mechanistic indicators (such as lower limb muscle strength and muscle thickness) will present a positive changing tr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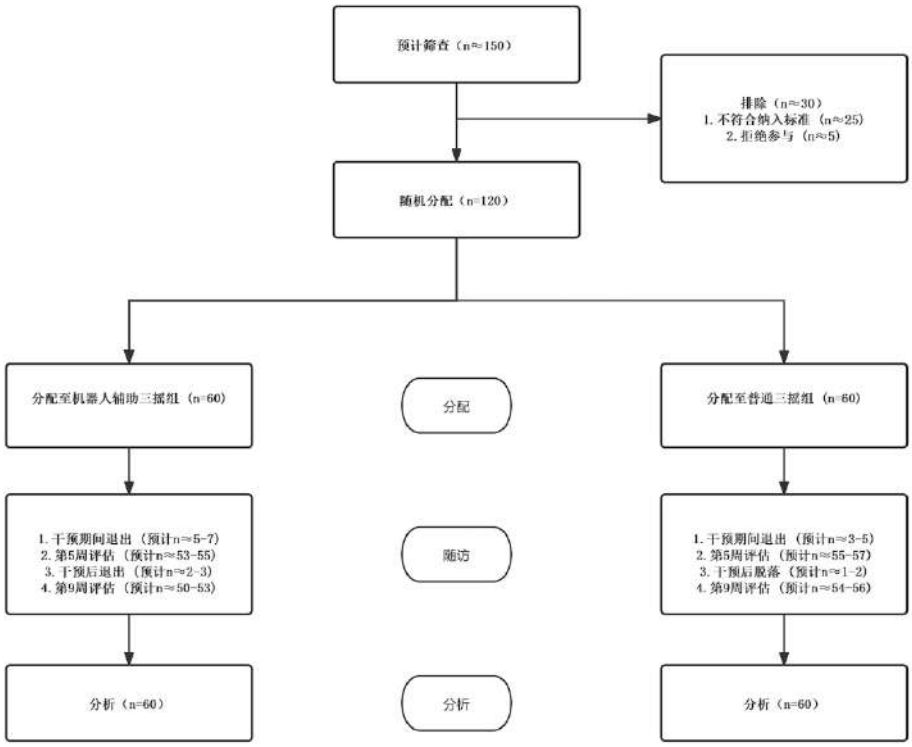


Figure 6

5. Conclusion

If the expected results support the primary hypothesis, it will indicate that integrating robotic assistance into Three-Oscillation Guided Training can more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ower limb functional mobility of the elderly in long-term care. This advantage may stem from three aspects: 1) The precise and adjustable mechanical support provided by the robot allows participants to undertake higher-intensity lower limb load challenges with reduced fear; 2) Standardized movement trajectory guidance may optimize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of neuromuscular control; 3) Real-time feedback enhances training motivation and movement quality. If the exploratory indicators show positive changes in muscle strength and muscle structure, it will provide potential physiological mechanism explanations for the functional improvements. This study will be the first to provide high-level evid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robot-assisted Tai Chi-derived training in improving the lower limb function of institutionalized elderly individuals.

Reference

[1] 范学峰(2015). **颈肩痛的健身气功康复方法探讨**[D]. 武汉体育学院.

[2] 邓倩, 董科男(2022). 健身气功运动处方对大学生颈椎病的干预探析[C]//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第十二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专题报告(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分会).** 武汉军理工学院体育学院; 2022:3. DOI: 10.26914/c.cnkihy.003744.

[3] 王奇, 张晓玲, 郭运华等(2023). 巴针联合无极桩功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临床疗效观察[J].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 18(07):1457-1461+1470. DOI: 10.13935/j.cnki.sjzx.230733.

[4] 杨慈蓉(2020). 站桩功对冰壶项目运动员膝踝关节慢性劳损的康复效果[J]. *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 38(05):1-7.

[5] 陈悦(2019). 应用生物力学信息分析站桩功调节脊柱-平衡的效应[D]. 北京中医药大学. DOI: 10.26973/d.cnki.gbjzu.2019.000025.

[6] 尚芳如(2018). 改良式“贴墙站桩”锻炼对改善青少年脊柱侧弯及基本姿态的疗效分析[C]//中国生理学会运动生理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体育大学. **2018 年中国生理学会运动生理学专业委员会会议暨“科技创新与运动生理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成都体育学院:1.

[7] 秦芳芳(2016). 太极拳泽园桩对小学生注意力稳定性的影响实验研究[J]. *当代体育科技*. 6(35):95-97. DOI: 10.16655/j.cnki.2095-2813.2016.35.095.

[8] 方超(2014). 养生桩对轻中度高血压病的干预研究[D]. 北京体育大学.

[9] 吕明, 吕艳明, 张光明等(2017). 太极桩功锻炼对失眠的疗效观察[J]. *吉林中医药*, 37(04):367-369. DOI: 10.13463/j.cnki.jlzyy.2017.04.013.

[10]江汇滨, 葛钧天, 白奕民(2023). 太极站桩对抑郁焦虑情绪改善的随机机制探讨[C]//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第十三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集——墙报交流(运动心理分会)(二)**. 北京体育大学,2023:3. DOI: 10.26914/c.cnkihy.2023.080607.

[11] 郭郁(2019). **三圆式站桩功“调心”效应缓解抑郁状态的生理及基因表达机制研究**[D]. 北京中医药大学.

[12] 张浩心(2018). 应用量表调查大学生抑郁状态、焦虑状态和睡眠质量状况及站桩功干预研究[D]. 北京中医药大学. DOI: 10.26973/d.cnki.gbjzu.2018.000001.

[13] 王悦(2023). 太极桩功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运动功能障碍及肠道菌群的影响研究[C]//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第十三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集——墙报交流(运动医学分会)(一). 哈尔滨体育学院, 2023:3. DOI: 10.26914/c.cnkihy.2023.076771.

[14] 冯琳, 李丽, 杨慧馨等(2023). 基于表面肌电图探讨太极桩功对脑卒中恢复期患者跌倒风险的影响[C]//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第十三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集——书面交流(运动医学分会).** 哈尔滨体育学院;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23:2. DOI: 10.26914/c.cnkihy.2023.085440.

[15] 许晓冬, 白品, 张洪丽等(2014). 太极桩功对中风后偏瘫平衡功能障碍患者的影响[J]. *河北中医*, 2014, 36(08):1149-1150+1198.

“入古出新”——浅析孙其峰先生的艺术风格及影响

"Entering the Ancient and Emerging the New" - A Brief Analysis of Mr. Sun Qifeng's Artistic Style and Influence

孔翔宇 泰国格乐大学国际艺术学院 邮箱：1571995641@qq.com

Kong Xiang-Yu,International College,Krirk University, Thailand. Email:1571995641@qq.com

摘要：孙其峰先生是中国著名书画家、篆刻家、理论家。是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中国书画印教学的探求者和实践者。在多个艺术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本文将分析孙其峰先生的艺术风格，剖析其艺术风格成因。研究其在书画印艺术及艺术教育领域的继承与创新、成就和影响对当代书画印论的学习和教育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孙其峰，艺术风格，风格成因，继承与创新，影响

Abstract:

Mr. Sun Qifeng is a renowned Chinese painter, seal engraver and theorist. H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ounders of the Chinese Painting College of 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and an explorer and practitioner of Chinese painting, calligraphy and seal engraving teaching. He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multiple art fields.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Mr. Sun Qifeng's artistic style and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its formation. Studying hi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and influence in the fields of Chinese painting, calligraphy and seal engraving art and art education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learning and education in these areas.

Keywords: Sun Qifeng, artistic style, causes of styl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fluence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孙其峰先生(1920 年 3 月 10 日—2023 年 3 月 20 日),汉族,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写意花鸟画的领军人物”、著名书画家、篆刻家、理论家、美术教育家。自幼受家庭艺术氛围熏陶，7 岁开始习字，12 岁接触绘画。1944 年,进入北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学习。对花鸟、山水画、书法篆刻、理论等进行了系统的学习。1952 年起长期担任天津美术学院系主任、副院长等职。推动中国画教学体系建设。曾任中国美协理事、中国书协理事、西泠印社理事。也是集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西泠印社终身成就奖、天津美院美术教育终身成就奖、中国造型艺术终身成就奖等多项殊荣于一身的书画大家。

代表作品《白鹰》、《梅枝栖禽》、《山花烂漫》、《春江水暖》、《俏不争春》、《一击万里》等。曾赴世界多地举办展览，促进国际艺术交流。

1.2 研究方法与目的

笔者运用文献分析法、个案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研究孙其峰先生艺术风格及其影响、贡献。

1. 研究孙其峰先生书画印的艺术风格，揭示其艺术风格的成因
2. 探索孙其峰先生的学艺经历、艺术成就和影响
3. 通过研究孙其峰先生的学艺经历,得到对自身学习书画篆刻艺术的启发。

2. 研究意义

传统与创新的融合典范；研究他的创作实践，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艺术在现代语境下的传承与创新路径，为当代艺术家提供借鉴。深入理解中国画笔墨的内在规律和表现潜力，以及如何在传统笔墨基础上进行个性化表达，促进中国画笔墨语言在当代的发展。

美术教育板块;学习其教学方法。对了解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有一定帮助。以及如何培养具有传统功底和创新精神的艺术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对当代艺术教育有重要启发作用。

文化自信与民族精神的体现：他的艺术成就和人生经历，为当代社会提供了精神榜样，激励人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跨学科研究的价值：研究他的艺术，可以促进美术学、书法学、篆刻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艺术研究的新视角。

中国现当代艺术史的缩影：孙其峰先生的艺术生涯跨越了近百年。见证了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他的作品和经历反映了不同时期的艺术思潮、社会变迁和文化氛围，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案例。

3. 孙其峰先生的艺术风格

3.1 绘画风格

孙其峰的绘画深受中国古典绘画影响，注重对古代经典作品的学习与传承。他广泛临摹历代名家作品，深入研究传统笔墨技法、构图法则和意境营造，将文人画的精髓融入创作中，使作品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笔墨灵动精妙：他以书法入画，线条刚柔并济、疏密得当，既能精准勾勒物象形态，又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在花鸟画中，他通过简练而富于表现力的笔墨,寥寥数笔,便可捕捉到鸟类的动态和神韵;在山水画中，皴法运用自如，通过不同的用笔、用墨层次表现出山石的质感和空间感。

中西融合创新:孙其峰先生大胆吸收西画元素,是在继承传统的进行的。如注重造型的准确性、写生的生动性等。他把西画的写实技法与国画的写意精神相融合,使作品既保留了中国画的神彩,又不失现代气息。

构图巧妙新颖：擅长运用疏密、虚实、主次、争让、对比等构图方式。打破传统构图的束缚，营造出富有韵律感的画面。

意境清新自然：孙其峰先生的绘画注重意境的营造，善于观察和感悟自然物象。他的花鸟画清新淡雅，画鸟灵动活泼，山水画雄浑大气，传递出一种宁静、和谐的美感,让观者在欣赏作品的同时,感受到了生机勃勃的生活气息。

3.2 书法风格

隶书古朴洒脱：孙其峰的隶书独具特色，他博采汉碑北碑,早年临习《史晨碑》、《礼器碑》、《鲜于璜碑》，之后学习《居延汉简》《武威汉简》等出土简牍。采取去粗取精的办法,将汉简的笔意融入汉碑中。形成浑厚雄健、古朴洒脱之风。其隶书作品不仅保留了汉隶的古朴韵味,而且融入了自然清新的汉简气息。笔法多变，结构严谨，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

行草书典雅纵逸：他的行草书宗取张旭、黄庭坚笔意，笔势飞动而不失法度，线条遒劲有力，以画入书、笔势连贯而又各自独立,字虽断而意连,彼此呼应。显示出一种流畅之美。其行草书作品,既有古韵,又不失时代气息及审美情趣。

篆书古朴雄浑：孙其峰的篆书摈弃了追求了大写意的特点。取法多种前人篆书，受清代篆书家启迪，古拙雄浑。其篆书作品反映出对传统篆书艺术的深刻认识。透露着对篆书艺术的精到把握。

3.3 篆刻风格

3.3.1 传统根基与创新精神

取法高古：孙其峰的篆刻以秦汉印章为根基，深研战国古玺、秦汉官私印的章法、刀法和文字结构，汲取其古朴雄浑、大气磅礴的风格。同时，他对商周金文等古文字也进行过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篆刻创作文字资源。

融合创新：他不局限于传统范式，在篆刻中融入绘画的构图原理和书法的笔意。形成独特的艺术语言。例如，他在印章章法上运用疏密、虚实、呼应的方法。使方寸之间充满韵律。体现了“画印”与“印从书出”的理念。

3.3.2 创作态度与技法特点

严谨认真：孙其峰对待篆刻创作极为严谨,反复构思、琢磨,印稿往往画上几十遍,直到达到满意的效果才动刀镌刻。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保证了高品质的作品。

刀法灵动：其刀法既有秦汉印的古朴厚重,又有灵动洒脱。通过不同的刀法表现线条的粗细、轻重、缓急，使印章线条富有变化和表现力，既有金石味，又具书写性。

3.3.3 风格特色与艺术表现

古玺：其古玺风格的印章气息高古，朴茂苍浑，文字结构自由灵动，章法错落有致，展现出战国古玺的神秘与古朴之美。

肖形印创作：孙其峰的肖形印造型生动有趣，栩栩如生，将绘画的造型能力和篆刻的刀法技巧相结合，以简洁的线条和生动的形态表现动物等形象，充满艺术感染力。

个性表达：他的篆刻作品不囿于前人窠臼，力求形成自家风貌。通过独特的文字处理、章法布局和刀法运用，抒发个人艺术情感与美学追求。

孙其峰先生晚年在作品上钤盖的印章均为自己所刻，使其作品风格统一。他的篆刻与书画风格相互呼应、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艺术作品。印玺不只是作为书画作品的点缀之用。更成为艺术整体表达的重要内容。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文化内涵得到了加强。

孙其峰先生的篆刻艺术反映了他对传统篆刻艺术的深刻认识和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对发展当代篆刻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迪作用。

4.孙其峰先生艺术风格成因

4.1 传统继承

笔墨根基:孙其峰早年受教于徐悲鸿、黄宾虹、李可染等大家，系统学习传统笔墨技法。他精研历代花鸟画大家作品，如八大山人、徐渭、石涛等，尤其擅长以简洁灵动的线条勾勒物象，中锋、侧锋运用自如，既保留了中国画传统的神韵,又与现代审美融为一体。

书画同源:他强调“以书入画”，将书法的笔法、结构融入绘画，使线条更具表现力和节奏感。其书法精通行、草、隶、篆，风格苍劲浑厚，与绘画相得益彰。

题材与意境:孙其峰常以传统花鸟题材入画，如仙鹤、雄鹰、松竹梅等，这些题材承载着吉祥、长寿等文化寓意。他在创作中坚守传统意境，通过笔墨传达对自然、生命的赞美，如《鹤寿》中仙鹤的优雅姿态与空灵意境，延续了传统花鸟画的审美精神。

4.2 创新实践

写生与造型是受徐悲鸿《写实论》影响。孙其峰注重写生，将西画的造型观念融入中国画创作中。他通过对自然物象的观察,提炼出凝练生动的形态。使作品更具现代感和真实感，达到主客观的统一。例如《春意初浓》中飞鸟的动态捕捉，展现了他对写生的深刻理解。

构图与形式：他对传统花鸟画的构图方式进行了突破。采用简洁、开放的布局，强调画面的视觉张力。如《一击万里》中苍鹰与松枝的动静对比，以及《飞鸟出林图》中对空间的巧妙处理，使画面更具现代审美意趣。

色彩的运用：孙其峰在国画设色上推陈出新。融合传统水墨与现代色彩观念。他善于运用淡墨渲染与干墨皴擦相结合的手法，营造出极富诗意的氛围。同时，他对宣纸、毛笔等传统材质的特性有深入研究，通过材质的特性表达情感与意境。

作为天津美院终身教授,孙其峰结合了传统技法与现代绘画理念相结合的思想。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推动了中国画教育的现代化转型。

4.3 艺术理念

孙先生曾提出强调传统与创新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结合时代精神与个人感悟，形成独特的艺术语言。其作品在保留中国画笔墨精髓的同时,又融入了现代审美。对当代中国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4.4 对工具材料的合理运用

孙其峰先生作画非常讲究，善于使用不同的工具材料，根据毛笔笔毫的不同种类、笔锋的不同长度、宣纸的不同纸性，表现不同的绘画题材和物象。比如：用狼毫画山石、竹子，用兼毫设色，用羊毫画花头、花瓣，用秃笔点苔点。用熟宣纸画工笔、没骨画，用偏生的纸画小写意等。充分体现其对书画创作精益求精的态度。

5. 艺术成就、影响及贡献

5.1 艺术成就

孙其峰先生是国内唯一一位集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西泠印社终身成就奖、天津美院美术教育终身成就奖、中国造型艺术终身成就奖等多项殊荣于一身的书画大家。

作品被中国艺术博物馆博物馆等机构收藏。艺术成就载入权威典籍,如《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现代中国美术大全》等。

5.1 教育贡献

编著《花鸟画技法》《孙其峰画集》《花鸟画谱》等教材，开创美院中国画教学新模式，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广纳时贤。在中国画教育方面，先后聘请了李苦禅、李鹤筹、蒋兆和、溥雪斋、溥松窗、叶浅予等名师来学校开展教学。多次邀请京津冀中国画名家来津任职、授课。促进学校青年教师团队发展。与李鹤筹、张其翼、王雪涛、溥佐、萧朗等大家一同组成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教学学脉传承与文化精神谱系。打造了一支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深远影响的当代中国画坛艺术

家。把天津美院推向中国画教学的重镇。为天津美院高等美术教育打下了深厚而宽广的学术基础。中国画实力处于八大美院领先地位。

孙先生的教育理念倡导“师古人更要师造化”，强调传统与创新结合，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如何家英、贾广健、白庚延、霍春阳、孙伯翔、刘万鸣、刘文生、方楚雄等众多名震全国、蜚声国际的书画家。

据孙其峰先生的第一位花鸟画研究生、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刘文生老师说:“孙其峰先生非常重视天津美术学院书法专业的建设，并指出书法专业的学生不能只写书法，一定要书画齐头并进!”此后天津美院书法专业自 2004 年首次招收书法专业本科生以来的 10 余年间，校考考试科目中除了书法临摹和创作以外，还有素描、速写、国画等考试科目。书法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也有近一半是国画必修课程。

孙其峰一生践行“知足、知不足、不知足”的人生哲学，以谦逊、勤奋和创新精神，为中国的书画艺术传承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家、教育家。

6.研究结果

孙其峰先生的艺术生涯和学习经验为后人提供了诸多启发:

坚持与热爱:孙其峰先生自幼对艺术充满热爱，尽管当时生活条件艰苦、学习机会有限，但他一直没有放弃书画的学习。他通过自学,临摹,观察生活,不断地积累经验。最终成为一代书画大家。这启发我们,不管环境多么艰苦。对学习的热爱和坚持是成功的关键。

博采众长与融会贯通:孙先生广泛学习传统书画技法，兼收并蓄中西艺术元素，将书法、绘画、篆刻相互融合。例如，其隶书以《汉碑》为底本,融汉简意趣于一体;草书结合绘画线条的韵律，以画入书，形成独特风格。这表明，学习应打破门类界限，从不同领域汲取营养，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

注重基础与深入钻研:孙其峰强调基础训练的重要性，如书法的笔法、绘画的造型等。他通过长期临摹经典作品，深入研究笔法、结构、章法等要素。逐步掌握艺术规律。同时，他主张“举一反三”，通过对典型范例的深入钻研，触类旁通，提高学习效率。

理论与实践结合:他不仅注重实践创作，还深入研究艺术理论，如“形神关系”“笔墨意趣”等。他认为“法”是手段,“理”是本质，只有理解艺术原理，才能更好地运用技法。这提醒我们，学习应兼顾理论与实践，通过理论指导实践。

创新与传承并重：孙其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提出了“不求形似，不离形似，貌合神离，似非而是”的创作思路。既尊重传统，又追求个性表达。他鼓励学习者在传承中创新，形成自己的艺术语言，避免因循守旧或盲目求新。

终身学习和自我反省：他一生都保持着对学习的热忱。即使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仍然在速写本上画着构图，仍然在不断地对新的艺术形式进行探索。他主张“知足常乐，知不足而不知足”的人生哲理。既满足于生活的简朴，又不断反思自己的不足之处，追求艺术的更高境界。这启示我们，艺术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应保持谦逊和进取的心态。

孙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德艺双馨的全才型艺术家，孙先生的学习经验告诉我们，学艺要先学做人，艺术学习不仅是技巧的积累，更是对生活、对传统的深刻理解和感悟。要终身学习，通过坚持、创新、融会贯通，才可以在学习中不断成长，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正如母校校训：崇德尚艺、励学力行！

参考文献：

[1]孙其峰（2019）。坚定文化自信 书写时代之光。人民日报

[2]贾广健（2023）。孙其峰先生的艺术成就与贡献。**天津美术学院**

[3]杨德树 陈福春（2013）。论孙其峰先生的书法艺术成就及其境界。北方美术

[4]杨健君（2014）。浅论孙其峰书法。天津美术学院学报

[5]李鸿鹤 段彦彦（2019）。刘文生教授谈孙其峰先生的艺术教育。**天津美术学院学报**

[6]朱友舟（2013）。中国古代毛笔研究。荣宝斋出版社

[7]张小庄（2014）。孙其峰先生绘画思想浅识。天津美术学院学报

[8]邵佩英（2024）。略论孙其峰先生艺品与人品。大学书法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the Evolution of Yao Dance Forms: A Study on Cultural Adaptation Mechanisms

Yang Zhang, International College, Krirk University, ThailandEmail: 15992616@qq.com

Abstract: Under accelerating processe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raditional ethnic dances are undergoing continuous adjustment and reconstruction. As a representative form of ethnic dance in southern China, Yao dance reflects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Focusing on typical Yao communities in southern China, this study adopts an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combining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cultural context, and dance form analysis.

Drawing on long-term field observations and dance morphology data, the findings reveal a clear stage-based evolution of Yao dance, characterized by a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maintenance to adaptive transition and further to integrative innovation. Changes are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movement complexity, spatial uti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function. Meanwhile, different communities demonstrate diverse cultural response strategies, including conservative maintenance, selective absorption, and integrative innovation.

These findings highlight that environmental change functions not only as an external pressure, but also as a conditional catalyst shaping culturally differentiated adaptation pathways. By conceptualizing ethnic dance as a dynamic and adaptive cultural practice,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broader discussions on cultural sustainability and heritage preservation in changing environments.

Keywords: Environmental change, Yao dance, Dance form evolution, Cultural adaptation, Ethnic cultural heritage

1. Introduction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have become defining features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development. Processes such as urbanization,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changes in livelihood patterns continuously reshape the contexts in which traditional cultures are practiced and transmitted.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environmental and climate-related pressures often trigger cultural reorganization and adaptive transformation, rather than simple cultural decline (Templon et al., 2021).

Dance, as a form of embodied cultural expression, is particularly sensitive to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hange. Unlike 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dance relies on living communities, ritual contexts, and embodied transmission processes, making it especially responsive to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space (Fink et al., 2021; Harris, 2024). As a result, dance forms often serve as visible indicators of deeper processes of cultural adaptation.

The Yao ethnic group, widely distributed in southern China, possesses a rich tradition of dance closely connected to ritual activities, communal life, and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Traditionally, Yao dance functioned a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religious expression, social cohes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However, in recent decades, Yao communities have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hanges, including expanding urban influence,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the growth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Similar dynamics have been observed in other ethnic dance traditions under modernization pressures (Liu et al., 2024).

Although existing studies have documented various aspects of ethnic minority dance, many focus on stylistic description or cultural symbolism, while paying limited attention to long-term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 under environmental change. Moreover, the adaptive strategies adopted by local communities are often underexplored, particularly from a comparative and stage-based perspective (Chamba Nana, 2024).

To address these limitation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Yao dance fo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daptation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A structured analytical strategy combining long-term field data,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and stage-based comparative analysis is adopted (see Tables 1–3). By doing so, the study aims to reveal how environmental change interacts with cultural context to shape the adaptive transformation of ethnic dance.

2. Literature Review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2.1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Environmental change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as a fundamental force shaping cultural systems and social practices. Rather than viewing cultural change as a passive response to external stress, recent studies emphasize adaptation as a dynamic process involving selection, adjustment, and innovation (Templon et al., 2021). From this perspectiv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reflects both environmental pressure and human agenc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factors such as urbanization,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labor migration have significantly altered traditional cultural environments. These processes often weaken ritual continuity while simultaneously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cultural reinterpretation and hybridization (Liu et al., 2024; Chamba Nana, 2024). Within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adaptive capacity is increasingly regarded as a key indicator of cultural resilience (Mansouri & Elias, 2025).

2.2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ance Forms

Dance occupies a unique position within cultural systems as an embodied and performative form of expression. Changes in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ontexts are often directly reflected in movement structure,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performance function (Fink et al., 2021). In many cas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ritual-based performance to stage-oriented presentation mirrors broader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 (Harris, 2024).

Previous research also suggests that modernization reshapes dance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replacing oral and ritual transmission with institutionalized teaching and public performance. While such shifts may enhance visibility and accessibility, they

also raise concerns regarding cultural simplification and symbolic reduction (Liu et al., 2024).

2.3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above literature, this study adopts an integrated analytical framework linking environmental change, cultural context, and dance form evolution. Environmental change is conceptualized as a combination of natural and social factors, while cultural context refers to shared values, identity, belief systems, and community cohesion.

Within this framework, dance form is analyzed through observable dimensions including movement structure, spatial utilization, performance function, and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This framework provides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 for the empirical analysis presented in Sections 3 and 4, where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dance form indicators, and stage-based patterns are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see Figure 1 and Tables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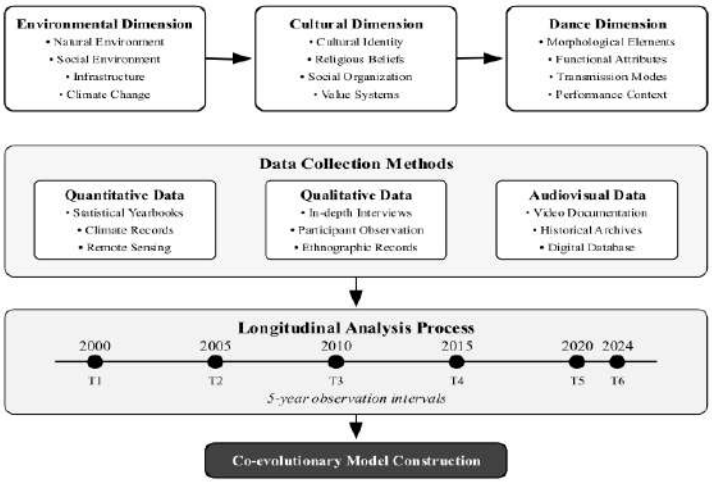


Figure 1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Culture, and Dance Form Evolution

3. Research Design and Data Sources

3.1 Study Area and Research Sample

This study focuses on major Yao ethnic settlement areas in southern China, covering representative communities across different geographical and socio-economic contexts. A multi-site research design was adopted to capture variation in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cultural responses, following established guidelines for comparative cultural research (Page et al., 2021).

Table. 1Study Areas and Sample Distribution

Region	Communities (n)	Altitude (m)	Dance Groups (n)

Guangxi	5	200–1,500	18
Hunan	4	300–1,800	15
Yunnan	4	800–2,200	14
Guangdong	4	150–1,200	13
Guizhou	4	400–1,600	12
Total	**21**	**150–2,200**	**72**

Note: This table summarizes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sample size of Yao dance groups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study areas and the overall sample composition are summarized in Table 1, which demonstrates the multi-regional and comparative design of this research. By incorporating communiti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study ensures analytical representativeness and robustn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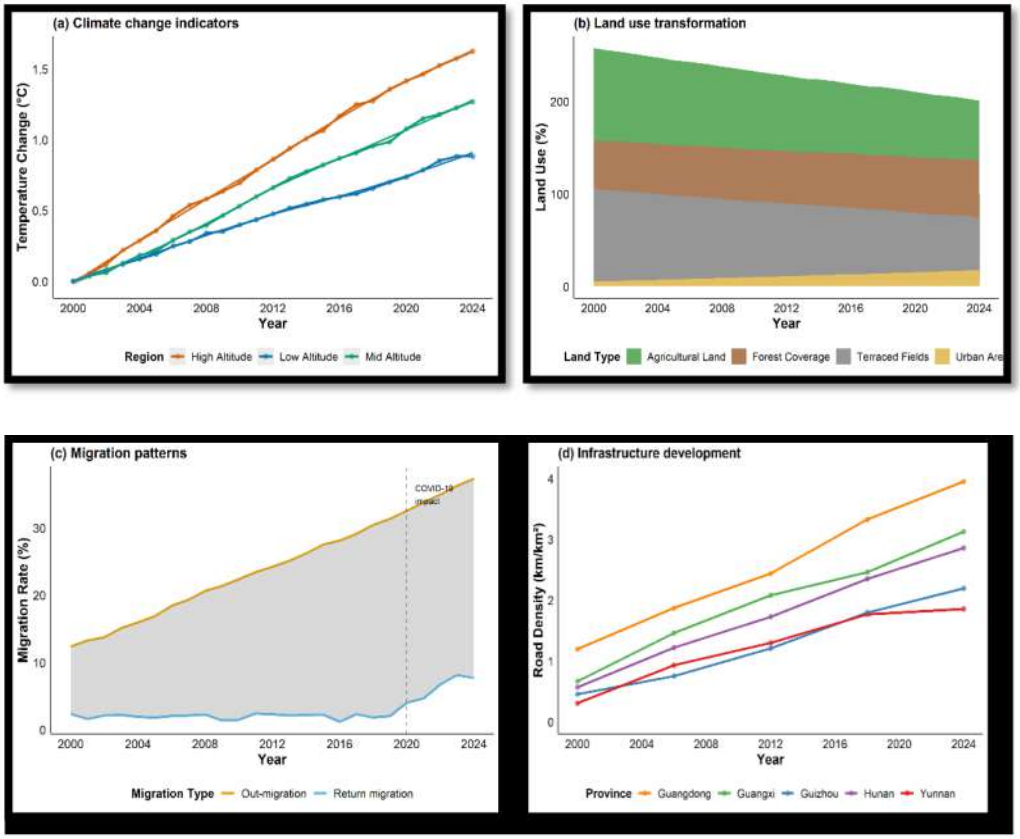


Figure 2Temporal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Yao settlement areas (2000–2024)

3.2 Data Collection

Environmental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official statistical sources and long-term records, including indicators related to climate variation, urban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mobility (Xiao & Watson, 2019).

Table. 2Key Environmental and Dance Form Variables

Dimension	Category	Indicators	Data Type

Environmental	Natural	Temperature change, precipitation, altitude	Continuous
Environmental	Social	Urbanization rate, population mobility	Continuous
Cultural	Community	Ritual participation, language use	Ordinal
Dance Form	Movement	Movement complexity, vocabulary size	Index
Dance Form	Space	Spatial utilization, formation diversity	Index
Dance Form	Function	Ritual vs. stage performance	Categorical

Note: Only core variables directly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dance form evolution are retained in the conference version.

Dance-related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long-term field observation, systematic documentation of dance practice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practitioners and community members. The core environmental and dance form variables retained for the conference version are listed in Table 2, ensuring analytical focus while maintaining theoretical completen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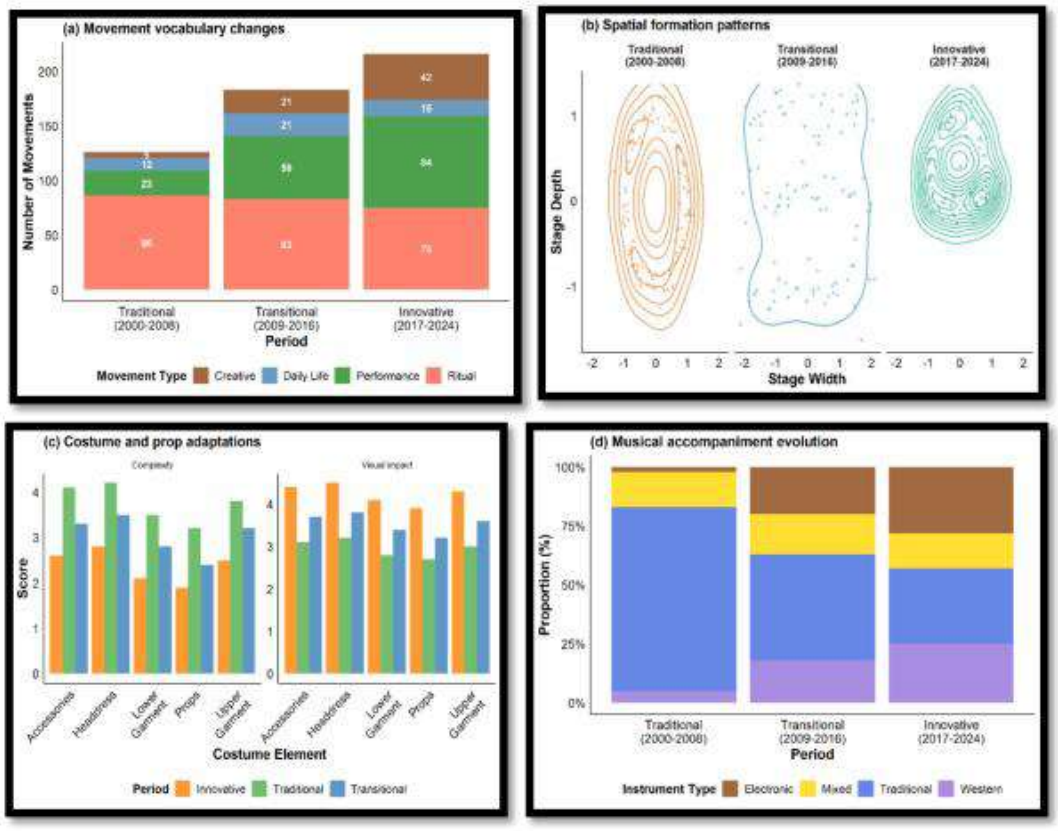


Figure 3 Multi-dimensional evolution of Yao dance forms across developmental stages

3.3 Analytical Strategy

The study adopts a stage-based analytical strategy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dance form evolution. Rather than assuming linear change, the analysis allows for nonlinear and context-dependent pattern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research on cultural adaptation processes (Templon et al., 2021).

Dance form evolution is examined across key dimensions including movement complexity, spatial uti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function. Qualitative interview data are used to interpret community perceptions and adaptive choices, while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support comparative stage differenti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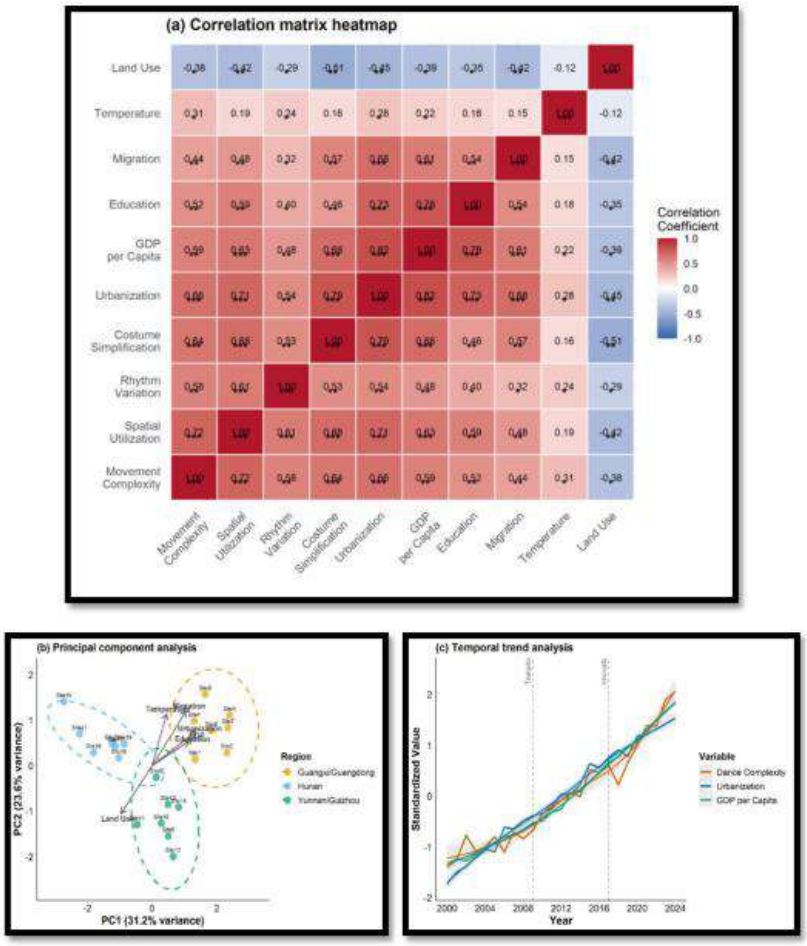


Figure 4 Corre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Yao dance form transformation

3.4 Research Reliability and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o enhance research reliability, multiple data sources were cross-validated through triangulation. Observational records, interview narratives, and environmental data were compared to ensure consistency and analytical credibility. Ethical considerations were addressed through informed consent and respect for local cultural norms, particularly in relation to ritual practices and community knowledge. Such ethical awareness is essential in research involving living cultural heritage and minority communities (Reshma et al., 2023).

4. Results

4.1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Yao Settlement Area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Yao settlement areas have experienced substantial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ver the past decades. Soci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particularly urban expansion and population mobility, have played a prominent role in reshaping local cultural contexts, a pattern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studies on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Templon et al., 2021).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environmental changes are further illustrated in Figure 2, providing a visual overview of variation across regions and periods.

4.2 Stage-Based Evolution of Yao Dance Forms

Corresponding to environmental transformation, Yao dance forms exhibit a clear stage-based pattern of evolution. Based on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evolution of Yao danc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raditional maintenance, adaptive transition, and integrative innovation.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tage are summarized in Table 3, while Figure 3 visualizes the multi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of movement structure, spatial uti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function across stages. This stage-based pattern supports arguments that cultural change often unfolds through identifiable phases rather than continuous linear trajectories (Liu et al., 2024).

Table. 3 Stage-Based Evolution of Yao Dance Forms

Stage	Time Period	Environmental Context	Dance Characteristics	Performance Function
Traditional Maintenance	Before 2005	Low urban influence, stable community structure	Stable movement patterns, strong ritual symbolism	Ritual ceremonies, community cohesion
Adaptive Transition	2005–2015	Increasing mobility, early urban expansion	Modified movements, expanded spatial use	Ritual and semi-public performances
Integrative Innovation	After 2015	High urban influence, tourism development	Increased complexity, hybrid forms	Stage performance, cultural display

Note: The stage division is based on combined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dicators and observed transformations in dance form and performance context.

4.3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Dance Transformation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Yao dance forms is neither linear nor uniform, but instead exhibits clear stage-based and con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As shown by the comparative

results, moderate levels of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hange are often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flexibility and innovation in dance form. During this phase, changes are reflected in greater movement complexity, expanded spatial utilization, and a gradual shift in performance function from strictly ritual contexts toward semi-public and stage-oriented settings. Importantly, these transformations do not necessarily imply the erosion of tradition, but rather represent adaptive reconfigurations within existing cultural frameworks.

However, when external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intensify—particularly under conditions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tourism-driven development—the nature of dance transformation begins to change. In highly interventionist contexts, dance practices tend to display increasing standardization and functional simplification, with a stronger emphasis on visual impact and performative efficiency. Correspondingly, certain ritual meanings and symbolic layers may become compressed or selectively represented. This pattern suggests that environmental change functions simultaneously as a potential catalyst for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when excessive, as a force that may constrain cultural depth.

Overall, these findings support the view that environmental change shapes dance transformation through differentiated pathways mediated by social context and community choice, reinforcing the argument that cultural adaptation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a dynamic and negotiated process rather than a unidirectional outcome of modernization pressures (Templon et al., 2021; Harris, 2024).

Table. 4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Dance Form Changes

Environmental Factor	Direction of Change	Affected Dance Dimension	Observed Pattern
Urbanization	Increasing	Movement structure	Higher complexity and standardization
Population mobility	Increasing	Performance context	Shift from ritual to public/stage settings
Tourism development	Increasing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Visual emphasis, reduced ritual depth
Education expansion	Increasing	Transmission mode	Institutionalized teaching replaces oral transmission
Community stability	Decreasing	Dance function	Decline in purely ritual performances

Note: The relationships summarized in this table are based on integrated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and observed dance form transformations.

5. Discuss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demonstrate that the evolution of Yao dance is neither random nor purely externally driven. Instead, dance transformation reflects a process of

cultural adaptation shap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essure and community agency, a pattern widely discussed in studies of environmental and cultural change (Templon et al., 2021).

The stage-based evolution identified in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emphasizing phase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s shown in Table 3,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maintenance to integrative innovation corresponds closely with changes in soci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consistent with research on cultural adaptation under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Liu et al., 2024; Chamba Nana, 2024).

The differentiated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mmarized in Table 4, further highlight the central role of social environmental change. Urbanization,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reshape performance contexts and aesthetic orientations, often prioritizing visual impact over ritual depth (Harris, 2024).

Importantly, Yao communities do not respond uniformly to these pressures. The typology of cultural adaptation strategies proposed in Table 5 illustrates how conservative maintenance, selective absorption, and integrative innovation coexist under similar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is diversity of responses supports arguments for pluralistic and context-dependent approaches to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heritage preservation (Mansouri & Elias, 2025; Aristidou et al., 2019).

Table. 5 Typology of Cultural Adaptation Strategies in Yao Dance Practices

Adaptation Strategy	Core Features	Typical Context	Potential Risk
Conservative Maintenance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forms and rituals	Remote communities with low external influence	Cultural isolation
Selective Absorption	Limited incorporation of external elements	Semi-urbanized communities	Symbolic dilution
Integrative Innovation	Hybridiz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elements	Tourism-oriented areas	Commercialization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Shift from ritual to performance-oriented use	Urban and educational settings	Loss of ritual meaning

Note: Adaptation strategies are identified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mmunity responses to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hange.

6. Conclusion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evolution of Yao dance forms under conditions of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hange,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cultural adaptation mechanisms. By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with systematic analysis of dance morphology and performance context, the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a growing body of literature that conceptualizes traditional dance as a dynamic and adaptive form of cultural expression (Fink et al., 2021).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Yao dance evolution follows a clear stage-based pattern shaped primarily by soci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cluding urbanization,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s mediated by cultural context and community decision-making, leading to diverse adaptive outcomes (Harris, 2024; Liu et al., 2024).

By foregrounding community agency and adaptive strategy, this study advances discussions on cultural sustainability and heritage governance. Rather than framing change as cultural loss, the results support an understanding of adaptation as an ongoing process of negotiat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consistent with recent perspectives in cultural globalization and diversity governance (Chamba Nana, 2024; Mansouri & Elias, 2025).

Despite its contributions, this conference-oriented study has limitations. Future research may expand comparative scope or employ more detailed statistical modeling, building on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in dance ethnography and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Aristidou et al., 2019). Overall, this research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change as a contextual force shaping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provides implications for the sustainable preservation of ethnic dance traditions.

References

[1]Aristidou, A., Shamir, A., & Chrysanthou, Y. (2019). Digital dance ethnography: Organizing large dance collections. *Journal on Computing and Cultural Heritage*, *12*(4), 1–27.

[2]Chamba Nana, M. F. (2024). Cultural globalisation: From the globalisation of modernity in traditional dances to the practice of hybridisation in contemporary dance in Cameroon. *Atlantic Studies*, *21*(1), 1–25.

[3]Fink, B., Howe, L. J., & Volk, A. A. (2021). Evolution and functions of human dance.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42*(4), 351–360.

[4]Harris, R. (2024). The aesthetics and imaginaries of Uyghur heritage, Chinese tourism, and the dance craz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30*(8), 872–887.

[5]Liu, W., Xue, H., & Wang, Z. Y. (2024).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of intercultural and indigenous cultural dance education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2010–2024).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5*, 1493457.

[6]Mansouri, F., & Elias, A. (2025). Pluralist diversity governance: Deepening the multiculturalism–interculturalism nexus. *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 *13*(1), 23.

[7]Page, M. J., McKenzie, J. E., Bossuyt, P. M., et al. (2021). The PRISMA 2020 statement: An updated guideline for reporting systematic reviews. *BMJ*, *372*, n71.

[8]Templon, A. R., Kirsch, D. R., & Towner, M. C. (2021). Contributions of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to understanding climate-induced human mig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Biology*, *33*(4), e23635.

[9]Xiao, Y., & Watson, M. (2019). Guidance on conducting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39*(1), 93–112.

文化认同理论视域下—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研究

Influence Factors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Yunnan Dian Opera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dentity Theory

作者 1 栾澜 泰国格乐大学国际学院艺术系 邮箱：858374365@qq.com

作者 2 王尚文 泰国格乐大学国际学院艺术系 邮箱：wang.shangwen@krirk.ac.th

Author 1 LuanLan,International College,Krirk University,Thailand.Email:858374365@qq.com

Author 2 Shang-WenWang,International College,Krirk University,Thailand.Emailwang.shangwen@krirk.ac.th

摘要：中国逐渐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在 2008 年开始收录第一批和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云南滇剧便是第二批选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滇剧作为中国地方戏剧戏曲之一，近些年来的创作作品逐渐增多，以传统剧目改编、全新作品创作、增加演出场次、拓宽演出地点等多种方式尝试着创新。

目前学术界有对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作品或现状进行分析。但是对于从文化认同理论基础上探索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的相关学术研究较少；其次，有些学者对其影响因素分析仅作为学术论文中的单一章节阐述，分析不够全面；且在研究方法上，当前学者对此研究的分析多为质性研究方法，缺乏量化研究的相关学术成果。基于此，本研究的研究问题是：1.影响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因素有什么？2.影响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因素与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3.推动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本研究将主要通过量化研究中的问卷调查法，以文化认同理论中的文化因素、语言因素、价值因素作为分析视角，探究影响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因素。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是文化、语言、价值；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是相互交织、互相影响，促进云南滇剧的创新与发展；推动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创新驱动发展。

关键词：云南滇剧，创新发展，文化认同理论

Abstract： After China gradually began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 started to include the first and second batches of national-leve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2008. Yunnan Dian Opera was selected into the second batch of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 As one of China's local operas, Dian Opera has seen a gradual increase in creative works in recent years, experimenting with innovation through various methods such as adapting traditional plays, creating new works, increasing performance frequency, and expanding performance venues.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has analyzed works or current status regard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Yunnan Dian Opera. However, there is limited scholarly exploration examin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of its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dentity theory. Moreover, some scholars' analyses of these factors are confined to single chapters in academic papers, lacking comprehensive coverage. Methodologically, existing studies predominantly employ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es, with insufficient quantitative research achievements. Based on this, the research questions of this study are: 1. What factors influenc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Yunnan Dian Opera? 2. What relationships exist between these influencing factors? 3. What driving mechanisms propel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Yunnan Dian Opera? This study will primarily utilize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pecifically questionnaire surveys, to explore these factors through analytical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elements, linguistic elements, and value elements within cultural identity theory.

The final conclusion is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Yunnan Dian Opera are culture, language and valu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Yunnan Dian Opera is interwoven and mutually influential, which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Yunnan Dian Opera;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Yunnan Dian Opera is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Key words: Yunnan Dian Opera,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Cultural Identity Theory

1.引言

滇剧发源于滇中地区，形成于清代光绪年间，至清末民初臻于成熟。这一时期，滇剧名家辈出、经典纷呈，如瑞兰派创始人李瑞兰等，同时在演进过程中广泛吸收贵州梆子、川剧、汉剧、徽剧等剧种精华，逐步建立起丰富多彩的剧目体系。新中国成立后，滇剧迎来发展鼎盛期，人才与佳作不断涌现。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因国有专业剧团改制合并及多元文化产品冲击，滇剧发展陷入低谷，表现为剧团数量锐减、专业人才断层、观演群体萎缩。

2008 年，滇剧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其保护与传承提供了重要契机。近年来，云南滇剧新创剧目已达十二部，传承者亦积极探索创新路径：设立传习所、借鉴环境戏剧与沉浸式表演模式、推进校企合作育人等。作为一种古老的戏剧艺术形式，滇剧展现出难能可贵的发展活力，也为相关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视角。

故本研究以云南滇剧的创新发展为对象，在文化认同理论框架下，结合文化因素、语言因素、价值因素三个维度入手，系统探索影响滇剧创新发展的关键要素及其内在相互关系，以为中国地方传统戏曲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2.研究目的

云南滇剧发端于滇中地域，于清代光绪年间正式成形，并在随后的清末民初臻至成熟。此阶段，滇剧诞生了众多杰出艺人及经典作品，例如瑞兰派滇剧的创始人李瑞兰。滇剧在演进历程中持续汲取其他剧种精华，诸如贵州梆子、川剧、汉剧与徽剧等，构建了内容多样的剧目系统。新中国成立后，滇剧步入发展鼎盛期，戏曲人才层出不穷，佳作持续涌现。但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国有专业剧团改制合并以及多样文化产品的兴起，滇剧逐步陷入低谷，剧团数目骤降，专业人才匮乏，观演人群缩减。

滇剧在二零零八年入选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云南滇剧持续推出新作，创作总量已达十二部之多。同时，滇剧传承者积极探寻新发展途径，譬如：设立传习所、借鉴环境戏剧或沉浸式戏剧等新型表演模式、开展校企合作培育。云南滇剧作为古老戏剧艺术形态，却展现出蓬勃生机，也为本研究开辟了崭新探讨角度。

本研究以云南滇剧创新发展为主体，在文化认同理论的视角下的文化因素、语言因素、价值因素着手，探索影响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与其之间的内在关系。

3.研究问题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开展问题探究，分别拟定三个研究问题。研究问题如下：

3.1 影响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因素有什么？

本研究在文化认同理论视角下开展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探究，旨在对文化认同理论中的要素进行归纳，并针对云南滇剧创新发展阶段中，可能会受到的因素进行整理，并形成调查问卷，探索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

3.2 影响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因素与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在文化认同理论的独特视角下，旨在深入探讨文化因素、语言因素以及价值因素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此，将设计问卷调查，通过系统地收集和分析数据，以期揭示这些关键因素在文化认同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更全面地理解文化认同的多元维度，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证依据。

3.3 推动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什么？

通过对问卷数据的深入分析，旨在探索文化因素、语言因素以及价值因素这三个关键维度，挖掘有效推动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这一研究不仅聚焦在滇剧传承，还深入探讨在文化传播、言语表达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整体贡献，以寻求推动滇剧艺术持续焕发新生机的核心要素。

4.文献综述

滇剧于 2008 年（第二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云南文化的重要象征。李小岗（2010）、李慧智（2015）、朱建锋（2021）均有谈到云南滇剧作为云南地方戏曲的代表，是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滇粹”或“云南山茶花”，是云南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地方剧种之一。滇剧的历史悠久，形成于清朝道光年间，是不同地域和民族戏曲艺术融合的产物，其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包括清代、辛亥革命时期、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至 2004 年均在传承老剧目演出和传唱。

近年来滇剧的保护上，第一，政策支持与保护措施，云南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滇剧。例如，2014 年云南省文化厅授予牛街庄滇剧团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习基地的称号，推动了滇剧在民间的传承（李慧智，2015）。此外，昆明市建立了多个滇剧传习基地，如呈贡七甸滇剧传习基地，为滇剧的传承提供了重要平台（张智梅，2022）。第二，数字化传播与创新随着科技的发展，滇剧的传播方式也在不断创新。例如，“微滇剧”APP 通过新媒体技术展示滇剧文化，解决了传统戏曲在现代传播中的难题（胡帅，2020）。此外，滇剧文创产品的设计研究也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将滇剧元素融入现代设计中，提升了滇剧的市场价值和社会影响力（裴若男，2023）。第三，教育与人才培养高校在滇剧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云南艺术学院戏剧学院等机构通过研究和教学，培养了一批滇剧人才。此外，民间业余队伍的扶持力度也在逐步加大，为滇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刘佳云，2021）。

5.理论基础

本研究在文化认同视域下展开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其中文化认同理论的研究中，佐斌，温芳芳（2017）认为，文化认同理论被定义为个体或群体对某种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这种认同不仅包括对文化形式的认同，例如涵盖语言、宗教、习俗等等，而且还包括对文化规范与准则的认同，以及对社会实践的认同。它是一种心理机制，通过文化比较、文化类属、文化区辨和文化定位等基本过程逐步形成。耿恩会（2016)在谈到文化认同理论提出者：美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强调文化认同是通过社会互动和历史实践逐渐形成的，并非天生存在。郭晓川（2012）在谈到文化认同理论提出者：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了文化适应理论，探讨了个体在跨文化环境中的心理适应过程。同时，还对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所提出“文化认同”概念进行阐述，Samuel Huntington 认为文化认同是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基础，并将其与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联系起来。张莹瑞，佐斌（2006）在谈到文化认同理论相关联密切，社会认同理论两位提出者：塔杰菲尔。特纳（Turner） 。他们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强调个体通过群体归属感形成文化认同。在社会认同理论研究中强调了文化认同的重要性。

文化认同理论强调文化认同由多个要素构成，包括语言、服装、仪式、历史等文化指标，以及基本观念、价值观和规范这些方面的影响。并认为文化认同是个体或群体对共同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通过内化为坚定的信念并形成特定的行为模式来体现。文化认同不仅是个人存在的价值体现，也是国家认同、历史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基础。

文化认同理论广泛应用于多个学科领域，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政治学和跨文化研究等。在心理学领域，他的理论常常被用来探讨个体身份的形成与发展，尤其是在青春期阶段的自我同一性危机及其解决过程（张小慧，2015）。在社会学领域，他的理论被用来分析社会结构对个体身份的影响，以及社会群体如何通过文化认同来实现个体与集体的整合。教育学中，埃里克森的理论被用于理解学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及如何通过教育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在人类学、文化、艺术研究中，他理论被用来探讨文化多样性对身份认同的影响，以及文化、艺术构建角色认同，以展现文化认同。此外，政治学领域也利用他的理论来分析国家认同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关系。

基于上述对文化认同理论的深入探讨和分析，本研究计划在文化认同理论框架下，聚焦于文化、语言和价值这三个核心维度，系统考察云南滇剧在当代背景下的创新发展路径。具体而

言，研究将围绕滇剧所承载的地域文化特征、语言表达形式及其内在价值观念展开，深入挖掘这些要素如何与文化认同理论中的相关概念相互关联、相互作用。通过这一分析，旨在明确文化认同对滇剧传承与创新的潜在影响，进而为后续实证研究及结论的得出提供扎实的理论前提和坚实的基础。

6.研究方法

6.1 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Khulpi&Hendracipta（2023）和朱亮、孟宪学（2013）研究中阐述道，文献研究法也被称为情报研究、资料研究或文献调查。该研究方法是一种通过查阅、分析和整理已有文献资料来获取研究数据和知识的方法。它在教育科学研究、社会科学、人文研究等领域中被广泛应用，其核心是通过系统地检索、搜集、鉴别、整理和分析已有文献资料，以获取研究所需的信息和知识。这种方法的主要三个特点包括：（1）直接面对文本或数字数据：研究者直接阅读和分析已有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通常是次级数据，而非原始数据。（2）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文献资料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的信息来源。（3）成本效益高：相比实地调查等方法，文献研究法在数据收集和研究执行方面具有较高的成本效益。

在本研究中使用文献研究法，对 CNKI、万方数据、维普资讯、高校图书馆、Web of science 等电子数据库，以及借阅和购买纸质书籍、资料等，开展云南滇剧相关学术成果进行整理归纳和分类总结。关于云南滇剧、滇剧创新发展、滇剧传承、影响滇剧发展的因素等相关学术资料百余篇，已对云南滇剧发展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深入了解和研究，从而能为本研究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撑。

6.2 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风笑天（1994）、郑晶晶（2014）、刘婷婷（2017）均阐述了问卷调查法是一种通过书面形式间接收集研究材料的方法，通常以标准化问卷的形式向目标群体提问，以获取关于某一现象或问题的数据。这种方法的核心在于利用问卷作为工具，通过收集和分析数据来得出研究结论。问卷调查法具有实证主义的特点，强调科学性和客观性，同时结合随机抽样和统计分析等技术手段，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7.研究过程

本章节旨在探讨影响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与动力机制。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在理论构架中的文化认同理论（文化、语言、价值）的关键要素，对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预制问卷，从而分析云南滇剧创新发展影响因素。

7.1 预调研

正式分析之前，开展小规模预调研工作，样本量为 50 份，覆盖问卷设定的所有维度，来验证云南滇剧创新发展影响因素问卷的初步信度结构，信度检验结果显示，所有维度的 Cronbach α 系数都超过了 0.70，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说明问卷整体测量稳定性良好，其中文化符号维度的 α 系数最高，是 0.961，该维度题项间相关性最强，能有效反映受访者对滇剧文化象征要素的统一认知。文化价值维度系数是 0.917，这些维度都处于优良信度区间，说明受

试群体面对相关题项时，回答倾向较稳定。文化认同维度系数是 0.907，显示出良好的可接受性与理论一致性。见表 1。

表 1：预调研

维度	项数	样本量	Cronbach α系数
文化符号	10	50	0.961
文化认同	10	50	0.907
文化价值	10	50	0.917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7.2 信度检验

为深入剖析云南滇剧创新发展影响因素问卷调查的样本构成以及群体特征，针对 429 份有效问卷的被试人口统计学信息展开了统计和整理工作，并对以上数据收回后，进行信度检验。表 2 为云南滇剧创新发展影响因素信度检验结果。为了验证云南滇剧创新发展影响因素调查问卷在实际应用当中的信度结构，本研究针对各维度量表以及其所属题项展开了信度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从整体情况来看，各维度 Cronbach's α 系数全都高于 0.85，其中大部分超过了 0.90，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与稳定性，问卷有优良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文化符号维度的 Cronbach's α 为 0.929，虽然各题项 CITC 值相对稍微低一些，但仍然处于可接受甚至良好的水平，该维度内部结构稳定、题项协同性较好，“我能从滇剧角色形象中识别云南地方特征”“我愿意向他人介绍滇剧中独特的文化符号”等题项都在一定程度上指出滇剧符号识别与观众传播意愿之间的联系。文化认同维度 α 系数为 0.934，各题项 CITC 大多集中于 0.68 以上，结构良好，其中“滇剧让我与其他观众建立起文化上的认同感”的 CITC 高达 0.921，是本维度中最具代表性的测量项之一，另外文化价值维度信度也达到了 0.935 的较高水平，各项 CITC 值均超过 0.77，显示出该部分内容在测量传统文化教育、文化传播与非遗保护方面的认知态度有高度一致性。见表 2。

表 2：云南滇剧创新发展及影响因素信度检验

名称	CITC	项已删除的α系数	Cronbach α
滇剧中的服饰、脸谱等具有文化象征意义。	0.678	0.924	0.929
滇剧角色的语言与动作具有文化隐喻。	0.643	0.926	
我能从滇剧角色形象中识别云南地方特征。	0.754	0.92	
滇剧中常出现的传统象征物具有深刻寓意。	0.725	0.921	

滇剧舞台上的布景和道具富有文化象征性。	0.746	0.92	
滇剧对传统神话、历史人物的演绎很有特色。	0.732	0.921	
我能够理解滇剧所使用的地方方言或表演语汇。	0.734	0.921	
滇剧角色的扮相和造型能够强化文化身份认知。	0.753	0.92	
滇剧的象征符号在现代戏剧中仍具有吸引力。	0.754	0.92	
我愿意向他人介绍滇剧中独特的文化符号。	0.709	0.922	
滇剧让我感受到作为云南人/中国人的文化根基。	0.684	0.93	
我认为滇剧是云南文化的重要代表。	0.709	0.928	
滇剧的内容使我产生强烈的文化归属感。	0.716	0.928	
滇剧是我了解民族文化与地方精神的重要途径。	0.77	0.925	
我在滇剧中看到了与我生活经验相似的文化影像。	0.675	0.931	0.934
滇剧让我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身份。	0.742	0.927	
看滇剧让我更加自豪于本地传统文化。	0.692	0.929	
我愿意将滇剧作为云南文化的窗口向外推广。	0.784	0.925	
滇剧创新不会削弱其对文化身份的表达。	0.717	0.928	
滇剧让我与其他观众建立起文化上的认同感。	0.921	0.92	
滇剧蕴含了丰富的道德教育与人文精神。	0.818	0.925	
滇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保护价值。	0.799	0.926	
滇剧具有传承传统美德的社会意义。	0.805	0.925	
滇剧可以作为中小学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	0.81	0.925	0.935
滇剧创新有助于传统文化的活化与传播。	0.79	0.926	
滇剧的文化内涵需要多种渠道去传播和解读。	0.773	0.927	

滇剧表达的历史和民俗故事具有学习价值。	0.802	0.926
滇剧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0.806	0.925
滇剧在当代文化多元化中仍有独特价值。	0.502	0.939
我支持将滇剧纳入本地城市文化品牌建设。	0.496	0.94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7.3 影响因素分析

接下来，为剖析对云南滇剧在“文化符号”这一维度当中的感知以及认同情况，本研究针对该维度下的 10 个题项展开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的数据展示于表 3，从整体的发展趋势去看，各个题项的均值都集中在 3.4 至 3.5 之间，全都处于“Agree”也就是认同的区间范围，观众普遍对滇剧在文化象征表达方面所起到的作用给予认可。见表 3。

表 3：文化符号

名称	M	SD	Range
滇剧中的服饰、脸谱等具有文化象征意义。	3.459	0.967	Agree
滇剧角色的语言与动作具有文化隐喻。	3.438	0.981	Agree
我能从滇剧角色形象中识别云南地方特征。	3.501	0.959	Agree
滇剧中常出现的传统象征物具有深刻寓意。	3.538	0.97	Agree
滇剧舞台上的布景和道具富有文化象征性。	3.378	0.999	Agree
滇剧对传统神话、历史人物的演绎很有特色。	3.41	0.949	Agree
我能够理解滇剧所使用的地方方言或表演语汇。	3.424	0.982	Agree
滇剧角色的扮相和造型能够强化文化身份认知。	3.469	0.968	Agree
滇剧的象征符号在现代戏剧中仍具有吸引力。	3.469	0.916	Agree
我愿意向他人介绍滇剧中独特的文化符号。	3.462	0.945	Agree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为探究滇剧在受众文化认同形成中的作用，本研究对“文化认同”维度内的十个问题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详细结果展示于表 4。总体来看，各项问题的平均分均位于“Agree”范

围，观众普遍认同滇剧在塑造地方文化归属感、民族身份认同以及文化传播体系方面所起的作用。见表 4。

表 4：文化认同

名称	M	SD	Range
滇剧让我感受到作为云南人/中国人的文化根基。	3.259	0.91	Agree
我认为滇剧是云南文化的重要代表。	3.212	0.927	Agree
滇剧的内容使我产生强烈的文化归属感。	3.238	0.924	Agree
滇剧是我了解民族文化与地方精神的重要途径。	3.226	1.011	Agree
我在滇剧中看到了与我生活经验相似的文化影像。	3.196	1.038	Agree
滇剧让我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身份。	3.172	1.006	Agree
看滇剧让我更加自豪于本地传统文化。	3.233	0.955	Agree
我愿意将滇剧作为云南文化的窗口向外推广。	3.219	0.976	Agree
滇剧创新不会削弱其对文化身份的表达。	3.203	0.961	Agree
滇剧让我与其他观众建立起文化上的认同感。	3.228	0.811	Agree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在本次针对云南滇剧文化价值因素展开的研究调查中，受访者整体呈现出较高程度的认同感，在表 5 中有十项指标的均值都处于 3.5 以上，全部落入“Agree”区间，公众普遍承认滇剧作为传统文化载体在教育、传承、传播以及价值表达等方面有着关键地位，然而依靠对均值大小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观众对于滇剧所体现的不同文化价值内涵存在一定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滇剧在文化功能发挥方面的重点与薄弱之处。接下来将围绕均值最高以及最低的几个题项展开详细分析，得分最高的题项是“滇剧有传承传统美德的社会意义”，它的均值为 3.597，标准差为 0.992，多数受访者高度认同滇剧在弘扬传统伦理道德方面所发挥的功能，作为承载地方文化精髓的戏剧形式，滇剧在长期的演化进程中融合了忠孝节义、礼仪规范等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在人物塑造以及情节推动过程中传递出明确的道德导向。这种借助艺术形式承载伦理思想的方式，提高了传统道德观念的可接受性与感染力，又使滇剧在当代社会的教育功能显现出来，在多元文化并存、价值观多样化的当下，滇剧所体现的正向价值具有关键的社会意义，可提高青少年的文化归属感与价值观稳定性，体现了其文化教化与社会导向的双重功能。见表 5。

表 5：文化价值

名称	M	SD	Range

滇剧蕴含了丰富的道德教育与人文精神。	3.517	1.022	Agree
滇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保护价值。	3.513	1.06	Agree
滇剧具有传承传统美德的社会意义。	3.597	0.992	Agree
滇剧可以作为中小学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	3.524	1.062	Agree
滇剧创新有助于传统文化的活化与传播。	3.545	1.007	Agree
滇剧的文化内涵需要多种渠道去传播和解读。	3.515	0.99	Agree
滇剧表达的历史和民俗故事具有学习价值。	3.506	1.004	Agree
滇剧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3.515	1.029	Agree
滇剧在当代文化多元化中仍有独特价值。	3.552	0.922	Agree
我支持将滇剧纳入本地城市文化品牌建设。	3.566	0.954	Agree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7.4 系数

最后，在针对“云南滇剧创新发展影响因素”展开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里，表 6 呈现出各个自变量针对因变量“创新驱动发展”的具体回归系数、较大性水平以及多重共线性指标，首先从非标准化系数方面来看，文化价值的回归系数为 0.204，在所有自变量当中是最高的，这意味着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文化价值每提升一个单位，会带动创新发展水平提高 0.204 个单位，其影响力颇为突出。紧挨着的变量依次是文化符号、文化认同，依然达到了统计较大水平，它在模型里同样有着稳定的正向作用。见表 6。

表 6：系数

模型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共线性统计	
		B	标准错误	Beta			容差	VIF
1	(常量)	.617	.189		3.261	.001		
	文化符号	.179	.036	.200	4.961	.000	.886	1.129
	文化认同	.142	.034	.172	4.187	.000	.856	1.169
	文化价值	.204	.035	.243	5.809	.000	.827	1.209
a. 因变量：创新驱动发展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7.5 相关性分析

在本研究关于云南滇剧创新发展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中，三个核心变量之间的关系展现出明确的结构特征，尤其是在“创新驱动发展”与各因素之间的联动上，体现出滇剧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不同文化维度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从表 7 中的结果可以看出，“创新驱动发展”与三个影响因素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均达统计显著水平（$p < 0.001$ 或 $p < 0.01$），这不仅反映了各构面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也揭示了实现滇剧现代化发展的多维动因路径。“创新驱动发展”与“文化价值”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r = 0.429^*$），这一发现表明，观众普遍认为滇剧创新的核心并不仅在于视觉或技术层面的更新，而在于是否持续传达并强化其所承载的文化价值。滇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内在的教育意义、道德象征和民族精神在创新过程中仍被高度关注和认可。“创新驱动发展”与“文化符号”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365*，显示出象征意义在滇剧创新路径中的重要价值。滇剧服饰、脸谱、方言与动作的文化隐喻，不仅为观众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视觉体系，也为创新内容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基础。许多观众在创新演出中仍期望看到这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巧妙再现与现代转化，这种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文化符号的再编码”成为滇剧创新不可或缺的一环。见表 7。

表 7：相关性分析

名称	文化符号	文化认同	文化价值	创新驱动发展
文化符号	1			
文化认同	0.211***	1		
文化价值	0.169***	0.302***	1	
创新驱动发展	0.365***	0.357***	0.429***	1
M	3.455	3.228	3.535	3.635
SD	0.752	0.811	0.799	0.671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8.研究结果

8.1 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文化、语言、价值

本研究在文化认同理论视角下开展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探究，旨在对文化认同理论中的要素进行归纳，并针对云南滇剧创新发展阶段中，可能会受到的因素进行整理，并形成调查问卷，探索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

8.2 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相互交织、互相影响

在云南滇剧的创新发展过程中，根据问卷调查中为剖析对云南滇剧在“文化符号”这一维度当中的感知以及认同情况，其各个题项的均值都集中在 3.4 至 3.5 之间，全都处于“Agree”

也就是认同的区间范围，观众普遍对滇剧在文化象征表达方面所起到的作用给予认可。其次，对“文化认同”维度内的十个问题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各项问题的平均分均位于“Agree”范围，观众普遍认同滇剧在塑造地方文化归属感、民族身份认同以及文化传播体系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后，对云南滇剧文化价值因素展开的研究调查中，受访者整体呈现出较高程度的认同感均值都处于 3.5 以上，全部落入“Agree”区间。

由此表明，各影响因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呈现出一种相互交织、互相影响的复杂关系。文化符号作为滇剧艺术表现的重要元素，不仅承载着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还通过与观众的共鸣增强了文化认同感。这种认同感进一步提升了滇剧的文化价值，使其在传承与发展中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语言作为滇剧表演的核心媒介，不仅塑造了艺术形式的独特性，还通过与文化符号、文化价值的互动，共同推动了滇剧的创新表达。例如，方言的运用不仅增强了地方特色，还通过与观众的情感连接，促进了文化认同的深化。而文化价值的提升，又反过来为文化符号的丰富和语言的创新提供了动力，形成了良性循环。因此，云南滇剧的创新发展是文化、语言与价值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

8.3 推动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创新驱动发展

通过对问卷数据进行全面、系统且深入相关性分析，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文化因素、语言因素和价值因素这三个关键维度，挖掘推动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关键要素。此综合性研究不仅聚焦于滇剧的传统传承问题，还进一步剖析了滇剧在文化传播、语言表达和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综合贡献与影响。

通过对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的细致分析，得出推动云南滇剧不断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创新驱动发展。首先，在政策的扶持下，云南滇剧获得了创新发展的经济基础，政府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引导为滇剧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其次，在语言、文化、价值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交织和互相影响下，云南滇剧得以在多元化的环境中汲取养分，形成了独特的创新发展动力。语言因素的独特性使得滇剧在表达上更具地方特色，文化因素的深厚底蕴为滇剧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而价值因素的引导则使得滇剧在传承中不断创新，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最终，通过对问卷数据的深入分析得出，影响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依然是创新驱动发展。只有不断推出新剧目、新作品的演出，才能有效推动观众的欣赏兴趣，提升滇剧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也为中国地方戏剧种类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和成功的范例。这一研究成果不仅为云南滇剧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其他地方戏剧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9.结论

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第一，通过文化认同理论中的文化因素、语言因素、价值因素，在问卷调查设计中将此三项影响因素用于设计问卷问题，以及进行数据收回与数据统计，探索出云南滇剧创新发展影响因素受到以上三者因素的影响。第二，通过数据的分析与相关性分析，证明文化因素、语言因素、价值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相互交织、互相影响，共同促进云南滇剧的创新与发展。第三，在数据分析问卷中得出，云南滇剧在中国政府支持、地方滇剧艺术从业者的努力、文化、语言、价值等多种因素的交织下，也最终得出推动云南滇剧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创新驱动发展。

参考文献

风笑天（1994）。<方法论背景中的问卷调查法>。*《社会学研究》,*（03），13-18。

何星亮、杜娟（2014）。<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特点、原则与类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4），18-25。

胡帅（2020）。**《地方戏曲文化的数字化传播设计—“微滇剧”APP 交互设计》（硕士论文）。**云南艺术学院，云南省。

刘婷婷（2017）。<教育研究领域中问卷调查法的应用>。*《新校园（上旬刊）》,*（10），48-49。

李小岗（2010）。**《滇剧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研究》（硕士论文）。**云南艺术学院，云南省。

李慧智（2015）。**《滇剧的民间生态研究—以牛街庄为个案》（硕士论文）。**云南艺术学院，云南省。

刘佳云（2021）。<云南少数民族剧种生存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民族艺术研究》,* 34（5），118-126。

裴若男（2023）。**《滇剧文创产品设计研究》（硕士论文）。**云南师范大学，云南省。

周勤如（1986）。<当代音乐分析学进展的一般倾向>。*《音乐研究》,*（4），23-28+13。

郑晶晶（2014）。<问卷调查法研究综述>。*《理论观察》,*（10），102-103。

朱建锋（2021）。<滇剧音乐概论>。*《民族音乐》,*（1），50-52。

朱亮、孟宪学（2013）。<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法比较研究>。*《图书馆工作与研究》,*（6），64-66。

张智梅（2022）。**《斗南滇剧的历史与传承研究》（硕士论文）。**温州大学，温州市。

佐斌、温芳芳（2017）。<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中国科学院院刊》,*（2），175-187。

张小慧（2015）。**《嘉莉妹妹的认同危机：从埃里克森认同危机理论分析《嘉莉妹妹》》（硕士论文）。**西南大学，重庆市。

Fasya Afria Khulpi,Siti Rokmanah, Nana Hendracipta.（2023）.HUBUNGAN ANTARA KETERAMPILAN GURU DALAM MEMBERIKAN PENGUATAN DENGAN PENINGKATAN MOTIVASI BELAJAR SISWA SEKOLAH DASAR.*Didaktik: Jurnal Ilmiah PGSD STKIP Subang,* 9(5), 1045-1055.

Zaragocin,S.,Caretta,M.A.(2020). Cuerpo-Territorio: A Decolonial Feminist Geographical Method for the Study of Embodiment.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111(5), 1503–1518.

海外粤剧团体的寻根之旅

The Root-Seeking Journey of Overseas Cantonese Opera Troupes.

作者 梁莘 泰国格乐大学国际学院艺术系 邮箱：691454136@qq.com

Author liang shen International College, Krirk University, Thailand.Email:691454136@qq.com

摘要：2025 年 11 月 17-19 日，广东粤剧曲艺社应邀组团，由周月明社长领衔，集合了星加坡、荷兰、法国、美国、英国、比利时、澳洲、泰国等国的粤剧爱好者与传承人。这一现象级的国际协作，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华人社群如何通过戏曲“寻根”以构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绝佳案例。

关键词：粤剧，文化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Abstract:From November 17 to 19, 2025, the Guangdong Cantonese Opera and Folk Arts Association, invited to perform as a group, was led by President Zhou Yueming and brought together Cantonese opera enthusiasts and inheritors from Singapore, the Netherlands, France,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Belgium, Australia, Thailand, and other countries. This remarkabl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provides an excellent case study for observing how the Chinese diaspora uses traditional opera to "root-seek" and build collective memory.

Keywords: Cantonese opera, cultural identity,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heritance.

1. 引言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当下，华人社群的文化认同与身份建构呈现出多层次、跨地域的特征。作为中国传统戏曲中极具地方特色且具备强大号召力的“南派艺术”代表，粤剧的海外传播与演变，一直是跨文化研究与人类学考察的重点。2025 年 11 月 17 日至 19 日，由佛山市侨联与市委统战部统筹联合主办的华光先师宝诞暨寻根大汇演盛典，不仅是一次文化盛典，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文化自觉（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行动。

2. 活动概况

2025 年 11 月 17 日，自泰国、新加坡、荷兰、法国、广州、中山等地的团队一同参加由市

侨联及市委统战部统筹联合主办的华光先师宝诞和寻根大汇演盛典。泰国广东粤剧曲艺社应邀组团，在周月明社长的带领下，由泰国曼谷出发至广东佛山共襄盛举，时间为 11 月 17 日至 19 日，为期三天。

2.1 寻根

首日上午，粤剧名伶云集佛山粤剧院，伴随着喧天锣鼓与醒狮出场，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巡游活动结束后，众人前往经堂古寺前举行粤剧发源地先师宝诞盛典仪式，仪式环节精彩纷呈，包括“刘关张”醒狮开运、南派粤剧功夫展雄风、恭请华光师傅、华光出巡、锣鼓柜迎神、粤剧院院长致辞、锣鼓柜起乐、接驾上香、祭华光（陈志超致祭文）、佛澳五军虎祭戏神、主礼嘉宾上香、全体上香、八仙贺寿、醒狮贺岁等。

图 1：全球华人粤剧寻根团游行

图 2: 佛山粤剧团请出华光先师牌位

当晚，活动分为澳省港名家及地市院团开幕合演开台例戏《六国大封相》，以及各地市县及新建县团参与的粤剧大汇演两大环节。陈志超率佛山粤剧院红船木人桩团队参与演出，并带来经典折子戏串烧。在《六国大封相》的演出中，演员们身着华丽的戏服，妆容精致，举手投足间尽显粤剧的韵味与风采。他们用婉转的唱腔、灵动的眼神和细腻的表演，将战国时期的风云变幻展现得淋漓尽致，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而在粤剧大汇演环节，各地市县及新建县团的演员们也毫不逊色，他们带来了各具特色的剧目，有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有波澜壮阔的历史传奇，还有诙谐幽默的市井小品。每一个节目都展现了粤剧的多样性和独特魅力。

演出过程中，舞台上灯光璀璨，音效配合恰到好处，让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故事的世界。台下的观众们全神贯注，沉浸在粤剧的艺术氛围中，时而为精彩的表演喝彩，时而为感人的情节动容。在场观众中，其大多数为海外归国参加此活动海外侨胞，因为身在海外有文化限制，又对原汁原味的粤剧文化依恋依旧，所以对当晚的演出赞不绝口，演出持续到当晚十一点才正式谢幕。

第二日，佛山大剧院先锋剧场上演海内外华人寻根粤剧粤曲大沤演专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及国内各省(区、市)的粤剧团队轮番登场，献演历经百年沉淀的经典折子戏;代表泰国的泰国广东曲艺社社长周月明女士于下午登台演出。总体节目单如下

比利时:梁玉卿，萧琼芳合唱<<狄青闯三关》

美国:陈振鸿，阮月兰合唱<<悲怨别重台>>

英国:林嘉文(剧院花旦)合演折子戏<<无情宝剑有情天>>

英国:宋佩莲，梁紫丹合唱<<打金枝>>

法国:杜干超，(剧院花旦)合演折子戏<<关公月下惜刁婵>>

澳洲:利仕辉，汤佩仪國黄衰粤即勘售社

合唱<<古渡离愁>>

法国:陈思燕，广卅:黄春强，合演折子戏<<倩女尘缘下午节目表

美国:陈馨兰，叶伟明合唱<<悲怨别重台>>

苏格兰:李仕祥，钟明合唱<<锦江诗魂>>

泰国:周月明，刘秀兰合唱<<狄青闯三关>>

英国:陈婉冰，浊唱<<紫钗记之独醉玉门关>>

荷兰:刘秀英，曾月有合唱<<七月七日长生殿>>

香港:邓瑛萍，黎兰娣合唱<<良朋>>

新加坡:刘秀兰独唱<<有情活把鸳鸯葬>>

比利时:杨锦来何少芳合唱<<合兵破曹>>

英国:谢锦霞，陈秀英合唱<<梦会太湖>>

粤剧这门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不该与时代渐行渐远， 在历史的长河里，它的光芒依旧熠熠生辉，牵动着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牵动着更多喜爱它的人不远万里回到家乡共襄盛会。

图 3: 泰国周月明社长，星加坡刘秀兰老师合唱狄青闯三关。

2.2 走访与传承

第三日，海内外嘉宾前往顺德、中山开展寻根走访活动，先后探访了粤剧名伶千里驹故居（顺德伦教）、薛觉先故居（顺德龙江），并有幸采访粤剧名旦林小群（时年 94 岁）。她在整个粤港澳乃至东南亚地区是极有代表性的，她曾移居美国，是代表着第一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成名的演员。但在多年后，怀揣着对粤剧与祖国的依恋，落叶归根回到了故乡。她本人在 13 岁时已经是名噪一时的“粤剧神童”19 岁时她首次作为正旦（女主角）演出。1949 年中国解放后，她为新中国而歌唱，直到 1988 年退休后，前往美国。

她对笔者谈到，旧社会时，粤剧伶人是“上台戏子，落台乞儿”十分凄惨，她的父亲林超群先生本是男花旦，后期渐渐女花旦进入了人们的视线，父亲事业在家，一家兄弟姐妹九口人生计艰难，她决定拜师学艺，靠自己的力量养家。我们粤剧有很长的历史，特别，我在美国生活有这样的体会。我们的粤剧，我们的中国的戏曲舞台艺术，在世界上是瑰宝。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四功五法，唱做念打，手眼身法步，有这些的“功”，有这样的“法”。像外国（艺术），芭蕾舞它是不唱的，只有肢体（语言），歌唱家又不同动作，不用练四功五法。像西方三大男高音，他们就这样站着唱，“啊——我的太阳.....”所以我们中国舞台戏曲艺术史代表我们中国文化艺术的奇珍异宝，是奇葩来的，很难得的。所以你在泰国，你就理解到，做一场戏要花多好功夫呀。又要学唱，又要学做，又要试服装，又要练曲。四功五法，唱做念打，很珍贵呀！学之不尽啊！”

采访结束后，嘉宾们前往顺德龙江镇属粤剧特色学校华东小学，观看该校粤剧社团的汇报演出，演出节目包括《火凤凰》《红线盗盒》《女儿香之剑归来》等，小演员们展现出灵动的身段与扎实的功底，情感真挚、唱腔圆润；他们还带来创新融合传统经典与粤剧唱腔的粤语戏剧《三字经》。随后，嘉宾们参观了华东小学的戏曲展览馆，欣赏绣金戏服、古旧月琴等展品，感受粤剧百年传承脉络与后继有人的蓬勃生机，令海外粤剧代表赞叹不已。活动全程由广东电视台、佛山电视台、中国文化报、佛山日报、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及相关自媒体跟进报道，直至华光诞活动结束。参团名单如下：泰国周月明、梁艳芬、余福标、余绍鸿、梁凤来、余翠玉、俞彩霞；中山林远良、吴蔼玲、梁掌权、曹雅丽；广州李淑珍、梁莘；新加坡刘秀兰、梁锦成、黄佩兰、曾颊儿、袁明女、叶东敬、戴伟健；荷兰凌穗芬、曾慧仪；法国曹秀金、叶庄华。此次寻根之旅以“溯源粤剧文脉，弘扬广府文化”为宗旨，在海内外华侨的欢声笑语中圆满结束。期间，海内外粤剧代表共同签署《粤剧文化传承佛山宣言》，承诺将继续推动粤剧在全球的传播与发扬。

图 4: 泰国广东曲艺社周月明社长，梁掌权顾问与顺德华东小学展演小演员留影。

3. 寻根与身份建构：从“千里驹”到“华光先师”

根据《粤剧文化传承“海内外华人，今朝聚首于此，非为他物，惟为寻根。” —— 粤剧文化传承佛山宣言》。

地理寻根：在“千里驹”故居的参访，象征着华人子弟在千里之外寻找精神家园。

人物寻根：拜谒“薛觉先”故居，意在缅怀粤剧的奠基者。

精神寻根：观看华东小学的戏曲展览馆，感受百年传承的脉络。

3.1“寻根”与“归属”：华人社群如何利用粤剧这一文化符号重塑身份认同

笔者认为，此次活动最大的亮点是其国际化的寻根情节，来自不同国家的华人粤剧团体不仅展示了各自的演技，更多的，是寻找作为华人精神寄托滋养。他们在顺德伦教（“千里驹”故居）和顺德龙江（“薛觉先”故居）的走访，并非单纯的旅游观光，而是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文化仪式。

这种文化仪式背后，是华人社群对自身身份的不断叩问与重塑。在异国他乡，华人面临着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而粤剧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他们与故土紧紧相连。通过参与这次寻根活动，他们在粤剧的表演和传承中，重新找回了那份被岁月冲淡的华人认同感。

在“千里驹”故居，那些古老的建筑、陈列的物品，仿佛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海外华人感受到了先辈们在粤剧艺术道路上的执着与追求。他们在这里，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根，看到了华人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延续。而在“薛觉先”故居，缅怀这位粤剧奠基者，更是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肩负着传承和发扬粤剧文化的责任。

通过对林小群女士的采访，更加证实了粤剧这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是许多海外华人的精神支柱。可以说，粤剧在海外华人社群中，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他们身份认同的

重要标志，是连接他们与故土、与中华文化的坚实纽带，支撑着他们在异国他乡坚守自己的文化根源，不断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这种寻根活动，让华人社群在文化层面上找到了归属感。他们不再是漂泊在异国他乡的游子，而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华人后裔。在表演粤剧的过程中，他们将自己对故乡的思念、对华人身份的认同融入到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唱词中。这种情感的表达，不仅是对自身身份的肯定，也是向世界展示华人文化的独特魅力。

同时，这种国际化的寻根情节也促进了不同国家华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他们在活动中分享自己在海外传播粤剧的经验和故事，互相学习、互相支持。这种交流与合作，不仅有助于粤剧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发展，也进一步加强了华人社群之间的联系和凝聚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寻根活动将会成为华人社群传承和弘扬粤剧文化、重塑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它将激励着更多的海外华人积极参与到粤剧的传承和发展中来，让粤剧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图 5：中山市香山粤剧研究院邓志驹院长接待泰国广东粤剧曲艺社团队专访。

4. 结语

通过此次“寻根”之旅，粤剧不仅在海外华人社群中找到了强烈的文化认同感，还实现了跨国界的文化交流与传承。在活动中，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侨通过共同参与粤剧的演出和文化活动，不仅重温了传统艺术的魅力，也通过亲身体验粤剧的历史渊源和艺术精髓，深刻感受到作为华人的文化归属感。这一活动展示了粤剧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独特影响力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重生与活力。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粤剧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不仅承载着华人社群的文化自觉，也成为连接全球华人的精神纽带，促进了不同国家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

此外，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也为粤剧的传承提供了新的契机。在面对全球文化多元化与现代化的浪潮时，粤剧凭借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鲜明的艺术特色，展现出其与时俱进的能力。无论是在剧目演绎、艺术交流，还是在文化认同的构建上，粤剧都为海外华人社群提供了一个共鸣与团结的舞台。通过这种形式的文化寻根，海外华侨不仅重拾了与祖国的文化纽带，也在全球文化语境中更自信地展现华人文化的独特魅力。未来，粤剧的传承与发展势必会在更广阔

的舞台上继续延续，并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参考文献

Lee, R. (2005). Theorising the Chinese diaspora: Chinese Canadian and Chinese Australian narratives.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entre PTY LTD. (2013–2025). *Title of the work.*

混声合唱《往日时光》的音乐特征与艺术处理

The Mus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rtistic Treatment of the Mixed Chorus "Past Time"

冶育晓 泰国格乐大学国际学院 艺术系 邮箱：1836215925 @qq.com

YE YU XIAO,Department of Arts International College, Krirk University, Thailand.Email:1836215925 @qq.com

摘要：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精神追求不断提高，流行音乐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在音乐领域中有着一席之地。尤其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作曲家将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进行巧妙地融合，流行歌曲改编成合唱作品便是其中一种形式。作为一种新型的合唱形式，流行合唱不仅拥有流行音乐的通俗性，同时兼具了传统音乐的高雅性，受到了众多音乐爱好者的喜爱。因此，研究流行合唱作品的音乐特点，无论是对于合唱艺术的发展，还是对于传统音乐与流行音乐的融合，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以混声合唱作品《往日时光》为研究对象，从而将流行合唱作品和国外经典民歌元素融合，本文对音乐特征、艺术处理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此研究分析作为流行合唱作品多元化特点创作探索的新途径。

关键词：《往日时光》，流行合唱作品，中俄民歌元素，艺术处理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popular music has gradually become a fashionable trend in the field of music. Many composers skillfully integrate popular music with traditional music. In recent years, many composers often adapt popular songs into popular choruses. It has become a new form of chorus that emerged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in China, characterized by the popularity of popular music and the elegance of traditional music, and has been loved by a large number of chorus enthusiasts.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mu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r chorus works is a new attempt for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opular chorus ar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mixed chorus work "The Past Tim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o as to integrate the elements of popular chorus works and foreign classical folk songs.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musical characteristics, artistic processing, and other aspects. This research analysis serves as a new way to explore the diversified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r chorus works.

Keywords: "Time of the Past",Popular chorus works,Chinese and Russian folk song elements,Art processin

1. 引言

随着近些年来流行合唱艺术作品的兴起，许多经典流行歌曲经常被改编为合唱，把传统的民歌元素融入到现代流行音乐中，是一种新的探索与尝试，如《小路》《又唱浏阳河》《玛依拉变奏曲》等，作曲家们把国外经典乐曲片段引入到自己的创作当中，使作品的表现力得到了升华，受到了听众热烈的反响和心灵的共鸣。《往日时光》作为一首经典的声乐作品，由乌兰托嘎作曲，郑健改编混声合唱。从这部作品的曲调和歌词中，我们不难发现它与前苏联民歌《红梅花儿开》、《三套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对年轻时光的回忆，将忧郁，惆怅，奋进，向往等词语进行深刻的表达，并将整首歌的音乐形式和结构进行加工、创作与编排。同时，在歌词中加入具有地方特色的词汇，与音乐元素巧妙融合，使得歌词与谱曲之间交相呼应，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让听众获得优秀的视听体验的同时，将作品中蕴含的艺术情感做出了更好地表达。对于合唱作品《往日时光》的研究，不仅可以充分了解其创作背景及音乐特征，同时能够在合唱的艺术处理上有更进一步的把握。

2. 混声合唱《往日时光》概述

2.1《往日时光》词曲作者的艺术成就

歌曲《往日时光》是由我国著名词作家，诗人克明创作的。他同时创作的还有《呼伦贝尔大草原》《牧马人》等 140 余首作品。《往日时光》的作曲是由我国蒙古族音乐家、国家一级作曲乌兰托噶所创作。他同时创作的作品还有《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天边》《草原在哪里》等。合唱作品《往日时光》是由青年指挥家、作曲家任知超和我国著名指挥家郑健所编配。两位指挥家长期从事合唱作品与交响乐作品的创作与指挥，所创作的作品享誉海内外，受到我国合唱爱好者的关注和喜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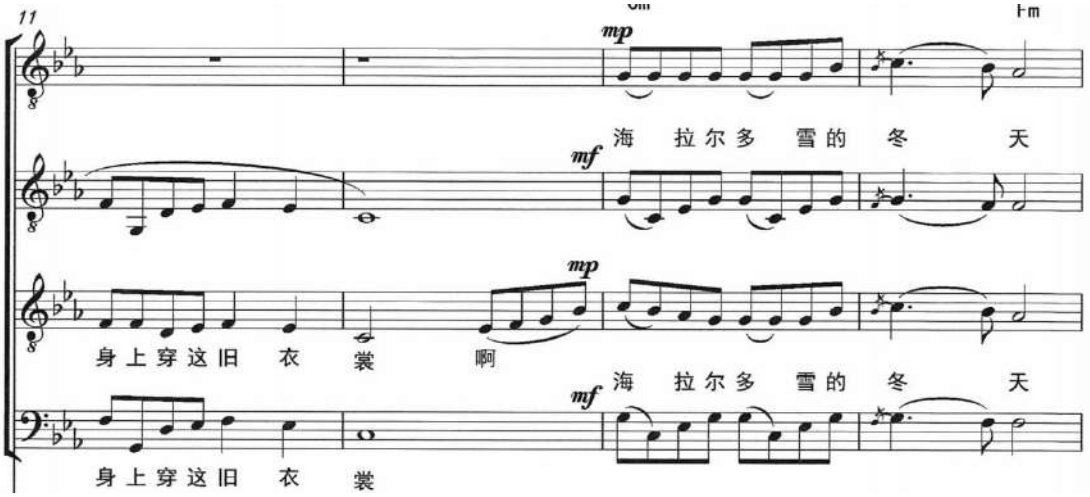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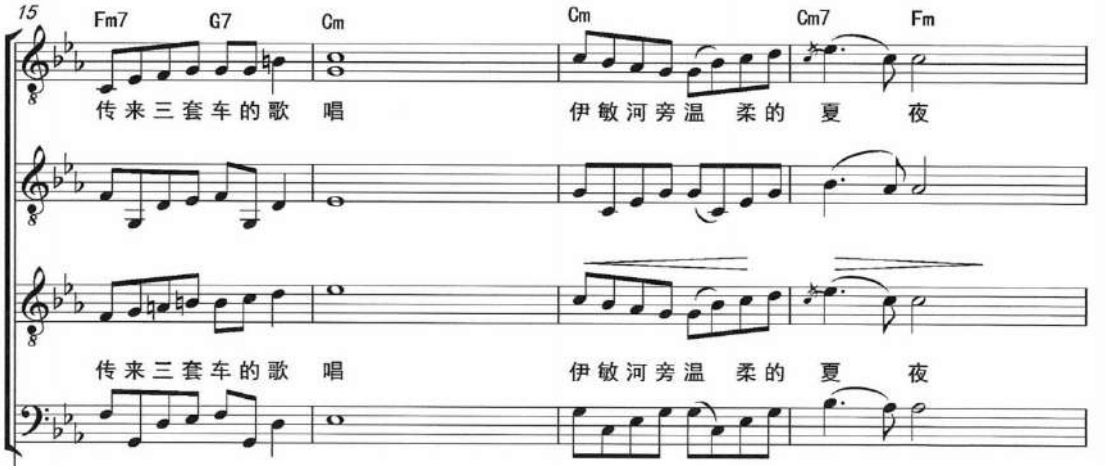
2.2《往日时光》创作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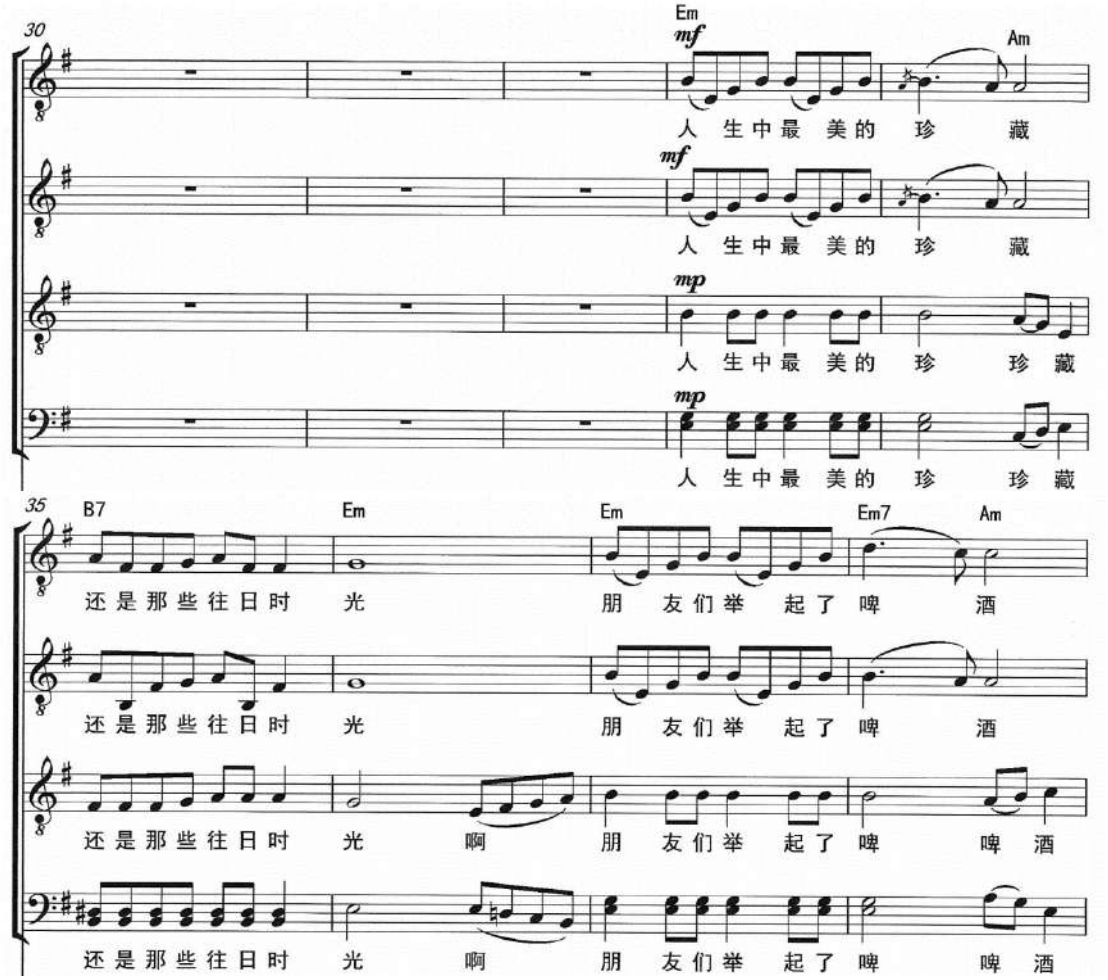
合唱作品《往日时光》歌词表达了人生从小到老所经历的过程感受。其中有欢乐与悲伤，喜悦与惆怅，失败与成功等人生的每一阶段。乐曲在创作中能够把传统与现代创作手法融入其中，并在流行音乐创作中融入充满充沛情感的俄罗斯小调，使听众耳目一新。这充分的体现了作曲家深厚的创作功底和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度，不仅使我们中国的听众喜欢，同时也受到国外听众的喜欢。这充分的证明音乐无国界，同时为中俄两国文化艺术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3. 混声合唱《往日时光》的音乐特征

3.1 旋律创作运用级进与跳进及模进的创作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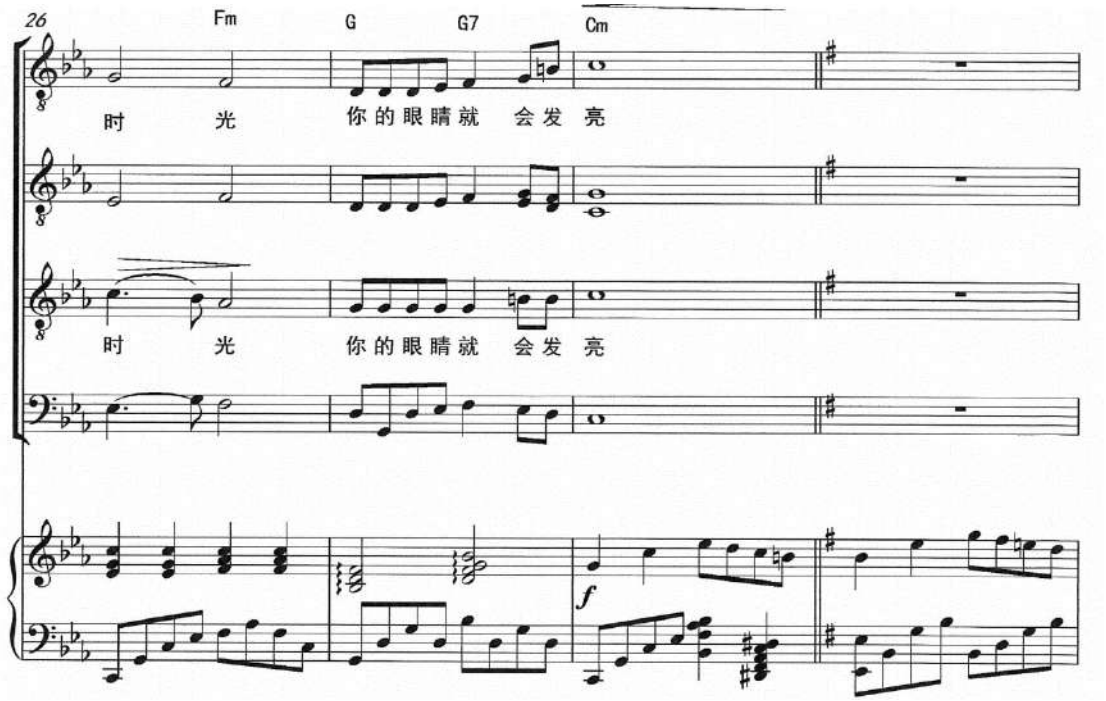
旋律的流畅是流行合唱作品的一大特点，运用级进平缓的旋律表达音乐，音程的级进给人以安静平衡柔和流畅的感觉在旋律中，如乐曲第 13 小节（见谱例 1）歌词中写到“海拉尔多雪的冬天，传来三套车的歌唱”其旋律运用的上行级进，是一种音乐能量的积蓄与展开，其旋律线条给人以情绪层层递进加深的感觉，不自觉的想深入其中。反之，乐曲第 17 小节“伊敏河旁温柔的夏夜”中“伊敏河旁”“夏夜”运用的是下行级进则给人是一种音乐能量的释放与消解，使人情绪舒缓而闲适。并且“夏”字的时值稍长，符合人们日常强调某一重音的说话习惯更加突出了乐曲的叙事风格。

谱例 1

谱例 2

与级进音程手法相对应的，跳进音程在乐曲中也是比比皆是。如乐曲第 33 小节（见谱例 3“人生”“最美”中都有一个纯五度的跳进又上升小三度的旋律线条，用音乐在诉说人生就是宽阔且曲折向前的。乐曲 33 小节-36 小节和 37 小节-40 小节（见谱例 3 又运用了模进的创作手法，仿佛代表着时间的车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整个旋律进行中，既有级进的平缓又有跳进的起伏，始终贯穿在旋律的进行中。

谱例 3

3.2 调性转换突出色彩情绪的对比

歌曲之中调性的变化始终伴随着情感的变化而变化，二者紧密相连。如乐曲开头至 28 小节是 c 和声小调，给人以温柔淡雅充满忧郁的感情色彩，第 28 小节（见谱例 4 钢琴伴奏部分，

本调的导音，转为下一小节 e 和声小调的主音，这种上方三度的转调，为乐曲增添了明朗坚定的感情色彩。

谱例 **4**

除此之外，乐曲第 36 小节（见谱例 4 两个小节的连接处男高音声部运用了四分音符的上行级进进行推动，男低音声部运用了反向下行级进，增强了音乐行进的力度，同时也增强了音乐的连贯性。此处 e 和声小调的音乐旋律较 A 乐段的 c 和声小调更加的激进且富有张力。

3.3 带有变化重复的并列单二部曲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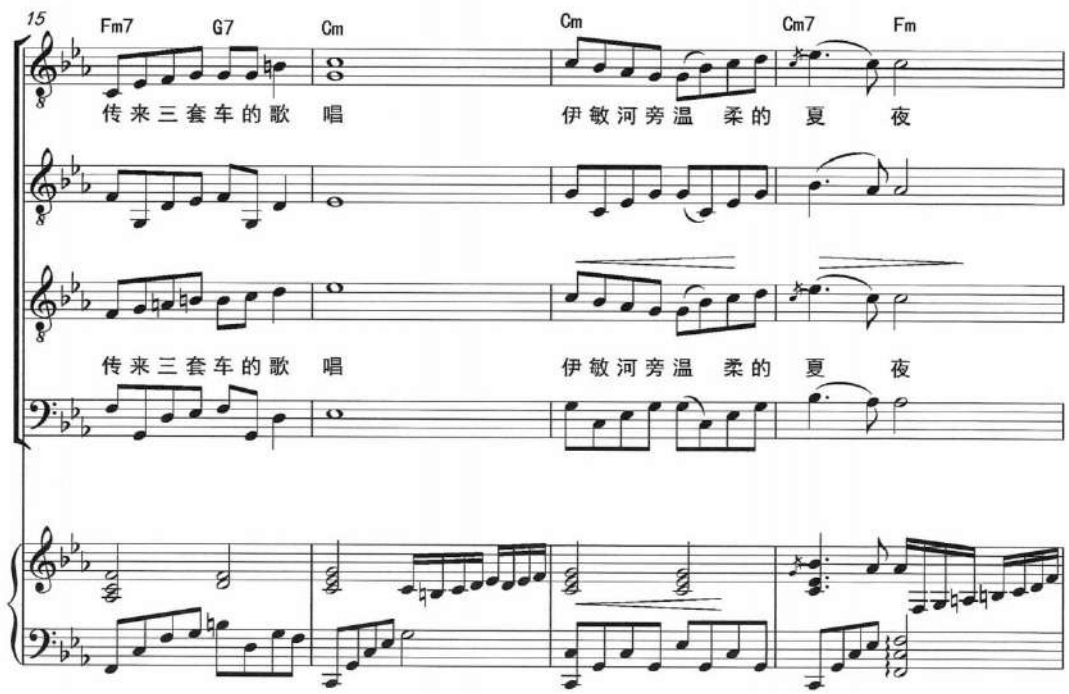
这是一首四声部合唱作品，乐曲采用并列单二部的曲式结构，其曲式部分的内部的构成十分的简洁明了，但是整个乐曲的发展过程中仍然体现出一些独特之处，例如并列单二部曲式的 A 乐段和 B 乐段进行了多次变化重复，从中也可以剖析到中国作曲家在创作中所进行的可贵的探索，曲式结构图如下图所示:

合唱曲《往日时光》曲式结构图																			
带有变化重复的并列单二部曲式																			
乐段	引子	A		A1		B		间奏	A2		B1		连接	B2		连接	B3		
乐句		a	a1	a2	a3	b	b1		a4	a5	b2	b3		b4	b5		b6	b7	补充
小节	4	4	4	4	4	4	4	4	4	4	4	5	3	4	4	5	4	4	7
调性	c 和声小调							e 和声小调											

由上图的曲式结构图可知此带有变化重复的并列单二部曲式全曲共包括十一个大的部分，分别为引子部分（1-4 小节）、A 乐段（5-12 小节）、A1 乐段（13-20 小节）、B 乐段（21-28 小节）、间奏（29-32 小节）、A2 乐段（33-40 小节）、B1 乐段（41-49 小节）、连接（50-52 小节）、B2 乐段（53-60 小节）、连接部分（61-65 小节）、B3 乐段（66-80 小节）

A 乐段（5-12 小节）它包含了两个平行的乐句，为方整性的 4+4 小节乐句结构。a 乐句作为贯穿全曲的主题乐句，音域集中在中低音区。A1 乐句是 a 乐句的变化重复进行，和声功能的运用为 c 和声小调的主和弦到属和弦的交替进行，最终在第十二小节上收拢终止。A1 乐段（13-20 小节）是整个 A 乐段的变化重复，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歌唱旋律声部由原来的男声二声部转为了四个声部混声同时进行，增加了和声的厚度，因此，同样的旋律却给听众带来了不

一样的听觉体验，这也是作曲家在创作中的创新点所在。音乐在第十五小节（见谱例 5 中加入了下属和弦的功能，并且这两小节的分解和弦旋律中大量的运用了辅助音和经过音的和弦外音，给听众以无限遐想的空间，仿佛置身其中，心随乐动。B 乐段（21-28 小节）是乐曲的第一次高潮的陈述，同样是 4+4 的方整性乐句结构，整体的旋律进行由中低音区转为了中高音区，运用了突出主调化的作曲手法，增强了音响效果的厚重性，激发了听众更深层次的回忆。

谱例 **5**

3.4 中俄民歌音乐元素的巧妙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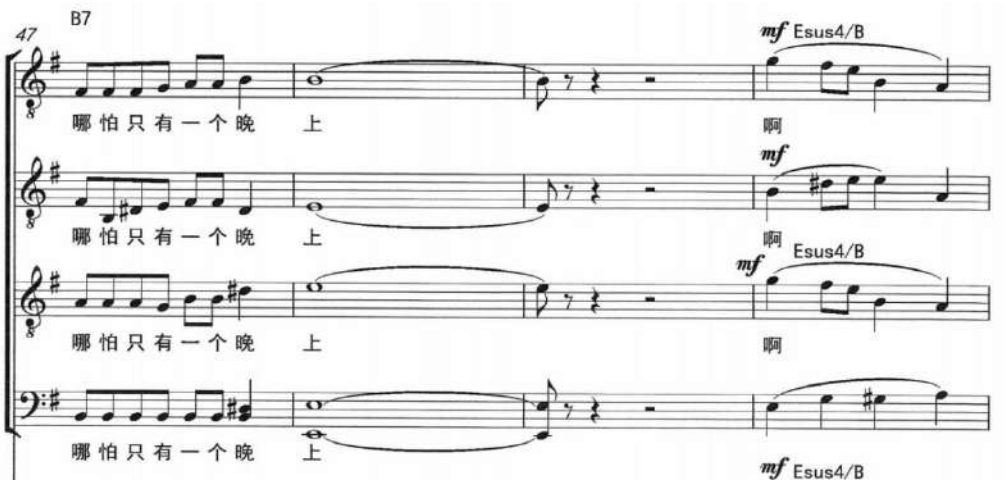
在歌词中提到的“海拉尔”“伊敏河”这些词语，都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地名，因呼伦贝尔与俄罗斯接壤。当地的生活和文化深受俄罗斯地区的影响与感染。词作者加入了具有俄罗斯经典曲目片段《红莓花儿开》与《三套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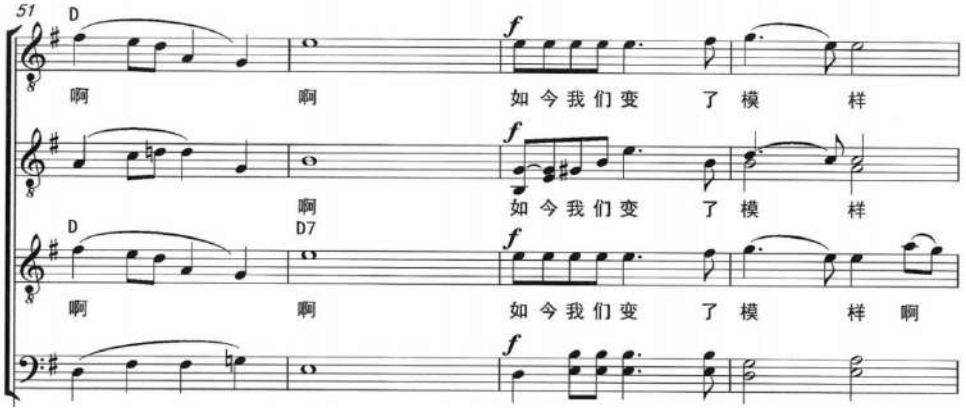
《红梅花儿开》是 20 世纪中期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的插曲，在 1951 年，获得了斯大林文艺奖金。这首歌曲旋律宛转悠扬富含有诗情画意，感情含蓄羞涩，表达了少女对心上人的思念之情，展现了革命时代的浪漫主义情怀，荡气回肠，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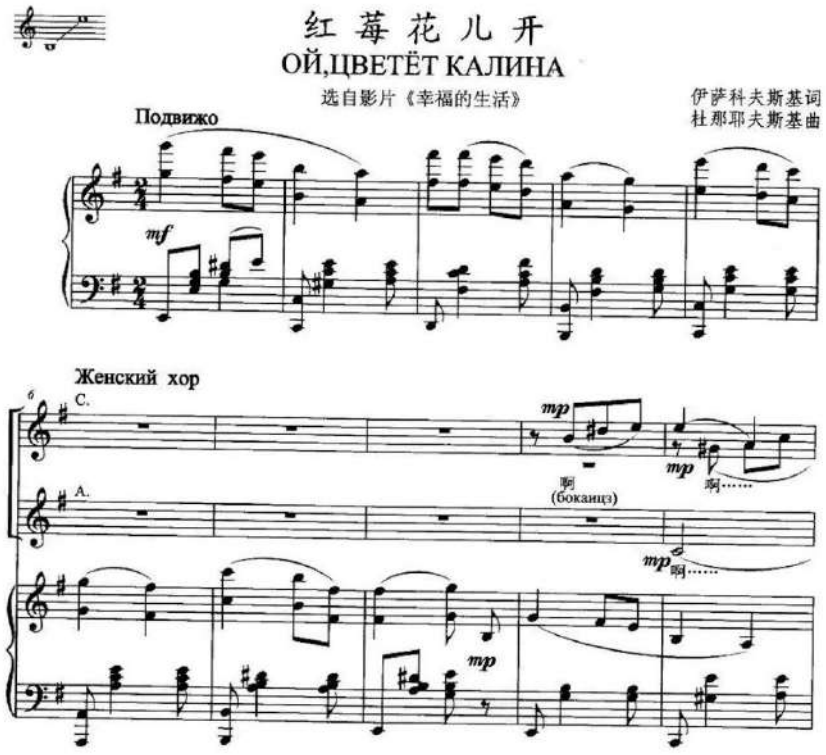
《三套车》是 20 世纪初当地著名的民间歌曲，大意为当时由于俄罗斯地广人稀，交通不便，马车成了人们重要的交通工具，而车夫的生活也格外漂泊，奔波在寂寞的长途，唱出了忧伤，凄凉的旋律。

《往日时光》作品中乐曲的 50-52 小节（见谱例 7）利用 53 小节 B 段主音 E 与《红梅花儿开》的 1-4 小节（见谱例 8）引子部分结束音 E 进行巧妙的连接，使音乐进行过度非常自然平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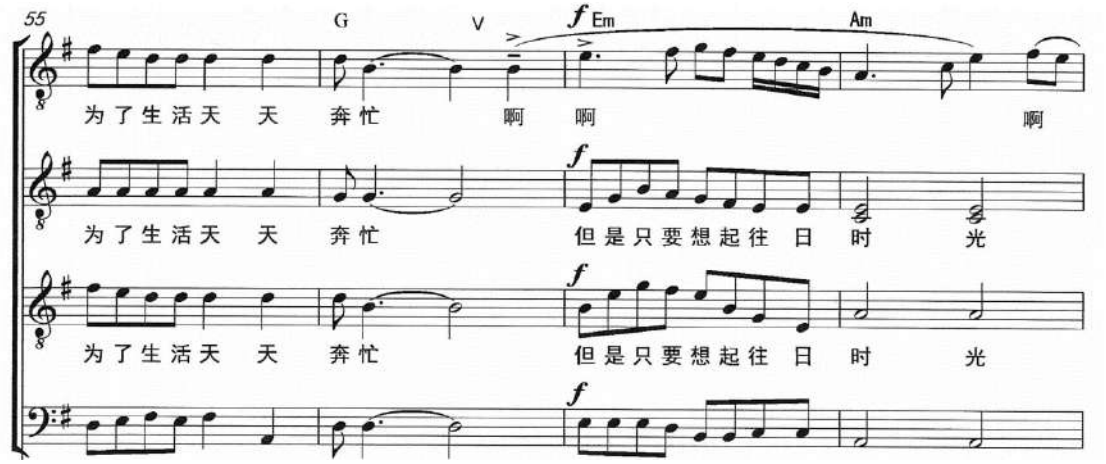
谱例 **6**


47
B7
mf Esus4/B
哪怕只有一个晚 上 啊
mf
哪怕只有一个晚 上 啊
mf Esus4/B
哪怕只有一个晚 上 啊
哪怕只有一个晚 上
mf Esus4/B

谱例 **7**

51
D
f
啊 啊 如今我们变 了模 样
啊 如今我们变 了模 样
D
D7
啊 啊 如今我们变 了模 样 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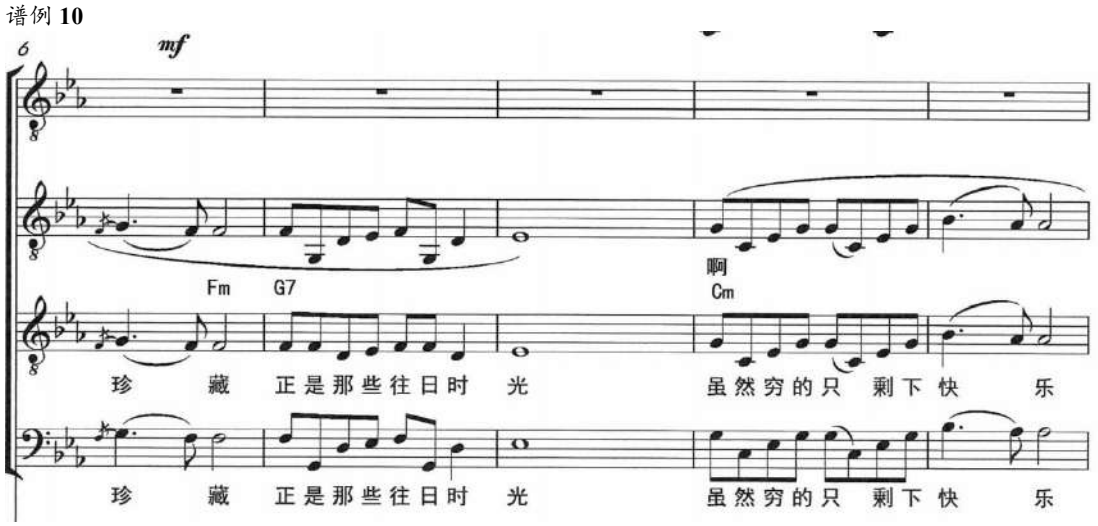
谱例 **8**

红莓花儿开
ОЙ,ЦВЕТЁТ КАЛИНА
选自影片《幸福的生活》
伊萨科夫斯基词
杜那耶夫斯基曲
Подвижо
mf
Женский хор
C.
mp
啊……
(боканцз)
A.
mp啊……
mp

音乐中56小节“奔忙”的“忙”尾音B，又一次与56-60小节的女高音声部唱的俄罗斯经典曲目《三套车》的副歌旋律开头音B融合了起来，并把整首乐曲推向了一个小的高潮（见谱例 9）《三套车》歌词与《往日时光》的歌词意图相近，曲作者把《三套车》的副歌旋律结合至此突出了忧伤，苍凉的感情色彩。这种巧妙的结合正是符合当代作曲家，把传统的民间乐曲引进到现代流行音乐中，是一种新的探索与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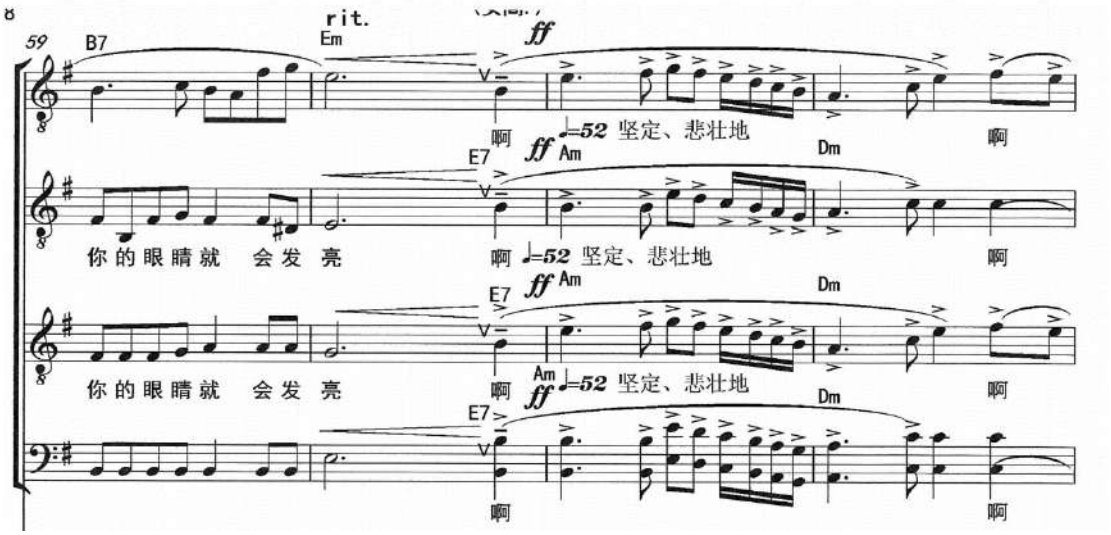
谱例 **9**

4. 声合唱《往日时光》的艺术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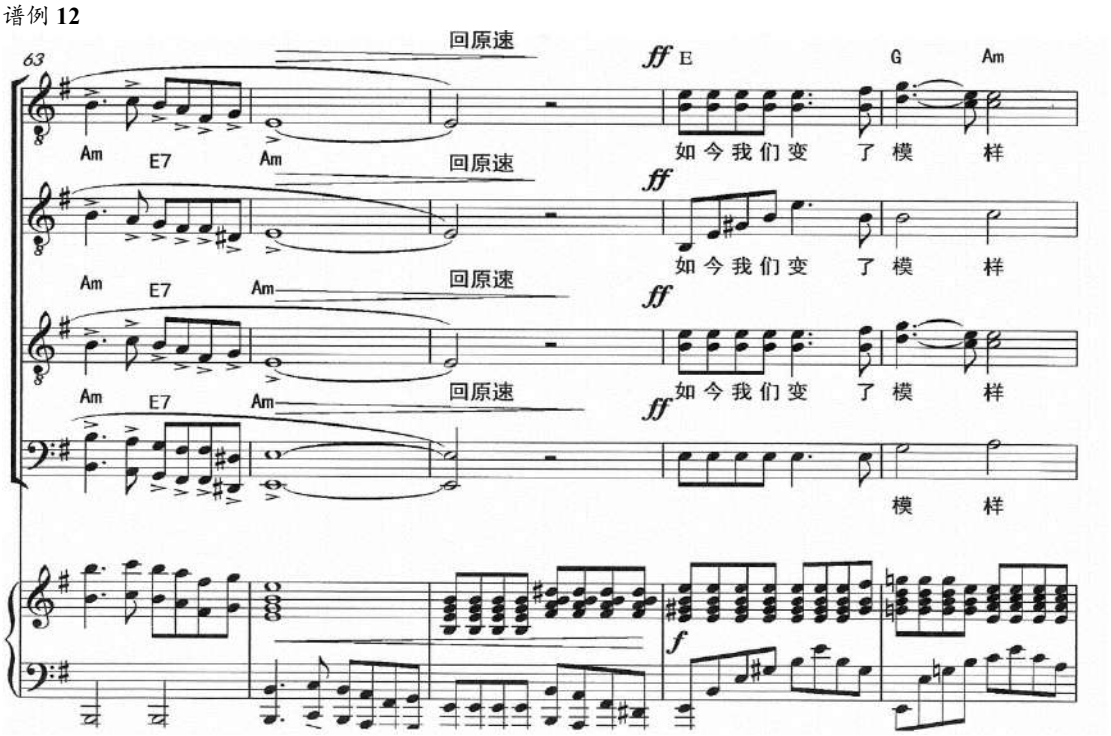
4.1 歌词叙述与衬词烘托巧妙结合

歌词的叙述朴实而深邃，衬词是歌曲的重要组成部分，衬词的运用是本曲目的一大亮点。乐曲第 9 小节（见谱例 10 生声部主旋律的陈述演唱与女低音声部运用了衬词“啊”演唱的巧妙结合，更增加了歌词的表现力，使歌曲的情感更加丰富，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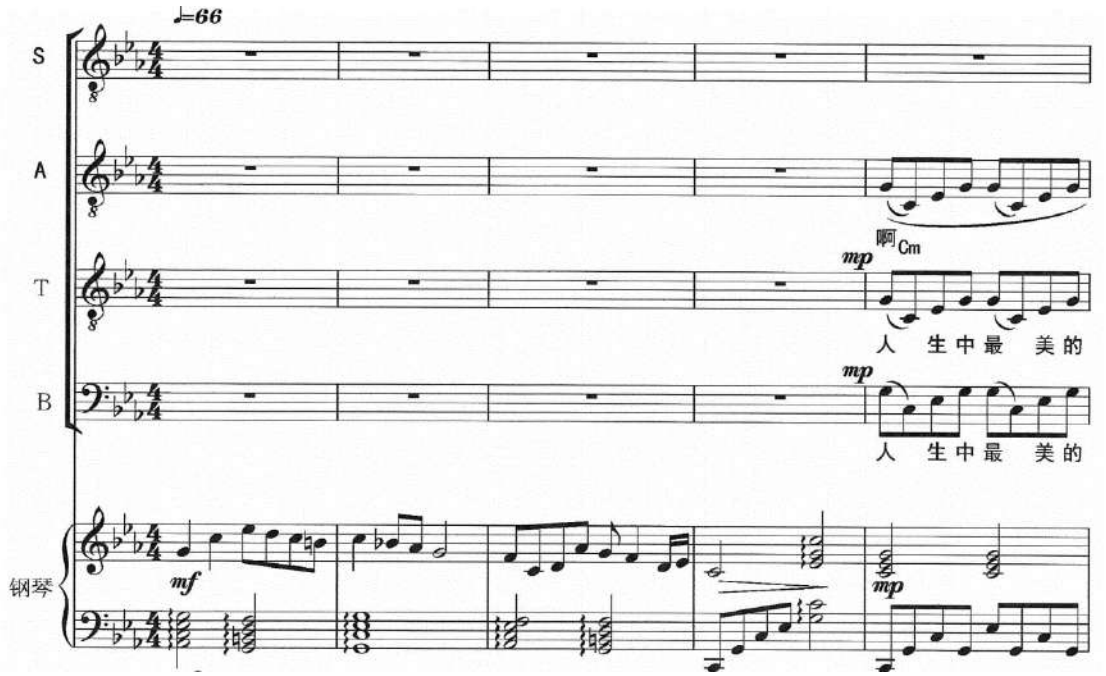
谱例 **10**

4.2 音乐进行中力度与速度等技术手段的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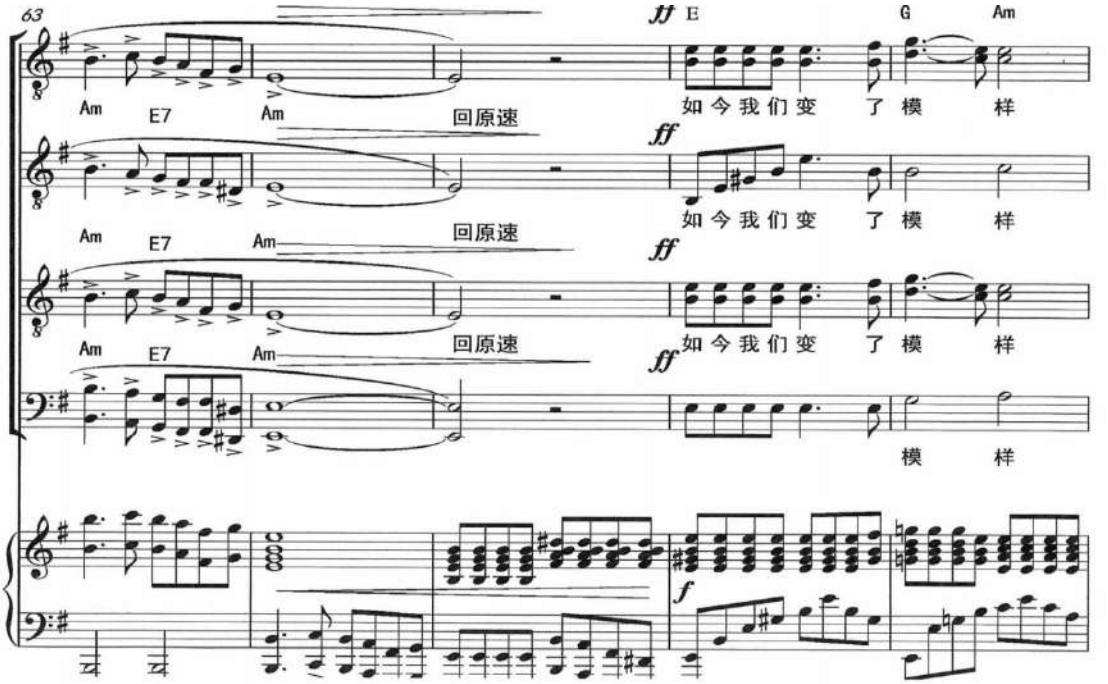
乐段中的情绪变化主要是通过音乐力度和速度的改变。60 小节（见谱例 11）上方标注 rit 渐慢的标识，使得谱面上附点二分音符的实际音响效果变为一个全音符的音响效果，并且伴随着渐强直至非常强的音量。61 小节每个音符上方都标注着重音符号，此处没有歌词，而是用衬词“啊”来唱出《三套车》主旋律的再现，要求演唱者坚定饱满地大声唱出每个音高，给听众以悲情壮烈豪迈的感情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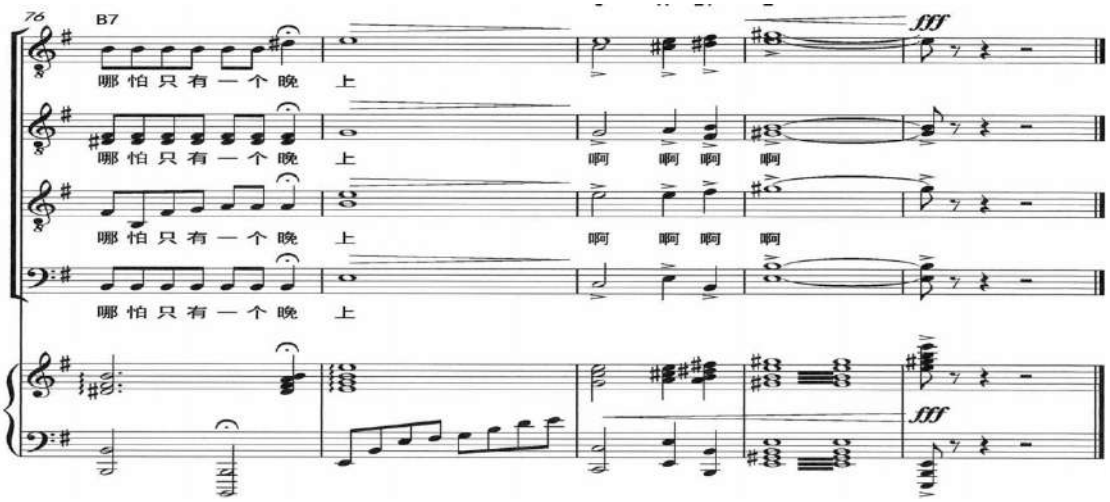
谱例 **11**

乐曲 64-66 小节（见谱例 12）歌唱时强弱要注意的是 64-65 由中强到渐弱，表达的整首乐句已经很充分，主音渐慢渐弱进行。两拍休止符过后，‘Fortissimo 的’很强的歌唱力度又再次把听众拉回现实迎接音乐下一次高潮的到来。这种“波浪形”的强弱音响效果使得整首乐曲更加生动形象。

谱例 **12**

4.3 丰富多变钢琴伴奏织体的运用

钢琴伴奏功能可分为塑造形象，互相补充，烘托气氛这三种类型。首先乐曲前奏部分 1-4 小节（见谱例 13）钢琴伴奏的上方声部为主旋律，运用了分解和弦增强了音乐中旋律的流动性。钢伴下方低音声部运用了柱式和弦和琶音进行，来衬托着主旋律。琶音和分解和弦这两种创作手法在塑造回想的气氛中与之非常契合，贴切，表现出往日的时光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流淌，把听众带入了无限的回忆中。

谱例 **13**

除此之外，乐曲第 64 小节 69 小节（见谱例 14），钢琴伴奏的织体有着明显层次上的加厚，最值得一提的是歌曲的 64,65 小节，当歌唱的声部保持着长时值的音符进行时，钢琴伴奏的低声部运用了八度音程的下行走向作为支撑，再一次将音乐推向高潮。

谱例 **14**

全曲左手低音部分多次出现的琶音运用了流行音乐的钢琴伴奏织体，容易让人接受，听上去非常悦耳，浪漫，使全曲在古典中融入流行，在流行中蕴含着古典，这种相互融合相得益彰。作品第 19 小节 6 连音的运用，音阶的上行级进，增加了音乐的流动性与张力。乐曲结尾处 79 小节（见谱例 15）钢琴低音的运用，充分的发挥了钢琴 88 个键音域的宽广，充当着低音乐器中贝斯的作用，给高音主旋律做铺垫，使得音乐的音响效果非常有厚度。并且加上了震音的使用，这是模仿交响乐当中定音鼓轮奏的演奏方法，听上去有非常恢宏的效果，给乐曲的强音收尾做了完美的铺垫。

谱例 **15**

5. 结语

人类社会的进步，对精神生活和文化艺术的追求愈加强烈。而当代作曲家把经典歌曲与现代流行音乐的融合并加入现代创作技法，也是时代的要求，使作品更加丰富多样，对于出新的合唱作品也赋予了更多希望。首先，流行合唱作品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与时代发展密切联系，既有现代的创作理念，又有融入民族民间音乐元素，这才真正反应出好作品来自于民间，十分接地气；其次，流行音乐和传统音乐的结合，吸引了更多的受众，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这对于合唱作品的创新与改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希望通过以上对合唱作品《往日时光》的音乐特征及艺术处理的研究，为广大合唱爱好者学习流行合唱作品经典与现代的融合特点提供一个探索的新途径。

参考文献

[1]汪健、武素霞（2014）。合唱训练与指挥设计。吉林：吉林音像出版社。

[2]田晓宝（2013）。中国当代合唱艺术的多元化发展。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3]马革顺（2003）。合唱学新编。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4]付林（2003）。中国流行音乐 20 年。上海：中国文艺出版社。

[5]陈家海（2013）。合唱艺术文论。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

[6]王拥军（2015）。合唱指挥艺术研究。北京：新华出版。

[7]曾遂今（2004）。《音乐社会学》。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8]崔继峰（1996）。通俗歌曲理论与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9]汪健、尹达（2010）。合唱训练教程。吉林：吉林音像出版社。

[10]田晓宝（2008）。室内合唱——当今中国合唱艺术发展的新思路。*人民音乐，10*，46-47。

[11]田晓宝（2006）。当今中国合唱艺术发展中若干问题与思考。*人民音乐，9*，47-49。

[12]田晓宝（2012）。当下多元化的中国合唱的美学品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119-124。

[13]王亮（2016）。高校合唱教学现状与创新发展。*音乐创作，11*，168-170。

[14]周正松（2005）。关于中国合唱发展的几点思考。*人民音乐，7*，40-41。

[15]余瑶（2020）。传播学视阈下的合唱艺术新发展——以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为例。*新闻前哨，5*，01-103。

[16]林伟伦（2018）。现代环境下少数民族合唱艺术多元化创作发展路径管窥。*贵州民族研究，8*，2-85。

[17]刘雯（2004）。**中国流行歌曲改编的合唱作品研究**。湖南师范大学。

[18]阙烁（2014）。**改变节奏等分形式的音乐追求及相关乐感训练**。天津：天津音乐学院。

清外销广绣商品的广式工艺与设计

The Cantonese Craftsmanship and Design of Qing Dynasty Canton Embroidery

吴颖露 泰国格乐大学国际学院艺术系 邮箱：66566183@qq.com

WU Ying-lu, International College, Krirk University,Thailand.Email:66566183@qq.com

摘要：广绣工艺与设计的独特性，是其作为具有能动性的社会行动者，在特定的历史与地理环境节点上，为了成功地周旋于本地工艺关系与外销贸易网络之间，而发展出的一整套高度成功的生存与发展策略的物质结晶。笔者对广绣商品的广式工艺与设计进行深入分析。可看到广绣并非被动的物品，而是具有能动性的社会行动者，它能在一个复杂的艺术圈——在本地生产关系与外销贸易网络这两个交织的场域中，通过其工艺与设计的调整，达到影响、感动或说服观者与使用者。

Abstract: The uniqueness of Canton embroidery craftsmanship and design lies in its role as an active social actor. At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junctures, it developed a highly successful set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o navigate between local craft relations and export trade networks.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antonese craftsmanship and design of Canton embroidery products. It reveals that Canton embroidery is not a passive object, but rather an active social actor. Within a complex art world—a field interwoven with local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export trade networks—it can influence, move, or persuade viewers and users through adjustments in its craftsmanship and design.

关键词：广绣 贸易 商品 设计 工艺

Keywords: Guangdong embroidery, trade, commodities, design, craftsmanship

1. 引言

自明代以来，广州是中国唯一有过三次“一口通商”的口岸城市（详细资料请参考：表1），至清代十三行时期的广州进出口贸易，几乎就是整个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由于全国的出口商品必须先集结广州，然后装上外国商船“漂洋过埠”，这样的模式不仅促进了广绣与国内苏绣、蜀绣、湘绣等优秀绣品的相互参照、取长补短，还有力促进了中西丝绸文化的融合与交

流，内外文化结合，进一步加快推动了广绣的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的广绣行业从设计、工艺、生产到销售都带有明显的外贸商业化特征。

表 1：刘瑜梅，2023，羊城学堂系列讲座《传承丝路精神弘扬海丝文化》整理

次数	年份	时长
第一次	1523-1566（明嘉靖年间）	43 年
第二次	1655-1684（清康熙年间）	29 年
第三次	1757-1842（清乾隆二十二年至道光二十二年签订《南京条约》止）	85 年

2. 十三行的广东刺绣贸易

2.2 从市舶司到粤海关的十三行贸易

广东自古海运贸易十分繁荣，海岸绵延数千公里，水陆交通便利，内陆腹地广阔；唐代起，经济中心由内地向沿海扩展，为加强对海运进出口事务的管理，在位处珠江入海口，南邻大海，北接中原的广州设立“市舶司”，是我国第一个对海关、外贸和外事的管理机构，标志着中国对进出口管理制度日趋成熟。市舶制度由唐到清初，经久不断，延续千年，起始终于广州，让广州成为我国历史最悠久且最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也为清代粤海关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明洪武初起 ，设三个市舶司城市，“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 ”（余思伟，1983）。随着海运贸易量的增加，出入境事务从陆地边关逐渐发展到沿海，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建立以“海关”命名的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在东南沿海设粤、闽、浙、江四个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其中以粤海关最为重要，唯监督由皇帝从内务府中钦派，以广招各国商人来华贸易。乾隆二十二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757-1842）因抵制“洋船北上，移市入浙”，限广州一口通商，粤海关的管辖范围覆盖了整个广东沿岸，包括现海南、广西、钦州等，成为中国海关的代名词，极尽显赫。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广东巡抚李士桢发布《分别住行货税》文告，将原经营贸易的牙行分为金丝行和洋货行两类，这使专营对外贸易的洋货行分离出来，逐渐发展为一种行业，后称“洋行”，是在清朝解封海禁，对外贸易发展后，应运而生的专营对外贸易的洋货行，俗称“十三行”。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禁止其他港口通商，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十三行”成为了清政府唯一对国际贸易的特区。当时的“十三行”商馆林立，形成了一个商人群体、一种贸易体制；它承揽对外贸易、传达政府相关法令、执行对外商的管理，担负着商务与外交的双重任务；它经营的贸易品类繁多，大量出口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制品，包括丝绸、茶叶、陶瓷等，引进西方的机械、医学、针织、石油、化工涂料等，是进出口贸易的集散地。在十三行时期，大规模的进出口贸易，西方大量的手工艺制品需求，使广州手工业的商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在丝织品作为出口大宗的带动下，刺绣品成为了丝织品的重要出口手工艺商品之一。（详细资料请参考：表 2）

表 2：1704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肯特号”贸易从广州购回货物清单（区宗华，1991）

商品	丝织品	云南铜	水银	青干姜	茶叶	陶瓷	胡椒	大黄
价格/两	80000	6180	17200	2000	14000	3500	3600	460

2.3 “中国风”与“西洋风”的广绣商品

从市舶市时代到十三行时代，广州口岸的手工艺部门，作为中西文化交融的南大门，犹如进水楼台，即得“国风”又得“西风”。此时代广州口岸的外销商品已形成了大批量、流水线生产规模，广东成为国内乃至世界专业化商品生产产业链最完善的地方，巧匠云集广州城，以省城广州为中心辐射珠江三角洲地区商贸繁荣，各类工艺发展臻与鼎盛。

广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洲地区织绣品的刺绣工艺，在十三行时期逐渐形成以海外销售为目的的商品化工艺特征，内销与外销并存，让广绣工艺步入市场化的贸易体系，商品化的生产模式逐渐趋向成熟，广绣工艺与其它工艺相互结合，使广绣商品的类别多样化，其品类包括服装面料、服饰成品、室内软装、生活用品和戏剧服饰等。

据十三行博物馆展览数据指出，清代中叶，广州城内有绣铺五六十家，生产量巨大。因全国各地绣品汇聚广州，早期的绣铺商人为能出售好价钱，广绣并没有专门标明的店铺经营，多和其它绣种一起在广州城内冠以“顾绣”的名称在店铺售卖。一方面反映了此时江浙地区顾绣发展迅速，以顾绣为代表的“画绣”成为最流行的商品，也反映了广绣在这时期融合了顾绣与其它绣种，进行了工艺的消化与发展，以适应市场的需求，大量对海外市场发扬“国风”。

随着外贸航线的成熟发展，除传统的欧洲航线，还开辟了北美洲、俄罗斯和大洋洲等航线，各国成立对东方贸易专营的公司，从广州出口批量生产的刺绣品，清广绣逐渐成为洋人贵族的时尚；此时期洋人还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刺绣品的订制，包括服装、名片、肖像等，此类刺绣商品订制图案形式多样，经广绣艺人的融合后，图案表现自成一派，逐渐趋向西方生活习惯和欣赏品味，形成结构明快，用色丰富、繁而不乱的风格，尽得“西风”。（如图 1）

图 1：约 1930 年的黑绸地广绣亭台人物纹长上衣

资料来源：广东省博物馆

3. 十三行手工业发展下的广绣工艺

3.1 上下手职能分工的广绣工艺

十三行时期，广州刺绣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广绣以广州为中心辐射周边珠三角地区，形成刺绣产品生产的产业链，以分工制作的行业模式进行经营。当时广州刺绣商店、作坊多集中在状元坊、新胜街、下九甫等地，为方便行业事务交流与沟通，成立行会组织——锦绣行，行会以大力支持与保护本土刺绣业发展为责，对广州城内的绣店和绣坊进行统一管理，对坊间的经营矛盾进行协调，同时在行会内设立会馆——绮兰堂，进行日常事务综合管理执事；规定只招刺绣男工，形成了广绣独有的以刺绣男工为主，刺绣女工为辅的协作方式。

广绣的制作以上下手进行职能分工，来自珠三角南海、番禺、顺德的农村妇女组成女绣工进行下手工的制作，以平针刺绣简单的图案部分，完成后送回广州城进行精细部分的上手工制作，上手工都由男性组成，俗称“花佬”，形成技艺以男工为上的刺绣产业结构，明确了职能管理，巩固了行业经营环境。此时期，大量的洋货刺绣商品需求，多为生活实用品，在使用过程中，原丝线制作的图案容易勾线或折损，这促使了刺绣商品的品质改良，刺绣艺人在使用中进行反复实验，将下手工简单平针绣图案改为实用线绣，上手工精细部分保留丝线绣，既保留了绣品的精细美观又实用，进一步巩固了职能分工模式（如图 2）；另外为了提高刺绣商品的产品适用性和生产效率，刺绣艺人创造了实用双面线绣技法，将双面绣进行了实用性的改良，运用到生活实用品中。这反映了当时广州的刺绣品贸易发展空前、分工细作，也促进了广绣商品趋向生活化和大众化的发展。

图 2：清外销马利拉大披肩，上下手丝线绣和线绣分工

资料来源：“广绣庄”郑乃谦先生收藏

3.2 材料多样融合的广绣产品

刺绣品市场活跃，手工艺人汇聚，促成了广绣品类的多元化发展。当时广绣品类包括：服装面料、服饰成品、室内软装、生活用品和戏剧服饰等；除市场流通商品外，还有宗教用品、

朝廷贡品和用品，品类多样。旺盛的外销内贡，成就了广绣的盛景，一度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给西方的礼物。”。在法国路易十四时期，宫廷男女服饰都以刺绣、折裥、蝴蝶结做装饰，贵妇高跟鞋的鞋面也是用中国丝绸、织锦为面料，上面绣着象征吉祥如意的麒麟、龙凤等精美的中国图案，有些贵妇甚至穿着中国刺绣的服装、披着中国刺绣的围巾、口袋装着中国刺绣的手帕，将自己打扮成中国传统的大家闺秀模样而大肆炫耀（谭瑞芳，2021）。折扇作为当时每个贵族小姐们都希望拥有的时尚必备流行单品，工艺应用极其丰富，刺绣也是该品类常用的工艺之一，还常与其它工艺结合进行制作（如图 3），多材质结合，这使刺绣的工艺优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丝绣品的工艺与其它工艺融合，大大推进了需求量，大量带刺绣的工艺融合品进入到欧洲贵族的生活场景中，涉及的品类越来越丰富，成为了生活风尚。

大量的西洋生活用品订单，促使了广绣的制作材料融合；广州作为进出口贸易集散地，发挥了其天然优势，各国制作材料汇聚，加上手工艺人们的巧思，广绣产品材料呈多样性发展。在清代“广东彩元绣庄”的广告单里可以看到，当时的各类绣品和刺绣材料，其中“珍珠翎毛，洋金古龙、缂丝戳纱、上绣翎毛、洋金银线、绒线杂货……”，这些都说明了当时广绣产品的材料丰富，在产品上会根据不同的生活场景和使用者的喜好进行用料，任君选择。据朱启钤《存素堂丝绣录》中广绣的记载：“铺针于豪芒，下针不忘规矩，以马尾缠作勒线，从而勾勒之，轮廓花纹自然，工整、明显，针眼掩茬，天衣无缝”；屈大均《广东新语》中记载：“以孔雀毛绩为线缕，以绣谱子及云肩袖口，金翠夺目，亦可爱；其毛多买于番舶，毛曰”珠毛“，盖孔雀之尾也”（屈大均，1985）。对应了上述广告单上的材料，说明了广绣艺人除了运用常用的材料，还创造性地使用马尾以及海外的孔雀羽毛线缕和勒线刺绣，国内外材料大融合，呈多样性和探索性发展，质感丰富，技艺高超。

图 3：清玳瑁骨双面广绣贴象牙人物花鸟折扇

资料来源：十三行博物馆

4. 进出口贸易推动下的广绣设计

4.1 “前店后坊”的设计工坊

“前店后坊”是一种传统的经营模式，即以“前店”经营为主的临街商铺，加“后坊”生产为主的工作坊的组合式格局，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缩影。十三行时期，广州城内遍布绣坊、绣庄，清末广州民间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广绣广绣，广府名流。神功会景，官袍锦绣，荷包绣片，漂洋过埠。赊佬绣工，养家活口，工精艺好，仲靠揽头，若无阔佬，衣食难求

（龚伯洪，2010）。说出了当时广东刺绣产业的商业景况——揽头招揽生意，给绣花艺人进行制作，前店后坊经营，分工有序，艺人辛苦劳作，得到可观的报酬。最繁荣的时候，广州刺绣有绣坊、绣庄五十多家，下九甫光雅里有“和安”、“和盛”等店经营披肩、绣巾等洋庄货，状元坊有“鸿章”、“余茂隆”等经营顾绣戏服，新胜街有三四十家经营绣画、会景等。为挣得生意，各绣铺各有特色，形成各种市场流通的刺绣商品，从设计到制作巧立心思。

“来图定做，岁无定式”的设计工坊，形成了顾客来图或想法定制，在店里落实刺绣设计图，后坊手工艺者完善样品构想，再发单到周边工场进行量产的经营模式。在这张清末刺绣图案图纸上展现了当时手工艺人接单的披肩项目，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图案设计的工作流程。据这张图案来源广绣庄的负责人郑乃谦先生说：“这是广州博物馆出的书里的图案，这个图案，研究人员并不知道是披肩图案，这个图案大概就一个火柴盒那么大，我们将它放大，放大了之后发现是披肩图案之后，然后我们就设计，将它拼出来，这是 4/1，拼出来四方连续图案，运用当时的常用色，上了颜色，做了样板，展示给西班牙的进口商看后，他们觉得风格非常具有西班牙特点，由此证明这个是当时西班牙来图生产的披肩图样。图片上还有个西班牙文图章，图章中文字翻译出来是 1877 年，在中国广东做刺绣的。”（如图 4）在这广绣发展的全盛时期，为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绣庄、绣坊会自行设计图案，绣制样品，供外商选择，也会按外商提供的图案或样品，专门订制，这使广绣的风格中西融合，外销绣品深合西方人的审美趣味，一度引领欧美的社会时尚。

图 4：清外销马利拉大披肩，上下手丝线绣和线绣分工

资料来源：广绣庄

4.2 刺绣商品化的设计体现

商贸的繁荣让广绣产品形成商品化、产业化发展，广绣设计趋向生产标准化，分工进一步细分，既保证质又提高量。据《佛山忠义乡志》记载：“佛山镇刺绣手工业行会名‘顾绣行’，专造各种刺绣品，或雇工人在店制造，或发四乡女工接绣。行销本省及广西地方，多设于长兴街等处。”，可见刺绣业接单、发单的生产经营，促使上文提到的上下两道工序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周边地区绣娘完成粗加工第一道下手工工序，广州城里“花佬”完成精加工上手工工序，完整的流水线操作，完善了既定的生产标准操作模式，稳定了生产线结构。

广绣设计以消费者需求为考量，实行刺绣生产计划，获利价值。据《千年广绣》记录，广绣艺人不但技艺高超，而且善于迎合市场需求，第一单来样订制广绣产品大约是清初期，一位英国商人拿着服饰图样，来到广州绣坊订制绣品。因为这个图样是西方油画风格，讲求透视和光线折射效果，这对当时的广绣作坊的艺人们出了一个不小的考验，但艺人一番琢磨后，刺绣艺人巧妙采用采用增加绣线及改革绣法的方式，丰富绣品色彩与光影的表现力，完成了产品，受到了广大客商的欢迎。逐渐形成了中西交融的视觉风格，新的产品规划，新的工艺应用，多样的订单需求，使行会对遍布城内的绣坊、绣庄进行管理，据朱启钤《丝绣笔记》记载，绣品的工时、用料、图案、色彩、规格、工价等，都有具体的规定。合理规范成本，使利润增加，指引了刺绣产品的规划，也使刺绣经营的商品化、体系化和规模化都日趋成熟。

广绣设计产品与行销配合，刺激购买欲。据《十八世纪中国出口艺术品》的作者朱尔丹描述：“18 世纪，英国贵妇使用着中国刺绣艺人绣的双面刺绣围巾。还有一些时髦的贵妇与小姐将设计、剪裁好的服装、名片，通过东印度公司运送到中国，请中国刺绣匠师刺绣。”这为广绣的设计吹入了一股华丽的异域流行风，用户的特殊需求，也让绣坊、绣庄各显特色，在设计图案上进行特殊化处理，每个绣坊都拥有自己特殊的图案设计，同时产品设计与行销相配合，在当时的刺绣产品中可以看到商品化的整体推广设计的营销规划，绣品以每个绣坊、绣庄为品牌，进行广告营销和独立包装。（如图 5）

图 5：清广绣紫红缎地花鸟牡丹纹床罩

资料来源：十三行博物馆

5. 结论

通过对广东刺绣贸易的研究，看到了十三行时期的广东刺绣产品呈现出手工业的商业发展进程；多样化、精致化和商品化的产品，是手工艺从业者的创造性劳动，手工艺对当时贸易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首先，在工艺特征上，形成了中西结合的特点，色彩受中原文化、海洋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影响，用色更加丰富；材料的使用，出现了各类综合线品材料的应用，不再局限于丝绒线，这使刺绣针法的运用上更加多样，现存的针法就有五六十种，绣品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征。其次，在生产发展上，广绣的产品线随着贸易强度的加大，出现了上下手工的

生产模式，该生产线辐射珠三角周边地区；以广州为中心，城村镇结构的生产模式完善，这使产量不断提升，迈向了日益成熟的商品化进程。再次，在行业结构上，绣品产量的增加，也催旺了刺绣业的经营；在高峰时期，广州有绣坊、绣庄六七十家，绣工多达三千多人；行会“锦绣行”在广州成立，规定只有男绣工入行会，女绣工为从属，这以男性绣工为主导的行业结构，使刺绣正式成为了一种职业形式。

从以上刺绣品的商业化的进程中，工艺与设计不断被该时期的手工艺从业者进行改良，调整生产结构与模式；正如沈从文所说，广绣在创作方面“突破了苏绣文人画的局限”,“充满对于自然环境的倾心”,“充满本地刺绣创作上的热情和天真”,“充满了民间趣味”（沈从文，1962）。其实这些独放异彩的突破有着它历史必然性，清代地域的商业优势使手工艺刺绣产品在不断商业化操作中改变，成为了中国岭南珠三角地区手工业的发展的重要手工艺，形成了独特的“广式”制式，是该地区绣种设计与制作的特色风格。

参考文献

[1]蔡鸿生（2019）。**广州匠图志。**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

[2]龚伯洪（2010）。**万缕金丝:广州刺绣。**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

[3]杭间（2007）。**中国工艺美学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4]林明体（1988）。**广东工艺美术史料。**广东：广东省工艺美术工业公司，广东省工艺美术学会。

[5]区宗华（译）（1991）。**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原作者：H.B.Morse）。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

[6]屈大均（1985）。**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

[7]沈从文（1962）。谈广绣。*羊城晚报*，8，9

[8]谭瑞芳（2021）。中西融合 引领时尚——清代的外销广绣艺术品。*东方收藏*，3，5-10

[9]谭元亨（2015）。**广州十三行——明清 300 年艰难曲折的外贸之路。**广东：广东经济出版社

[10]谭元亨（2021）。**十三行史稿。**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

[11]余思伟（1983）。清代前期广州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73-83。

《可持续发展视域下舞蹈编创的融媒介创新路径研究》

A Study on Innovative Pathways for Cross-Media Integration in Dance Choreography from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张爽 泰国格乐大学国际艺术学院 艺术系 邮箱 zhangshuang5399@126.com

Zhang Shuang,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Krirk University, Thailand. Email:zhangshuang5399@126.com

摘要：在媒介技术不断进步与舞蹈艺术可持续发展需求日益增长的推动下，融媒介已成为当代舞蹈编创实现跨学科突破与艺术价值提升的重要方向。本文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案例研究与行动研究方法，结合笔者的创作实践、教学探索与行业调研，对舞蹈编创风格演变进行系统考察。研究发现，舞蹈编创由以传统舞台为中心、强调肢体叙事与单一艺术表达的形态，逐步转向以导演思维主导、多媒介融合为特征的创新形态，实现了与戏剧、

数字技术、直播媒介及公共文化空间的深度融合。基于创作实践、课程建设、学术传播、行业调研与公共教育等多维路径，本文提出融媒介创新推动舞蹈编创可持续发展的三条机制：通过拓展传播场景扩大传播边界与受众覆盖，通过导演思维与技术赋能革新编创方法，以及依托产教融合与公共参与强化舞蹈艺术的社会价值与文化活力。研究认为，舞蹈编创中的融媒介创新并非技术手段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系统性转型，为舞蹈艺术的长效传承与创新发展提供实践范式。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舞蹈编创；融媒介；艺术实践

Abstract: Driven by advances in media technology and increasing demand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ance art, media convergence has become a key direction for contemporary choreography to transcend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nd enhance artistic value.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mploys literature review, case study, and action research to examine the stylistic evolution of dance choreography in relation to the author's creative practice, pedagogical exploration, and industry investiga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a shift from stage-centered choreography emphasizing bodily narration and singular artistic expression toward innovative forms characterized by directorial thinking and multi-media integration, enabling deep integration with theater, digital technologies, live-streaming media, and public cultural spaces. Based on creative project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cademic dissemination, industry-oriented research, and public education initiatives, the study identifies thre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media convergence supports sustainable choreographic development: expanding dissemination contexts and audience reach, transforming choreographic methodologies through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directorial thinking, and enhancing social value and cultural vitality through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public engagement.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media convergence in dance choreography represents a systematic transformation oriented toward sustainability rather than a simple accumulation of technologies, providing practical paradigms for the long-term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dance art.

Key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ance Choreography; Converging Media; Artistic Practice

1. 引言

在数字技术迭代与文旅融合推进的背景下，舞蹈编创面临多重挑战，融媒介融合成为其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立足可持续发展理念，结合笔者在舞蹈编创、教学、行业调研及公益普及的实践经验，梳理舞蹈编创融媒介创新的演变逻辑与实践策略，构建全链条可持续发展路径，旨在为舞蹈艺术传承发展提供理论框架与实践方案，兼具理论与实践双重意义。

1.1 研究背景

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与文旅融合的深度推进，媒介形态的多元化变革正深刻影响着艺术创作的底层逻辑。舞蹈艺术作为以肢体为核心表达载体的传统艺术形式，在新时代背景下面临着受众审美迭代、传播场景拓展与行业需求升级的多重挑战，其可持续发展亟需突破传统创作与传播的边界。在此语境下，融媒介融合成为舞蹈编创创新的重要方向，通过整合舞蹈、戏剧、数字技术、直播媒介、公共文化空间等多元要素，实现艺术表达的多维延伸与价值扩容。

笔者长期深耕舞蹈编创、教育教学与行业实践一线，兼具丰富的创作经验与教学实践经验。从早期参与传统舞台舞蹈创作，到近年来主导沉浸式戏剧、民族舞剧等融媒介项目，从开发专业课程、开展学术讲座，到深入企业调研、推进产教融合与公益普及，笔者深刻感知到融

媒介融合对舞蹈编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赋能作用。基于自身一系列艺术实践经历，本文聚焦舞蹈编创的融媒介创新路径展开研究，以期为舞蹈艺术的长效传承与创新发展提供实践指引。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文立足可持续发展理念，结合自身实践梳理舞蹈编创融媒介创新逻辑、提炼策略并构建发展路径，兼具理论与实践双重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文立足可持续发展理念，结合笔者的创作实践、教学探索、行业调研与公益普及经历，系统梳理舞蹈编创融媒介创新的演变逻辑，提炼融媒介创新的实践策略，构建“创作创新 – 教学转化 – 行业对接 – 公益普及”的全链条可持续发展路径，明确融媒介创新在舞蹈艺术传承与发展中的核心价值，为舞蹈编创者、教育者及行业从业者提供可借鉴的理论框架与实践方案。

1.2.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层面，本文将可持续发展理论与舞蹈编创实践深度结合，聚焦融媒介融合这一前沿议题，丰富了舞蹈艺术创新领域的研究维度，厘清了融媒介创新与舞蹈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关联，填补了传统舞蹈研究中“实践导向”与“行业对接”的薄弱环节。

实践意义层面，本文以笔者的真实实践案例为核心支撑，包括沉浸式戏剧创作、舞剧编创、专业课程开发、学术交流、访企拓岗、公益培训等，提炼的融媒介创新路径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与复制性。既能为舞蹈编创者提供创新思路，助力其突破创作瓶颈；也能为舞蹈教育机构提供教学改革参考，推动课程体系与行业需求精准对接；同时可为行业发展提供人才培养与价值拓展的方向，实现舞蹈艺术社会效益与行业效益的协同提升。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行动研究法，结合笔者的艺术实践项目展开研究，整体框架分为引言、演变逻辑与驱动因素分析、核心实践策略提炼、可持续发展路径构建、结论与展望五个章节。

1.3.1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可持续发展理论、舞蹈编创理论、融媒介融合相关文献，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厘清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础，为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案例研究法：以笔者主导或参与的艺术实践项目为核心案例，包括长沙市美术馆沉浸式戏剧《情&理》、舞剧《盘王之恋》、《编舞技术技法》课程开发、访企拓岗调研、公益大课堂等，深入剖析各案例中融媒介创新的实施过程、核心策略与实践效果。

行动研究法：以笔者的实践行动为研究对象，贯穿创作、教学、调研、普及全流程，通过“实践–反思–优化–再实践”的循环模式，验证融媒介创新路径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提炼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逻辑。

1.3.2 研究框架

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引言，阐述研究背景、目的、意义、方法与框架；第二章梳理舞蹈编创融媒介创新的演变逻辑与驱动因素，结合笔者实践经历分析风格转型的核心特

征；第三章基于实践案例，提炼舞蹈编创融媒介创新的核心实践策略；第四章构建融媒介创新赋能舞蹈编创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体系；第五章为结论与展望，总结研究成果，提出未来发展方向。

2. 舞蹈编创融媒介创新的演变逻辑与驱动因素

舞蹈编创的融媒介创新经历了从单一舞台肢体叙事，到导演思维引领多媒介协同创作的渐进式风格转型，笔者早期舞台作品与近年沉浸式戏剧、民族舞剧等实践，直观呈现了这一转变。而数字技术革新的支撑、行业与受众需求升级的驱动、艺术实践探索的奠基，这三重因素共同赋能，推动舞蹈编创突破舞台边界，拓展艺术表达层次与传播场景，为舞蹈艺术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

2.1 演变逻辑：从单一舞台到多元融合的风格转型

舞蹈编创的融媒介创新并非偶然出现，而是经历了从“单一舞台聚焦”到“多元媒介协同”的渐进式转型。早期舞蹈编创以传统舞台为核心载体，创作逻辑聚焦于肢体语言的叙事性与艺术性表达，媒介应用局限于舞台灯光、服饰、音乐等辅助元素，核心目标是通过纯粹的肢体动作传递情感、讲述故事。笔者早期的创作实践亦遵循这一逻辑，如参与实景剧《白蛇传》主演、民族舞剧《浏水人家》编导等，作品均以舞台为核心场景，聚焦肢体表达的精准性与艺术感染力，凭借扎实的创作功底斩获中国舞蹈“荷花奖”十佳作品奖、湖南省艺术节“田汉大奖”等荣誉。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与行业需求的升级，舞蹈编创逐渐突破舞台边界，进入多媒介协同创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编创不再局限于肢体语言本身，而是以导演思维为引领，整合戏剧、数字技术、直播媒介、公共文化空间等多元要素，构建多维叙事逻辑。笔者近年来的创作实践充分体现了这一转型，如主导长沙市美术馆沉浸式戏剧《情&理》，将舞蹈与美术馆的展览空间、视觉艺术作品深度融合，让舞者与观众、场景形成实时互动；担任舞剧《盘王之恋》执行导演，融入瑶族文化元素与数字投影技术，构建沉浸式民族文化场景，实现舞蹈与地域文化、数字媒介的协同表达。这种转型不仅丰富了舞蹈的艺术表达层次，更拓展了舞蹈的传播场景与受众群体，为舞蹈艺术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2.2 驱动因素：技术、需求与实践的三重赋能

数字技术革新为融媒介创新提供技术支撑。近年来，数字投影、互动装置、直播技术等的快速发展，为舞蹈编创提供了新的表达工具与传播渠道。如在《情&理》沉浸式戏剧中，借助美术馆的空间布局与视觉技术，实现舞蹈叙事与场景氛围的精准匹配；直播技术的普及则催生了舞蹈直播编导、舞蹈才艺主播等新兴岗位，推动舞蹈编创向直播场景延伸。

行业与受众需求升级为融媒介创新提供核心动力。通过访企拓岗调研发现，舞蹈教育行业对“舞蹈专业功底+综合运营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需求日益迫切，直播行业则明确提出舞蹈直播编导、内容策划等岗位需求，要求从业者兼具舞蹈专业能力与直播运营能力。同时，受众对艺术体验的需求从“被动观看”转向“主动参与”，沉浸式、互动式的艺术形式更受青睐，这推动舞蹈编创从“舞台表演”向“多元场景体验”转型。

艺术实践的持续探索为融媒介创新提供实践基础。笔者长期深耕舞蹈编创、教育教学与行业实践一线，通过长期的创作、教学与行业交流，积累了丰富的融媒介实践经验。如主讲“导演思维视域下的舞蹈创编与跨媒体实验”学术讲座，与先锋实验导演罗丹围绕舞蹈与多元媒介的融合应用展开深入交流探讨，提炼融媒介创作的核心逻辑；通过《编舞技术技法》课程开

发，将融媒介编创理念融入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借助公益大课堂普及融媒介编创技法，扩大舞蹈艺术的社会影响力，这些实践探索为融媒介创新路径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

图 1：《导演思维视域下的舞蹈创编与跨媒体实验》讲座图片

资料来源：长师艺科 https://mp.weixin.qq.com/s/_KriX7DBwQFLZoOwRCs72w

3. 舞蹈编创融媒介创新的核心实践策略

舞蹈编创融媒介创新可从创作、教学、行业、普及四个维度推进：创作端以导演思维统筹多元媒介，适配项目主题打造协同作品；教学端将融媒介理念融入课程体系，并通过学术交流拓宽学生视野；行业端依托访企拓岗精准对接需求，构建产教融合的闭环培养机制；普及端以公益活动为载体推广编创技法，借助新媒体拓展传播边界，助力舞蹈艺术可持续发展。

3.1 创作端：导演思维引领的多媒介协同策略

融媒介创作的核心在于以导演思维统筹多元媒介，实现艺术表达的协同增效。笔者在创作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导演需在创作初期明确艺术表达方向，通过与设计师、技术人员的深度沟通建立统一的美学标准，避免媒介元素的简单叠加。以自身作品《皿方罍》为例，排练厅版本聚焦肢体语言的精准表达，而舞台版本则融入灯光、影像等综合媒介，构建多维叙事逻辑，让肢体动作与媒介元素形成互补，提升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在具体创作中，需根据项目主题与场景特点选择适配的媒介组合。如在长沙市美术馆沉浸式戏剧《情&理》中，采用“舞蹈+戏剧+视觉艺术”的媒介组合，以美术馆的展览作品为叙事背景，舞者的肢体动作与展览内容形成互动，让观众在参观展览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舞蹈的魅力；在舞剧《盘王之恋》中，采用“舞蹈+数字技术+地域文化”的媒介组合，通过数字投影还原瑶族山水场景，用肢体动作演绎瑶族文化故事，实现艺术表达与文化传承的协同。同时，要注重技术服务于情感共鸣，如在文旅项目创作中，动态投影与舞台场景的协同编程需围绕地域文化叙事展开，注入情感温度，避免沦为冰冷的科技秀。

3.2 教学端：融媒介理念融入的课程体系构建策略

舞蹈编创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人才培养，需将融媒介创新理念融入课程体系，培养适应行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笔者牵头与张华、江慧共同开发的《编舞技术技法》课程，正是这一策略的实践探索。该课程突破传统编舞课程聚焦肢体动作的局限，引入导演思维与融媒介理念，引导学生从“动作编排”转向“叙事构建”，学习运用多元媒介丰富艺术表达。课程内容涵盖融媒介编创理论、技术应用技巧、案例分析与实践创作等模块，通过“理论讲解+实践操作”的模式，提升学生的融媒介创作能力。该课程凭借创新的教学理念与实践效果，入选第十三届全国“桃李杯”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湖南赛区“优秀教师精品课”，其微课作品还荣获湖南省首届高校网络教育优秀作品推选展示活动奖项。

此外，需通过学术交流与行业对接拓宽学生的视野。笔者受邀前往长沙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开展“导演思维视域下的舞蹈创编与跨媒体实验”学术讲座，面向艺术与科技专业学生分享融媒介创作经验，解答学生关于“数字技术如何平衡艺术表达”“编舞如何与多媒体设备更好交互”等问题，助力学生打通理论与实践壁垒。同时，在舞蹈大赛评审中，引导学生注重作品文化底蕴的挖掘与媒介表达的创新，鼓励学生探索舞蹈与多元媒介的融合路径。

图 2：《编舞技术技法》现场展示

资料来源：湖艺团小青 https://mp.weixin.qq.com/s/8wJwIMK0VCyVs6eQP9u-ng

3.3 行业端：需求导向的产教融合策略

融媒介创新需精准对接行业需求，通过产教融合实现人才培养与行业发展的同频共振。笔者积极参与访企拓岗专项行动，先后走访湖南舞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宝宝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企业，深入了解行业对舞蹈编创人才的需求。调研发现，舞蹈教育行业注重“以赛育人”“科技赋能”，需要兼具编创能力与教学能力的人才；直播行业则需求舞蹈直播编导、内容策划等岗位，要求从业者具备舞蹈专业功底与直播运营能力。

基于行业需求，相关教学单位需优化课程体系，增设直播编导、内容策划、数据分析等相关理论与实训课程，帮助学生提前适应新兴岗位工作模式。同时，建立“企业需求—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岗位输出”的闭环培养机制，通过校企协同开展实践育人、专业共建、就业创业合作，推动教学内容与行业需求紧密衔接。如与湖南舞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围绕“实践育人、专业共建”达成共识，共同培养符合舞蹈教育行业发展的实用型人才；邀请行业专家参与国际标准舞专业研讨，共同探讨人才培养方向，打造“精、尖、高”人才，强化学生实习实训与服务意识。

3.4 普及端：公益驱动的融媒介编创技法推广策略

舞蹈艺术的可持续发展需扩大社会影响力，通过公益普及让更多人了解并参与舞蹈编创。笔者积极参与由湖南省民办教育协会艺体美专业委员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舞蹈专业公益大课堂，以“以戏剧思维拓宽舞蹈创作边界”为主题，为岳阳市校外培训机构从业者分享融媒介编创理念与实操技法。在培训中，通过具体案例解析舞蹈创作的核心概念，讲解如何在教学中转化创作理念，提升教学的专业性与创新性。培训过程中注重互动交流，针对从业者在教学与创作中遇到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助力其专业成长，进而推动区域舞蹈行业的发展。

图 3：《以戏剧思维拓宽舞蹈创作边界》舞蹈公益课堂现场

资料来源：活动拍摄 https://mp.weixin.qq.com/s/cXAUnCFvkjs89U5xJsRppg

公益普及还可结合融媒介技术拓展传播渠道，如通过线上直播开展公益讲座，让更多人便捷获取融媒介编创知识；制作融媒介编创教学短视频，在新媒体平台传播，扩大普及范围。同时，可依托基层文化服务项目，深入艰苦边远地区开展舞蹈编创培训，分享创作经验与优秀作品研究成果，助力基层文化人才建设，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以专业能力践行舞蹈艺术的社会价值。

4. 融媒介创新赋能舞蹈编创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体系

融媒介创新从三大核心路径为舞蹈编创可持续发展赋能：一是拓展传播边界，实现场景多元化延伸与受众群体拓宽，夯实发展基础并形成良性循环；二是革新创作理念，推动编创从“肢体本位”转向“多元协同本位”，激活创新动力；三是强化社会价值，拓宽价值维度，让舞蹈艺术深度参与文化传承、公益服务等领域，注入持久发展动力。

4.1 拓展传播边界，夯实可持续发展的受众基础

融媒介创新打破了传统舞蹈“剧场中心”的传播局限，实现了传播场景的多元化延伸，从剧场拓展到美术馆、乡村、直播平台、校园等多元空间，进而拓宽了受众群体。如长沙市美术馆沉浸式戏剧《情&理》通过舞蹈与展览空间、视觉艺术的深度融合共创，吸引了大量美术馆参观者，这些受众并非传统舞蹈观众，却通过沉浸式体验感受到了舞蹈的魅力；舞剧《盘王之恋》以“舞蹈+数字技术+地域文化”的融媒介形态，在盘王节与长沙市杜鹃花艺术节上演，既覆盖了城市观众，也让乡村群众在家门口欣赏到专业舞蹈作品；舞蹈直播则通过实时互动的融媒介传播形式，吸引了年轻受众群体，显著提升了受众的参与感与粘性。

受众群体的多元化拓展，为舞蹈编创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一方面，更多受众的关注与参与为舞蹈作品提供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提升了舞蹈艺术的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受众需求的多元化反馈也为舞蹈编创提供了创新灵感，推动编创方向更加贴近大众需求，形成“创作-传播-反馈-优化”的良性循环。

图 4：“华艺百年 舞苑芳华”舞蹈学院第十五届舞蹈大赛决赛合影

资料来源：湖艺舞院 https://mp.weixin.qq.com/s/sf8t-ADFIR4kijozpa-eHA

4.2 革新创作理念，激活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动力

融媒介创新推动舞蹈编创理念从“肢体本位”转向“多元协同本位”，激活了创作的创新动力。在传统编创理念中，肢体动作是唯一的核心表达载体，而融媒介理念则强调以叙事为核心，通过多元媒介的深度融合共创实现表达升级，并非简单叠加不同媒介元素。这种理念革新让舞蹈编创突破了传统思维的束缚，探索出更多创新路径，如舞蹈与直播的实时互动融合、舞蹈与沉浸式展览的空间共生融合、舞蹈与科技的技术赋能融合等。

创作理念的革新还体现在对文化传承与时代主题的深度契合上。如舞剧《盘王之恋》以瑶族乡村文化振兴为主题，通过融媒介编创将数字投影技术与瑶族文化、肢体表达深度融合共创，既生动传承了民族文化，又精准呼应了时代主题；现代花鼓戏《徐特立》《我娘是片钥匙》等作品，融入红色文化与地域文化元素，借助融媒介手段实现艺术表达的升级，提升了作品的感染力，荣获湖南省艺术节“田汉大奖”。这种将文化传承与时代主题融入融媒介创作的理念，让舞蹈作品更具思想深度与社会价值，为可持续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4.3 强化社会价值，拓宽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维度

融媒介创新让舞蹈艺术突破了纯艺术的边界，深入参与到文化传承、公益服务、产教融合等多个领域，通过深度融合共创强化了社会价值，拓宽了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维度。在文化传承方面，通过融媒介编创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与舞蹈艺术深度融合，如《盘王之恋》以融媒介形态活化传承瑶族文化、《皿方罍》通过多元媒介协同展现湖南地域文化，让文化传承更具活力与传播力；在公益服务方面，通过公益大课堂、基层文化服务等活动，以融媒介理念普及编创技法，提升基层文化人才专业水平，践行艺术的社会服务使命；在产教融合方面，基于行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将融媒介创作、运营等相关技能融入教学体系，通过校企协同培养兼具艺术创新能力与技术应用能力的人才，推动舞蹈行业健康发展，实现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协同。

同时，舞蹈艺术的社会价值还体现在科普教育、文化交流等跨界领域。如笔者参与的2024 年湖南省科技活动周重大科普示范活动“湖南科学之夜”，以执行导演身份将舞蹈与科普知识深度融合共创，通过肢体动作生动演绎科学原理，让科普活动更具趣味性与观赏性，进一步拓展了舞蹈艺术的应用场景与社会价值边界。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结合笔者实践研究，系统梳理并提炼出舞蹈编创融媒介创新的转型特征、实践策略与赋能路径等核心结论；展望未来可从技术应用、人才培养、理论研究三大维度深化探索，持续推动舞蹈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5.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结合笔者的创作实践、教学探索、行业调研与公益普及经历，对舞蹈编创的融媒介创新路径展开系统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舞蹈编创的融媒介创新经历了从“单一舞台聚焦”到“多元媒介深度融合共创”的风格转型，这一转型是数字技术革新的技术支撑、行业与受众需求升级的核心驱动、艺术实践持续探索的基础赋能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舞蹈编创融媒介创新的核心实践策略包括创作端导演思维引领的多媒介协同

共创策略、教学端融媒介理念融入的课程体系构建策略、行业端需求导向的产教融合策略与普及端公益驱动的技法推广策略，四大策略相互衔接、协同发力，构成融媒介创新的完整实践支撑体系；第三，融媒介创新通过拓展传播边界、革新创作理念、强化社会价值三大核心路径，为舞蹈编创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关键赋能，最终实现了艺术本体、行业需求与社会价值的协同统一；第四，舞蹈编创的融媒介创新并非技术的简单叠加，也区别于跨媒介的协同合作模式，而是立足丰富艺术实践、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系统性变革，其核心是以导演思维统筹多元媒介，实现深度融合共创，服务于艺术表达与价值传递，为舞蹈艺术的长效传承与创新发展提供了新范式。

5.2 研究展望

未来，舞蹈编创的融媒介创新仍有广阔的探索空间。在技术应用层面，可进一步探索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元宇宙等新兴技术与舞蹈编创的深度融合共创，开发更具沉浸感、互动性与科技感的作品，如虚拟舞蹈场景构建、人机协同编创、沉浸式互动舞蹈剧目等，推动艺术表达形态的迭代升级；在人才培养层面，需进一步完善融媒介相关课程体系，强化“艺术创新+技术应用+行业运营”的复合型能力培养，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推动人才培养与行业发展需求的精准对接，为融媒介创新实践输送专业人才；在理论研究层面，需结合更多不同场景、不同主题的融媒介创作实践案例，深化融媒介创新的理论体系构建，厘清融媒介要素的融合逻辑、适配标准与效果评估机制，为实践提供更系统、更具指导性的理论支撑。

同时，希望更多舞蹈从业者、教育者与研究者参与到融媒介创新的实践与探索中，打破传统艺术创作的思维定式与边界限制，推动舞蹈艺术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更广泛的传播、更深度的传承与更持续的创新，让舞蹈艺术的价值在可持续发展中不断升华。

参考文献

[1]席欢欢（2025）。中国古典舞蹈文化基因在当代戏剧编创中的传承与创新。*戏剧之家，(34)*，139-142。取自 https://doi.org/10.26959/j.cnki.CN42-1410/J.2025.34.033。

[2]杨婧慧（2025）。空间环境与舞蹈编创的协同作用探究。*戏剧之家，(31)*，116-119。取自 https://doi.org/10.26959/j.cnki.CN42-1410/J.2025.31.032。

[3]吴兼（2025）。新时代舞蹈编创的创新精神。*大众文艺，(20)*，66-68。取自 https://doi.org/10.20112/j.cnki.ISSN1007-5828.2025.20.022。

[4]汪彦彤、蔡艺萌（2025）。舞蹈《转山》创编中的叙事性与情感表达的价值探究。*金钥匙（汉文、蒙古文），(04)*，77-79。

[5]武小文（2025）。非遗保护视角下忻州民间舞蹈的编创策略研究。*戏剧之家，(27)*，119-121。取自 https://doi.org/10.26959/j.cnki.CN42-1410/J.2025.27.039。

[6]常俊勇（2025）。红色戏曲文化元素融入群众舞蹈创编课程探索。*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7*(04)，64-67。取自 https://doi.org/10.13970/j.cnki.nbjyxyxb.2025.04.027。

[7]刘海燕（2025）。音乐编创在舞蹈编排中的运用。*黄河之声，(15)*，128-131。取自 https://doi.org/10.19340/j.cnki.hhzs.2025.15.030。

设计哲学视域下高校美育的价值重构与实践路径

Exploration on the Value Re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Paths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Philosophy

宋菲菲 中国衡水学院 邮箱：534675161@qq.com

Song Fei-fei,, Hengshui University, China. Email: 534675161@qq.com

摘要：在“新文科”与 AI 发展背景下，高校美育亟需从“传授技能”向“培育素养”转型。通过对设计本质的深度思考，我们揭示了美育中存在的工具理性主义倾向及学生审美感知不足的问题。基于扎实的理论依据，我们重新构建美育价值，致力将学生培养为具强烈身体感知的审美主体，以及具备批判创造性思维、关注社会伦理重塑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通过将现象学体验拓展至实践层面，并引入跨学科路径研究真实文化问题，我们正逐步推动美育向“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核心目标迈向更高层次发展。

关键词：设计哲学，高校美育，价值重构，具身认知，批判性思维，实践路径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initiativ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esthetic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s in urgent need of a transformation from “imparting skills” to “cultivating literacy”. Through in-depth reflection on the essence of design, we have revealed the tendency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sm existing in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the inadequacy of students’ aesthetic perception ability. Based on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we have reconstructed the valu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committed to nurturing students into aesthetic subjects with strong physical perception, as well as high-quality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equipped with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and a focus on the reshaping of social ethics. By extending phenomenological experience to the practical level and introduc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real cultural issues, we are gradually promoting aesthetic education to a higher level of development centered on the core goals of “nurturing people through beauty and cultivating virtue through culture”.

Keywords: Design philosophy, College aesthetic education, Value reconstruction, Embodied cognition, Critical thinking, Practical paths

1. 引言

美育不只是审美方面的教育，还涉及情操与心灵的培育。它在提升国民整体素质、培育创新型人才方面，有着无法被其他教育形式取代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美育实践存在一定偏差：在艺术专业教学中，美育常被简化为技能技法训练，过度聚焦“术”的层面而忽视“道”的引导；在非艺术专业的通识课程里，美育教学往往局限于艺术史知识的单向传授或表层作品赏析，学生多处于被动接收状态，难以获得深层次的审美体验与生命认知。设计边界正持续拓展，其范畴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造物活动，而是逐渐转向对更大规模系统的规划、对更复杂服务流程的设计、对更深层次交互体验的把控，以及对更优质生活方式的探索。通过深入探究“人、物、境”的存在论，设计哲学更明确地将功能实现与形式创造结合起来，同时巧妙地平衡了技术的先进性与人文关怀的温暖。引入对生活进行深刻反思的审美教育，可突破传统美育的局限。如此一来，美育的价值不再局限于带来纯粹的感官享受，而是能引导人们对生活有更深入的理解，进而对生活提出更高要求。通过深入探究设计哲学的核心思想，并持续重构与突破高校美育的价值定位，我们致力于在美育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富有现代气息、充满活力的实践路径。

2. 设计哲学的内涵及其对美育的启示

设计哲学是对设计活动本质、规律、价值及意义的哲学思考。它不仅研究“怎样设计”的方法，还深入探究“为何要设计”背后的伦理和价值问题。

2.1 从“功能主义”到“生活世界”：审美的回归

现代主义设计秉持“形式追随功能”的理念，这一理念在纠正过度装饰倾向时体现出历史进步意义，但过度强调可能导致设计呈现机械化的理性特征。当下，设计哲学领域，特别是受现象学影响的设计理论，逐渐重视回归“生活世界”这一理念。海德格尔提出，器具的“可靠性”体现在它能够指向并汇聚周围的世界要素。这给美育带来启示：审美不应只关注博物馆里的艺术品，而应将目光投向日常生活中的器物、所处环境以及人与这些元素的交互过程。美育的目标在于，让学生在亲自操作、使用物品的过程中，体会物品所蕴含的文化和情感，进而发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与美好。

2.2 具身认知与感知体验

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指出，身体是感知活动的核心主体，人的认知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于身体与周围环境的交互作用。设计哲学里提到的“交互设计”与“体验设计”，可看作是该理论的一种拓展。传统美育多以“视觉中心主义”为基础，而从设计哲学角度看，美育应重视“具身性”，也就是要调动触觉、听觉、动觉等多种身体感官。借助材料、结构与空间带来的沉浸式体验，学生不再只是站在一旁观看的“主体”，而是能够参与到审美构建过程中的“此在”角色。

2.3 批判性设计与伦理反思

设计哲学还具备鲜明的批判性特点。比如批判性设计，它借助设计出的物品，来揭示技术、社会以及伦理方面存在的潜在问题，目的是引发人们思考，而不是直接给出简单的解决办法。这给高校美育带来如下启示：美育不只是要让学生学会欣赏美，更要引导学生学会审视美。在如今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美育应当让学生具备批判性审视“景观社会”的能力，引导学生探究设计背后隐藏的权力架构、生态问题以及数字差距。

3. 当前高校美育的困境与哲学反思

尽管国家高度重视美育工作，但在具体的高校实践中，仍存在诸多与设计哲学精神相悖的现象。

3.1 工具理性对审美价值的遮蔽

在当下高度功利化的教育评价体系中，美育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被边缘化，沦为可量化技能的附属品。当前，不少设计类课程过度聚焦于软件操作技能的训练，或一味强调设计理论向商业实践的转化效率。这种倾向导致设计学科最核心的本质特征——追求诗意化的创造性表达，逐渐被忽视和边缘化（张静静，2021）。然而，这种状况导致“技艺娴熟但内心空洞”的现象出现，学生的作品虽然技巧娴熟，却缺少内在灵魂。这使得美育的初衷从“启迪心智”退化成了单纯的“技艺训练”。

3.2 离身化教学导致感知的退化

当前高校美育教学里，普遍采用“PPT 讲解加图片展示”这种脱离实际的教学方式，使得学生与真实的物质世界产生了距离。即便在二维屏幕上能够展示名画之美或经典设计，学生仍难以真切感受其材质的肌理，也无法切实体验到作品所营造的宏大空间感（李伯聪，2024）。长期以来，我们采用“感官剥夺”的方式教学，导致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逐渐变弱，难以对真实世界形成深刻洞察。

3.3 学科壁垒限制了创新思维

传统美育往往局限于特定艺术院校或单一课程，很少与相邻学科如科学、工程、社会学等开展对话，而这些学科对美育有着深层影响。当前学科割裂的现状，催生出单一、狭隘且封闭的哲学思维（姚维维，2020）。这种思维虽强调整体论和系统观，却反而束缚了学生，使他们难以用跨学科视角，深入、全面、多角度、全方位地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理工科所具备的审美想象力与文科所擅长的技术实现力相互结合，以此培养综合性创新人才，更能有效达成“以人为本”和“体现人文价值”的根本目标。

4. 设计哲学视域下高校美育的价值重构

基于对当前高校美育现状的深入反思，结合设计哲学视角，高校美育的核心价值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深度重构。

4.1 认知重构：从“视觉观看”到“具身感知”

更为关键的是，高校美育教育的首要价值应体现在唤醒学生对于自身身体的自然感知。在这一过程中，学生通过感受美、体验美、追求美，不断重建并升华与世界的感性联系。只有把美的熏陶真正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才能更深入地感受和认识美。把“材质表达”与“触觉美学”结合起来，能让学生更真切地感受物体的重量、温度、纹理等感性特征，还能让他们的设计更贴近人性、更生动鲜活。通过培养具身感知体验，学生能将抽象概念与真实生活体验联系起来，进而对生活中的细微之处变得更加敏感（张凯华，2016）。

4.2 思维重构：从“审美判断”到“设计思维”

传统美育主要聚焦于对已有作品进行审美评价，判断其优劣。而在设计哲学的视角下，美育的重点应放在“解决问题”和“创造价值意义”上。应将“设计思维”——一种以人为本、同理心驱动、原型迭代的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作为美育的核心内容（李锦林、余利平与李莹，2023）。借助美育手段，着重培养学生界定问题、拓展思维、快速构建原型以及开展测试反馈的能力，让他们拥有把“美”转变为实际“应用”，再进一步转化为“善行”的实践动力。

4.3 伦理重构：从“形式美学”到“社会责任”

设计哲学重视设计的伦理层面，傅凯莉、黄晶石（2024）认为设计的目的在于提升生活品质，让生活变得更好。高校开展美育工作，不能只停留在形式层面，要摆脱形式主义的束缚，将社会责任感融入其中。价值重构的目标是培养具有“伦理意识”的设计者和审美者。这包括关注弱势群体（包容性设计）、关注生态环境（可持续设计）以及关注数字时代的人机关系。美育需引导学生思考两个问题：怎样的设计符合伦理规范？何种美感能推动社会公平？

5. 高校美育的创新实践路径

价值重构必须通过具体的实践路径落地。结合设计哲学的理念，本文提出以下三条实践路径。

5.1 课程路径：引入现象学“工坊”教学法

改变传统的课堂讲授模式，建立基于现象学体验的“工坊”或“实验室”。

（1）材料与工坊实践。设置《材料特性与感知探索》《手工艺创作与哲学思考》等课程。安排学生直接接触木材、陶土、金属等材料，让他们在打磨、塑造这些材料的过程中，亲身感受材料的阻力与易塑性。通过这样的实践，学生能够理解技艺的精巧与质朴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而领悟工匠精神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林倩倩、孙远波、高婧与张少焕，2023）。

（2）情境还原教学。利用虚拟现实（VR）或实体空间，还原经典设计作品的使用场景。在讲解包豪斯椅子时，不只是介绍其设计特点，还让学生亲自模拟坐姿，体验椅子的人体工学原理，进而感受其蕴含的社会理想，比如为大众设计的理念。

5.2 方法路径：推行跨学科项目制学习（PBL）

打破学科壁垒，以真实问题为导向，组织跨学科的美育项目。

（1）“服务学习”项目。通过与社区、乡村或公益组织建立合作关系，指导学生针对特殊群体的需求，开展适老化产品设计、无障碍设施建设或社区公共艺术创作（李伯聪，2025）。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要运用美学知识，还要结合社会学调研和工程技术实践，深入理解设计哲学里“关注他人需求”的理念。

（2）STEM向STEAM的转化。在理工科课程中强行植入审美模块。在工程制图领域，可以引入形式美学法则；而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则可融入交互美学理念（王馨、邱松与陈登凯，2021）。应鼓励工科学生从技术逻辑里探寻美的规律，推动科技与人文的融合。

5.3 评价路径：建立过程性与反思性评价体系

摒弃单一的技能考核标准，建立符合设计哲学精神的评价体系。

（1）评估环节。关注学生的“过程日志”并进行细致评估，能让我们清楚看到他们在设计过程中的思维变化，比如设计思路如何演变、对所画草图如何推导分析，还能看到他们对自己决策进行的哲学层面的思考。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比较深入地了解学生设计成功或失败的原因（李伯聪、王大洲，2025）。只有明确区分学生“完美”作品与其中是否体现深入思考和独特见解的根本差异，才能更全面地评价学生。

（2）引入“批判性评论”环节。可定期举办设计哲学研讨会，让学生们相互评价彼此的作品，并围绕伦理、文化、环境等多个方面展开批判性讨论。评价主体应多元化，引入社会学专家、工程师甚至社区居民作为评价者，形成多棱镜式的评价视角。

6. 结语

高校美育改革并非只是对教育形式和模式进行简单调整与完善，它本质上是对传统美育理念发起的一场深刻的哲学观念变革。其对造物本质的深入探究、对现实生活世界的细致体察，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忧虑，同样为高校美育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持。

通过深度重构美育的价值，我们不再仅将美育局限于技能层面的训练，而是将其拓展到对学生全面素养的培育。美育不再只是培养学生的“技”，而是着眼于培养“全才”，使学生从单纯的“工匠”或“浅薄的旁观者”，转变为具备敏锐感知力、强大创造力以及深厚社会责任感的完整的人。

随着人工智能持续进步、数字技术日益完善，人类对美的独特感知以及对哲理的深入探寻，反而会愈发显得珍贵。高校美育教育需深度融入学生全面发展进程，以学生的终身成长为立足点，将其作为培育学生全面且深厚精神文化的重要途径。唯有如此，高校才能真正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在设计哲学理念的引导下，高校应探索出一条实现真、善、美相统一的教育路径，为培养能更好应对未来挑战的新时代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傅凯莉、黄晶石（2024）。实证美学视角下的设计学专业美育改革探索。*美术教育研究*，（9），72-74。

[2]李伯聪（2024）。再论设计思维——设计哲学研究之二。*高等工程教育研究*，（5），6-14。

[3]李伯聪（2025）。设计哲学：问题域、核心范畴和核心命题。*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17*（2），152-164。

[4]李伯聪、王大洲（2025）。设计哲学的多维建构与实践创新。*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17*（2），143-151。

[5]李锦林、余利平、李莹（2023）。中国传统文化对艺术设计的哲学启示。*美术教育研究*，（18），97-99。

[6]林倩倩、孙远波、高婧、张少焕（2023）。设计思维的哲学探究。*包装工程*，*44*（22），25-33。

[7]王馨、邱松、陈登凯（2021）。从洞见到创新的设计哲学——基于设计形态学的创新设计方法新途径。*西北美术*，（1），38-41。

[8]姚维维（2020）。简析设计哲学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大众标准化*，（24），62-63。

[9]张静静（2021）。中国古代设计哲学在现代设计中的活化语言。*艺术大观*，（28），72-73。

[10]张凯华（2016）。**基于中国传统哲学语境下的妆品外形设计与教育研究（硕士论文）**。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天津。

“董仲舒”题材艺术作品创作研究

Research on the Creation of Dong Zhongshu’s Artistic Works with Themes

韩燕燕 中国衡水学院 邮箱：781735481@qq.com

Han Yan-yan, Hengshui University, China. Email: 781735481@qq.com

摘要：董仲舒（前 179 年—前 104 年）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对董仲舒的艺术作品创作进行研究，深入挖掘其思想内涵和人生经历，创作出具有深刻内涵和广泛影响力的艺术作品，同时也有助于提升艺术作品的深度和广度。以“董仲舒”为题材进行艺术作品创作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董仲舒，艺术作品，创作

Abstract: Dong Zhongshu (179 BC–104 BC) was a famous thinker, politician, and educator 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his ideological system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later generations. By studying Dong Zhongshu’s artistic works, we can deeply explore his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and life experiences, and create artistic works with profound connotations and broad influence, which also helps to enhance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artistic works. Studying the creation of art works based on the theme of “Dong Zhongshu” not only has academic value, but also has broad application value

Keywords: Dong Zhongshu, Artwork, Creation

1. 董仲舒人物简介

董仲舒，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以“天人合一”思想为核心，提出了儒家思想的系统化主张，对后世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思想构建了汉代政治哲学的基础，他的理念启迪了后来的中国文化。因此，从多角度研究和纪念董仲舒十分必要，除了通过历史学、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理性分析，也可以通过艺术创作将他的精神与思想传承并传播开去。

为此，笔者尝试创作了一部以董仲舒为题材的剧作。该剧从文艺创作理论出发，采用虚实相生的手法，借助叙事与抒情结合的旁白理论，塑造了董仲舒的形象。

2. 艺术作品创作理论研究

2.1 艺术创作的理论基础

艺术创作理论中的关键要素包括表现形式的选择、主题思想的传递、艺术语言的运用和观众的审美体验等（白立强、曹迎春，2024）。在以董仲舒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创作中，这些要素不仅要求艺术家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与艺术修养，还需要他们在创作过程中发挥创新精神，通过新的艺术形式和表达方式，赋予历史人物和思想以新的生命力。

2.2 董仲舒的生平事迹与思想体系

董仲舒是汉代的著名儒学学者和政治家，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化的进程，尤其是他提出的“天人感应”与“大一统”思想（崔锁江，2023）。董仲舒通过推崇儒学的价值观，为汉朝的政治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持，强调天命与君主的关系，以及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和谐共生。

2.3 艺术创作的形式与策略

艺术创作的形式多种多样，不同的表现形式能够提供不同的艺术体验与思考方式（代春敏，2023）。

（1）绘画创作

绘画作为艺术创作中最具表现力的形式之一，能够通过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构图将董仲舒的形象及其思想传达给观众。连环画和国画是适合表现历史人物与思想的两种重要形式（刘雨晴，2024）。

（2）雕塑创作

雕塑作为艺术的三维表现形式，能够更加直观地展示人物的形象和思想特征。

（3）影视作品创作

影视作品，尤其是纪录片和电视剧，能够通过剧情的展开和人物的塑造，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董仲舒的思想和人生。纪录片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详细描述董仲舒的生平事迹与思想发展，展现其在历史中的地位与影响。而电视剧则可以通过虚构的情节，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现董仲舒的思想冲突与人物内心世界，使观众在情感的共鸣中更加深刻地理解其思想的内涵。

（4）戏剧作品创作

戏剧作品，尤其是舞台剧或实景演出，能够将董仲舒的思想与人物情感直接呈现给观众。通过演员的表演与舞台的表现，观众能够在沉浸式的氛围中感受到董仲舒的精神世界（宋艳萍，2024）。戏剧的表现形式可以更加侧重于情感的传递和思想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艺术作品的互动性和感染力。

2.4 创作策略：跨界融合、叙事创新与视觉呈现

（1）跨界融合

随着艺术领域的不断拓展，跨界融合已成为当代艺术创作的重要趋势（王文书，2024）。可以将董仲舒的思想与当代艺术形式相结合，如数字艺术、装置艺术等，以创新的方式呈现其思想的魅力。

（2）叙事创新

艺术创作中的叙事创新是通过改变传统故事叙述的方式，使人物形象和思想得以更加生动与直接地展现。通过对董仲舒生平事迹的虚构或改编，艺术作品能够突破历史事实的束缚，呈现更为灵活与富有表现力的故事情节。

（3）视觉呈现

视觉呈现是艺术创作中最直观的表现手段，通过细腻的笔触、色彩的运用、构图的安排等，能够传达出董仲舒的思想情感与人物精神。

3. 艺术作品的社会影响与文化价值

3.1 文化价值：创新与传承

董仲舒作为中国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及哲学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魏彦红，2017）。艺术作品的创作，不仅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回顾，更是对文化内涵的深刻解读和再创造。

3.2 应用价值：宣传、教育与文化产业发展

艺术作品不仅仅是视觉或听觉的享受，它还承载着深刻的社会功能，其中之一就是传播和教育功能。董仲舒题材的艺术作品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文化宣传工具，让更多的人了解董仲舒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内涵。

3.3 社会影响：学术研究与文化认同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和“大一统”思想，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可能被赋予不同的解释。艺术作品的创作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思想进行艺术再现，激发学者们对其深度研究的兴趣，推动儒家思想在当代学术领域的进一步探讨（温逢源，2024）。通过视觉呈现和情感表达，能够帮助大众更好地理解和认同董仲舒的思想。同时，也能够加深公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尊重，促进儒家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

4.“董仲舒”题材的舞台剧作品创作

舞台剧作为一种直观且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形式，能够生动再现历史人物与事件，深刻传达思想内涵。董仲舒作为西汉时期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其生平事迹与思想体系为舞台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灵感余治平（余治平，2023）。

4.1 舞台剧创作背景与主题设定

（1）创作背景

董仲舒生活在西汉时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与创新者。

（2）主题设定

主题围绕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与生平事迹，展现其智慧与远见。突出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4.2 舞台剧结构与情节设计

（1）结构安排

舞台剧分为多个幕次，每个幕次围绕董仲舒的某个重要阶段或事件展开。

（2）情节设计

情节设计紧扣主题，突出董仲舒的思想与人格魅力。通过虚构或改编的方式，增加戏剧冲突与悬念，提升观众的观赏体验。情节中包含董仲舒与他人的互动，如与弟子、父亲等，以展现其思想的影响力。

4.3 角色塑造与表演风格

（1）角色塑造

董仲舒：智慧、正直、有担当的儒家学者形象。

汉武帝：作为董仲舒的重要对话者，一个英明、果断的君主形象。

丞相贾谊：虚伪权欲心强、心机深沉、利用一切手段谋取个人利益的形象。

弟子等各具特色的角色，以展现董仲舒思想的影响。

（2）表演风格

表演风格贴近历史背景与人物性格，注重细节与情感的表达。通过舞蹈、音乐、灯光等艺术手段，增强舞台效果与氛围。注重语言的准确性与生动性，以传达董仲舒思想的深刻内涵。

4.4 舞台设计与视觉效果

（1）舞台设计

舞台设计体现西汉时期的文化特色与建筑风格。使用道具、布景等手段，营造历史氛围与场景感。舞台布局合理，便于演员的表演与观众的观赏。

（2）视觉效果

视觉效果通过灯光、投影、烟雾等手段来增强。灯光营造不同的氛围与情感，如明亮表示欢乐、暗淡表示悲伤等。投影展示历史画面或思想图表，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剧情与思想。

4.5 脚本设计

（1）第一幕《目不窥园》

音乐起，场景，董仲舒家后花园

董太公上台。

董太公对伙计说：“我舒儿勤学好读，但小小年纪整日闭门读书，为读书不喜玩乐，我怕闷出病来，你们南下，带来修纂花园的法子，老夫要为吾儿建座漂亮的花园，供吾儿闲暇休息。”

随从：“是，老爷”

灯暗下场。

鸟叫声，灯光渐起。

舞蹈《小儿闹花园》

（轻松的舞蹈，一群古代孩子，在花园里嬉戏打闹，俏皮的样子。）

远处书房里少年董仲舒低头读书。

小朋友们跳完舞来找董仲舒，“敬先（董仲舒小名），敬先，听说你家花园的花都开了，我们一起去玩吧”。

“你们去吧，我还要读书呢”。

“哎呀读书读书，你又在读书！”

“读书才能明理，读书才能启智，我们只有年少多读书将来才能有所作为啊！”

“得了吧！我们还小，读书有什么用啊，你呀都成书呆子了”哈哈哈小朋友们大笑。

“诗书，义之府也。还是你们去玩吧！我要读书了。”

小朋友们悻悻的离开，“看，董家的花开的好漂亮啊！”

音乐响。

原创舞蹈《花开董家园》

喈喈百鸟啼

灼灼花烂漫

为读圣贤书

三年不窥园

不负少年志

勤学成圣贤

不负少年志

勤学成圣贤

舞者定格，光束打到董太公头上，董太公欣慰泪目：“难为我舒儿小小年纪，勤学至此，将来必成大器！列祖列宗，我董家后继有望啊！”

画外音：“少年董子，为读圣贤书，身处花园读书，却三年目不窥园，治学心志专一的故事，被后人广为流传！更因为这种精神最终成为了一代大儒，下帷讲诵，桃李天下，还被汉武帝召见，天人三策.....话音未落，朝堂声音传来。

（2）第二幕《下帷讲诵》

布景：亭子有帷幔，院子里几十个座墩和书桌。

学子们端坐书桌前，用书简学习。

书桌学生列队而坐。配合原创音乐唱诵。空白的桌椅可以让游客入座，也可以远观。

董子声音传出：

各位学生了都到齐了？

一位书生看向观众点了点数，向亭子施礼回话：“回夫子，都到了”

董子：“下帷，上课”

“夫子好!”学生集体问好!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善无小而不举，恶无小而不去。

自责以备，谓之明；责人以备，谓之惑……”

唱诵由慢及快，

恢弘音乐起，白色帷幔把讲席慢慢包围落下，

群舞书生上场，手持书简，开始“书简舞”。

舞蹈结束：

画外音：“董子的一生少年目不窥园，30 下帷讲诵，辅佐过王侯，为汉朝大地江山稳固，更为儒家思想的传承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汉武帝继位后，让各地推荐贤良文学之士，董子被推举参加策问。连续三次参加了汉武帝的策问，史称天人三策。董子对策后，被汉武帝派到他的哥哥江都王刘非处……

（3）第三幕《德政德教》

练兵场：

刘非端坐正位，欣赏练兵。

突然刘非大喊：“停！今日练兵到此为止”

“报！启禀大王，董仲舒已到殿外等候”

“哦？哈哈哈听闻董仲舒乃举国知名的大儒，博学多才，足智多谋，有他献策，好比管仲辅助齐桓公，那本王必将称霸一方呀哈哈哈哈，快快有请！不得怠慢!”

董子近身行礼

刘非：“听闻董夫子博古通今，足智多谋，今日一见果然大儒风范。你看我江都现如今兵强马壮，比当年灭吴称霸的越国一点不差吧？哈哈哈”。

董子默然不语。

刘非继续：“那越王勾践有范蠡、文种辅佐，贤君良臣传为佳话。想当年我 15 岁就获得先帝赏给的天子旗，夫子您的才学也绝不在范蠡、文种之下。”

董子依然默然不语。

刘非继续：“本王认为当年越国的这三个人堪称三位仁德之人。夫子您以为呢？””

董子不慌不忙：“臣以为，越国一个仁人也没有，哪里来的三个？!”

刘非不悦，厉声问道：“嗯？此话怎讲？”

董子：“什么样的人才配得上仁这个称呼？臣以为，所谓仁人，是‘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就像夏禹、商汤、周文王那样，重视德政德教、化民成俗，这才是仁君、仁政的最高境界啊！陛下可知，孔子的弟子即便是小孩子也羞于提到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霸主，因为春秋五霸靠的是诈谋得天下。他们怎么可以和仁德圣贤之人相提并论呢？”

刘非听闻，陷入沉思…。

（4）第四幕《朝堂论道》

朝堂大厅，众大臣肃立。汉武帝端坐龙椅，望向众人。

汉武帝：各位，朕近来思考国家治乱之道，理应听取诸位的意见。董卿，朕已知你深得儒学精髓。你曾提出天人三策，朕要听听你的见解。

董仲舒：陛下，国家之治，实在在于上德。在下愚以为，治国之道不应倚赖天命，更多的是依赖君主的德政和明智。上天赋予君主权力，但若君主心怀百姓，才是治国之根本。我们要通过施行仁政，培养贤能之士，才能真正强盛国家。”

贾谊：董卿一味依赖儒家学说，然当今世道，何能单凭道德治理国家？诸侯割据，国家危机四伏，若依你所言，岂不如同束手就擒？倘若汉朝真如你所说仅凭仁政，如何应对百姓的愚昧与敌人的威胁？我们需要的是强硬的手段，强大的军队，而非空洞的道德口号！

董仲舒：贾丞相所言，虽然一时能得一些短期的效果，但以武力压制，终究无法稳固天下。上天赋予我们权力，但亦赋予我们智慧。‘天人感应’并非指天命，而是指国家治理必须得当，民心相应，方能长治久安。强大不是表面的威武，而是内里的道德建设。”

贾谊：若如此，岂不是要让那些奸臣也能在朝堂上享有权利吗？依我看，治国之法，仍是要掌控权力，快速解决内外问题，才是王道。董卿所言虽美，然何能迅速见效？有时权谋与策划之计，才是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的根本。

董仲舒：权谋之事，确实必要，然而更重要的是道德的底线。若国君不能以德治国，只凭权谋之术，长久之计必定是空中楼阁。‘天人三策’所言，正是欲以道德立国，以德治天下。若国家心志统一，百姓同心，岂惧外来威胁？

汉武帝：贾丞相，朕已决定按照董卿所言行事。天下事，靠的是持久的仁德，而非短期的谋略。爱卿在朝中为政多年，不知能否支持此策？

贾谊：陛下既然如此决定，贾某自当随意。但愿此策能真如董卿所言般见效。

（5）第五幕《传承》

画外音：

董仲舒秉承“春秋大一统”的原则，为汉朝的大一统做出了贡献！

音乐起：

老年董子出现在舞台位置，

温情的音乐起，董子已到暮年。

董子：“少年当有鸿鹄志，老夫用一生的努力践行了自己少年的志向，如今已至暮年，朝花夕拾中，不知这一生可曾辜负那读过的诗书，辜负这大汉江山，可对得起当年父亲为我修葺的百花园啊…。”

灯光亮起，董子父亲董太公出现：

“舒儿，你对得起！”

董子惊喜转身，眼含热泪

“舒儿，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竭尽一生对得起你年少雄心抱负，你谏言君王春秋一统，对得起这大汉的天下，对得起这天下黎民；你下帷讲诵、桃李天下……对得起你读过的诗书，对得起我的园子，更对得起我！……”

灯光推起

董子眼含热泪，站在高处，欣慰点头。

“董夫子，您更对得起后世！”舞台一侧，青年学生说：

“如果不是董子您年少苦读，就不会有后来的伟大作为，就不会让读书、治学之韵的优秀传统，在衡水这片伟大的土地上亘古流传。衡水千年历史，以您为代表的许许多多伟大先贤们都为我们衡水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你们留下的文化，都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瑰宝，我们后代人都在努力的研学保护和研究着。而那些许许多多为衡水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先贤们，都在我们心中。”

董子欣慰点头！

灯光依次渐起，音乐高潮起，舞台高低处依次出现特型演员逐一说台词：

王之涣：“我是王之涣，当年入仕衡水，千百年后，可曾有人记得我？”

青年学生：“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您的诗我们所有中华儿女都会背。”

王之涣欣慰点头，灯光暗下。

孔颖达：“我，孔颖达，被称为唐朝的十八学士之一。”

青年学生：“您整理五经，编写了标准版的《五经正义》。开启了儒学经典统一的时代。”

孔颖达欣慰点头，灯光暗下。

毛苌：“我是毛苌，那村南的诗经台可还在，那是我当年的讲经之台？”

青年学生：“在，您曾经注解《诗经》的高台，后来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传播源头之一！”

毛苌欣慰点头，灯光暗下。

孙伏伽：“我是孙伏伽，是科举史上第一位状元！”

青年学生:“状元郎，我们当然知道。衡水老乡。武德五年参加科举，名列甲榜第一名，状元及第!”

欣慰点头，灯光暗下。

吴汝纶:“我是吴汝纶，我开创书院，力倡新式教育，你可曾认得我？”

青年学生:“当然认得，您幼时虽家境贫寒但刻苦好学，得鸡蛋换松脂照明读书，长大后辞官办学堂，您的事迹后世一直传唱!”

欣慰点头，灯光暗下。

“记得，我们都记得”剩下的现代演员一起说;

教授:“我是衡水学院董子研究院的教师，董子文化为中华大地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各位先贤请放心，现在我相信尤其是将来，我们一定会继续将这些优秀文化发扬光大!”音乐高潮起；舞台上是各种文字、形象的投影……

5. 结论

以董仲舒为题材进行舞台剧艺术作品创作，是对儒家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一次有益尝试。通过深入挖掘董仲舒思想的多元价值，结合舞台剧的艺术表现形式，可以创作出具有深刻内涵与广泛影响力的舞台剧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有助于提升公众对儒家文化的认知与认同，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1]白立强、曹迎春（2024)。“2023 衡水·董仲舒儒家思想学术研讨会”成果综述。*衡水学院学报*，*26*（3)，44-48。

[12]崔锁江（2023)。董仲舒大一统论基本内涵的三重维度分析。*社科纵横*，*38*（6)，78-86。

[13]代春敏（2023)。“第二届全国儒学史学术研讨会暨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2022学术年会”成果综述。*衡水学院学报*，*25*（1)，10-16。

[14]刘雨晴（2024)。董仲舒礼乐思想探微。*戏剧之家*,（13)，135-137。

[15]宋艳萍（2024)。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刍议。*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49-56。

[16]王文书（2024)。西汉董仲舒学术继承者考述。*衡水学院学报*，*26*（2)，48-55。

[17]魏彦红（2017)。董仲舒教化思想研究述评。*衡水学院学报*，*19*（1)，70-79。

[18]温逢源（2024)。西汉时期董仲舒的地位变化。*名家名作*,（25)，21-23。

[19]余治平（2023)。董学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可能贡献——“2023 衡水·董仲舒儒家思想研讨会暨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开幕致辞。*衡水学院学报*，*25*（6)，3-4。

信息技术与美术深度融合下民族玩偶 IP 设计的应用效果研究

许焱焱 泰国格乐大学国际学院艺术与设计系 邮箱：2024084690@qq.com

Xu Yan-yan,International College, Krirk University, Thailand. Email:：2024084690@qq.com

摘要：在数字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双重驱动下，信息技术与美术的深度融合为民族玩偶 IP 设计提供了全新路径。本文以民族玩偶 IP 设计为研究对象，聚焦信息技术与美术融合的应用场景，通过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及实验法，系统探究数字绘画、3D 建模、虚拟交互等技术在民族玩偶 IP 的元素提取、形象塑造、传播推广等环节的应用策略，并从文化传承、设计创新、市场反馈三个维度评估应用效果。研究发现，信息技术与美术的融合不仅提升了民族玩偶 IP 设计的效率与精准度，更强化了民族文化符号的可视化表达与年轻化传播；同时也存在技术应用表层化、民族文化内核挖掘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构建“技术-美术-文化”三位一体的设计体系，为民族玩偶 IP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信息技术；美术融合；民族玩偶；IP 设计；应用效果

Abstract：Driven by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cultural industry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ethnic cultures,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ine arts has provided a brand-new path for the IP design of ethnic dolls. Taking the IP design of ethnic doll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ine arts. By adopting literature research, case analysi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experimental method, it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digital painting, 3D modeling, virtual interaction and other technologies in the links of element extraction, image shaping,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ethnic doll IP, and evaluates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from three dimensions: cultural inheritance, design innovation and market feedback.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fine arts not only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ethnic doll IP design, but also strengthens the visual expression and younger-oriented communication of ethnic cultural symbols; meanwhile,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superficial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and insufficient excavation of the core of ethnic cultur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construct a trinity design system of "technology - fine arts - culture",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thnic doll IP.

Key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ine arts integration; ethnic dolls; IP design; application effects

1.绪论

在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创意产业的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与美术设计的深度融合，正为民族文化的创新转化开辟全新路径。民族玩偶 IP 作为承载民族符号、传递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其设计与开发既需要扎根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又需借助信息技术实现表现形式与传播方式的突破。当前，学界对民族玩偶 IP 的研究多聚焦于文化内涵挖掘或单一设计技法，较少从信息技术与美术融合的视角，系统探讨其应用效果与实践路径。基于此，本文以信息技术与美术深度融合下民族玩偶 IP 设计的应用效果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融合设计的理论基础，分析具体设计案例的技术应用与美术表现策略，探究该融合模式对提升民族玩偶 IP 文化传播力、市场竞争力的作用机制，为民族文化创意产品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民族文化 IP 化成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玩偶作为承载文化记忆与情感寄托的载体，是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媒介。传统民族玩偶设计多依赖手工创作，存在形象同质化严重、文化表达单一、传播范围有限等问题，难以满足当代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群体对个性化、互动性产品的需求。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美术创作的革新，信息技术与美术的深度融合打破了传统设计的时空限制。数字绘画、3D 建模、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的应用，为民族玩偶 IP 设计注入了新的活力，实现了从创意构思到成品落地、从线下展示到线上传播的全流程升级。在此背景下，众多民族玩偶 IP 如故宫“宫廷宝贝”、云南“云小绣”等借助数字技术脱颖而出，印证了技术与美术融合的巨大潜力。然而，当前学界对民族玩偶 IP 设计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化符号解读或单一技术应用，缺乏对信息技术与美术深度融合的系统性研究，关于其应用效果的实证分析更是匮乏。因此，开展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明确信息技术与美术深度融合在民族玩偶 IP 设计中的应用维度与实施路径；通过实证研究，科学评估该融合模式在提升设计创新性、强化文化传播力、增强市场竞争力等方面的应用效果；针对现存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策略，为民族玩偶 IP 设计从业者提供实践指导。

1.2.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丰富民族 IP 设计与数字艺术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构建信息技术与美术融合的民族玩偶 IP 设计理论框架，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范式。

实践意义：助力民族玩偶 IP 设计突破传统瓶颈，提升作品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推动民族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增强民族文化在年轻群体中的认同感与影响力；为文化企业提供差异化竞争策略，促进民族文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界围绕民族玩偶与数字技术的研究逐渐增多。在民族玩偶设计方面，学者多聚焦于民族元素的提取与应用，如李娟（2022）以苗族银饰纹样为例，探讨了传统图案在玩偶设计中的重构方法；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王强（2021）研究了 3D 建模技术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优化路径，强调了技术对提升产品精度的作用。此外，关于 IP 设计的研究多集中于影视、游戏领域，对民族玩偶 IP 的系统性研究较少，且现有研究多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缺乏对应用效果的量化评估。

1.3.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数字艺术与 IP 产业发展较为成熟，在玩偶 IP 设计方面，迪士尼、LINE FRIENDS 等品牌早已实现信息技术与美术设计的深度绑定，形成了完整的 IP 产业链。学界相关研究侧重技术应用的实操性，如 Smith（2020）研究了 VR 技术在玩偶原型测试中的应用，提升了用户参与度；Jones（2022）探讨了人工智能在 IP 形象优化中的算法逻辑。但国外研究多以商业 IP 为对象，对民族文化背景下的玩偶 IP 设计关注不足，与我国的文化语境存在差异。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1.4.1 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梳理国内外关于信息技术、数字美术、民族 IP 设计的相关文献、著作及政策文件，奠定研究的理论基础。

案例分析法：选取故宫“宫廷宝贝”、敦煌“九色鹿”、贵州“苗小仙”等典型民族玩偶 IP 案例，分析其技术融合策略与应用成效。

问卷调查法：针对设计从业者、高校美术专业学生、消费者三类群体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826 份，了解其对技术融合下民族玩偶 IP 的认知与评价。

实验法：选取 20 名美术设计专业学生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组采用数字技术与美术融合的设计方法，对照组采用传统手工设计方法，对比两组的设计效率、作品创新性等指标。

1.4.2 研究创新点

视角创新：突破单一技术或文化的研究视角，构建“信息技术-美术设计-民族文化”三维融合研究框架，系统分析三者的内在关联。

方法创新：结合定量与定性研究，通过实验法与问卷调查法，对应用效果进行实证评估，增强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与说服力。

内容创新：聚焦民族玩偶这一细分领域，针对应用中的实际问题提出优化策略，填补了该领域应用效果研究的空白。

1.5 论文结构

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研究背景、目的、意义等基础内容；第二部分界定核心概念，梳理相关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分析信息技术与美术融合在民族玩偶 IP 设计中的应用维度；第四部分通过实证研究评估应用效果；第五部分提出优化策略；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展望。

2.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核心概念界定

2.1.1 信息技术

本文所指的信息技术，特指在美术设计领域应用的数字技术，包括数字绘画工具（Photoshop、Procreate）、3D 建模软件（Blender、Maya）、虚拟交互技术（VR/AR）、人工智能设计工具等，涵盖从创意构思、原型制作到传播推广的全流程技术应用。

2.1.2 美术深度融合

美术深度融合并非技术与美术的简单叠加，而是以民族文化为内核，将信息技术贯穿于美术创作的思维、方法与表达之中，实现技术服务于艺术表达、艺术提升技术内涵的双向赋能，最终达成设计作品在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上的统一。

2.1.3 民族玩偶 IP

民族玩偶 IP 是以特定民族的文化符号为核心，通过玩偶这一载体，构建具有独特形象、情感共鸣与品牌辨识度的文化 IP。其核心要素包括民族服饰、传统纹样、民俗故事等，兼具艺术观赏性与文化传播性。

2.2 理论基础

2.2.1 文化符号学理论

文化符号学理论认为，文化是通过符号来传播与传承的。民族玩偶 IP 中的服饰、纹样、造型等均属于文化符号，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实现文化符号的解构、重构与可视化表达，增强符号的传播力与感染力，帮助消费者快速理解民族文化的内涵。

2.2.2 数字艺术设计理论

数字艺术设计理论强调技术与艺术的共生关系，认为数字技术不仅是创作工具，更是艺术思维的延伸。该理论为信息技术与美术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明确了在民族玩偶 IP 设计中，应坚持技术服务于艺术、艺术引领技术的原则。

2.2.3 消费者行为理论

消费者行为理论关注消费者的需求、动机与决策过程。在民族玩偶 IP 设计中，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满足消费者对个性化、互动性的需求，而美术设计则决定了产品的审美吸引力。结合该理论，可精准评估应用效果，提升产品的市场认可度。

3.信息技术与美术深度融合在民族玩偶 IP 设计中的应用维度

3.1 民族文化元素的数字化提取与重构

民族文化元素是民族玩偶 IP 设计的核心素材，传统提取方式依赖人工临摹与手绘，效率低且精准度不足。信息技术的应用实现了民族文化元素提取的标准化与高效化。

在图案提取方面，借助图像识别技术，可快速从民族服饰、建筑、器物中提取核心纹样。例如，对苗族蜡染图案进行扫描后，通过 Photoshop 的路径工具进行矢量化处理，去除冗余元素，保留纹样的核心特征；利用 AI 图像分割技术，可自动分离图案中的色彩与线条，方便设计师进行二次创作。在色彩提取方面，通过取色软件获取民族传统色彩的色值数据，建立标准化的民族色彩库，确保玩偶色彩还原的准确性，避免传统手工配色的主观性偏差。

同时，数字技术助力文化元素的创新性重构。设计师可通过 Procreate 等数字绘画工具，将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进行跨界融合，如将蒙古族的祥云纹样与壮族的绣球造型结合，创造出兼具多元文化特色的玩偶形象；利用参数化设计软件，可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元素的大小、比例与排列方式，实现个性化定制。

3.2 玩偶 IP 形象的数字化塑造与优化

玩偶 IP 形象的塑造是设计的核心环节，信息技术与美术的融合贯穿于从草图设计到原型制作的全过程，显著提升了形象的表现力与精准度。

在二维形象设计阶段，数字绘画工具取代了传统的纸笔，设计师可通过图层功能反复修改线条与色彩，降低创作成本。例如，使用 Procreate 的画笔预设功能，模拟毛笔、水彩笔等多种笔触效果，赋予玩偶形象丰富的艺术质感；借助数位屏的压感技术，可精准控制线条的粗细变化，提升形象的细腻度。

在三维原型制作阶段，3D 建模技术实现了玩偶形象的立体化呈现。设计师通过 Blender 软件构建玩偶的三维模型，调整头部、躯干、四肢的比例，确保造型符合人体工学与审美需求；利用 ZBrush 进行细节雕刻，还原民族服饰的褶皱、饰品的纹理等细节。与传统手工泥塑相比，3D 建模可实时预览效果，通过旋转、缩放模型，全方位检查造型缺陷，大幅提升原型制作的效率与精度。此外，通过 3D 打印技术，可快速将数字模型转化为实体原型，缩短设计周期。

3.3 玩偶 IP 的虚拟交互设计与体验升级

传统民族玩偶多为静态产品，互动性不足。信息技术的应用打破了这一局限，通过 VR/AR 等虚拟交互技术，为民族玩偶 IP 赋予了互动功能，提升了消费者的参与感与体验感。

AR 技术的应用实现了虚拟形象与现实场景的融合。消费者通过手机 APP 扫描玩偶，即可

在屏幕上看到玩偶的动态效果，如让穿着藏族服饰的玩偶跳锅庄舞，让佩戴彝族银饰的玩偶展示传统礼仪。部分品牌还开发了AR故事绘本，玩偶作为触发点，消费者扫描后可观看民族故事动画，实现“玩偶+故事”的沉浸式体验。

VR技术则构建了虚拟的玩偶互动场景。在VR体验馆中，消费者可佩戴设备进入虚拟的民族村落，与玩偶IP进行实时互动，如一起制作民族手工艺品、参与民俗活动等。这种沉浸式体验增强了消费者与玩偶IP的情感连接，加深了对民族文化的理解。此外，通过动作捕捉技术，消费者还可控制玩偶的动作，实现个性化互动，提升了产品的趣味性与粘性。

3.4 玩偶IP的数字化传播与品牌构建

信息技术为民族玩偶IP的传播提供了多元化渠道，实现了从线下传播到线上线下联动的转变，助力品牌影响力的快速提升。

在社交媒体传播方面，设计师可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玩偶的设计过程，如3D建模的步骤、数字绘画的技巧等，吸引用户关注；利用直播平台开展玩偶新品发布会，邀请民族文化专家与设计师共同解读产品背后的文化内涵，增强品牌的文化底蕴。此外，借助社交媒体的分享功能，消费者可上传自己与玩偶的互动视频，形成病毒式传播，扩大品牌影响力。

在品牌IP化构建方面，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消费者的偏好数据，精准定位目标人群，制定个性化的传播策略。例如，针对年轻群体，在小红书、B站发布玩偶的二次元同人作品；针对亲子群体，开发玩偶相关的教育课程与游戏。同时，搭建数字化品牌官网，整合玩偶的设计故事、产品信息与购买渠道，形成完整的品牌传播矩阵。

4.信息技术与美术深度融合下民族玩偶IP设计的应用效果实证研究

为科学评估信息技术与美术深度融合在民族玩偶IP设计中的应用效果，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法与实验法开展实证研究，从设计效率、文化传播、市场反馈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4.1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826份，有效回收率为82.6%。调查对象中，设计从业者215人，占26.0%；高校美术专业学生320人，占38.7%；消费者291人，占35.3%。

4.1.1 设计从业者视角

在设计从业者中，86.5%的受访者认为信息技术提升了民族玩偶IP的设计效率，其中62.3%的受访者表示设计周期缩短了30%以上；78.2%的受访者认为数字技术增强了文化元素的表现力，能够更精准地还原民族文化内涵；但有53.5%的受访者反映，当前存在技术应用表层化问题，部分设计师过度依赖技术，忽视了美术设计的艺术价值。

4.1.2 高校美术专业学生视角

高校美术专业学生中，92.1%的受访者熟练使用至少一种数字设计工具，85.6%的受访者认为数字技术有助于激发设计创意；73.4%的受访者表示，通过数字技术能够更好地将民族文化元素融入玩偶设计中。但有68.8%的受访者认为，自身缺乏对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导致设计

作品的文化内涵不足。

4.1.3 消费者视角

消费者中，75.3%的受访者更倾向于购买数字技术设计的民族玩偶，认为其造型更精致、细节更丰富；68.7%的受访者表示，通过AR/VR等互动功能，加深了对民族文化的了解；在购买动机方面，文化内涵（62.2%）、外观设计（58.1%）、互动体验（45.3%）是消费者的主要考量因素。

4.2 实验结果分析

选取20名高校美术专业学生，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10人。两组以“侗族玩偶IP设计”为主题，实验组采用数字技术与美术融合的设计方法，对照组采用传统手工设计方法，实验周期为15天，从设计效率、作品创新性、文化还原度三个指标进行评估。

4.2.1 设计效率

实验组平均完成时间为8.2天，对照组为13.5天，实验组效率提升了39.3%。实验组借助数字工具快速修改设计方案，平均修改次数为12次，而对照组为5次，且修改成本更高。这表明信息技术显著提升了民族玩偶IP设计的效率，降低了创作成本。

4.2.2 作品创新性

邀请5位行业专家采用10分制对作品创新性进行评分，实验组平均得分7.8分，对照组为5.2分。实验组的作品在造型设计、色彩搭配、元素融合方面更具创新性，如部分作品将侗族鼓楼造型融入玩偶的头部设计，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了造型的立体化与个性化。

4.2.3 文化还原度

专家对文化还原度的评分中，实验组平均得分8.1分，对照组为6.3分。实验组通过数字技术精准提取侗族服饰的纹样与色彩，建立了标准化的文化元素库，确保了玩偶形象对民族文化的还原度；而对照组因手工提取的局限性，部分纹样与色彩存在偏差。

4.3 典型案例应用效果分析

4.3.1 故宫“宫廷宝贝”

故宫“宫廷宝贝”IP借助数字技术，将清代宫廷服饰、器物纹样等元素融入玩偶设计。通过3D建模技术还原了龙袍、凤冠的细节，利用AR技术让玩偶“活”起来，消费者扫描后可观看宫廷生活动画。该IP上线后，通过社交媒体传播获得了广泛关注，首款玩偶销量突破10万件，不仅实现了商业成功，更推动了故宫文化的年轻化传播。

4.3.2 贺州“瑶小仙”

“瑶小仙”玩偶IP以瑶族文化为核心，通过图像识别技术提取瑶族服饰的核心元素“盘王印”等，利用数字绘画工具进行重构设计。品牌开发了VR体验课程，消费者可在虚拟场景中学习瑶族刺绣技艺。该IP不仅获得了年轻消费者的喜爱，还带动了贺州当地瑶族手工艺品的销售，实现了文化传承与经济增收的双赢。

4.3.3 敦煌“九色鹿”

敦煌“九色鹿”玩偶 IP 借助 3D 打印技术还原了壁画中的九色鹿形象，通过 AR 技术让消费者“走进”敦煌莫高窟，了解九色鹿的传说故事。该 IP 与手游合作，将玩偶形象植入游戏场景，扩大了传播范围。数据显示，该 IP 上线半年内，相关话题在社交媒体的阅读量突破 5 亿次，有效提升了敦煌文化的影响力。

5. 信息技术与美术深度融合下民族玩偶 IP 设计的优化策略

5.1 构建民族文化元素数字化数据库

当前民族文化元素的提取缺乏系统性，导致设计中存在元素滥用、错用的问题。应联合高校、文化机构与企业，共同构建民族文化元素数字化数据库。数据库应涵盖各民族的服饰、纹样、色彩、民俗故事等内容，通过 3D 扫描、图像识别等技术进行标准化采集与分类存储。同时，建立元素使用规范，标注元素的文化内涵与适用场景，为设计师提供权威的参考依据。此外，数据库应定期更新，纳入新兴的民族文化元素，保持内容的时效性。

5.2 强化设计师的技术素养与文化认知

设计师是技术与美术融合的核心载体，当前部分设计师存在技术应用不熟练、文化理解不深入的问题。应加强设计师的双重培养：一方面，通过专业培训、 workshops 等形式，提升设计师对数字工具的运用能力，尤其是 3D 建模、VR/AR 等新兴技术的实操水平；另一方面，组织设计师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研，了解民族文化的历史背景与生活场景，增强文化认知。高校应优化美术设计专业课程设置，增设民族文化、数字技术相关课程，培养兼具技术能力与文化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5.3 推动技术与艺术的深度融合，避免表层化应用

部分民族玩偶 IP 设计存在“重技术、轻艺术”的现象，过度依赖数字技术，导致作品缺乏艺术感染力。应坚持技术服务于艺术的原则，将信息技术与美术设计深度融合。在设计过程中，以美术设计为核心，根据作品的艺术需求选择合适的技术手段；例如，在传统风格的玩偶设计中，可采用数字绘画模拟手绘效果，保留艺术质感。同时，鼓励技术创新，探索 AI、元宇宙等新兴技术在设计中的应用，如利用 AI 生成个性化的玩偶形象，借助元宇宙搭建虚拟玩偶社区，提升作品的互动性与创新性。

5.4 完善多元化的市场反馈与评价机制

当前民族玩偶 IP 设计的评价多依赖设计师主观判断，缺乏市场反馈机制。应构建“专家评价+消费者反馈+市场数据”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邀请行业专家、民族文化学者对作品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进行评价；通过问卷调查、用户访谈等形式，收集消费者的使用体验与建议；分析产品的销量、社交媒体热度、复购率等市场数据，精准把握市场需求。建立快速反馈机制，根据评价结果及时调整设计策略，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5.5 加强跨领域合作，构建完整的 IP 产业链

民族玩偶 IP 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完善的产业链支撑。应加强跨领域合作，整合设计、生产、传播、销售等环节的资源。设计环节可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攻克技术难题；生产环节

可采用数字化生产技术，实现柔性制造，满足个性化需求；传播环节可与社交媒体、影视、游戏等平台合作，扩大品牌影响力；销售环节可搭建线上线下联动的销售渠道，结合电商平台与线下体验店，提升消费者的购买体验。通过跨领域合作，构建从设计到变现的完整 IP 产业链，推动民族玩偶 IP 的规模化发展。

6.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系统探讨了信息技术与美术深度融合在民族玩偶 IP 设计中的应用效果，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信息技术与美术的融合贯穿于民族玩偶 IP 设计的全流程，在文化元素提取、形象塑造、交互体验、传播推广四个维度发挥着重要作用，显著提升了设计效率与作品质量；第二，实证研究表明，采用数字技术的实验组在设计效率、作品创新性、文化还原度三个指标上均优于对照组，且消费者对技术融合下的民族玩偶 IP 接受度较高；第三，当前应用中存在民族文化元素数据库缺失、设计师素养不足、技术应用表层化、产业链不完善等问题，制约了民族玩偶 IP 的发展。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构建数字化数据库、强化设计师培养、推动技术艺术融合、完善评价机制、加强跨领域合作等优化策略。

6.2 研究不足

本研究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是实证研究的样本量有限，仅选取了 20 名学生进行实验，且问卷调查的地域覆盖不够广泛，可能影响结论的普遍性；二是对新兴技术如元宇宙、人工智能在民族玩偶 IP 设计中的应用探讨不够深入，缺乏具体的案例分析；三是未对应用效果进行长期跟踪研究，难以评估其长期影响力。

6.3 研究展望

未来可从以下方向进一步深化研究：一是扩大实证研究的样本量与地域范围，涵盖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的消费者与设计师，提升研究结论的代表性；二是聚焦元宇宙、AI 生成式设计等新兴技术，探讨其在民族玩偶 IP 设计中的应用路径，丰富研究内容；三是对典型民族玩偶 IP 进行长期跟踪，评估其文化传播效果与市场可持续性；四是加强国际比较研究，借鉴国外优秀 IP 的发展经验，结合我国民族文化特色，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民族玩偶 IP。

民族玩偶 IP 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信息技术与美术的深度融合为其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相信在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与产业协同的推动下，民族玩偶 IP 将不断突破创新，成为文化产业的新增长点，让民族文化在数字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参考文献

[1]陈楠（2020）。 **数字艺术设计教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刘军（2023）。民族文化 IP 的数字化传播策略研究[J]。*新闻爱好者，(02)*，78-80。

[3]王强（ 2021）。3D 建模技术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优化路径[J]。 *数字技术与应用，39*(10)，187-189.

[4]张岱年，方克立（ 2019）**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5]周珂（2021）。 消费者行为视角下民族文创产品的设计策略[J]。*包装工程，42*(12)，256-262。

[6]Jones, A（2022）. The Algorithm Logic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IP Image Optimization[J]. *Computer Graphics Forum, 41*(3): 121-135.

[7]Smith, J（2020）. Application of VR Technology in Doll Prototype Testing[J]. *Journal of Digital Art & Culture, 15*(2): 45-58.